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邓小平在中原

 **eBOOK**
网络资料 非卖品

邓小平在中原

前 言

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浪潮，作为这场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成为举世瞩目的伟大人物。人们崇敬他，仰慕他，信赖他，更期望了解他的昨天和今天，了解他的全部生涯和业绩。邓小平在中原的革命活动，是人们了解他昨天的历史中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逐鹿中原的斗争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的一幕，历史把邓小平推到了这蔚为壮观的伟大斗争的中心，使他得以施展宏图，大显身手。

在中原，邓小平以他全部的聪明才智和奇韬雄略，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屡建功勋。他和刘伯承密切合作，首战上党和平汉，促进了国共停战协定的签订，他率部连续取得陇海、定陶、巨野等9次战役的胜利，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保卫了华北解放区；他挥师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在长江、淮河、汉水、黄河之间创建了辽阔的中原解放区，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至长江北岸；他领导总前委，指挥了著名的淮海战役，消灭了长江以北国民党军精锐主力；他统率第二、第三野战军，浩浩荡荡渡过长江，一举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所有这些表明，邓小平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和军事家。

邓小平以注重实践，讲究实际而闻名于世，他的这一特点在中原时期亦得到充分体现。在中原，他坚定不移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但又坚持从中原的客观实际出发，不盲从和机械地执行中央指示，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他根据中原新区的实际情况，发表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文章和讲话，提出了创建中原解放区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和策略，并系统总结了开辟新区的宝贵经验，显示了他作为战略家、政治家高瞻远瞩，胸怀全局，独立处理复杂问题的领导能力和艺术。在领导创建中原解放区的实践中，邓小平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以及坚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思想不断成熟和发展。正是这些思想与丰富的历史实践，铸造了邓小平与众不同的风格与特点，使他在几十年后敢于力排众议，拨乱反正，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而他自己则成为一个以务实而著称于世的伟大的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本书力求实事求是地反映邓小平在中原时期的思想、活动轨迹、领导艺术、品格气质、情绪爱好等，为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和研究邓小平提供一些详细和有益的素材。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电文、报告等文献资料，并参考了100多名当事人撰写的回忆录或调查访问记录，对一些重大史实均作了考证，凡邓小平的活动均以文献或当事人的回忆为依据。

由于作者才疏学浅，水平有限，书中可能有一些疏漏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作 者
1993年1月

第一章

争取和平 反对内战 为和平而战

1945年8月25日，一架银灰色的飞机在轰鸣的马达声中从延安机场起飞，向东飞去。飞机上的乘客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薄一波、滕代远、张际春，还有该区的几位著名将领——陈赓、杨得志、陈锡联、王近山等。

邓小平是两个月前来延安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的，现在，他正和他的战友们从延安飞返太行。

飞机在浩瀚的苍穹翱翔，穿过茫茫云海，飞越奔腾咆哮的黄河，横跨绵延数百里的太岳山脉，很快出现在巍峨挺拔、气势磅礴的太行群峰的上空。透过舷窗，俯瞰机翼下那一座座熟悉的山峦，邓小平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师、和一二九师。邓小平先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18日，又接替张浩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师长是刘伯承。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率部深入敌后，以素称“天下之脊”、横贯晋冀鲁豫三省边界的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地，向平原发展。在太行山，他们分兵发动群众，组织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首先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不久，他们又率部越过平汉铁路，东下冀南平原，开辟了冀南抗日根据地、太岳抗日根据地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42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翌年10月，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在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他指挥部队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灭绝人性的“扫荡”，领导全区军民成功地进行了建党建军、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等运动，渡过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到抗战胜利前夕，他所领导的部队，经过8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歼灭日伪军42万余人的辉煌胜利。晋冀鲁豫区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抗日根据地已基本连成一片，形成了西起同蒲路，东抵津浦路，北至正大、德石路，东到黄河的全国7个较大的解放区之一。全区已控制了80多个城市，拥有约2400万人，正规军发展到近30万人，民兵发展到40万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饱经战患的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8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消息传来，举国沸腾，解放区的军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连日来一直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气洋洋的热烈气氛中。从陕北高原到冀鲁豫平原，从山东海滨到太行山脚下，人们欢呼，跳跃，奔走，歌唱。这时，邓小平正在延安，走出窑洞，看着那漫山遍野的沸腾的人群，一张张心花怒放的笑脸，听着那喧天的锣鼓和噼噼叭叭的鞭炮声，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情不自禁地加入到那欢庆胜利的队伍中。

正当全国人民陶醉于迎接和平，庆祝胜利，准备重建家园的时候，蒋介石却在精心策划着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发动全国内战的阴谋。

他一面利用对日伪军受降的权利，命令八路军，新四军“驻防待命”，不许收缴日伪军的枪械，加紧向东北、华北、华东和中原各解放区运兵，准备发动内战，另一面又装出和平姿态，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以共产党人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为交换条件，让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的人民政权，达到消灭革命力量的目的。

对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内战的阴谋，中共中央早就作了充分的估计和准备。抗战胜利前夕，即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深刻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他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毛泽东还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

在邓小平一行离开延安的这天，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确定了在目前严重局面中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一系列方针。宣言指出，中共中央准备派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尽量争取和平，但各地对蒋介石绝不应有任何幻想，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必须集中力量迫使日伪军向我投降，从日伪军手中夺取一切可能夺取的城镇和交通要道，扩大解放区。必须站在自卫的立场上，把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在组织上，中共中央加强了各大战略区的领导力量。8月20日，邓小平在延安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指示，任命他为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刘怕承、邓小平、薄一波、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等为常委。正式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怕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为副政委，张际春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

现在，邓小平和晋冀鲁豫中央局的主要领导人就要回到他们浴血奋战了8年的太行山了。遥望山颠，邓小平十分清楚，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了，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更加严重、更加复杂的新的斗争。在这场新的斗争中，他所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他这次回去的首要任务就是，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一系列对敌斗争方针，领导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用战斗来保卫解放区，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

飞机在太行山区黎城县长凝临时机场降落，李达参谋长派来迎接邓小平一行的骑兵排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顺利地回到涉县赤岸村军区指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28页，第1023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28页，第1023页。

挥部。

回到太行的第二天，即8月26日，邓小平便召集晋冀鲁豫军区的主要领导人开会，研究部署全区的斗争方针和任务。他了解到，晋冀鲁豫区所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从全国战局看，蒋介石正在从他的大后方西北和西南调动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陆续开进。8月下旬，向华北进攻的国民党军，其先头部队第一战区胡宗南的2个军已经风陵渡进抵运城以南，第十一战区孙连仲的3个军经豫西正向郑州一带集中，第十战区李品仙的3个军由安徽的阜阳、太和等地正向徐州开进，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在进

占归绥（今呼和浩特）、集宁两地后正向察哈尔进攻。蒋介石的计划是，夺取华北各大中城市，占领铁路干线和战略要地，进而集中兵力进军东北。由于晋冀鲁豫区处在晋绥、晋察冀、华东和中原解放区之间，在战略上具有四面呼应的作用，又是华北战略区的中央大门，正堵着国民党军北上进攻的道路，所以，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之一。从8月中旬，国民党军便加紧了对晋冀鲁豫区的进攻，盘踞在晋西南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部已进占太原及附近一带，同时，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心区上党地区，企图分割太行、太岳两块根据地，把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逼到山区予以消灭。

对于这种严峻的斗争形势，邓小平在延安时便已预料到了。

8月14日，他和刘伯承电令各军区要迅速扩大解放区，立即扩充野战军，准备打击沿平汉、同蒲路北犯的国民党军，以保卫解放区。8月22日，他又从延安电示李达、谢富治、王新亭等，“应立即行动，消灭阎顽西进部队，求得适时夺取长治。太行、太岳两区对顽军可能到达地区之游击战争及侦察必须加强。”

现在，根据当前的形势和中共中央的方针与指示，邓小平和军区的主要领导人共同研究制定了晋冀鲁豫区的斗争任务：（一）坚决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阻止其沿同蒲、平汉铁路北上的行动，协同兄弟部队打破国民党军进占平津和东北的企图，从日伪军手中夺取一切可能夺取的据点，控制铁路线，扩大解放区。（二）立即集中主力，编组野战军。（三）在新解放区，迅速建立和加强人民政权，开展反奸清算和减租运动。（四）揭露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内战的阴谋，克服一些人“抗战胜利，解甲归田”的麻痹思想，作好反击敌人的一切准备。

在研究部署军事行动时，邓小平、刘伯承等人认为，晋冀鲁豫区在战略上的主要任务是粉碎国民党军在平汉、同蒲两个方向的进攻，而平汉线是南北交通干线，可能成为敌人的主攻方向，更应重视对平汉线的控制。但侵入上党地区的敌人是心腹之患，如不迅速消灭，待国民党军主力北上时，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将遭腹背受敌之虞。因此，军区决定，集中太行、太岳军区主力，进行上党战役，收复上党地区，消灭心腹之患；同时控制平汉线一段，扫清新乡以北平汉线两侧，消灭伪军，准备平汉线上的作战。

8月28日，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以便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并在谈判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面目，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但国民党对谈判根本没有诚意，继续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在晋冀鲁豫区，蒋介石电令阎锡山集中13个师

的兵力，从临汾、浮山、翼城、太原，榆次等地出发，占领了上党地区周围的襄垣、长治、屯留、潞城、壶关等地。这样，为了迅速消灭侵入上党地区的敌人，配合中共中央在重庆的谈判，使中共中央在谈判中能争取更多的主动权，进行上党战役，就成为迫不急待的任务。

9月7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向部队发出了上党战役第一号作战基本命令，随即率指挥部亲赴前线。10日拂晓，指挥部到达故县村。邓小平在向部队战斗动员时提出了“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战”，“为支援毛主席谈判而战”的口号。他说，我们在这里打得越好，消灭的敌人越多，毛主席在谈判桌上说话就越有力量。

9月10日凌晨，战役正式发起。到20日，先后攻占屯留、潞城、长子、壶关等城镇，使据守长治的国民党军陷入孤立无援之境。24日，刘伯承、邓小平下令夺取长治。

长治是上党地区的首府，城高壕深，工事坚固，易守难攻。蒋介石命令阎锡山从太原等地派了8个师的重兵增援长治。刘伯承、邓小平决心采取攻城打援的战术，首先歼灭援军，再回头消灭长治之敌。

10月2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将援军包围在屯留、 亭地区，并将其全部歼灭。10月8日，长治之敌弃城向西突围，12日，被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全部歼灭。

上党战役是邓小平、刘伯承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第一次大战役，也是部队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的运动战转变的第一次大战役。在8年抗日战争中，部队多年分散在各地，长期进行山地战、游击战，而且编制不足，装备很差，只有半数的团有几门迫击炮，3至4挺重机枪，许多战士行军打仗时甚至扛着大刀、长矛。所以，要立即集中部队，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是很困难的。邓小平主张在实战中采取边战、边教、边打、边学的办法，锻炼部队，迅速提高部队正规战的能力，使部队的思想、作风和战术逐步适应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军事战略转变。在上党战役中，他号召广大指战员克服困难，不怕牺牲，顽强作战，以战斗和生命保卫解放区，争取实现和平。

上党战役打了1个月零3天，取得的成果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共歼敌11个师和一个挺进纵队计3.5万余人，缴获山炮24门，轻重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

装备不足，常年钻山沟的游击部队第一次打败了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正规军，这在全国不能不引起强烈反响。它表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正在成功地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的运动战转变，它完全有能力粉碎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在今后的战争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上党战役的胜利，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后方，同时，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

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正式签订《双十协定》。同日，邓小平从上党前线回到涉县赤岸村晋冀鲁豫军区指挥部。

这时，蒋介石正在加紧实现抢占平津，夺取东北的计划。他把《双十协定》作为缓兵之计，利用美国的舰艇、飞机昼夜不停地把他的部队运到华北和东北，同时，令其主力部队加快速度，从陆地向北推进。10月中旬，胡宗南的先头两个军经同蒲、正大路，进抵石家庄，其后续部

队已到达晋南闻喜。沿平汉路北进的孙连仲部三十军、四十军和新八军，10月14日从新乡出发，计划10天左右到达石家庄与胡宗南部会师，其后续部队4个军已到达新乡，企图与进占石家庄的胡宗南部一起夹击已被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占领的邯郸，然后继续北进。

10月12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山东、华中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至快还须一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须两至三个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毛泽东还电告刘邓，可集中太行、冀鲁豫6万以上兵力，在刘邓亲自指挥下，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或大部。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立即着手部署以邯郸为主要战场的平汉战役，以阻止国民党军北进，配合山东、华中主力争取东北的斗争。10月16日，刘伯承、邓小平联名发出《平汉战役作战基本命令》，指示部队分路西军和路东军，在邯郸东南的漳河、滏阳河河套地区钳击沿平汉线北进的敌人，将其分割包围，各个歼灭。随后，将指挥部移至邯郸县的峰峰煤矿。

10月22日，国民党四十军，新八军、三十军共4.5万人渡过漳河，占领磁县，24日，进至邯郸以南马头镇地区。同日，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各路部队发起攻击，并对敌人形成四面包围的态势。敌人一面收缩阵地，一面等待援军。这时，敌人内部开始出现危机，高树勋的新八军已出现动摇的迹象。邓小平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指示做好对新八军的争取，瓦解工作，尽一切可能说服高树勋起义，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其实，争取高树勋的工作在这以前便已悄悄进行了。高树勋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由于近几年来在国民党军中受歧视、遭排挤，有靠近共产党的意图。早在上党战役打得正酣时，高树勋就派他的使者王定南秘密来到山西黎城刘邓前线指挥部，交给邓小平一封他写给彭德怀副总司令的信，表达他愿意和共产党友好合作的愿望。邓小平热情地接待了王定南，对他说：“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准备做这项工作。为了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使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必须在国民党军中开辟新的战线，首先要争取受蒋介石排挤、歧视的非嫡系部队，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面来。你赶快回去，继续做好高树勋的工作。”

王定南还未来得及返回新八军，高树勋已奉命率新八军和河北民军到了磁头马头镇。邓小平立即派人将王定南追回，告诉他：“情况变化很快，高树勋的新八军和河北民军已到马头镇。党中央指示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国民党这3个军北进，这是我们当前最严重的战略任务。”他又说：“现在，你马上到马头镇去，对高树勋将军讲，形势紧迫，他要立即就地起义，配合我们完成阻止国民党军北上的战略任务。”

当王定南把邓小平的话转告高树勋时，他最初的反应比较犹豫，后来他得知刘邓已电请中央设法接应他在徐州的妻子和全军的家属时，便下了起义的决心。在发起总攻前，邓小平又派李达参谋长前往新八军军部，敦促高树勋起义。

10月30日，高树勋宣布新八军和河北民军1万余人起义，使固守马头镇的国民党四十军和三十军很快土崩瓦解。31日拂晓前，敌人主力向南突围。

11月1日夜，刘邓命令部队突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的指挥部，第四十军、三十军顿时乱作一团，失去了指挥。马法五被俘，其余大部被歼灭。平汉战役于11月2日胜利结束，共歼敌2万余人。这次战役的胜利在国民党内部又一次引起强烈震动，它保卫了晋冀鲁豫解放区，阻止了国民党军沿平汉线的北进，对中共中央调整战略部署和争取国内和平的斗争，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前后，其它战场也取得了胜利。10月18日到12月14日，晋察冀和晋绥军区主力进行了绥远战役，歼敌1.2万人，解放绥东6县；10月18日到1946年1月13日，山东军区进行了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歼敌2万余人，粉碎了蒋介石限令11月底打通津浦路的企图，迟滞了国民党军北进的时间。与此同时，中原解放军在鄂豫皖地区的战略坚持使蒋介石难以抽兵至华北，而在东北，解放军11万大军和2万余名干部已陆续到达，使蒋介石独占东北的阴谋破产。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于1945年12月15日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宣布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促成中国的统一。同时，派马歇尔将军专程来华“调停”内战，说服中国政府，停止内战，召开包括主要政党代表组成的全国会议，实现中国的统一。

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5日，中共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关于《国共两党停止军事冲突协议》（即停战协定），1月10日，双方颁布了《停止军事冲突命令》，规定双方军队于1月13日午夜就各自的位置上停止军事冲突。从这时起，中国结束了5个月来的军事政治斗争，暂时实现了国内和平局面。

停战时，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驻在武安县的伯延镇。1946年3月2日，他又率领机关从伯延镇移驻平汉线上重镇邯郸城内。

丢掉和平幻想准备严重斗争

邯郸，位于河北省南部，是华北的一座历史名城。战国时期，它是赵国的国都，自从赵敬侯由晋阳移都到此地以来，这个城市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至今，城内仍保留不少战国时期的古迹遗址，如赵国宫女的“梳妆楼”、“照眉池”，蔺相如的“回本巷”，还有座落在城西的古丛台等，这些，都默默无闻的向人们记录着当年赵国的历史。

近代以来，由于邯郸地处平汉线北段，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抗战时期，侵占华北的日军第一混成旅即以邯郸为旅团部的所在地，并以邯郸为据点，向太行根据地多次空前的大扫荡和经济封锁，同时，大肆掠夺邯郸周围武安、磁山、上党等地区的铁矿、粮食与山货，在邯郸集中、装车，运往各地。抗战胜利后，据守邯郸的日伪军拒绝向八路军缴械投降，并凭险负隅顽抗。1945年10月1日，邓小平、刘伯承在指挥上党战役的同时，命令太行、冀南军区部队向邯郸守敌发起进攻，经数日激战，于10月4日解放邯郸，邯郸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在战国时期，由于赵国“东邻燕齐，两边秦、烦楼、南界韩、魏，北迫匈奴、数距四方之敌”，故邯郸曾被称为“四战之国”。现在，它仍然是“四战之地”，东要协同山东、苏北作战；西要配合陕甘宁的斗争；北与晋察冀相呼应，南要支援中原解放军。正因为邯郸具有这种

特殊的战略作用，邓小平、刘伯承才决定把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迁到此地，以便领导全区部队，负起“四战之军”的光荣任务。

自从邓小平、刘伯承率领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领导机关移驻邯郸后，邯郸便成为华北最大的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连日来，这个古老的小城突然变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城里郊外，大街小巷，到处是满载物资的大车和身着灰色军装的干部、战士，邓小平也不断地四处走走，到各机关检查了解情况，以便部署下一步的工作。

停战命令发布以来，表面上看，国民党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一些主要地区的军事冲突也有所缓和，国共两党正在就划定停战线，整编军队，改组政府等问题进行和平谈判。但实际上，国民党对谈判根本没有诚意，国民党军对解放区边沿区的蚕食和进攻也从未停止过。在东北，国民党不承认解放军在东北的地位，命令军队继续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在中原，国民党一边同中原军区进行谈判，一边加紧对中原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在晋冀鲁豫区，国民党不断派出军队，沿交通线侵占晋冀鲁豫解放区边沿城镇，并利用大量的伪军，地方团队，袭击、骚扰解放区边沿村庄。从1月14日到4月底，国民党军对该区的军事进攻已达到920次，其中万人以上的进攻有4次，千人以上的有40次，百人以上有110多次。

鉴于国民党军不断向晋冀鲁豫区发动进攻，1946年3月3日，三人小组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飞抵新乡，召集驻该区的国共双方军队最高指挥官，谈判关于执行停战协定的具体问题，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参加了这次谈判。由于国民党没有诚意，谈判未获任何实质性结果。在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国民党军仍不断破坏停战协定，在解放区边沿区制造军事冲突。一系列事实和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停战、谈判是假，而利用谈判部署、发动内战是真。事实上，内战的阴云一直笼罩着中国，内战的危机时时刻刻都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教育全区的干部、战士充分认清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如何正确解决一部分同志思想上存在

着的松懈意志、和平幻想、居功自傲和厌战情绪；如何调动各方面力量，做好反内战的各种准备，以便在将来的自卫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邓小平和晋冀鲁豫中央局面临的首要问题。

早在平汉战役刚结束不久，邓小平便于1945年11月10日，在峰峰煤矿主持召开了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对全区的工作作了初步的安排。会议决定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两件大事》的指示，在全区展开大规模的减租、生产运动，同时，统一全区财政经济领导与供给标准，以支持长期战争。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严肃批评了平汉战役胜利后一部分同志思想上存在着的居功自傲倾向和厌战情绪，号召全体指战员充分认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从思想上作好应付长期战争的准备。

停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不断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1946年3月中旬，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公开否定政协通过的宪法草案修改原则。不久，国民党又召开“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反对政协决议的议案，并声称，要继续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邓小平在检查直属队练兵情况时说：“同志们，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企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因此，大规模的内战危机严重存在。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练兵，作好应付内战的准备，歼灭一切敢于进犯解放区的敌人。”

4月4日，邓小平和刘怕承、滕代远、薄一波等联名签发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准备应付内战的指示》，4月25日和5月8日，又联名签发了《晋冀鲁豫军区军事斗争纲领》和《关于应付大规模内战加强准备工作的指示》。这些指示的中心内容是，提醒全区各级领导干部和战士，对国民党反动派保持高度的警惕，揭露敌人破坏停战的阴谋，利用停战时机，抓紧练兵，放手发动群众，搞好减租和生产，作好应付全面战争的各种准备。

在邓小平和晋冀鲁豫中央局的领导下，晋冀鲁豫解放区掀起了大规模的减租、生产高潮。许多地区开展了反奸清霸运动，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就立即转入减租减息运动。在一些老解放区，则进行查减运动，对减租减息不彻底的村庄，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复查。通过减租减息，在经济上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限制了地富剥削，不少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耕牛、农具，激发了其生产热情，促进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调动了农民支持长期战争的积极性。

在领导解放区的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的同时，邓小平把大量的精力投注干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方面。

1945年12月，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和各解放区的民兵基干团通过整编，正式组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刘怕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野战军指挥部辖6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后王维纲）；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宏坤（后王近山），政委段君毅（后杜义德）；第七纵队司令员杨勇，政委张霖之。到停战命令发布时，晋冀鲁豫全区的主力部队已发展到31万余人，多数纵队用缴获来的武器装备了部队，还建立了炮兵营。野战军的正式成立，部队人数的增加和装备的改善，为进一步适应大规模的运动战创造了条件。

军队人数的发展和装备武器的改进，固然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主要因素，但部队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的优劣，则更能体现部队的综合战斗能力，而这一点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其它反动军队的本质区别。作为政治委员，邓小平不仅重视部队人数、装备的发展，而且还十分注重培养和锻炼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因为他一向认为，只有素质优良的部队，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才能不断地适应战争的变化，保证赢得战争的胜利。特别是从抗战胜利到全面战争爆发的这段时间，随着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化，部队作战的环境、作战的任务和对象以及作战的方式都起了很大的变化，部队正处在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的运动战的转变时期，如何带领部队迅速实现这种战略转变，如何使部队尽快地彻底适应大规模的运动战，更好地完成党中央交给的战斗任务，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军建军，提高部队政治、军事素质的重要内容。

在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中，部队虽然取得了胜利，但那是靠八年抗战小米加步枪的精神，靠战士们死打硬拼的顽强战斗作风换来的，是付出了很大牺牲和代价才争取来的。今后，更大的、更残酷的战争还在后面，光靠英勇牺牲精神和死打硬拼是不够的，还必须教育全体指战员努力克服长期游击战争所带来的游击性和地方性，充分认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从思想上来一个彻底的转变。同时，利用停战时机，训练和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改变战术，掌握攻坚、野战技术，培养和锻炼一支打不垮，过得硬，素质优良的军队。为此，邓小平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峰峰会议上，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军队中恢复党委制的决定，指示首先在各纵队和旅建立党的委员会，在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此后，又根据工作的需要，逐步加强了团以下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轮训了党支部委员、党小组长，并吸收了大批战斗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战士入党，普遍进行党的教育，充分发挥了党组织和党员在部队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停战期间，邓小平指示部队深入进行形势教育和人民军队本质的教育，各部队通过列举国民党军不断破坏停战协定，向东北、华北和中原解放区进攻，积极准备内战的大量事实，教育指战员，使之认识到全面内战危机的严重性，从而克服了麻痹倾向，和平幻想，提高了斗志，进一步做好了应付内战的思想准备。

为了更好地配合部队的政治教育，邓小平授意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编一本进行人民军队本质教育的小册子，阐述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建军原则和建军思想，作为人民军队本质教育和改进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教材。不久，《人民军队的建设》一书出版并发到各个部队。这本书对提高部队政治觉悟和军事战术水平，增强战斗力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多年的戎马生涯和政治工作中，邓小平逐渐积累了一套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并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他讲究实际，注重效率，反对浮夸拖拉，空话连篇；他主张深入基层，“一竿子插到底”，反对层层下达，延时误事。正因为如此，他时常到连以上干部会上讲话、作报告，以便把上级的指示精神一下子传达到基层，迅速贯彻落实。他还十分欣赏报纸在政治工作中的特殊作用，认为这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最快、最好和最有效的工具。

对于办报，邓小平颇有经验。1933年，他在主编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时，曾对《红星报》的宗旨和功能作了恰如其分的论述，他说：“《红星报》是一面‘大镜子’，要反映红军的工作、生活；是一架大‘无线电台’，要传播红军、地方以及全世界革命斗争的消息；又是一个‘政治指导员’，要帮助红军指战员提高思想，改进工作。”从这里可以反映邓小平办报的指导思想。

正因为报纸能够尽快地将上级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基层，让全体指战员及时地了解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同时又能及时反映战士们的政治思想、军事训练和生活方面的情况，邓小平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创办《人民的军队》，发到各个连队，让战士们互相传阅、学习，以配合正在进行的时势教育和政治教育。

1946年3月24日，晋冀鲁豫军区机关报《人民的军队》创刊了、邓

小平欣然提笔，作了如下题词：

“人民军队的责任是随时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今天我们必须亲自动手，努力生产，克服困难，以减轻人民负担，使人民经济向上，逐渐恢复8年战争的创伤，走向丰衣足食的道路。”在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同时，邓小平和刘伯承加强了部队的军事训练。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蓝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各地在接此指示后，应“立即下令全军练兵，上级督促检查，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5月中旬，晋冀鲁豫区召开了训练会议，颁发了3个月的练兵指示，要求全区部队和各地方武装立即掀起大规模的练兵运动，通过练习射击、爆炸、投弹、参战演习等，提高部队战术和技术水平。6月中旬，邓小平和刘伯承在邯郸主持召开了晋冀鲁豫区高级干部练兵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严肃指出，全面内战危机已十分严重，部队必须加紧练兵，作好一切准备，以应付全面战争的爆发，他严厉地批评了忽视练兵的个别高级领导干部，指出练兵运动不只是战士们的事，各级指挥员要亲自动手，具体指导练兵运动，不要只委之于训练部门，自己当“阅兵大臣”。这天散会后，邓小平、刘伯承、李达、张际春等带领各纵队、旅首长来到打靶场上，亲自指导练兵，为全军做出了表率。通过几个月的政治整训和军事训练，全区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已有显著提高，他们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打掉了和平幻想，从各方面作好了应付全面战争的充分准备。

6月中、下旬，局势进一步恶化，蒋介石加紧调兵遣将，部署内战，在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和中原，国民党军重兵压境，内战危机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邓小平、刘伯承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讨论确定了战争爆发后全区的工作方针：第一，争取战争的胜利；第二，任何时候不放松对发动群众和生产的领导，第三，在战争中部队应坚持利用一切空隙练兵，提高技术和战术。

6月23日，邓小平签发了晋冀鲁豫中央局紧急指示，要求全区党政军民立即动员起来，迅速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工作，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心，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第二章 南进探路 毛泽东出击中原 战略的支持者

正当邓小平领导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为应付全面战争而日夜紧张地工作时，从中原传来了内战的隆隆炮声。几天后，蒋介石下令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及海南岛等解放区，这样，首先自中原爆发的内战便迅速扩展到所有的解放区，终于形成一场全国规模的内战。

历史证明，这场震撼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内战是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气势最波澜壮观的战争，它不仅是国共两党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大决战，也是双方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大较量。

作为这场战争的发动者——蒋介石，他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意图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首先消灭中原解放军，然后主力由南向北逐步压缩，控制解放区的城市 and 交通线，把解放军主力聚歼在华北解放区。

毛泽东的方针历来是针锋相对，根据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战争爆发前夕，提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北线和南线作战的战略方案。关于南线作战，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封给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毅、舒同的电报，提出了关于《全局破裂后太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毛泽东在电文中指出：“太行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尽可能攻取长垣、考城、民权、兰封、封丘、宁陵、睢县、杞县、陈留、通许、太康、柘城、淮阳、商丘、鹿邑、两华各点，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山东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取黄口、砀山、虞城、涡阳、夹沟、符离、宿县、任侨、固镇（即徐蚌间）各点，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毛泽东在电文中还提出了豫东、徐州作战之后下一步的战略计划，即“上述作战胜利（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后，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

南线作战计划明确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

其核心主要有两点：一是敌进我进，逐步向南，把战争引向国统区，在外线大量歼敌，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显而易见，这与蒋介石的由南向北，逐步压缩，把战争扭在解放区打的战略方针是针锋相对的。从1945年8月到1946年6月，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经过战略调整，逐步将主力集中在北方，这就形了解放军主力在北，国民党军主力在南的战略态势，根据这一布局，蒋介石的战略是由南向北进攻，而毛泽东的战略则是敌进我进，逐步向南；蒋介石要把战场摆在解放区，在华北消灭解放军，而毛泽东的战略则是跳到敌人的后方，在外线歼敌，破坏蒋介石的进攻计划。所以，毛泽东在阐明他的战略计划的意义时指出：“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介石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如能逐步渡淮河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

毛泽东南线作战计划的另一核心是：出击中原，援助五师。毛泽东

提出了外线出击，逐步向南的战略，并且明确指出，外线出击的目标是中原。

中原解放区，是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在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处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日本投降前，五师积极发展根据地，缩小沦陷区，逐渐形成了对战略要地武汉的包围态势。抗战胜利后，武汉成为国民党自大后方进军华东、华北和东北的战略枢纽，所以，国民党先后调 20 多个师，计 30 万兵力，加紧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企图首先消灭中原解放军，打通向华北、华东和东北进军的道路。停战令颁布后，国共双方虽就中原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签订了《汉口协议》，但国民党对中原的军事蚕食和经济封锁并未停止。到内战爆发前，中原解放区只剩下罗山、光山、经扶（今新县）、礼山之间，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的狭小地区。

鉴于中原解放区处在国民党军层层包围之中，又难以得到外界的支持和援助，1946 年 5 月初，中共中央曾指示中原军区，在情况紧急时准备以一部兵力坚持原地斗争，而主力可分路向西突围，转移到豫西、鄂西北、陕南、川东地区活动。6 月 23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中原局的指示，同意中原解放军“立即突围，愈快愈好。”6 月 26 日，当蒋介石下令进攻中原解放区时，中原解放军已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分路向西突围。蒋介石围歼中原解放军的阴谋遂宣告破产。

毛泽东预料，中原解放军向西突围后，必然把敌人主力全部引向西边，而“郑州以南之平汉线及其以东广大地区包括大别山在内，颇为空虚”，形成敌人的战略弱点，所以，毛泽东提出了大行、山东两军在豫东、徐州地区作战，并相机出击中原的战略计划，他认为“这一计划可保障五师不致被消灭或吃大亏”。

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提出了南线作战的战略计划后，即征求南线各战略区首长的意见，以便“速定战略方针”。南线各战略区首长，从打破蒋介石的军事进攻计划，争取和平的愿望出发，原则上都拥护中央军委的这一计划，只是就当时军队的部署、作战的形式等具体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作为晋冀鲁豫战略区最高指挥员之一的邓小平，他的态度更为积极和明确，他在看完了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与刘伯承联名回电，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战略计划，同时，将敌人在豫北、豫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和战略企图报告中央，以供毛泽东参考。

邓小平对毛泽东出击中原的战略计划所以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明朗的态度，除了他认为该计划是打破蒋介石进攻计划的最佳方案外，还有其与众不同的原因，这就是早在十几年前，他就是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的支持者。

1931 年 8 月，邓小平从上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这时，他曾经领导的红七军已冲破敌人的层层围困，与中央红军会合，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处在第三次反“围剿”的艰难困境中，形势十分严峻。邓小平到任后，立即召开瑞金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前一时期蒙受冤屈的干部和群众平反，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迅速提高，局面也大为改观。1932 年冬，他调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半年后，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1933 年 1 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迁入中央革

命根据地。临时中央一到瑞金，便积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打击、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当时，邓小平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他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城市中心论”，赞成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和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的正确的战略战术。邓小平的态度和做法触怒了临时中央，他们在反对毛泽东的同时，以批判所谓“江西罗明路线”为由，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邓小平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

1933年3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在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公开批判会、寻、安的“罗明路线”。3月31日，作出《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宣布“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5月4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又作出《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指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攻击邓小平等人“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

面对“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邓小平并没有屈服，他连续两次递交了申明书，以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和坦荡的胸怀，反复陈述自己的态度是光明磊落的，自己所坚持的毛泽东的路线和主张也是正确的。但是，“左”倾机会主义者根本无视邓小平等人的申辩，并于5月5日，批准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撤销了邓小平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派到边远的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毛泽东及其他的支持者，无一例外的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罚，剥夺了党的领导权，这不能不给接踵而来的第五次反“围剿”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这时，毛泽东虽已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但仍竭力主张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围攻线，进攻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威胁敌人的后方和心脏地区，迫使敌军回援，以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当时中共中央仍坚持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使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遭受到重大损失，最后，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

后来，邓小平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无不痛心地说：“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在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时，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针，由内线转到外线，将敌拖出苏区之外去打就好了，那样苏区还是能够保持，红军也不致被迫长征。可惜“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这样做，中了蒋介石的计。”

现在，历史又出现了与十几年前极为相似的情景，蒋介石又要调集重兵对解放区和人民发动进攻了，而且这一次蒋介石又要故伎重演，企图把战争扭在解放区打，来削弱解放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解放军不能持久作战。但是，历史是不会重复的：蒋介石自以为他的战略和手段最高明，万无一失，能够出奇制胜。但他犯了一个战略家绝不应犯的

错误，这就是他忽视了他的对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那个党和军队了，经过十年内战，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经过 8 年抗日战争的锻炼和考验，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不成熟到成熟，已经成为一个能够带领全国人民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人毛泽东也不再是十几年前的那个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国情，只懂得“城市中心论”、“武装暴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王明。无论是聪明才智，还是政治、军事各个方面，毛泽东都远远胜蒋介石一筹，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看准蒋介石还没有发动全面内战之前，就看清了蒋介石的战略意图，从而根据蒋介石的战略，制定出外线作战，出击中原的战略计划。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和胸怀战争全局的战略思想，是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根本不可能预料到的，而这正是日后蒋介石兵败中原的主要原因。

作为毛泽东出击中原战略的主要实施者邓小平，他对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他那战略家的广阔胸怀体会得更深，他曾在一次报告中讲到：“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要把战争扭在解放区打，这是他从长期反人民战争中得到的经验。”蒋介石的“这个如意算盘是高明的，但是还有更高明的毛主席，他从确定自卫战争的方针时起早就看清这一点”。

在后来的实践中，毛泽东依据战局的变化，虽然多次调整预定计划，但外线作战，兵出中原的战略并没有变，因此，外线作战，兵出中原便成为晋冀鲁豫军区和华东解放军在战略防御阶段的长期战略方针。为了实现这一战略，邓小平和刘伯承以及他们领导的军队，作了多次的艰苦不懈的努力。

马头镇誓师

1946年6月28日，邓小平、刘伯承、薄一波等乘吉普车离开邯郸，向磁县马头镇方向奔驰而去，准备参加在那里召开的第三、第六纵队自卫反击作战誓师动员大会。

夏天的清晨，阳光和煦，清新宜人，这对于连日来一直处在紧张繁忙的备战状态的人来说，是多么的轻松惬意。尽管这轻松的感觉只是短暂的，甚至是一瞬间的，但它也足以令人心满意足了。

一片浓荫遮盖的村庄，马头镇到了，这里距邯郸城只有十几里路。从远处望去，村头有一片郁郁葱葱的古松老柏，那里掩映着一座气势雄伟壮观的古丛台，当地的百姓们都晓得，这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庆祝胜利，观看军事演习而专门修建的。邓小平把今天誓师大会的地点选在这里，可以说是独具匠心。

会场设在离古丛台不远的一片旷野里，在一片煤堆上，人们用木板临时搭建了一座检阅台，简陋而朴实，看不出任何精雕细凿的痕迹，与宏伟的古丛台形成鲜明的对照。检阅台的周围是一排排穿着灰色军装的战士，他们肩上的刺刀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耀眼夺目，在这一望无际的灰色的海洋的簇拥下，高高的检阅台显得更加庄严和神圣。

邓小平与第三、第六纵队的首长陈锡联、彭涛、王近山、杜义德一一握了手，便健步登上了检阅台。今天，邓小平显得格外精神，虽是大热的天，他却穿戴得整整齐齐。平素，他很注意自己的仪表、风度，尤其遇到象今天这样的隆重场合，更是一丝不苟。尽管他个头不高，也没有标准军人那槐梧的身材，然而，他那身整齐的装束，气度不凡的言谈举止和严肃的表情却处处显示出一种气宇轩昂、威武潇洒的军人气质，使人感到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军人。

邓小平站在台中央那张铺着花线毯的桌子后面，目光扫视了一遍台下那一排排整齐的队伍，开始了他的动员报告：

“同志们，国民党已经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了！中原解放军主力已撤出宣化店，分路向西突围，我们也要做好最后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空旷的田野里一片寂静，只有邓小平那宏亮、激昂、铿锵有力的声音在回荡：

“经过8年抗战，我们取得了胜利，人人都希望结束战争，家人团聚，安居乐业，建设家园。但蒋介石不顺从民意，不适应历史潮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只有奉陪到底，用枪杆子打出和平来。”

邓小平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现在，蒋介石调集了193个师，约160多万人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仅我们晋冀鲁豫解放区周围就有28个师，约24.9万人。敌人已经气势汹汹地向我们逼过来了，我们只有迎上去，消灭他们，才能保卫解放区，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大战之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是违背人民意愿的，必须遭到人民的反对。而我们的自卫战争是正义的，是顺从民意的，必然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我们的装备和力量虽然暂时还不如蒋介石，但

我们一定能够打败他，一定能够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邓小平讲完了战争的形势和晋冀鲁豫解放军所担负的任务后，把话锋一转，向大家解释了在古丛台附近召开誓师大会的原因，而这正是许多指战员从一开始就感到困惑不解，急于想知道的问题。

“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国土。这个古丛台是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古迹，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了。”邓小平燥着那口浓重的四川口音，抑扬顿挫地向大家讲述着 2000 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段故事。

2500 年前，武灵王在赵国继位。当时的赵国国势衰弱，常受秦、齐等大国和匈奴、胡人等外族的欺侮和侵扰。由于赵国无力抵抗，常吃败仗。赵武灵王在率兵作战的过程中，发现胡人穿的衣服短小，骑马射箭极为方便，而自己的将士则宽袍长带，坐着笨重的战车，行动极其迟缓。他决心学习胡人，改革军队的服装，要将士们舍弃战车，学骑马射箭。他不顾朝野的反对，亲自骑马射箭。后来，赵国的军队果然一天天强大起来，并打了不少胜仗。赵武灵王十分得意，为了观看军事操演，庆祝胜利，他下令大兴土木，在这里修建了这座丛台。

邓小平用手指了指那座气势宏伟的古丛台说：“今天，我们把大家集中在这座古丛台前，目的就是要全体战士懂得胡服骑射的道理。我们的古人尚且知道要改革军事，以适应战争的需要，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军队，更应懂得实施战略转变的重要意义。全面战争爆发后，形势变了，作战的对象也要变，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强大的，是用全新的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正规军，如果我们不彻底摒弃过去的分散游击的战术，不从思想上来一个战略转变，就不能对付新的战争。”

誓师大会结束后，邓小平、刘伯承和其他晋冀鲁豫军区的首长们一起检阅了部队。最后，邓小平来到即将出发的第六纵队前卫团，和战士们一一握手。看着眼前这些全副武装、精神抖擞的战士们，邓小平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笑容。经过几个月紧张的政治整训和军事大练兵，他的部队再也不是 10 个月前刚从太行山下下来的“土八路”了，而是具有良好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具备较高野战、攻坚能力，能适应大规模运动战的正规兵团，有了这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就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党中央交给的艰巨任务，胜利实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他充满信心地鼓励战士们说：

“要记住，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也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你们要做智勇双全的战士，党就靠着你们，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多打胜仗！”

出发前，邓小平对后方的工作作了全面的安排。6 月 27 日，他在邯郸主持召开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会议，部署了全区的军事力量：邓小平、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率领野战军第三、第六、第七 3 个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主力一部，执行豫东方向作战任务；陈赓、谢富治率第四纵队和大岳军区一部，执行晋南方向作战任务；腾代远、王宏坤、薄一波等负责军区工作，其任务是组织各军区武装，对付豫北平汉路及道清路的敌人，保证主力侧翼的安全，同时，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配合野战军主力作战。

7 月 10 日，邓小平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在邯郸召开了 4000 余人参加

的党政军干部大会，号召全区党员、干部树立必胜信心，配合主力部队，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7月14日，正式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一天，邓小平和刘伯承乘吉普车从邯郸出发，率指挥部开赴冀鲁豫前线。

一出陇海向南探路

汽车沿着泥泞、坑坑洼洼的小路，冒着酷暑烈日一直向东驶去。穿越一座座绿荫掩映的村庄，绕过一片片一望无际的青纱帐，7月下旬来到鲁西南地区的菏泽县。

这时候，中原解放军在李先念、王震、王树声等率领下，已全部撤离豫鄂边区，越过平汉铁路向豫陕、鄂西北方向突围，而原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30多个旅，全部被李先念的突围部队牵引到豫西、陕南、鄂西北一带。这就造成陇海路开封、徐州之间以及铁路以南、新黄河以东以北广大地区的空虚。只有国民党整编第六十八、五十五师6个旅及地方团队担任守备，其中整编第六十八师3个旅分布于长垣、开封、杞县地区，整编第五十五师3个旅分布于考城、兰封至商丘之线，主力在商丘地区。虞城、刘堤圈及其以东的铁路沿线和徐沛段以南的10多个县城的守备部队全是地方团队。这一形势表明，执行中央军委原定的豫东作战计划的时机成熟了。

8月2日，邓小平、刘伯承在菏泽野战军指挥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于8月10日发起陇海路战役，将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攻取黄口、砀山、虞城，右路军攻取民权、兰封，然后主力越陇海路南下，攻占豫东各县，以策应华东主力和中原解放军作战。

邓小平在会上充满信心地说：“陇海路是蒋介石向华北、华东、西北、东北运送兵力和物资的生命线，也是他的致命伤，只要我们在这条大动脉上打得好，敌人进攻解放区的全部计划就会乱了套，这就叫作牵一发而动全身。”

8月6日，刘邓再次电告中央军委，表示出击陇海路的时间和计划不变。

毛泽东接到刘邓的电报后，即于9日，以中央军委名义回电，表示同意8月10日开始作战。毛泽东在电报中告诉刘邓，目前程潜、刘峙、胡宗南及重庆所属的30多个旅“全部用于对付我中原军，故我中原军负担极重，急须援助”。他要求刘邓军在发起陇海路作战的一个月内，“占领汴徐线及豫东淮北十余县，并歼敌二至三个旅，”“迫使蒋介石从我中原军方面抽掉数个旅向东向北增援。”毛泽东欣慰地指出，如果刘邓、陈粟两军能在苏中、淮北、豫东地区取得胜利，并调动围攻中原军的数个旅回授，“使我中原军能在陕西、豫西、川东、鄂西、鄂中、鄂东、皖西等七八处地方站住脚跟，即是战略上一大胜利”。

8月10日，陇海路战役开始。这天夜里，月色朦胧，辰星闪烁，各纵队一路急行军，悄悄穿过陇海路北侧据点密布的30公里纵深地区，向正在沉睡的陇海路徐（州）汴（开封）间的敌人发起猛攻。经过激烈战斗，11日拂晓，第六纵队攻克兰封城，第七纵队攻克砀山城。到12日，各部队又先后攻克李家集、杨集、刘堤圈、柳河集等10余处车站，歼敌5000余人，控制与破坏铁路150公里，完成了第一阶段作战任务。

8月13日，敌整编第五十五师一八一旅由商丘向西增援，进抵柳河集以西地区；敌整编第六十八师4个团由开封东援，进到罗王以西地区。同时，蒋介石被迫从追击中原解放军的部队中抽调整编第四十一、第四十七、第三师回接开封。

中央军委指示，乘敌援军尚未到达时，越陇海路南下，在豫东地区展开攻势，迫使敌人将豫、陕调动的援军向新黄河布防，使其不能集中于开封一处向我进攻，以争取时间，各个歼敌。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和刘伯承等研究确定了第二步作战计划，即以第三、第六纵队各一个旅钳制敌整编第六十八师并继续围困民权之敌；第三纵队攻歼敌第一八一旅，尔后南下夺宁陵、睢县；第六纵队主力南下夺取杞县、通许；第七纵队主力西进夺取虞城、马牧集后，南下夺取亳县、柘城、鹿邑、淮阳等城。14日，各纵队按计划投入战斗。

15日，第六纵队主力攻克杞县，冀鲁豫六分区部队攻克通许，故夏（邑）永（城）虞（城）联合指挥部指挥长蒋嘉宾率4000余人在虞城起义。

17日，第二阶段作战命令被敌人截获，刘邓军夺取豫东十余县的作战意图完全暴露。而这时，敌人的援军正向豫东逼进。西面豫陕来援之敌先头3个旅，除1个旅向新黄河以南布防外，2个旅已到达开封、阳武、封丘地区，后续4个旅正继续开进；东面徐州敌人也开始西援。邓小平、刘伯承当机立断，迅速改变作战部署，放弃攻城计划，集中第三、第七纵队主力全力围歼第一八一旅，同时以第六纵队1个旅集结兰封待机，其罗王附近部队以运动防御迟滞东援之敌，调第二纵队到东明地区，掩护主力侧背安全。

21日，全歼敌第一八一旅和第二十九旅1个团。这时，敌人两路援军整编第三、第四十一、第四十六师已全部到达开封、长垣、新乡地区；东路援军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第八十八师进至砀山、夏邑以东地区，企图夹击刘邓主力。邓小平、刘伯承遂决定结束战斗，将主力转移到陇海路以北休整，陇海路战役于8月22日结束。这次战役共作战13天，歼灭国民党正规军2个旅和5个保安

团，计1.6万余人，解放砀山，虞城、兰封、杞县、通许5座县城，占领车站10余处，破坏铁路150公里，截断了敌人东西交通线。刘邓军进行陇海路战役的结果，达到了预定的战略目的之一，这就是迫使蒋介石从围堵中原解放军的部队中抽调3个整编师回援开封，又从华北战场调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到冀鲁豫战场，这就减轻了中原解放军的压力，使其能在豫西、陕南、鄂西北等地站稳脚跟，创建新的根据地，同时配合了华东战场的作战。但由于战局变化，敌人迅速增援，原定乘胜出击豫东并占领十余县的计划却未实现。按照中央军委预定的战略部署，在邓小平、刘伯承率部发起陇海路战役的同时，山东野战军在东部发起朝阳集战役和泗县战斗，以策应刘邓军向豫东出击。7月下旬，山东野战军发起朝阳集战役，歼敌5000余人。8月7日，又发起泗县战斗。由于攻城兵力分散，主攻方向不清，加之连日大雨，进攻受阻，泗县城久攻不克，而部队伤亡较大，山东野战军遂于9日主动撤出战斗，8月底撤至泗阳东北地区休整待机。

泗县战斗失利，山东野战军主力向东撤退，豫东战场失去了东面的有力配合，而这时，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城的失守已成定局，敌人必然在得手淮阴后全力对付刘邓军，豫陕方向来的援军正步步逼近，鉴于这种情况，邓小平、刘伯承不得不忍痛放弃豫东作战计划，命令部队向陇海路以北撤退。

晋冀鲁豫野战军撤至陇海路以北，山东野战军撤至苏北，表明徐州、豫东方向作战的结束。这次作战，虽因泗县战斗失利而未能完全实现预定计划，但它却成为实现毛泽东外线出击，向南作战战略的一次探索，邓小平把它形象地比喻为“探路”。他在随后召开的团以上大会上曾颇为含蓄地暗示：“一出陇海，只是一次探路！”所谓“探路”，就是探明将来外线出击，向南作战的道路，实际上也是探明出击中原的道路。一出陇海，执行豫东作战任务，可以说是探索向南作战道路的第一次尝试，而第一次“探路”的结果表明，在全面战争爆发初期，由于国民党军的进攻来势凶猛，咄咄逼人，而我军装备不足，缺乏作战经验，暂时还不宜采取远离解放区进行外线作战和攻坚战，而应依托老解放区人民的支援，在内线打：运动战，创造条件，待时机更为成熟时再向外线出击。

所以，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全面战争爆发不久，便根据敌情变化，对预定的战略计划作了及时的调整。

7月4日，毛泽东电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和华中局：“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徐州、豫东作战结束后，党中央、毛泽东于9月总结了3个月的作战情况，确定了“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保守地方为主”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认为，要实现外线出击，向南作战，就要首先大量歼灭进攻之敌，开辟逐步向南的道路。而暂时的内线作战，诱敌深入正是大量歼敌的最好手段，它是实现将来向南作战的过渡。因此，他曾致电华东局，只要有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至外线作战更为有利。

邓小平在指挥部队向陇海路以南纵深发展的过程中也看到，敌人在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诸方面的强大优势是不容忽视的，我军要突破敌人的层层防线，立即实现外线作战，向南发展实有困难。所以，他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先内线再转至外线的计划。他在一次讲话中曾明确地表明了他的这一态度：

“在战争初期，我们的装备还不够优良，作战经验还不丰富，内线便于消灭敌人，便于组织和发展我们的力量，便于积累经验，所以，先在内线打是完全必要的。”

杰出的指挥艺术

部队从豫东撤到陇海路以北定陶、曹县地区以后，便开始了为期 10 个月的内线作战。

1946 年 9 月到 1947 年 1 月，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部队，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采取集中主力作战的战法，在鲁西南和濮、滑地区连续打了 5 仗，取得了五战五捷的辉煌胜利。9 月 3 日到 7 日，为打破国民党军东、西两路的合击计划，取得了定陶战役的胜利，歼敌 4 个旅共 1.7 万人，俘敌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10 月 3 日到 7 日，举行巨野战役，歼敌 5000 人。10 月 29 日到 31 日，取得鄆城战役的胜利，歼敌 9000 余人。11 月 18 日，为打破敌人打通平汉线的计划，发起滑县战役，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法，全歼国民党第一四旅、第一二五旅和河北保安第十二纵队等部计 1.2 万余人。12 月 22 日至 1947 年 1 月 16 日，在巨野、金乡、鱼台等地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及地方团队 1.6 万余人，收复县城 9 座，又一次打破了敌打通平汉线的计划。

在上述作战中，邓小平和刘伯承密切配合，协同指挥，根据形势和战场的变化，不断地在实战中总结经验，提高战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现代战争史上的光辉范例，为人们总结和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作为这一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和高级指挥员，邓小平在上述战役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由于邓小平的为人，他一贯反对称颂和赞扬他个人的历史作用，而强调刘伯承在战役指挥上的军事才能和集体指挥的作用，所以，他并没有为后人留下关于这一时期军事和作战的专门论著，这对于人们研究这一时期他的军事思想严指挥艺术无疑是一大缺憾，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具体活动中看出他在指挥上的一些风格和特点。

高瞻远瞩，统观全局，善于将每一次战役与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密切结合，这是邓小平指挥上的一大特点。

毛泽东在总结了徐州、豫东及其它战场的作战经验后，及时地将外线出击的方针调整为先内线作战后外线作战的方针，并且决定将内线作战的重点放在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方面。邓小平一面赞同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方针，一面在实战中进一步理解和实施这一方针。他在指挥部队进行定陶战役、巨野战役、哪城等战役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在内线作战，确实可以获得大量歼敌的良好战机。所以，他和刘伯承在总结定陶战役的主要经验时，第一条就肯定了诱敌深入解放区作战甚为有利的战法。在军事指挥上，邓小平不仅仅拘泥于把重点放在对战役的指挥上，而是力求把对战役的指挥提高到战略指挥的高度，把指挥每一次重大战役都与实施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密切结合。他十分注重让每一个指战员都了解党中央的战略任务，要他们懂得不是为战役而战，为局部而战：而是为战略方针而战，为全局的胜利而战。

哪城战役结束后，部队进入濮阳、鄆城以北地区休整。11 月 4 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涯县白衣阁主持召开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 3 个月来的作战经验。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政治报

告，他号召全体指战员再打几个大胜仗，来显示人民的力量，打击蒋介石召开伪国大的阴谋。

1947年元旦，邓小平在指挥部队进行巨金鱼战役的第一天，为冀鲁豫军区主办的《战友报》亲自题词，题词是：

“为更多的消灭蒋军而斗争；为争取战略主动、收复一切失地而斗争；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

这一题词和讲话充分地体现了邓小平这一时期的战略思想，这就是认真实施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为将来举行战略进攻，外线作战准备条件。

根据形势和战场的变化，及时地总结经验，并在战争的实践中加以运用和不断改进战术，是邓小平指挥艺术的另一特点。

邓小平在指挥部队进行定陶等战役的过程中，一方面有意识地指挥部队最终完成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一方面通过实战，不断探索和总结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和教训，以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术和运动战的能力。

定陶战役是部队在内线打的第一仗，邓小平、刘伯承集中了所有主力，以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终于战胜了敌人的顽强抵抗，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三师。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在总结定陶作战经验时指出，在战役上，应集中优势兵力打敌基干军队，在战术上，则应以兵力重点打击敌人弱点而各个消灭之。

邓小平不仅注意总结成功的经验，也十分注重探讨指挥上的教训。在巨野战役中，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以少数部队牵制了敌之主力，消耗和削弱了敌人，所以，邓小平和刘伯承认为，巨野战役中龙固集防御战打得很好。但是应该看到，因我之顽强防御而使敌更加稳重，更难展开，甚为不智。他在总结这次战役的经验教训时说，对付新的敌人，应有新的办法。这次我们机械运用消灭整编第三师的经验，自己火力弱，而对敌人的火力又估计不足，在敌尚集结并未充分展开时即投入战斗，因此陷入牛抵角僵持的笨拙状态，以致敌人十分谨慎，不可能调动、迷惑敌人，使其暴露弱点，实际上我反而陷入被动。根据这次战役的教训，邓小平和刘伯承提出，在战役上我主力宜大踏步的机动，才能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容易各个歼灭敌人。我们正本此教训准备大踏步的机动，哪里有机会就到哪里打。在后来的哪城战役中，由于在指挥上吸取了巨野战役的教训，注意撇开与强敌僵持局面，从纵深里实行了大踏步的机动，一面分遣部队迷惑强敌，一面集中大于敌人4倍的优势兵力，向较弱之敌展开猛烈攻击，故能获得迅速、干脆、彻底消灭敌人的奇效。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教训，对于党中央、毛泽东正确制定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9月16日，毛泽东正是根据定陶战役和其他战役的经验，向全军发出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强调在运动战中，必须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在后来的作战中，邓小平和刘伯承又正确运用和灵活掌握这些战术原则和作战方法，指挥部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役的胜利。

邓小平在指挥作战时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深思熟虑，果断决策，实事求是，注重实际。

了解邓小平的人都知道，他一生奉行的原则是：少说空话，多做实事。这一点既反映了他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性格，也体现了他讲究实际，注重务实的处事原则。这一原则贯穿于他的政治生活中，也体现在他的军事指挥上。所以，邓小平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指挥员，他主张一切从战场的实际出发，而不是凭想当然，吹大牛，好大喜功。

在定陶战役中，部队面临的局势是十分危险的，敌人在徐州、郑州两个方向集中了 14 个整编师 32 个旅共 30 万人，企图将刘邓军合击于定陶、曹县地区。当时，东面的敌人已到了成武、单县、鱼台地区，西面的敌人已开至东明、定陶、曹县一带，形成了夹击之势。

强敌迫近，危在旦夕。邓小平与刘伯承反复研究，打，还是不打。当时部队刚打完陇海路战役，未及休整，而敌人兵力强大，来势凶猛，如果连续再战，实有困难，但如果不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挫其锐气，则部队只能退到黄河以北，这对将来机动作战是极为不利的。经过权衡利弊，他们决定，克服困难，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和弱点，首先歼灭整三师，尔后扩大战果，粉碎敌人的进攻。

指挥部的决心是下定了，但是部队的情绪如何？能不能克服困难，连续再战？能不能取得战役的胜利？邓小平对此还无十分把握。因此，他在给担任主攻任务的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打电话时，十分严肃地强调，一定要说实情，讲真话。他在电话中说：

“王近山同志，这冀鲁豫解放区是你们亲手创建起来的，是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这一仗关系重大，打得好，我们就在这冀鲁豫站住了脚，打得不好，那咱们就得背上背包重回太行山去。你好好估量一下，实话告诉我，这大杨湖拿得下来拿不下来，拿得下来，我们就拼着命打，如果拿不下来，我们就立即把部队撤下来，不要贪功好利，放空炮！”

王近山是位老红军，久经沙场，敢打敢拼，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一员猛将。他跟随邓小平多年，对邓小平的指挥风格和特点颇为了解。这会儿，他仔细掂量着邓政委刚才那段话的份量，心里完全清楚，这大小杨湖的战斗关系着全军的胜败，如果久攻不下，待敌人援军一到，局势将不堪设想。不过，他对自己的部队还是有充分信心的。所以，他象下赌注似的在电话中回答道：“请政委放心，我保证把大杨湖拿下来！”

正如邓小平、刘伯承所料，国民党整编第三师进入定陶西部的大、小杨湖。

战斗打得很激烈。王近山果真没有让邓小平失望，他把最后一点后备力量全拿了上去，整三师终于支撑不住了。战士们冲进大杨湖，整三师全军覆没，师长赵锡田被俘。

多少年来，邓小平一直坚持从战争的实际出发，以制定作战的计划和方案，这不仅成为他指挥作战的一个特点，也是他率领部队

多打胜仗的原因之一。

邓小平历来注重从严治军，无论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决不容许他指挥的部队斗志松懈，意志涣散，特别是当部队打了胜仗的时候，尤其要教育部队戒骄戒躁，保持清醒的头脑，使各级指战员都懂得，只有纪律严明，具有坚韧不拔的、顽强的战斗作风的部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邓小平治军的原则是：重身教，律已严，以身作则，带头执行纪律，

同时严格要求高级干部，决不允许他们居功自傲，沾沾自喜，放松对部队的要求。

出击陇海路战役取得胜利以后，在部队中产生了居功自傲情绪，一些指挥员放松了对部队的要求，所以出现了违反纪律，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有的打骂群众，有的逼老乡让房，有的未经允许拿群众的东西，还有的把老乡家里搞得乱七八糟，这些情况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了军民关系。

邓小平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十分生气。他与刘伯承商量后，决定立即成立一个纪律检查团，由野战军指挥部民运部长穰明德任团长，对部队的纪律作一全面检查。他严肃地对穰明德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我们军队与一切旧军队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有严明的纪律，有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一定要认真、要严肃，把军纪整顿好。”

刘伯承当即起草了一份任命书，授予检查团“对违反纪律者，营以上干部先扣留，后报告，经批准后处理，对连以下人员，有就地处决之权”。

纪律检查团在执行任务时，发现某纵队的一些战士在宿营地随便摘吃群众果园中的果子，群众对此意见很大。个别干部拒不接受批评，还傲气十足地说：“我们打了胜仗，口渴了，吃几个果子算不了什么。”

当穰明德向邓小平汇报这一情况时，他认真地说：“这个典型你抓得好，抓得及时。我要亲自去过问一下，整顿纪律，事关重大，就要有魄力，不然就打不了胜仗。”

到了这个纵队的宿营地，邓小平下令立即集合营以上干部训话。100多人很快到齐了。邓小平登上一个土堆，严肃地说道：

“在陇海路战役中，你们打了胜仗，这无疑是你们的光荣，但决不是你们居功自傲、违反军纪的本钱，听说有些战士随便摘吃群众的果子，这不是违悖毛主席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必须坚决执行。违反了群众纪律，我们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回到指挥部，邓小平嘱咐穰明德，迅速派人到各个纵队，传达他和刘伯承的指示，下决心整顿纪律，否则，部队就形不成强大的战斗力，就不能打胜仗开辟新区，那样，我们就只有背着背包再回到太行山去打游击。

当时部队处在敌人的东西夹击之中，指挥部已下了打定陶战役的决心。大战在即，纪律检查团奉命冒雨传达邓小平的指示，结果，这次整顿立见成效，部队取得了定陶战役的胜利。

邓小平与刘伯承长期共事，多年来，他们在战场上，在工作与生活中互相尊重，默契配合，协同作战，已经成为他们指挥艺术的一个共同特点，“刘邓不可分”早已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中传为佳话。

邓小平与刘伯承同是四川人，但年龄、外表、性格、爱好却完全不同。邓小平比刘伯承小13岁，这在当时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可谓是年龄悬殊最大的一对。邓小平身材矮小，刘伯承槐梧高大；邓小平性格内向，文质斌斌、不苟言笑，刘伯承豪放开朗、幽默风趣；邓小平烟吸得

很凶，喜欢打牌、下棋等娱乐活动，刘伯承却不嗜烟酒，更不会打牌、下棋，只喜欢读书、散步。邓小平曾说：“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除了读书工作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不过，刘伯承的书法造诣很深，这使邓小平佩服之至，自愧不如。所以，他常常把刘伯承写的字拿来细心琢磨、临摹。他曾风趣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晓得我练的什么字？我练的是‘刘体’，这可是集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各体之大成的字哟！”

邓小平和刘伯承虽然性格迥异，兴趣爱好也多不相同，但共同的理想、志向，高尚的品德、情操和宽广博大的胸怀使他们成为举世赞誉的亲密战友。多年来，他们形影不离，情同手足，彼此尊重，互敬互爱。在军事上，他们共同指挥，尤以刘伯承为主；在政治上，他们密切配合，多以邓小平为主。在政治委员与司令员的关系上，他们两人一直是既分工明确，又协调一致，配合默契。

对于在长期战争和艰难困苦环境中结下的战斗友谊以及多年的亲密合作关系，邓小平甚为珍惜，感触挚深。几十年后，他在《悼伯承》这篇催人泪下的祭文中写道：

“我认识伯承，是1931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成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的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刘邓之间的高尚友谊成为他们亲密合作，密切配合的基础，而这种密切配合、协调一致的指挥艺术又是部队不断打胜仗、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二出陇海再次探路

巨金鱼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三天，即1947年1月18日，邓小平便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要他和刘伯承乘胜展开攻势，将陇海路北、陇海路南广大地区创造为机动战场，吸引郑州、徐州两绥署敌人主力来援并歼灭之，继续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作战。

1月19日，毛泽东又发来一份电报：“路北局面业已打开，形势极好。为着歼敌大批有生力量，壮大地方兵团，创造战场，孤立敌人主力，以利最后歼击之目的，利用王敬久、王仲廉、孙震三部均在黄河以北及张岚峰被我俘虏之机会，请考虑休整数天后，大举向路南行动一次，以四五星时期，攻占豫东淮北大批可能攻克之城镇，收复大批失地。”

当时，蒋介石正在加紧部署“鲁南会战”。他调集53个旅、约30万人，从陇海铁路的徐海段、津浦铁路的徐济段和胶济铁路中段向鲁南进攻，同时调王敬久集团到徐州地区增强其鲁南作战的力量，企图先击破华东野战军，再转攻晋冀鲁豫野战军。由于王敬久集团的第五军和整编第七十五师远在豫北，一时难以调回，而陇海路南北的广大地区只有刘汝明的八十八师和方先党的残部以及地方团队守备，如果乘此有利时机进行豫皖边战役，一定会在陇海路南北打开局面。而这一胜利不仅有力地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作战，而且对于探索将来向南作战的道路意义重大。所以，邓小平和刘伯承研究决定，部队休整几天后，立即发起豫皖边战役，深入陇海路以南，解放豫东广大地区。

在野战军指挥部，邓小平一边抽着香烟，一边和刘伯承研究战役的具体部署。“看来，这一次部队必须分作两个集团作战了。这样吧，你率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为路北作战集团，夺取定陶、单县、曹县等广大地区，我率第六、第七纵队和豫皖苏军区部队为路南作战集团，直捣张岚峰的老巢拓城，在豫东一带展开。你看如何？”经过深思熟虑，邓小平和盘托出了他的计划。

“这主意不错，正合我意，就这么定了。”刘伯承一拍即和，干脆利索，颇为赞同地答道。

1月24日，寒风刺骨，雪花漫天，冀鲁豫平原上，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小平指挥南线集团的第六、第七纵队正顶风冒雪向陇海路以南方向急进。

据当地老百姓说，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而这一天可能是这一年中最冷的一天。

邓小平穿着解放区自制的灰色棉军衣，外面套了一件褐色羊皮短外套。每逢行军，他总喜欢随前卫纵队行动，以便随时了解发生的新情况。此刻，他正走在第七纵队的行列中，雪地里，留下了他那坚定、刚毅的、深深的脚印。

第七纵队的底子原冀鲁豫军区的主力部队。1945年11月，升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司令员是原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是原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张霖之。这支部队久经考验，能打善拼，作风顽强，在创建与巩固冀鲁豫解放区的斗争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改编为第七纵队后，他们继续发扬过去英勇拼搏的优良作风，在许多重大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成为晋冀鲁豫野战军最能打仗的纵队之一。

白茫茫的旷野里，一条长长的灰色巨龙急速地蠕动着向南延伸。

一辆被雪花裹得严严实实的轿车与灰色的巨龙伴随而行。知道内情的人都晓得，里面坐的是国民党河南暂编第四纵队司令张岚峰。由于天气寒冷，这会儿，他把大衣裹得紧紧的，头和脖子都缩在大衣的领子里。

张岚峰是河南柘城县人，早年在西北军做事，后来一直以他的老家柘城为大本营经营他的势力。这次邓小平指挥部队直捣柘城县城，其守军便是张岚峰的部下。而张在十几天前的巨金鱼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获。由于他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劝说他在柘城的旧部弃城投降，所以，邓小平特别命令野直特派员张之轩带了一个班，用轿车把他护送到豫东，利用他作劝降工作。

雪还在下着，天越来越冷。敌人已经发现了刘邓军南进的意图，透过漫天飞舞的雪花，几架飞机突然出现在行进着的队伍上空，随着一声声轰鸣，银白色的大地被翻开了一个个的弹坑，硝烟裹着雪花扑面而来，挡住了人们的视线。邓小平一会卧倒隐蔽，一会儿又敏捷地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雪花，指挥部队继续前进。

过了陇海路，部队加快了行军速度。

当天，大军云集柘城之下。张岚峰给守城的叔叔张映臣写了一封信，劝他率部弃城投奔解放军，但未能奏效。原来，蒋介石得知张岚峰被俘的消息后，料到情况有变，已经在解放军攻打柘城前从商丘第六绥靖区派了一个军统连，进驻柘城县城，严密控制了柘城张岚峰的司令部。所以，张岚峰的劝降信没有生效。劝降不成，只有强打硬攻了。30日，部队发起总攻，经过激战，守军两个团全部被歼，张映臣和团长被俘，解放军很快占领了柘城。

接着，部队向鹿邑守敌发起进攻。在鹿邑前线，邓小平亲临指挥。他找到担任这次主攻的第七纵队司令员杨勇，严肃地说：“攻城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充分做好，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要考虑周到，要尽量减少部队伤亡，发扬你们敢打敢拼的精神，坚决夺下鹿邑城。”

攻城战斗于拂晓打响，到第二天结束，全歼鹿邑城守敌，夺取了南线作战集团的第二个胜利。

为了扩大战果，调动更多的敌人来援，邓小平命令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向鹿邑以东的亳州方向前进。

攻城的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

指挥部设在亳州城外一个小村子里。敌机不断地来轰炸，老百姓早跑得净光，村里的民房倒塌一片。邓小平独自坐在这个临时指挥部里，他在等待杨勇、张霖之和第七纵队参谋长潘焱来一起研究攻打亳州城的具体部署。

潘焱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气喘虚虚地跑了进来，一把拽住邓小平的胳膊就往门外跑：“政委，敌机正在轰炸，还是先到村外隐蔽一下吧……”

“杨勇、张霖之他们可能还在路上，派人去看看吧。”邓小平一边走，一边还在惦念着他的两员大将。

“政委您放心，他俩可能现在还在二十旅，不会有事的。”潘焱一边保护着邓小平，一边派人去接应杨勇和张霖之。可邓小平还是不放心，直到杨勇、张霖之站到了他的面前，他才宽心地露出了笑容。

经过连日来的紧张战斗，指挥员们都感到十分疲乏，个个满脸灰尘，深陷的眼窝透着丝丝倦意。可大战在即，他们谁也顾不得休息。

“抓紧时间谈谈情况和研究一下攻城的行动吧。”邓小平从潘焱手中接过一支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能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偷闲抽支香烟，对他来说真是件快事。

研究完了工作，邓小平笑着说：“抽支烟真解乏。要说抽烟，杨勇可有个绝招呢，行军骑在马上，刮大风照样可以划火柴点烟，这绝招我们可谁也学不来哟。”

邓小平的话把屋里的人都逗乐了，笑声驱散了连日来的紧张和疲劳。说实在的，平日里，邓小平十分严肃，不多言笑，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似乎他都在保持着晋冀鲁豫野战军政委的尊严，给人一种敬畏的感觉。其实，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性格并不孤僻，有时还随和得很，他也常跟战士们谈天，说笑，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他那张严肃的面孔里领略到他的风趣和幽默的。

2月1日，亳州守敌在第六、第七纵队主力的攻击下全部被歼，亳州解放。

亳州位于豫皖两省边界，是皖北的一座历史名城。这里商业繁华，经济发达，向有商埠之称。邓小平在第六纵队政委杜义德的陪同下，漫步来到亳州城北门城楼下。大战后的亳州，硝烟弥漫，瓦砾遍地，战士们正在忙着打扫战场。邓小平仔细地观察着这座古城的城楼建筑，好像要从中发现些与众不同的风格似的。

“这座城市确是不同凡响，这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曹操的故乡，名医华佗也出生在这里。告诉战士们，要好好保护这座城市，爱护这里的古迹。”他一边看一边嘱咐着身旁的杜义德。

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可亳州城却死一样的沉寂，无论大街还是小巷，都丝毫寻不出一一点过年的迹象。有的家门上贴着“一年苦中苦，三月都捐完”的对联。邓小平看了，感到有说不出的凄苦悲凉之情。他转过头来对杜义德说：“国统区老百姓的生活也很苦啊！明天就要过年了，可群众连白面都吃不上。赶快通知部队，打开粮仓，拿出一部分粮食救济群众，一定要想办法让群众过个好年。”

涡河北岸的粮库周围，人声嘈杂，一片沸腾，亳州城的老百姓手拿口袋，正在分粮。领到粮食的群众热泪盈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高声喊到：

“解放军来了，分白面大米过年了，还是解放军好啊！”

“解放军就是不一样，国民党的军队打人抢人，解放军救人济贫。”看着群众背着粮袋，喜气洋洋，激动兴奋的情景，邓小平脸上情不自禁地绽开了笑容。这笑容包含着对人民群众的无限深情，也流露出大战后胜利者的轻松和自信。

在邓小平指挥南线集团攻克柘城。鹿邑、太康、杞县、亳州的同时，刘伯承率领北线集团也打下了定陶、曹县、单县等县城。刘邓军在陇海路南北的胜利又一次震动了蒋介石，他急忙调进占大名、南乐等地的第五军、整编第八十五师及武汉地区的第七十二师驰援陇海路，企图与先期到达的整编第七十五师合击刘邓军，而后参加“鲁南会战”。

中央军委指示刘邓，拖住王敬久主力，阻止其东调，保障华东野战

军作战。

2月1日夜，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陇海路南北两作战集团，不顾连日来作战的疲劳，向民权以西郑庄岩地区的敌整编第八十八师发起进攻，紧紧拖住了王敬久集团，打破了其东进参加“鲁南会战”的计划。豫皖边战役取得了歼敌1.6万余人的辉煌胜利。

在豫皖边战役中，邓小平亲自率领部队深入陇海路以南，在豫东广大地区胜利展开的结果表明，二出陇海与一出陇海的形势已大不相同。经过半年内线作战，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受到严重挫折，兵力锐减，特别是由于战线不断延长，守备任务不断加重，用于第一线的兵力和机动兵力更不敷调用。以豫东地区的情形来看，守备该区的力量多是地方部队和地方团队，而正规军多被牵制在西北、华北、华东战场。邓小平率领部队深入陇海路以南，在豫东、皖北广大地区纵横驰骋，攻城略地，胜利发展，表明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优势已经明显下降，而解放军的力量正在逐渐增强。豫东地区是刘邓大军将来兵出中原的必经之地，所以，邓小平对这一地区政治、军事力量的变化尤为关注，在整个战役期间，他一直忘记他所肩负的使命——探路。后来，刘伯承在一次讲话中说：邓政委说，我们一出陇海和二出陇海，还有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探路”。二出陇海探路的结果表明，向南作战，兵出中原的时机正在成熟，而且为时不远了。

回师豫北

豫皖边战役结束后，2月下旬，邓小平、刘伯承率领部队从陇海路南北向黄河故道北撤，以便把沿陇海路东进参加对华野作战的王敬久集团主力吸引到冀鲁豫一带，配合华东野战军的莱芜战役。

这天，部队来到黄河故道。东进时，这里还是黄沙遍地、村庄遍野，可现在，它已变成一片汪洋。2个月前，蒋介石违背国共签订的协议，提前在花园口堵口，把黄河水放入故道。望着缓缓向东北流去的滔滔黄水，邓小平不由想起了一年来围绕黄河“堵口归故”问题上的一场斗争。

现在的故道，8年前是黄河的河床。1938年6月9日，蒋介石为阻止日军南进，下令在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让黄河水向东南方向豫皖苏一带流去，而这里则变成了一片沙漠。8年来，花园口以东的旧黄河已经面目全非，河床内的淤沙大部变成高者丈余、低者二三尺的沙丘，昔日黄河的南北大堤因年久失修，沟壕纵横，破败不堪。往日的河道上，新建了7万多个村庄，过去的沙滩变成了农民修养生息的沃上良田。经过8年抗战，黄河故道南北广大地区已成为冀鲁豫、山东解放区的一部分。蒋介石正是看到黄河故道横贯解放区的这一特殊地形，才制定了“以水代兵”的战略，在既不修复河堤，也不疏浚河道，更不安排故道40万人民搬迁的情况下，决定强行单方堵口，使黄水重归故道。

一年来，国共双方就黄河归故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1946年4月7日签订《开封协议》；4月15日，签订《菏泽协议》；5月18日，达成《南京协议》；7月22日，达成《上海协议》。这些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复堤浚河，整修险工地段，迁移河床居民，待复堤工程完竣后再行合龙。

在此前后，解放区军民在中共中央和边区党组织领导下，在西起长垣、东至齐河长达300余公里的堤岸上，掀起了历史上罕见的声势浩大的搬迁、复堤、治河工程。经过半年抢修，终于在花园口堵口工程合龙前完成了治河复堤工程，保证了解放区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946年12月27日，国民党当局以合龙工程技术需要为借口，将部分黄河水放入故道，同时，派飞机轰炸扫射抢修堤坝的民工，有几处河堤已出现破堤危险。当邓小平、刘伯承率领部队来到黄河故道的时候，解放区的几十万民工正在昼夜抢修堤坝。现在，放入故道的部分黄河水，水头已到东阿，但水位很浅，水中有许多“小岛”。如果抓紧时间架桥，几天之内，部队便能全部渡过黄河。邓小平思索了一会儿，立即派人把野战军司令部民运部长穰明德叫了来，神情严肃地对他说：

“敌人正在尾随我军而来，蒋介石已经提前在花园口堵口，把黄河水引入故道，企图把我军主力隔在黄河以南，以便一口吃掉我们。现在，河水已流过董口、罗楼。我和刘伯承司令员商量过了；决定乘大水还没有来到之前，设法在黄河上架设一座浮桥，让部队迅速通过，以便休整再战。这个任务很艰巨，你必须在3天之内把桥架好，保证部队安全通过。”

从司令部到黄河边有好几十里路，为了争取时间，邓小平要穰明德乘坐他和刘伯承的吉普车去。出发前，邓小平又改变了主意，与穰明德一同跳上了吉普车。架桥的事关系到全军的安危，责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他决定亲自到黄河边察看一下水位，以便选择一处最

佳的桥位。

汽车在黄河边停了下来，沿着黄河，邓小平一边走，一边仔细地察看。最后，他停下脚步，指着一处河中有沙州的地方说：“这里滩宽，水位浅，架桥比较合适，就把桥架在这里吧。”

邓小平指的那块地方，水位约有 1.4 米，水流缓和，确是架桥的理想之处。穰明德不敢怠慢，立即组织民工，就地取材，用高粱秆、沙土和石头架设浮桥。北风刺骨，地冻天寒，民工们把高粱秆扎成捆，一捆捆分层模竖交错地铺到河底，再用木桩加以固定。为了提高桥的载重量，每三层高粱秆捆上加铺一层高粱席，席上再铺一层沙。按照这样的程序，桥在一层一层的增高。第三天，一座长 1000 多米，宽 3 米，高出水面约 1 米的浮桥架好了。恰好这天夜里北风突起，天气骤变，大雪飞降，河面上冻成厚厚的冰层，真是“天时、地利、人和”样样具备。

邓小平在司令部接到了架桥任务已完成的消息，十分高兴。为解决部队多，桥面窄的困难，他命令桥上只通过汽车、炮车、辎重和伤病员，而部队一律从冰上徒步过河。部署完毕，邓小平穿上那件褐色羊皮短大衣，大步上了浮桥，他的身后是披着一件抗战时期缴获的日本黄色军大衣的刘伯承。仅从个头和装束来看，人们老远就能分辨得出，哪个是政委，哪个是司令员。

走在浮桥上举目四望，千军万马踏冰而行，辎重大炮浩浩荡荡，眼前这壮观的场面远非半年前部队第一次过黄河故道时的情景所能比，那时，部队全是轻装，而且简陋得很，有的纵队连一门大炮都没有，而现在，汽车、骡马、大炮、榴弹炮，各种辎重拖得老长老长，看不见尾，真是战争锻炼了部队，部队又在战争中更新了装备，得到了发展。

部队全部渡过了黄河，敌人的飞机才赶来炸毁了浮桥。这一炸，正好把刚刚赶来的国民党部队隔在黄河南岸，而邓小平、刘伯承则率领部队进入朝城、观城、范县一带老区休整。

1947 年 3 月，蒋介石目睹国民党军队不断失败，损伤严重的惨状，忽然发现了他在军事部署方面的弱点。他说：“我们在后方和交通要点上，不但要处处设防，而且每一处设防必须布置一团以上的兵力。我们的兵力就都被分散，我们的军队都成呆兵，而匪军却时时可以集中主力，采取主动，在我广阔正面积活动，将我们各个破击。”结果是，“占地愈多，则兵力愈分，反而处处被匪军牵制，成为被动。”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蒋介石改变了全面进攻战略，从 1947 年 3 月起，在晋察冀、晋冀鲁豫、东北等战场转取守势，集中兵力对山东和陕北战场实施重点进攻。

在敌人由全面进攻变为重点进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形势，确定全军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内线作战。要求山东、陕北我军实行诱敌深入，抓住战机，歼灭进犯之敌；要求豫北、晋南、晋察冀、东北等战场的部队根据各区情况，举行战略反攻，大量歼灭敌人，逐步收复失地，以配合陕北、山东我军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

国民党对陕北、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开始后，晋冀鲁豫区就成为联系这两个战场的枢纽地带，而敌人从该区抽调 17 个旅增援陕北、山东

战场，解放军便很快掌握了该战场的主动权。邓小平和刘伯承研究决定：集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和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主力，共60个团约10万兵力，举行豫北反攻，策应山东、陕北解放军作战。3月19日，在国民党军占领延安的当天，邓小平、刘伯承向部队下达了豫北反攻的命令。任务是：消灭豫北国民党军主力王仲廉集团的有生力量，彻底摧毁平汉、道清铁路，收复与控制某些要点，破坏敌人东西战场的联络，打乱敌人的军事部署。

豫北反攻作战历时2个月，共歼敌4万余人，解放了9座城市，逼迫敌人退守新乡、安阳、汲县等少数孤立据点内。

在刘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进行豫北反攻作战时，西北野战军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的胜利，歼敌1.4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取得了晋南攻势的胜利，歼敌1.4万余人；晋察冀野战军取得正大战役的胜利，歼敌3.5万余人；华东野战军取得泰蒙战役、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共计歼敌5.6万余人；东北野战军取得东北夏季攻势的胜利，歼敌8.3万余人。其它地区的解放军也分别取得了反攻作战的胜利，这些都严重地挫败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有力地配合了陕北、山东解放军的作战。

自1945年9月进行上党战役，到1947年5月豫北攻势结束，邓小平、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取得了十战十捷（即：上党、平仅、陇海、定陶、巨野、鄆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和豫北攻势）的伟大胜利。在战争中，部队迅速发展，人数由战争初期的8万人发展到28万人，并且更新了装备，积累了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成功经验，提高了战术和攻坚能力，为转入战略进攻，进行外线作战准备了条件。

第三章 挺进中原 战略进攻前的准备

豫北战场硝烟未尽，邓小平便接到毛泽东关于举行战略进攻，兵出中原的电报。其实，毛泽东自全面战争爆发前夕向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毅等提出《全局破裂后太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后，就一直在寻求外线出击，兵出中原的有利时机，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946年10月，毛泽东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仍按同年6月作战计划精神，准备以后以主力向中原出动，并特别强调，豫东一带是将来战略机动的转环枢纽，应加以扩大和巩固。当时豫皖苏地区处在徐州、开封之间，是个重要的战略区，又是将来刘邓大军外线出击，兵出中原的必经之地，所以中共中央决定，以冀鲁豫第六地委和华中第八地委所辖地区为基础，重建豫皖苏解放区。吴芝圃任区党委书记，张国华任军区司令员。11月6日，邓小平在山东省哪城县董楼村接见吴芝圃和张国华，向他们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豫皖苏解放区统一领导的决定，要他们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一部和豫东支队立即出发，越陇海路南下，以豫东为中心，重建和发展豫皖苏解放区。12月12日，吴芝圃、张国华率部在豫东睢县平岗一带与冀鲁豫第六军分区和华中第八军分区部队会师，宣布正式成立豫皖苏区党委和军区。1947年1月，邓小平率部举行豫皖边战役时，豫皖苏军区部队密切配合，协同作战，解放了豫东皖北十几座县城和广大地区，巩固和扩大了豫皖苏解放区，为刘邓大军经豫皖苏向中原挺进提供了可靠的前进基地。1947年1月2日、1月24日，毛泽东连续两次电示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准备5月开始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同时作好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如弹药、新兵、干部、经费等。

5月间，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解放军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共歼灭敌人正规军97.5个旅，连同地方团队共计112万人。敌人的兵力虽在不断补充，但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降到150多万，且多陷于对交通线和重点据点的守备，能作战略机动的兵力已为数不多。与国民党军队相反，解放军的人力、物力得到了及时补充与发展，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其中正规军由61万发展到100万人。更重要的是，除山东、陕北战场尚处在防御地位外，其它战场已先后转入战略反攻，取得了战争的局部主动权。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根据整个战局的发展情况以及敌人南线的不利态势，决定不待敌人的进攻全部被粉碎和解放军的总兵力超过敌人，立即组织解放军主力转入战略进攻，实现外线出击，兵出中原的战略计划。

5月4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电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对整个南线的战略进攻作了通盘部署，指出，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刘邓军于6月1日后，独立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汴、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5月8

日，毛泽东再次电示刘邓：“仍按中央5月4日电，争取于6月1日前休整完毕，6月10日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同时电告陈毅、粟裕，“在6月10日以前，应集结全力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6月10日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刘邓军渡过黄河，挺进中原，以调动山东和陕北敌人回援，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将战争由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全国各战场转入战略进攻。

当时，刘邓正指挥部队进行豫北反攻作战，鉴于部队连续作战，已极度疲劳，刘邓向中央军委建议，休整一个时期后再渡河。6月3日，中央军委回电，同意全军休整，渡河时间推迟至6月底。同时强调，主力南进须作长期打算，望作政治上、物质上的各种准备工作。

5月中旬，豫北反攻作战还未结束，邓小平便披着一身硝烟尘土，从豫北前线匆匆赶到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冶陶，着手进行战略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

5月15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晋冀鲁豫中央局会议，讨论转入战略进攻的具体问题。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联名向中共中央建议，为了统一领导战略进攻后中原地区的党政军工作，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由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张际春、郑位三、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组成中原局常委，邓小平任中原局书记，郑位三、李先念、李雪峰任副书记。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中央批准。6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徐向前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在刘邓率部挺进中原后，和薄一波、滕代远等人共同主持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的工作。

离渡河南进的时间只有1个月了，而准备工作千头万绪，任务繁重。在督促检查各项工作时，邓小平着重抓了部队的政治思想

工作。他指示野战军政治部，要组织全军干部、战士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实行战略进攻的指示，学习5月1日新华社《全力准备大反攻》的社论和毛泽东5月3日为新华社写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评论。6月3日，他授意政治部发出《目前形势与方针任务的报告大纲》，在干部战士中普遍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动员各级干部认清形势，明确战略进攻的意义和任务，提高争取胜利的信心。6月21日，邓小平在野战军直属队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解答时局与任务中几个问题的报告》，详细分析了解放战争的形势，深刻阐述了反攻的必要性。

邓小平在讲到反攻的时机问题时说：

“党中央和毛主席说，反攻时机到来了。为什么？这是有根据的。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危机，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蒋介石在第一线集中了220多个旅，后备非常空虚，山东、陕北两个主要战场上不但打不出名堂来；而且还被我逐步歼灭，其他几个战场上已经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蒋介石线不能保持住，点也不能保持住，所以不能不来一个重点防御。我们歼灭蒋军90个旅以上，战局没有理由不发生变化，事实上已经变化了。

党中央2月1日指示中写道，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性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高潮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蒋管区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学生运动、工人

运动、民众运动闹得轰轰烈烈，人民跑在我们前面去了，这与解放区的军事胜利，是打败蒋介石的两大力量，而解放区是领导力量。新的高潮，很快到来，我们要领导这一高潮走向彻底胜利。如果我们不支持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成为群众的尾巴，高潮就可能逐渐下降，就会影响革命的胜利。

从军事上看，敌人采取重点防御，我们是让蒋介石巩固他的统治区，喘口气再来打我们，还是我们先去剥夺他的兵员、财力，扩大解放区，来充实我们自己的力量，到底这两种办法哪一种好呢？这是很明白的摆着，蒋介石到处被动，好象两个人打架，只要再加一拳就能把对方打败，你偏偏要歇一歇让他喘气，自然是不对的，这用之于革命会使革命失败，要犯严重错误。”

对于一些干部、战士提出的反攻出去打不打大城市？能不能站住脚？有没有困难等疑问，邓小平一一给予明确的解答。他说：

“对城市好打就打，不好打就不打，你采取重点防御，我就占面，有机会就占地方，地方占多了，人口增加了，兵员解决了，财经也解决了，反过来敌人就困难了，力量对比又要起新变化。道理就在这里。”

关于反攻出去能不能站住脚的问题，邓小平充满信心他讲道：

“能，一定能够站住脚，但有一条，看我们三大任务做得好不好。客观条件是具备了。我们首先在思想上下决心不向后看（回头看着晋冀鲁豫），讲战法，讲政策，把三大任务做好。蒋管区人民那样好，有什么理由站不住脚呢？如果三大任务有任何一条做不好，都是站不住脚的；三条任务做好了，不要多久就站住脚了，新区很快就会变成解放区。”

接着，邓小平分析了反攻后可能遇到的困难，他说：

“困难有没有？一定有的。不能设想能象在解放区内线作战那样方便，要设想更多的困难，餐把饭吃不上嘴等等都会有的，思想上必须充分准备。即使有困难，只要充分做好三大任务，这也是暂时的困难，而且影响不了站不站得住脚。当然，我们是要历尽辛苦，你们想一想，象我们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人口占全世界四分之一，要革命成功，不化辛苦是不行的。我们这一代的确是幸福的，光荣的，我们将要造成子子孙孙的幸福，即令牺牲，也是值得的。反攻确实辛苦，并且是持久性的，争取得好，就快些，厌倦不应该，真正把革命干成功，辛苦是值得的。今天我们需得拿出英雄气概，拼命地干，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一定可以干成功的。”

最后，邓小平号召全体指战员要立下反攻雄心，一心一意跟毛主席走。他说：“我们的反攻是有把握的、光荣的、正确的，我们一定能完成党给我们的任务，争取反攻的胜利。”

邓小平的动员报告解决了一部分干部、战士思想上的疑问，提高了他们对反攻形势和外线作战的认识，鼓舞了他们的信心和斗志，他们纷纷表示，早日出征，打过黄河去，开辟新解放区，坚决为实现党中央的战略进攻方针而斗争。

关于渡河的准备工作的，早在1947年2月就开始了。当时，鉴于黄河不久就要回归故道，邓小平指示冀鲁豫区党委成立了黄河河防指挥部，

王化云任司令员，负责黄河南北交通和河防安全，同时加紧修复黄河大堤，在沿河各县设立船管所，征集民船，以备黄河归故后使用。3月15日，国民党为阻止刘邓大军向南支援山东战场，强使黄河在花园口合拢回归故道，构成从风陵渡到济南约1000公里正面的黄河防线，刘邓大军要实现外线作战，挺进中原，必须首先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为此，解放区军民开展了支援大军渡河的准备。3月，冀鲁豫行署发出“封购各村大树用以造船”的紧急通知，同时责令冀鲁豫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和行署秘书长罗士高主持召开沿黄河各地专员、县长会议，部署建厂、造船、筹料、征船等工作。5月，中央军委确定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破黄河防线，南下作战，挺进中原的战略方针后，冀鲁豫解放区沿河各县加紧了造船、修路、训练水手、编组民工队、建立运输站等准备工作。到6月，共修理旧船100多只，造新船54只。这些般只少则可坐二三十人，大则可乘100多人或五六辆汽车。为了隐蔽和安全，造好的船，有的伪装藏在村里，有的藏在地窖中，工程大的一些船坞，除了藏船之处外，还要挖若干条长400多米、深3米、宽30米的引河。在造船、修船的同时，冀鲁豫区党委根据邓小平的命令，组织了8万多民兵准备随军参战，动员了110万武装民工组成支援供应线，此外，在沿河各县组织了1000多船工和水手，专门进行驾驶帆船的训练，为大军渡河作好了准备。

渡河以前，加强和充实了部队。每个野战纵队平均补充了近8000名翻身农民和经过训练的解放战士，加强了主力部队的战斗力。此外，补充了足够的经费、弹药和装备。6月5日，野战军司令部颁布“敌前渡河战术指导”，要求全军指战员开展渡河前的战术训练和技术训练。这个渡河战术指导，对渡河的准备，地形的选择，渡河的指挥，渡河中的通讯联络以及遇到紧急情况的处置等作了详细的规定，以保证全体指战员在渡河时行动一致，争取渡河的胜利。

夜渡黄河兵出鲁西南

滔滔黄河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实施战略进攻，挺进中原的第一道障碍。蒋介石凭借黄河天障，自恃它可以抵得上40万大军，所以，把主要兵力集中在陕北和山东两个重要战场，而在连接两个战场的黄河这一漫长的战线上，只以少数兵力设防。当时，蒋介石在黄河南岸东阿到开封200多公里的黄河防线上，部署了郑州绥靖公署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集团的2个整编师。其中整编第五十五师守肖皮口、郟城、鄆城、临濮集地区，整编第六十八师守菏泽、东明、开封地区。另外又派整编第七十师位于嘉祥、济宁地区，准备机动应接。敌人认为，这一带河面宽，水位深，水急浪大，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所以，只在黄河南岸构筑了简单的滩头阵地和野战工事。这样，所谓可抵得上“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便成了不设防的防线。

邓小平当时指出，蒋介石把两个铁锤放在山东和陕北，中间是黄河天险，刚好是个“把”，这就是所谓“哑铃战略”。针对这一战略，邓小平和刘伯承决定把突破黄河防线的渡河点选在鲁西南的东阿至濮县之间，计划在张秋镇到临濮集150公里间分8个地段强渡黄河，然后，歼灭黄河南岸刘汝明集团的两个师，扫清鲁西南之敌，配合华东野战军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乘胜直出大别山。

1947年6月20日，刘伯承和邓小平正式向部队下达《晋冀鲁豫野战军鲁西南战役基本命令》，确定我军为达到越过黄河反攻敌人之目的，决定实施鲁西南作战。命令规定了各部第一步作战任务：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于27日夜秘密渡河，驱逐河岸之敌，首先围住肖皮口之敌，使其无法缩回郟城固守；独二旅应于27日同时围住或歼击皇姑庵之敌；独三旅于27日夜秘密渡河，驱逐河岸之敌，首先割裂陶楼、张庄、郟城之敌，不使缩集鄆城，俟六纵赶到歼灭之。野战军第一纵队于25日由现地出动，经指定路线限28日夜进至旧范县至孙口段（以一个旅进到旧城集至旧范县段）黄河北岸地带，自行掩护渡河，务使先行梯队于29日夜渡河完毕，尔后即直扑肖皮口、郟城之敌，并指挥军区独立第一旅、第二旅各个歼灭之。第六纵队于25日由现地出动，经指定路线限28日进至甘露集至旧城集一段（可以一个旅进至坝头至甘露集段）黄河北岸地带，自行掩护渡河，务使先行梯队于29日夜渡河完毕，尔后即直扑哪城及其附近之敌，并指挥军区独三旅各个歼灭之。第二纵队于26日由现地出发，经指定路线限29日进至白衣阁以西地区，30日进至旧城至旧范县段，借第一纵队之对敌牵制，自行掩护实施渡河，尔后即直扑定陶之敌而歼灭之。第三纵队于26日由现地出动，经指定路线限29日夜进至八公桥以西南地区。30日夜进至坝头至甘露集段黄河北岸地带，借六纵队对敌牵制，自行掩护实施渡河，尔后即直扑曹县之敌而歼灭之。

6月26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出《晋冀鲁豫野战军鲁西南战役作战命令》，对鲁西南作战各军渡河及作战任务重新调整：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及所在军分区武装的一部，应于6月30日拂晓，秘密前往戴庙至孙口段黄河南岸地区隐蔽，黄昏时确实到达渡河点，掩护第一纵队渡河，原在黄河南岸的独立第二旅及所在军分区武装一部，应于6月30日拂晓秘密前往旧城集至临濮集段黄河南岸地区隐蔽，黄昏时确实到达

渡河点，掩护第六纵队渡河。野战军主力分为第一、第二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由第一、第二、第六纵队组成，第三纵队作为第二梯队。渡河时间统一改为6月30日夜，各渡口同时行动。命令规定了各纵队渡河的具体地点：第一纵队分经位山、张堂、林楼（张秋以南20里）诸渡口实行宽正面渡河；第二纵队分经林楼（旧范县西南）、孙口（寿张以南）诸渡口强行宽正面渡河；第六纵队分经濮县以东南之李桥、于庄、大张村之诸渡口强行宽正面渡河；第三纵队为战役预备队，于30日夜进至白衣阁及其东西地区，尔后视渡河情况尾第六纵队或第二纵队之后渡河，适时扩张战果。

为了保障渡河的胜利，邓小平和刘伯承巧妙地运用了著名的“暗渡陈仓”的战术。命令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伪装主力，在豫北发动攻势，造成敌人的错觉，命令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佯攻，转移敌人的视线，而主力却隐蔽地从豫北开赴黄河北岸，待机渡河。当一切部署完毕，邓小平、刘伯承率领野战军指挥部从安阳出发，向黄河北岸移动。指挥部设在山东省寿张县（今阳谷县）沙河崖村一所农民的房屋里。这是三间草屋，黄泥坯墙，茅草顶，房间不大，四壁钉满了地图，中央摆着4张方桌，桌上铺着黄泥军毯。这几天，邓小平常坐在桌旁，一边看着地图，一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面前的小瓷碟里堆满了烟蒂。

6月29日，邓小平、刘伯承发出命令，要求把所有船只运下水，分别集中到8个渡口，并在每个渡口设立黄河指挥部，专门负责部队渡河事宜，同时命令部队隐蔽地进入各渡河点。

6月30日晚9点正，邓小平、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纵队，共12.4万余人，分别从魏山、张家堂、林家楼（张秋以南20里）、孙口、林楼（旧范县西南）、李桥、于庄、大张庄8个渡口同时行动，开始了强渡黄河的伟大壮举。

150公里长的黄河上，波涛汹涌，大浪滔滔，滚滚浊流载着大小船只在夜幕中向对岸驶去。由于这次强渡黄河的行动是在极其隐蔽的状态下进行的，而敌人又自恃黄河水流湍急，河床宽阔等自然条件麻痹轻敌，所以对黄河北岸多日来准备强渡的行动毫无察觉，直到渡河部队到达南岸，冲向河岸工事时，敌人才仓促开枪射击。这时，渡河部队在北岸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冲进敌人的防御工事，迅速占领黄河南岸滩头阵地，迫使敌人向南溃逃。当夜，刘邓大军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打开了蒋介石中原防御体系的大缺口。

第二天，主力部队全部渡过黄河，开始向各自预定的目标前进。

7月4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野战军指挥部来到台前县孙口渡口，准备从这里渡过黄河。仲夏之夜，黄河岸边是那样安澜静溢，一切都在沉睡，只有奔腾不息的河水在星辰月亮的拥护中悄悄地向东流去，偶而，从河面上刮来一阵凉风，把黄河湾处那片芦苇

吹得 作响。邓小平站在黄河岸边，掀开衣襟，任夏风吹着。一只渡船从岸边的芦苇中推了出来，划到邓小平的面前。

“该上船了。”刘伯承在邓小平身边轻声提醒道。

“是啊，该上船了。”看着警卫人员扶刘伯承上了船头，坐稳了，邓小平才敏捷地一跳，坐在刘伯承的身边。

河面上静悄悄的，河水轻轻地拍打着船舷，发出有节奏的悦耳的声响。一阵“嗡嗡”的声音由远而近，敌人的两架飞机投下几颗照明弹，把膝膝的黄河景色照得通亮。离岸边越来越近了，这时，从远处传来一阵阵激烈的枪声和炮声，渡过黄河的部队正在向盘踞在鄂城、菏泽、曹县一带的敌人发动进攻，鲁西南战役已经打响了。

鲁西南一带是刘邓大军向南作战略进攻的必经之地。它处在国民党陕北、山东两个重要战场的中间，敌人守备力量薄弱。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大军突破黄河防线后，首先发起鲁西南战役，有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一，当时，蒋介石正在集中主要兵力进攻山东，蒋介石认为：“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如果刘邓大军渡河后向鲁西南地区守敌发动攻势，必然调动进攻山东的敌人来援，这就可以支援华东野战军作战，打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其二，开辟鲁西南战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配合华东野战军的内线作战，有利于华野主力早日出鲁西南挺进中原。其三，鲁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将是追击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主要部队，如能在鲁西南大量歼灭敌人，可以减轻对刘邓军尾追的压力，同时还可造成敌人的错觉，摸不清刘邓军的战略意图，而刘邓则可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乘胜向南前进，经豫皖苏向大别山跃进。

这时，蒋介石看到刘邓大军突破了黄河防线，华东野战军主力又在津浦线发起强大的攻势，山东战场的左翼和后方受到严重威胁，急忙调兵遣将，开赴鲁西南，已堵住这个刚被冲开的缺口，确保徐州、郑州这两个战略要地的安全。蒋介石命令刘汝明集团的整编第五十五师第一八一旅和整编第六十八师守菏泽，整编第五十五师主力守郛城，从碭山调来第一五三旅扼守定陶，以地方团队守曹县等城，牵制刘邓野战军，另从豫皖苏区柑调整编第五十八师，从豫北抽调整编第三十二、第六十六师，在陇海线黄口至碭山段北上至金乡以北地区，和嘉洋地区的整编第七十师给成重点，增援鲁西南，并把在山东泗水的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调来统一指挥，逼迫刘邓军背水作战，企图把刘邓军歼灭在黄河、运河三角地带，或者重新逼回黄河以北。

根据这一敌情，刘邓决定采取“攻敌一点，（攻郛城），吸敌来援，打其一边（定陶、曹县），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乘敌援军主力尚未到达之际，首先攻歼郛城、定陶、曹县之敌，尔后集中兵力，于运动中歼灭来援的王敬久集团主力。具体部署是：第一纵队4个旅攻歼郛城之敌；第六纵队和第二纵队各一个旅攻歼定陶之敌；第二纵队主力围攻曹县之敌；第三纵队主力进至定陶东南之冉固集、汶上集地区待机；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二旅进至郛城、巨野之间地区待机。

郛城是蒋介石在鲁西南的一个军事重镇，防守该城的是国民党军曹福林的整编第五十五师，约1万余人。7月3日到6日，杨勇、苏振华率领第一纵队肃清郛城外围之敌，7日夜晩，发起总攻。8日拂晓，全歼守敌，解放郛城。

在第一纵队围攻郛城的同时，陈再道、王维刚率领第二纵队直逼曹

县。曹县守敌均是地方团队，闻刘邓大军临近曹县，连夜弃城逃跑，7月6日，解放曹县。

7月7日，第六纵队和第二纵队的第五旅，肃清了定陶外围之敌，10日傍晚向定陶守敌发起总攻。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王近山，杜义德率领第六纵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奋勇冲破城门，占领了定陶县城。

这时，王敬久率领援军已分别到达六营集、独山集、羊山集、谢家集和金乡地区。

7月10日，刘邓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如能在歼灭七十师并争取在路北多歼灭几部敌人，然后休息若干天，整顿队势，举行陇海路作战似属有利，我军愈多在内线歼敌，则出到外线愈易发展。”

邓小平和刘伯承分析了敌情，认为王敬久集团刚进入鲁西南地区，正在行进中，且兵力分散，如能分割包围起来，然后集中兵力，必能各个歼灭。故决定围歼兵力较弱的六营集守敌七十师，尔后再消灭独山集和羊山集的敌人。

7月13日拂晓，各纵队按部署迅速到达指定位置，分别完成了对六营集、谢家集、羊山集的包围。14日，第一、第六纵队向六营集守敌发起猛攻，歼灭整编第三十二师、整编第七十师一个旅。接着向羊山守敌发动攻势。

羊山位于金乡西兆、万福河北岸，全长仅2.5公里，形状很象一只羊。紧靠山脚下，有一个镇，居住有七八百户人家，这就是羊山集。这时，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已赶到这里，并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刘邓野战军主力包围了羊山集后，蒋介石命令王敬久亲率整编第五十八师和第六十六师的第一九九旅由金乡北援羊山集。7月22日，第三纵队第九旅和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向渡过万福河的国民党军第一九九旅发动进攻，全歼该敌。27日夜，对被包围的羊山集守敌发起总攻，激战至28日晚，全歼守敌整编第六十六师。

盛夏的鲁西南，大雨滂沱，阴雨连绵，战壕里的水足有齐腰深，

仗打得很苦。经过28天日夜激战，共歼灭敌人9个半旅，约5.6万人，取得了鲁西南战役的胜利。这一战，粉碎了敌人的黄河战略，迫使敌人从山东、陕北等地调动7个整编师共17个旅向鲁西南增援，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有力地支援了陕北、山东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直出大别山决策的确定

当部队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后，邓小平看到，蒋介石为了堵住南线上的这一缺口，不惜从山东、西北、中原等地调兵增援。如果中央军委派兵渡黄河出击豫西，无疑将威胁敌人的西北战场，吸引更多的敌人来援，这样，既能解陕北之围，又能配合刘邓军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所以，鲁西南战役打响后，邓小平便与刘伯承联名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建议，要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于月内直出豫西，协助陕北和刘邓作战。

7月1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了这一建议，决定陈谢纵队由原定西进陕北改为南出豫西。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等人的电报中指出：“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赓、谢富治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关、洛阳、郑州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中央军委还决定，以陈谢纵队和刚成立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第十二纵队（后改为进大别山）、第三十八军组成一个集团，由陈谢统一指挥，在20天内完成一切准备，于8月19日前渡河。中央军委这一新的决策，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原拟的进军中原的战略计划，即由原来的刘邓一军出中原变为刘邓、陈谢两军出中原，这对于互相配合，实现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后来的事实证明，陈谢出豫西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迫使蒋介石下令从陕北战场撤兵，减轻了陕北解放军的压力，而且直接配合了刘邓军的战略行动。

出击中原的战略方针已经定了，但何时出动？是继续留在鲁西南寻机歼敌，还是早日进军大别山？是先依托豫皖苏，逐步向南发展，还是采取跃进式，直出大别山？这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全面分析了整个战局，于7月23日提出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的建议。这时，鲁西南战役还没有结束，羊山集尚在激战。毛泽东在电报中指示：在目前情况下，为了确保与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建议“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这就是要改变原定的刘邓大军依托冀鲁豫地区逐步向豫皖苏边区和大别山地区挺进的计划，而采取在山东战场敌人主力回援之前，先敌直插大别山地区。

当时，邓小平正在前线指挥作战，故未及时回电。在前线指挥部，他与刘伯承反复研究了中央军委的电报，认为中央的建议完全正确，但部队经过一个月连续作战，已极端疲劳，且伤亡较重，如果要部队立即转入无后方作战，困难确实不小。7月28日，即羊山集被攻克当天，

邓小平立即与刘伯承向中央回电，一方面表示拥护中央方针，另一方面如实陈述了部队眼前存在的困难，希望能在内线继续作战一个时期，待时机更为有利时再向大别山跃进。

刘邓在电报中说：我们完全拥护所示方针，唯现有如下困难：（一）南渡后连续作战，共歼灭4个师部、9个半旅、约5万余人，战果不小，但消耗甚大，伤亡约1.3万，炮弹消耗殆尽，新兵没有，俘虏至少需时20天争取（约可补足伤亡），炮弹无法可补（陈谢亦然），医院已患员满，一时难以抽出。（二）我原来打算第一步依托豫皖苏，尚能保持后方接济。所需经费只法币数十亿元，不足半月开支，一到南面即发生冬衣困难。（三）陈粟谭27日电所提理由，我们亦具同感。我们当前敌人现有17个旅，除四十师外，战力均不强，山东敌人又难西调，仍有内线歼敌机会。如果在陇海路南北机动2个月，并消灭其8个旅以上，则南下更少困难。（四）但我积极作行动准备，立即休整半月。（五）如我们推迟，陈谢渡河，以先扫清垣曲、向坡、焦作为好。如邯郸局能在8月底补充5万新兵，（包括陈谢各部），东北一批炮弹，则阵容更为整饰。请中央考虑示遵。

第二天，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回电，同意“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的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当时，陕北解放区正处在国民党军34个旅、25万人的大举围攻中，处境极为艰难，所以，毛泽东在电报中亦流露出希望刘邓乘胡宗南军在陕北之机早日兵出大别山的焦虑心情。他告诉刘邓：“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邓小平反复看着电报，更加感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他们寄予无限的重托，眼下，部队是很疲劳，立即行动确有困难，鲁西南地区也存在着内线歼敌的良好时机，但兵出大别山系关全局和陕北的安危，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尽早行动。7月30日，刘邓向中央军委回电，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军委的建议，休整半月后，于8月15日直趋大别山。电报称：

“连日我们再三考虑，军委梗（23日）电方针确好。顷奉艳（29日）电，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敌19个旅，至少有10个旅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适宜。准备无后方作战。要求下列数事：（一）请山东令渤海尽量赶运炮弹取用，可能条件最好能再给我们1000山炮弹，我们已派车到德州接运。（二）请邯郸即千方百计派大批干部接收现有之1万伤员，好抽医院出动。（三）请邯郸将现存法币××，全给我们。以上务请限于15号前完成。此外，建议陈赓兵团在鲁西南拉一下敌人。山东抽出皮定均旅到大别山作军区骨干。”

这时，部队已经从前线全部撤了下来，正集中在巨野、郓城以北地区休整。自渡黄河以来，邓小平连续指挥作战，已经一个月没有好好休息了。现在，下一步的作战方案已初步拟定，按说，他可以宽心地睡个安稳觉了。可连日来发生的新情况又使他忧心忡忡，彻夜难眠。

7月下旬以来，鲁西南一带阴雨连绵，黄河水位猛涨，从阿城到东明一段黄河老堤，因年久失修，已岌岌可危，时刻有决堤的危险。不仅如此，国民党还扬言要决黄河大堤，放水淹没解放军于黄河以南。看来，新的情况已不利于大军久留此地。

还在鲁西南战役打得正激烈的时候，邓小平使已察觉到了国民党的这个阴谋，他指示冀鲁豫城工部与汴郑工委取得联系，时刻提防蒋介石扒黄河。汴郑工委接到指示后，通过各种关系，迅速掌握了蒋介石密令驻守开封的国民党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珍炸毁黄河大堤，水淹解放军的确实情报。蒋介石的打算是，只要把黄河大堤炸开，黄水滔滔，刘邓数十万大军将不战自溃，即使高地上尚留有一点部队，等黄水退尽后，他们将发现自己已不在黄河南而被隔在黄河以北，因为黄河已经改道了。

当汴郑工委书记刘鸿文向邓小平、刘伯承汇报这一情况时，邓小平气愤他说：“这是蒋介石想再次扒开黄河堤，水淹我军。”

“是啊，战争既讲天时，又讲地利，连日大雨倾盆，黄河水位猛涨，我军在黄河边上背水作战，蒋介石当然想利用这足抵40万大军的黄水来参战，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对付哟！”刘伯承接接着说道。

刘汝珍是西北军著名将领。大革命时期曾留学苏联，与刘伯承是同学。在蒋介石的高级将领中，刘是比较开明的，对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和进步人士也较客气。邓小平对刘鸿文说：“你们赶快回去，抓紧时间做好刘汝珍的工作，一定要说服他阻止蒋介石扒黄河的阴谋。”刘伯承给刘汝珍写了一封亲笔信，劝他不要象蒋介石那样，为了阻止日军，在花园口扒堤放水，淹死数十万百姓，使像皖苏十多县成为一片汪洋。要他为子孙后代着想，不要做历史的罪人。

刘鸿文回开封后，即与刘汝珍谈判。刘汝珍立即给刘伯承写了一封回信，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绝不作对不起国家民众的事。后来，刘果真没有食言，不仅未扒黄河，还派了5000民工加修了一段黄河大堤。

刘汝珍那边的情况是稳住了，可瓢泼大雨一个劲地哗哗下着，丝毫没有停转的迹象。司令部的院子里满是积水。

“如果再下几天，一旦黄河决堤，几十万大军将如何转移？后果不堪设想啊！”邓小平望着窗外滂沱大雨，心急如焚地对刘伯承说。

此刻，刘伯承正坐在门口的一把柳条圈椅上，门外地上放了几块青砖，砖上刻着刻度，他在聚精会神地测量水位的变化。听了邓小平的话，他头也不抬他说：

“是啊，我也在为这事担心啊。是不是把李达、际春、天民和作战处的同志们找来研究研究，集思广益嘛！”

8月6日早饭后，邓小平、刘伯承、李达、张际春和司令部有关处、科的干部在作战室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部队的行动问题。作战处的负责人汇报了几日来部队转入休整后的工作情况和黄河水位变化的最新情报，建议早下决心。邓小平听到这里插话说，对于黄河水位必须随时掌握变化情况，及时报告、通报。

会议讨论得很热烈，多数人同意按原计划休整到8月15日，再向大别山挺进。持这种意见的同志理由是很充足的：（一）部队经过一个月作战，十分疲惫，需要好好休整补充；（二）在鲁西南战役后入伍的几百万新战士，还没有经过很好的教育；（三）大量的战利品、物资未妥善

处理；（四）老区接济的经费、炮弹、药品等还未运到，伤员无处转移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就不能放心地入新反作战。

还有一部分同志说，鉴于黄河随时有决口的危险，部队应该缩短休整时间，提前行动，以防不测。

邓小平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每一个同志的发言。是继续休整，还是提前行动？这关系到全军的生死存亡，必须三思而行。他与刘伯承耳语了几句，宣布暂时休会，要大家进一步考虑意见。

午饭后，邓小平乘吉普车来到黄河边，他要亲自视察一下水情，以便早作决策。

8月的鲁西南，天气炎热，气候闷人。从司令部到黄河岸边，沿途布满了水哨，这是几天前，为预防万一，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而设的。一旦水位变化，哨兵就可以随时将情况报告司令部。

邓小平一边察看黄河水位，一边思忖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鲁西南战役结束后，他曾到各个部队检查工作，看到战士们确实很疲劳，如果要他们立即行动，向大别山挺进，实有困难。可继续休整下去，黄河决口怎么办？党中央交给的战略任务如何完成？他反复思考，权衡利弊得失。从战略上来考虑，他倾向于立即结束休整，提前行动。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全军的安危，更重要的是全国战局的需要。部队只有克服困难，勇往直前，下决心不要后方，向大别山跃进，才能调动和吸引更多的敌人来援，配合山东、陕北战场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完成中共中央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战略任务。

主意已定，他跳上吉普车，向司令部急驰而去。

当他跨进作战室的门坎时，刘伯承司令员正在看挂在墙上的地图。听到邓小平的脚步声，他回过头来大声说：

“我的决心定了，时间不能再拖延了，部队应该立即行动！”“对，突然早走，敌人猝不及防。我们进军本身就能粉碎敌人的合击。在鲁西南多消灭敌人几个旅对大局并无大的影响，而向大别山跃进，多调动和吸引敌人几十个旅，就会扭转整个战局！”见刘伯承与自己的意见不谋而合，邓小平十分兴奋地答道。会议继续开下去。

刘伯承首先讲话：“同志们，我建议停止休整，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要当机立断，抓紧时间，行动越早越好，机不可失，时不待我。”他用眼光扫视了一下在座的同志们，见邓小平对着他不住地点头，话语更坚定了。在讲到提前跃进的依据和理由时，他说：“第一，南下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我们尽早打出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有利于粉碎敌人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有利于扭转全国的战略局势。

第二，留在此地继续作故，当然能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几个旅，但这正上了蒋介石的当，犯了背水作战的大忌。我们决不上这个当。

第三，现在，全国各个战场已开始由被动转入主动，在北线的东北和华北战场，我军正在发动攻势；在南线，敌人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困难境地，而连接这两个战场的中间地带——晋冀鲁豫战场，已被我军突破，我军应不失时机抓住这个有利战机，迅速实施战略进攻，扩大战果。

第四，敌人当前兵力集中在开封、郑州、徐州及陇海路沿线，注意

力集中在鲁西南，而从陇海路南到长江北岸广大地区，敌人兵力薄弱，后方空虚，而且敌人错误地认为，我们因疲劳可能北返黄河以北。在这种情况下，我军结束休整，立即南下，取胜的把握是很大的。所以，我决定立即实施战略进攻，向大别山挺进。今天就下达命令，明天晚上开始行动。”

明天就出发，对此大家都感到突然，毫无思想准备。邓小平站了起来，接着刘伯承的话继续说道：

“刘司令员的意见和部署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南京，把故线从黄河推进到长江边，我军的战略行动，必将调动蒋介石回兵救援，这样，我们就能配合兄弟部队，配合全国各个战场，彻底扭转全国战局。”

最后，他又强调了三点：“第一，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战略任务，要教育各级干部和广大战士，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我军战争史上的创举。要准备为实现这一伟大战略决策做出贡献，付出代价。要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第二，在进军途中，敌人必然会前堵后追，我军在淮河以北主要是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要避免与敌人主力纠缠与作战，千方百计地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第三，教育部队，进入新区作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邓小平在结束了他的讲话后，把头转向李达参谋长，要他立即起草电报，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司令部的决心和部署。同时向部队发出准备行动的命令。

电报发出约3小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复电批准了这一决策。当晚，司令部下达了第二天部队出发的紧急命令。

从鲁西南到大别山

1947年8月7日夜，部队按计划从鲁西南的巨野、郓城地区出发了。

当时，蒋介石对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还毫无察觉。鲁西南战役后，刘邓大军12万人集结在巨野、那城一带休整，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5个纵队也进到郓城以东地区。蒋介石错误地认为，刘邓经过一个月连续作战，疲惫不堪，短时间难以再战。所以，他亲自飞往开封，部署被刘邓军吸引到鲁西南地区的30个旅，准备分路向刘邓大军合击。

刘邓主力悄悄离开鲁西南地区后，为了继续给蒋介石造成错觉，隐蔽部队进军大别山的方向，邓小平与刘伯承对部队的进军路线作了精心部署，确定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分左、中、右3路、沿不同路线共同前进：第三纵队在左，为东路，沿成武、虞城、鹿邑、界首之线，直插固始、金寨、六安、霍山地区；第一纵队和中原独立旅（这时正在豫皖苏）在右，为西路，沿曹县、宁陵、柘城、项城、上蔡之线以西，进入罗山、宣化店、黄波地区；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和第二、第六纵队为中路，沿沈丘、项城、息县之线，直奔大别山腹地，一千多名地方干部随各纵队行进，以便迅速到达指定地区，及时开展地方工作。此外，以新成立的第十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黄河渡口佯动：造成野战军主力北渡的声势，以迷惑敌人继续合围；以暂归刘邓指挥的华野外线兵团的5个纵队，在鲁南、鲁西南地区积极寻机打击敌人，掩护刘邓主力甫进，同时，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平汉路，断敌交通，中原独立旅参加破路后，绕道平汉路西侧，进入大别山，以吸引敌人注意力。

8月8日夜，部队通过荷（泽）巨（野）公路后，便分兵3路，分别向南疾进。邓小平走在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所率的第二、第六纵队的中间，11日晚，指挥中路部队在虞城古心王集附近跨过陇海铁路，闯过了南征途中的第一道障碍。

从鲁西南到大别山，远隔千里，前有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天然障碍，后有蒋介石的几十个旅穷追不舍，加上正值酷暑雨季，河水猛涨，道路泥泞，暑气蒸人，部队本来就疲惫不堪，未及好好休整，现在又冒着酷暑踏上甫进征程，马不停蹄地向南奔驰。不少战士病倒了，躺在路旁。邓小平见状，心痛难忍，要是往常，他会命令部队抬上他们，一同行军。可眼下，大军南进，事关全局，刻不容缓，他必须率领部队，咬紧牙关，抢在敌人之前进入大别山。他看了看病倒的战士们，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把自己带的草帽和身边仅有一些急救药品、水和其它防暑物品留给他们，嘱咐他们休息之后，设法赶上部队。

大军昼夜兼程，向大别山挺进。即使在紧张的行军途中，邓小平也丝毫没有放松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认为，指战员们疲劳、天气炎热、后有追兵，这些困难确实存在，但只要树立起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在战士们中开展思想互助和体力互助，就一定能克服困难，完成挺进大别山的艰巨任务。他指示政治部，向所有进军大别山的部队发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号召，要求各级指战员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共同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

14日，部队进入豫皖苏解放区的大牛岭、吴台庙、杨蔡园一带。在

这里休息了两天，补充了一些粮食、弹药、药品，安置了一部分伤病员。这期间，邓小平专程去拓城看望了中原独立旅的同志们。

中原独立旅是原中原军区的部队。一年前，他们随主力从中原突围，在武当山建立了鄂西北根据地。几个月后，根据地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中形势日趋恶化，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鄂西北军区决定，由军区参谋长兼四分区司令员张才千率领军区主力1200余人，渡过长江，打到外线去，配合根据地的内线斗争。张才千率部转战大江南北，在湘鄂边、鄂西北、豫西等地与敌周旋，开展游击战争。1947年6月初，这支部队越过平汉路，与豫皖苏军区部队会合，并奉命改编为中原独立旅，直属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指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中原独立旅配合豫皖苏军区解放了亳县、大和、鹿邑、扶沟、鄢陵、柘城，又在周口消灭国民党第十七交警总队1000余人，积极配合了刘邓野战军在鲁西南的战役。

当邓小平见到这支一直在敌后坚持斗争的英雄部队时，激动地向指战员们伸出了双手，他一边握手，一边兴奋他说：“同志们，你们在周口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在羊山集也打了一个大胜仗！敌人妄图消灭我们在黄河一线，我说他们是白日做梦！现在我可以宣布，敌人的梦想是彻底破产了。这次你们中原独立旅要同野战军一起行动，往哪里行动呢？你们都是大别山人吧？告诉同志们，我们这次就是要打回大别山，打回老家去！”

按照预先的部署，中原独立旅的任务是随第一纵队一起行动，作为野战军主力的右翼，在平汉路以西造成大军要挺进桐柏山的声势和假象，以迷惑敌人。邓小平、刘伯承与中原独立旅的指挥员们一起研究了这次行动的具体方案，嘱咐他们要克服困难，随机应变，一定要完成牵制敌人，配合主力挺进大别山的任务。

16日，部队离开豫皖苏，渡过涡河，向黄泛区开进。

这时，蒋介石仍然认为刘邓野战军是北渡不成，又不敢再战，而被迫南撤。所以，只以少数兵力在沙河布防，调动20个旅分路追击，另调4个旅在平汉路策应，企图将刘邓主力消灭在黄泛区与沙河之间。

黄泛区，又称“新黄河”，是10年前蒋介石下令决开河堤，使黄河改道而造成的，黄河归故后，一片汪洋的“泽国”变成了眼前的黄泥滩。它宽达40余里，遍地淤泥，浅处没膝，深处及脐，四周荒无人烟，路途难辨，如果不是远处尚有一些露出水面的屋脊和树梢，人们准会误认为这是又一条黄河。

在这之前，豫皖苏军区为保障刘邓大军顺利通过黄泛区，曾计划派人整修黄泛区道路，用秫秸、木石铺出一条路，因为这里是新区，工作没有基础，收成也不好，所以这项计划没有完成。当负责这项工作的豫皖苏二地委书记李一非向邓小平汇报这件事时，邓小平宽慰他说：“用秫秸铺好几十里泥巴路，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在我们老区也不容易办到。”他详细了解了黄泛区、沙河、汝河的情况，随即命令部队通过黄泛区。

战士们手拉着手，臂挽着臂，排成八路纵队，摇摇晃晃地踏进了没膝深的污泥浊水。邓小平裤脚管也不挽，双臂搀扶着刘伯承的胳膊也下了烂泥坑。黄泛区，除低洼地方还有大大小小的水坑外，大多是一片滩地，看上去，似乎便于行走，可一脚下去，却是稀烂的淤泥。有的战士

不晓得这淤泥的厉害，急于走出滩地，可前脚起，后脚陷，使劲越大，陷得越深。在平原上纵横驰骋惯了的战马，被陷在这片“沼泽地”里，急得直吼，可越挣扎，越往下陷。一些参加过长征、走过草地的老红军，见如此这般情景，不禁深有感触他说，这真象是“第二个草地”呀！邓小平搀扶着刘伯承，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嘴里还不断地说着：“我们一定能涉过黄泛区，一定能早日到达大别山！”

从16日傍晚到翌日上午，部队在黄泥滩里奋战了近两天，终于胜利地通过黄泛区。接着，急行军30里，直奔沙河。这时，豫皖苏军区部队已预先架好了浮桥，部队顺利渡过沙河，于23日下午，来到汝河北岸30里的大李岩。

刘邓率部渡过沙河后，蒋介石才察觉出解放军并非“溃不成军，向南流窜”，而是有计划地战略行动。他急忙改变策略，调八十五师和十五师的一个旅，星夜兼程赶往汝河南岸，妄图与尾追刘邓野战军的20个旅南北夹击，歼灭刘邓军在汝河一带。

汝河，是河南省南部的一条大河，河面不太宽，但水深三四米，河床深凹，两岸陡峭，不能徒涉。加上船只早被敌人拖走或破坏，河对岸还有国民党的地方团队把守，所以，部队很难立即渡过。

这时，挺进大别山的东、西两路部队已先敌抢渡汝河，向淮河逼近，中路部队的前卫纵队第二纵队也过了汝河，继续南进。但是，当刘邓率野战军指挥部、中原局机关和第六纵队到达汝河北岸，准备抢渡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国民党第八十五师和十五师的一个旅已抢先占领了汝河南岸的渡口，堵住了中路军的去路。而紧跟在背后的3个师的敌人，距离汝河北岸只有五六十里，不用一天功夫就可以赶到。前有阻师，后有追兵，形势真是千钧一发，万分险恶。部队能否在几个小时内抢渡汝河，关系到整个跃进大别山的成败。

在大李岩，司令部一再轻装，邓小平和刘伯承常坐的那辆破旧的吉普车，在前几次轻装时早已忍痛烧掉，除了一些书籍和必备的用品外，其余的东西都扔掉了。

黄昏，邓小平和刘伯承把指挥部移到第六纵队司令部。这时，第六纵队的几个首长正在研究如何抢渡汝河的方案。

“打开地图，向他们介绍一下新的敌情。”邓小平一走进六纵司令部的小草屋，便吩咐李达参谋长。

李达展开地图，一边用手指点着，一边简明扼要地说：“现在敌人有3个师紧紧跟在我中路的后面，距我只有五六十里，汝河南岸有国民党八十五师挡住去路，企图拖住我军，迫我背水一战。”

“同志们，情况非常严重。”邓小平的脸崩得紧紧的，十分严肃地说，“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桥断了，再修，敌人不让路，就打。今天过不去汝河，明天跟在屁股后面的敌人就会赶到，到那时，局面会更糟糕。”

一个参谋进来报告，尾追我军的敌人已经和后卫部队打上了。话音刚落，一颗炮弹在司令部附近爆炸，小草屋房顶上的尘土和秫秸被震得直往下落。

邓小平拍打着落在头上、脸上的尘上，接着说：“听到了吧，情况十分紧急，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

经过一阵激烈的争夺，第六纵队十八旅五十二团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抢占了汝河南岸敌人的一个桥头堡——大雷岗村，并在河面上架起了一座浮桥。敌人马上从东、西、南3面构成一个马蹄形阵势，把这个小小的村庄包围住，企图夺回大雷岗，阻止解放军渡河。

争夺大雷岗的战斗打得很激烈，也很残酷，阵地失去了，又被夺回来，又失去，又夺回来，战士们杀红了眼，每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大雷岗桥头堡控制着桥面，它的得失，关系到渡河的成败。邓小平和刘伯承决定亲自到大雷岗前沿阵地去看看。临行前，他拿出纸笔，亲自给野战军指挥部写了一封信，作了三项指示：（一）各部门应立即将机密文件全部烧毁，以免遗失；（二）桥头之阻敌已被我们压缩在村内了，直属队接六纵后尾渡河，不管飞机轰炸和敌人火力封锁，一定督促各单位跟上，求得迅速通过，以免前后接敌被迫作战；（三）预定宿营地在彭店一带，过河后到齐一个单位即指定专人带走，免受空袭。

此刻，野战军机关、中原局机关、大批南下地方干部和数千名从解放区跟随来的民兵，正在向汝河北岸移动，他们战斗力弱，组织乱，有些人还是未曾参加过战斗的娃娃，所以，掩护他们渡河，是件十分艰巨的任务。邓小平最担心的也正是他们。

交待完了要交待的一切，邓小平和刘伯承、李达等人通过浮桥，来到河南岸大雷岗村前沿阵地。这时，十六旅旅长尤太忠已率部冲过浮桥，接替了大雷岗阵地，战士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正抓紧时间休息。这里离敌人的阵地只有一二里，炮弹一个接一个落在掩体外，弹片横飞。邓小平顾不得这些，把尤太忠找了来，指示他，一定要坚守住这个阵地，保护浮桥，掩护全军安全渡河。

深夜二时，刘邓亲自指挥部队从大雷岗村突然向南猛扑过去，占领了大雷岗村南面的王庄、车桓庄、小张庄、贺寨，控制了前进的道路。25日拂晓，部队冲破敌人的拦阻，开始渡河，直到下午，中路部队才全部渡过汝河，陆陆续续赶到预先指定的集合点——息县彭店。

邓小平站在彭店的大街上，焦虑地察看着部队到达的情况。当他看到中原局机关，野战军机关和各部队都安全到达，才松了一口气，指挥全军向淮河前进。

淮河，是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的最后一道险关。它发源于河南省西南部的桐柏山麓，流经河南、安徽、江苏3省，有颍、洪、涡、等十几条支流，它还是中国南北的分水岭，常年通航，当地的农民用木船把山厦的竹、木、茶等运到平汉路上，再把内地的杂货运回山区。

26日晚，刘邓率指挥部和第六纵队主力来到淮河北岸。据前卫部队报告，淮河是可以徒涉的。不料，当大军到达时，上游突然涨水，水流湍急，难以徒涉。而且，淮河上下百里渡口上的船只，都被敌人烧毁破坏，部队费了很大的劲，才从岸边的芦苇中寻出仅有的十几只小木船。这时，集结在淮河北岸准备渡河的部队有7个旅，加上野直机关、中原局机关和大批地方干部，这么多人，仅靠十几只小船是无济干事的，不要说全军两天内难以渡完，就是前卫旅一夜全部渡完也很困难。而敌人正在向这里急速赶来，情况万分危急。

“我们开个会，研究一下渡河的情况吧。”邓小平对正凝神思索的刘伯承说。

他们一起来到淮河北岸一间孤零零的小屋里，这是一间闲置的柴草房，房基是大鹅卵石和石条，房的上部是用土坯垛成的，房顶粘着禾草。警卫人员点亮了马灯，会议开始了。

邓小平一进屋，便对李达说：“你先把背后敌人的情况说说吧。”

“情况是这样，敌人四十八师、三师、五十八师、七师、十师、六十五师、五十二师、骑兵一旅，共 19 个旅，正从我们背后赶来，十五师的先头部队距我后卫部队只有 30 多里，用不着等到天亮，战斗即可打响。”

此刻的形势与渡汝河的情况极为相似，东、西两路军已分别渡过淮河，向大别山挺进，隔在淮河北岸的又是中路军，7 个旅的兵力要对付敌人的 19 个旅，敌众我寡，势孤力单，情况确实令人担忧。

屋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说话。刘伯承抱着双臂站在屋子中央，李达、张际春、郭天民等人或站或蹲，人人都在凝眉思索着渡河的方案。邓小平坐在那盏忽明忽暗的马灯前，他抬腕看了看表，已经是凌晨两点了，如果拂晓前再拿不出渡河的好办法，等敌人重兵一到，那就只得背水一战了。眼下，大军云集淮河边，凶多吉少。必须设法加快渡河速度，争取多渡过一些部队。此外，还要有人先行渡河，统一领导和指挥已到达大别山的部队，创建根据地。主意已定，邓小平先开了口：

“情况万分紧急，时间不等人。我已经考虑好了，我和伯承分开，伯承、际春带司令部先行渡河，指挥已渡河的部队，实行战略展开。李达留在淮河边，继续指挥渡河，能渡多少，就渡多少。我负责组织部队阻击尾追敌人，掩护全军渡河。”

“政委的话就是命令，我们分头行动吧！”刘伯承立即表示赞同。

在小屋门口，邓小平与刘伯承握了握手，便去组织部队，部署阻击尾追敌人事宜。刘伯承则来到渡口，指挥部队渡河。凭着他多年的经验，他怎么也不相信淮河真的不能徒涉。他拿了一根长长的竹竿，跳上渡船，准备亲自测量一下水流深度。他不停地用竹竿探测着水位，发现有的地方河水并不深，流速缓慢，只要插上标杆，部队完全可以沿标杆徒步涉河。后来，他又意外地看到上游有人牵马过河，这证明他的发现是正确的。他立即派人给李达送来一封信，叫他迅速组织部队徒涉，并通知邓小平。

邓小平正在组织后卫部队，准备阻击敌人，掩护渡河，突然收到刘伯承派人送来的信，告诉他，河水可以徒涉，后卫部队可立即渡河。

这意外的喜讯，使面临背水一战的部队化险为夷，淮河，这南征途中的最后一道险关，终于闯过来了。8 月 27 日，部队全部渡过淮河。经过 20 天艰苦征战，刘邓大军终于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胜利地进入了大别山。

第四章 重建根据地 任重道远

1947年8月27日，刘邓率千军万马踏上了大别山的土地，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艰巨任务。31日，邓小平在向部队作报告时，激动地挥着两臂，庄严地宣告：

“我们已到了大别山，完成了战略任务的第一步，把蒋介石逼退了一条线。党中央说我们的行动是英勇的行动。”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20多年来，她所领导的革命战争长期处在防御地位，自从刘邓率领部队强渡黄河，跃进大别山后，中国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因此，这一伟大的壮举向人们预示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和胜利，预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和灭亡。

邓小平在论述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意义时说：“我们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一千里。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这个跃进的事实表明战略形势起了巨大变化，正如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的，由于我们的反攻，已经扭转了战争的车轮。我们击破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使之由进攻转为防御，由外线转到内线，而我们则由防御转为进攻，由内线转到外线，改变了战略形势。”

大别山横亘鄂、豫、皖三省，呈西北向东南的走向，海拔1000米左右，由于它靠近长江，地形险要，位于国民党首都南京与长江中下游重镇武汉之间，在战略上具有东扼南京，西迫武汉，瞰制中原的重要作用。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共激烈争夺的要地。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别山就是老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孕育、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现在，刘邓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老底子，正是当年的红四方面军。因此，邓小平对大别山的革命历史了如指掌。从党领导鄂豫皖地区农民起义，建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以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曾四出大别山：第一次是1932年10月，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西征；第二次是1934年11月，程子华、吴焕先率红二十五军长征；第三次是高敬亭率刚改编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第四次是李先念、郑位三率中原军区主力突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和迫害，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力量几乎损失殆尽。当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时，虽然少数地方还有一些分散的武装在坚持斗争，但大部分地区已经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所以，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重新创建根据地。

从全国战局的发展来看，形势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极为有利。继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之后，全国各解放区战场也先后转入战略

《邓小平政委报告目前形势和任务》，1947年8月31日。

《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1948年4月25日，《邓小平文选》（1938—1965），第97页。

进攻。国民党军队疲于应付，连连遭到惨败，兵源严重不足，难以抽出更多的兵力对付刘邓大军，这正是创建根据地的有利时机。

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在指挥各解放区战场作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战略进攻计划。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谢集团挺进豫西外，另决定陈粟大军进军豫东，与刘邓、陈谢两部成犄角之势。8月上旬，当刘邓大军向大别山跃进，山东敌人开始抽兵回援之时，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进到鲁北地区的陈毅、粟裕：刘邓南下，全局大有变动，鲁西南诸敌必大部南去，因此，你们应即率野直及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十纵队，组成西线兵团，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路以东广大地区实施展开，恢复与扩大豫皖苏解放区，与刘邓、陈谢两军共同经略中原。指示李先念率正在华北休整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到聊城以南黄河北岸，接受陈粟指挥，准备经豫皖苏解放区南下大别山地区。同时，中央军委还指示，以华东野战军4个纵队组成东线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与西北野战军继续在南线的两翼——山东和陕北战场钳制敌人，策应刘邓、陈谢、陈粟三军的行动。至此，一个三军挺进中原、两翼牵制的战略进攻部署就最后形成了。中共中央给刘邓、陈谢、陈粟三军的主要任务是：三军配合，挺进中原，互为犄角，在广阔的中原地区，以“品”字形阵势协力作战，机动歼敌，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调动敌人主力，配合解放军内线作战。

8月22日，当刘邓大军向汝河北岸逼近时，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第八纵队的二十二旅、第三十八军，计8万余人，在邵源以南的大教至官阳间以及茅津渡以东渡过黄河，向豫西挺进。解放了陇海路沿线的新安、渑池、洛宁等县，主力威逼洛阳，在洛阳和陕县之间开辟了战场，造成对潼关、西安的威胁，吸引尾追刘邓大军的整编第三、第十五、第四十一师和青年军第二六师各一个旅回援，减轻了刘邓大军的压力。

当刘邓大军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时，陈粟大军正在积极准备南渡黄河，向豫皖苏挺进。这样，陈谢在豫西的作战，陈粟在大别山外围地区的展开，都将对刘邓大军重建大别山根据地以有力的支援和配合。而三军的协同作战，一定能够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大量歼灭敌人，实现中共中央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的战略目标。

中原地跨鄂、豫、皖、苏、陕五省，北至黄河，东起运河，南临长江，西迄伏牛、汉水，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由于它居天下之中，扼四面八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以来，一直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宋代诗人陆游曾写过“中原于戈古亦闻”的著名诗篇，李弥逊也为后人留下了“回首中原飞鼓鼙”的脍炙人口的绝句。所谓“占中原者，方能得天下，”早已成为历代战略家公认的至理名言。所以，只要解放军能在中原立足生根，就可东慑南京，西逼西安，南扼长江、武汉，直接威胁敌人的长江防线和江南统治区，迫使敌人主力从山东陕北战场回援，从根本上改变战局。同时，中原还可以成为将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向江南进军，解放全中国的前进基地。因此，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曾说：“自古谁得中原，谁得天下。占领了华北、东北，再取得中原，就得到了全中国。”

作为中原局书记，邓小平深感创建中原解放区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从战略上来看，中原有三山、四河，即大别山、伏牛山、桐柏山，长江、黄河、淮河、汉水。邓小平认为，要在这三山、四河之间创建中原解放区，就必须首先控制住大别山。因为，“中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我们反攻以后，它代替了敌人重点进攻的山东和陕北，是敌人兵力集中最多的战场。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伏牛山，一个是大别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他还说：“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这是艰苦斗争的过程。”现在，部队经历了千辛万苦，已经到达大别山，完成了战略任务的第一步。但今后要完全控制脚下这块土地，建立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作出更多的牺牲。

对于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困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已预料到了。在刘邓率部队准备向大别山跃进时，毛泽东曾对跃进大别山的前途作了3种估计：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在周围坚持斗争，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他还特别提醒道，要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8月12日，当部队跨越陇海路向南挺进时，毛泽东又致电刘邓，对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困难和长期性要有充分思想准备，告诫刘邓：“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

对于毛泽东的估计，邓小平认为它完全符合大别山的实际斗争情况，因为大别山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然会代替山东和陕北，成为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战场，而争夺大别山的斗争一定会经过一个十分艰苦的、长期的过程。但是他坚信，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斗争，部队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争取毛泽东三个估计中的最好的前途。现在，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让全体指战员明白自己所担负的光荣使命，在思想上作好继续吃苦的准备，树立在艰苦环境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与勇气。

8月27日，即部队到达大别山的当天，邓小平便亲自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了《关于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下发到所有部队，明确规定了进入大别山后的任务以及实现任务的办法和要求，指出：

“（一）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跃进任务，敌人追击计划完全失败。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

（二）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发展半年以上的时间。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和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稳脚跟是不可能

的。因此，我们应切勿骄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

（三）应向全军说明，我们有完全胜利的把握。首先是有陈赓兵团在伏牛山、豫西、豫南广大地区及山东大军在陇海路南北的互为配合。其次是我当面敌人只有 23 个旅，兵力分散，战斗意志薄弱，此次尾我失败，战略上愈显被动。再次是大别山区有长期的革命传统，且保存有游击战争的基础，我们有许多本地干部。特别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军上下一致的决心和信心，胜利是有把握的，虽有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

（四）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他们的子弟在华北胜利了，壮大队伍了；说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条件，说明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

（五）在军事上，我们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仗（一两个团一次的歼灭战）。同时，特别注意引导大家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战，为大歼灭战准备条件。但必须了解，如果我们不在半年内歼灭 10 个旅以上的敌人，就无法使群众相信我们不会再走而敢于起来斗争，我们也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任何时候，全军必须有高度的战斗意志和战斗的准备。

（六）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而我军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

8 月 31 日，邓小平在大别山区的光山县北向店，向野战军直属队连以上干部作《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全面分析了挺进中原后的全国形势，再次阐明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有利条件。指出：

“我陈赓兵团已挺进陇海西线，向伏牛山前进。这样，便以大别山、伏牛山和鲁西南形成一个犄角之势。在这战略态势下，我们解放中原，是有充分根据与条件的。（一）由于我们挺进大别山区，陈赓兵团胜利地出现于陇海西线，加上陕北战场的攻势，蒋介石兵力不足更是捉襟见肘。现在尾追我们和在我们周围的敌人总共 23 个旅，不到 15 万人，其中一部是曾被我们歼灭后再补充起来的，要想从其他地方抽调部队来是万分困难的。另一方面，当我跨越陇海路时，敌人错误地认为我们是‘被迫’行动，事前没有布置正面阻击，事后尾追一直处于被动形势下，这就是蒋介石战略上的失败。（二）中原地区人口 4500 万，物产丰富，是蒋介石内战中重要兵库与粮库，我们到这里，便夺取了敌人的供给，加强了自己，使敌人的困难更加扩大。（三）这个地区有我们长期的革命影响，人民受过了革命的洗礼，内心拥护我们。但由于革命军队四次的转移，人民目前还暂时的对我们采取观望态度。只要我们打胜仗，方针正确，人民会很快起来，而且会产生大批干部。”

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在根据地没有建立之前，一定还有不少困难，如敌人一定在我立脚未稳时扭住我们；北方人到南方习俗不同，生活不惯；在群众未起来，政权未建立前，担架、粮食等问题难以解决等等。但只要全体指战员上下一心，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积极想办法，

克服困难，就一定能站住脚，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在讲到目前部队的具体任务时，邓小平提出了三条：（一）歼灭一定数量的敌人。只要我们把地形搞好，练习山地战，有准备，有信心，有战斗意志，反对怕死鬼，歼敌不成问题。（二）在一定时期要完成初步土地改革。发动群众要充分走群众路线，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只有过了这一关，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三）熟悉风俗习惯，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调查风俗人情，编成教材向战士讲，有困难要克服。

最后，邓小平充满信心说：

“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任务是十分光荣的，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一页！我们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解放区一定要建立起来！困难一定要克服！共产党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我们一定要站住脚，生下根！”

寻找中心县委

大军南下前，邓小平曾通过各种渠道，对大别山一带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他了解到，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主力突围时，曾留下一部分武装坚持大别山斗争，要他们发展游击战争，等待主力返回大别山。后来，由于敌人的严重摧残和破坏，这些武装损失严重，并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们仍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继续坚持斗争，打击和消灭敌人，保护群众，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情况，在大别山地区坚持斗争的武装主要有：黄安七里坪张县长部 200 多人；立煌西南滕家堡肖显扬及张体学部 200 多人；立煌龙门石民变武装 200 人；大别山杨秀昆部 300 人；流动在立煌附近的刘健挺部 300 人；还有活动在经扶一带的刘名榜部 200 多人。其中以刘名榜领导的罗礼经光中心县委和游击队的影响最大。

邓小平认为，部队要在在大别山立足生根，创建根据地，必须首先与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必须在当地干部和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克服困难，打开局面。所以，他在几次讲话中都反复强调，许多地方干部是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重要条件之一。

8 月下旬，大军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大别山，由于人地两生，情况不熟，困难甚多。如行军打仗找不到向导；伤病员聚增无处安置；进山后一些暂时不用的车辆、大炮等重武器无处隐蔽等等。这些情况表明，迅速与当地党组织与游击队取得联系，依靠他们解决困难，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邓小平指示进入大别山的各个纵队的首长，一定要想办法分别与活动在各地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开展各项工作。他还专门指示第六纵队政委杜义德，打下经扶县城后，要派人设法寻找在经扶一带坚持斗争的刘名榜领导的罗礼经光中心县委和游击队。

刘名榜是经扶县郭家柯乡莲花村人，1928 年参加革命，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鄂豫暴动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长期坚持大别山斗争，是一位久经考验，具有领导敌后游击战争丰富经验的老党员。当地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大别山的儿子”。中原突围前，刘名榜奉命担任中共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书记，再一次挑起了主力突围后领导大别山游击战争的艰巨重任。当时，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曾风趣地对刘名榜说：“刘名榜，你要是‘革命到底’了，我回来给你树纪念碑！”

中原军区主力突围后，刘名榜带领中心县委和游击队一直在经扶、罗山、黄安、麻城等地坚持斗争。在敌人的残酷“围剿”中，他们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一连数月被敌人围困在深山密林中，断炊断粮，生活异常艰苦。敌人还把刘名榜的母亲和妻子带到山上喊话，企图引诱游击队下山，要挟刘名榜屈服。刘名榜鼓励同志们，无论斗争多残酷，生活多艰昔，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决不让大别山革命的红旗在我们手中倒下！他率领游击队多次冲破敌人的包围，主动出击敌人，惩办了一批极为反动的保长、叛徒，打击乡、保武装，在大别山造成很大的影响。中共中央正是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了游击队打死国民党经扶县参议员杜定廉的消息，才知道大别山仍有刘名榜领导的游击队在

坚持斗争。1947年5月，中共中央在作出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向大别山挺进这一战略决策的同时，派原中原局代理书记郑位三之弟郑植惠从延安到大别山，告诉刘名榜，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少则3个月，多则半年，定要挥师南下，解放大别山，要他们克服困难，坚持斗争，迎接主力重返大别山。

当邓小平指示仕义德到经扶一带寻找中心县委和游击队时，刘名榜和中心县委的同志们已得知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的消息，也正在设法寻找主力部队。8月28日，第六纵队解放了经扶县城。刘名榜得知消息，率游击队连夜下山向新集奔来，准备与主力部队接头。不料，途中与国民党保安团遭遇。当他们摆脱敌人时，第六纵队已奉命向黄安进发，他们又急忙赶往黄安。

几天后，邓小平率野战军司令部来到经扶县的宋家贩、小姜湾一带。在这里，邓小平得知第六纵队因向黄安进军，未来得及与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中心县委取得联系，也没有留下干部建立政权，随即把野战军司令部民运部长穰明德找了来，神情严肃地对他说：

“现在的情况你都知道了，我们来到大别山，就要在这里安家落户，下决心不走了。据了解，经扶这一带有中心县委和游击队，负责人叫刘名榜，他有多少人，多少枪，我们都不大清楚。现在，我们要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困难很多，而他们对当地情况熟悉，对敌斗争经验丰富，所以，必须尽快找到他们，你带一部分人，明天就出发到新集去，公开身份是县长。到新集后，赶快出安民告示，建立民主县政府，一边开展工作，一边寻找刘名榜。”

第二天清晨，穰明德带领警卫团的一个排半个通讯排和一部分文工团员共100多人，准备到新集去。临出发前，邓小平又从警卫团抽调一个营交给穰明德指挥，再三嘱咐：“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尽快找到刘名榜。现在，大批的军用物资和重武器都堆在山沟里，许多伤病员无处安置，这些都需要刘名榜的游击队帮助解决。”

看着邓小平那焦急关切的神情，穰明德感到寻找中心县委任务的艰巨和紧迫。到了新集他一刻也不敢怠慢，立即派人四处寻找，并亲自走村串户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中心县委和游击队的同志们。当刘名榜得知是邓小平政委派穰明德来找他的，并要他出任经扶县长时，激动地说：“邓政委这么信任我，我一定当好这个县长。”

在中心县委和游击队的帮助下，一直搁置在山沟里的重武器，如大炮、车辆、炮弹等都迅速地掩藏了起来，伤病员也得到妥善的安置。经扶县很快建立了县政府、区政府和各级人民政权，地方工作正逐渐走上正轨。

后来，邓小平到经扶县检查地方工作，在这里，他看到了他一进入大别山就派人四处寻找的中共罗礼经光中心县委书记刘名榜。站在他面前的是个高个子，宽宽的肩膀，黑红的面庞，两眼炯炯有神，给人一种粗犷、刚毅、威武不屈的感觉。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弯腰的硬汉子。

邓小平久久地凝视着这位与大别山患难与共近20年的中心县委领导人，紧紧握着刘名榜的双手说：

“大别山的斗争环境这么艰苦，你们是怎样坚持下来的，真不容易

哟！”

刘名榜向邓小平详细汇报了中原突围后中心县委和游击队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情况，然后指着周围的群众说：“我们所以能够在这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直到胜利，一靠枪杆子；二靠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三靠这大别山！”

“对！我们离开了群众活不成，离开了枪杆子也活不成！”邓小平对中心县委和游击队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坚持大别山斗争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充满信心地对刘名榜说：“坚持游击战争要靠群众的支持，靠枪杆子，现在，我们要重建根据地，同样要靠群众的支持，靠枪杆子。希望你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发动群众，支持主力部队，重建大别山根据地！”

王大湾会议

刚到大别山的几天，群山一片寂静，因为尾追刘邓大军的几十旅尚在淮河以北，大别山敌人的力量极为空虚。邓小平和刘伯承研究决定，抓紧有利时机，立即分遣部队，实施战略展开，迅速抢占大别山中心地区的县城和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具体部署是：第三纵队3个旅向皖西展开；第六纵队2个旅向鄂东展开；第一、第二纵队、中原独立旅、第六纵队的一个旅共10个旅，在大别山北麓的商城、罗山地区，一面迎击和牵制敌人，一面掩护皖西、鄂东工作的展开。为了适应大别山区的斗争环境，各纵队根据指挥部的命令，普遍精简了机关，减少了重武器和牲口，把一部分不适应山地、水田作战的辎重交由地方保管，每个纵队只留一个山炮连，每旅只留两门山炮，使部队更加精悍、灵活。

9月初，尾追刘邓大军的23个旅先后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敌人来势凶猛，妄图乘解放军在大别山立足未稳之际，把他们消灭或赶出大别山。当时，国民党第八绥靖区（驻合肥）夏威指挥的整编第四十六师已进到六安、霍山地区，整编第五十八师进到固始、商城地区；郑州前进指挥所（驻信阳）张轸指挥的整编第八十五师进到罗山、信阳地区，整编第十、第四十师经宣化店沿公路向黄安、麻城前进；武汉行辕程潜指挥的整编第六十五师，经平汉路进至黄安，整编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六师在信阳以南的平汉线和武汉外围，就地分散摧残解放军后方机关和地方政权。此外，国民党国防部长自崇禧亲自指挥的整编第七、第四十八师，沿经扶、麻城公路向南寻找解放军主力作战。

针对国民党的军事部署，邓小平和刘伯承对大别山周围敌人的兵力状况进行了分析，位于商城的五十八师，系国民党滇系军队，战斗力较弱，又处在孤立地位，易于消灭，而桂系的两个师战斗力较强，所以，决定先打五十八师，另以少数兵力牵制桂系两个师，调动敌人向大别山北麓回援，以掩护鄂东、皖西地区工作的开展。

9月5日，刘邓集中第一、第二两个纵队主力和第六纵队一个旅，在商城以北的河风集地区向国民党五十八师发动了进攻。这一仗由于部队不熟悉山地、水田作战，只消灭了一部分敌人，但调动了敌整编第四十八、第十师从经扶、宣化店地区向北回援。

9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作战似应避免桂系主力七师、四十八师，集中注意歼灭中央系及滇军。因七师较强不易俘获，四十八师情况似与七师差不很远，而中央系各部及滇军五十八师则在运动中易于歼灭。”中央军委的指示与刘邓的想法完全一致，根据商城作战后，敌整编第四十八师又转向皖西，敌整编第七、第四十、第六十五师仍在黄安、麻城地区，破坏解放军地方工作的情况，刘邓决定集中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主力和第六纵队1个旅，仍以商城滇军五十八师为打击目标，再打一仗，吸引敌人向北回援。9月19日，战斗在商城以西的中铺地区打响，歼灭五十八师新十旅：个团，调动了敌整编第八十五师自光山、潢川地区东援，敌整编第四十八师自六安西援。接着，又以第一、第二纵队主力和第六纵队1个旅，于9月25日在光山附近打了第三仗，给第五十八师以沉重打击，击退了敌东招部队整编第八十五师的进攻。

经过上述三次作战，将敌人的全部机动兵力调到大别山北麓，保障了第三、第六纵队在鄂东、皖西地区顺利展开。第三、第六纵队进至皖西、鄂东地区后，与原在这一地区坚持斗争的皖西人民自卫军和游击队会师。在他们的配合下，部队连续歼灭固始、金寨、六安、霍山、岳西、舒城、桐城等 10 余城的地方团队，开始站住了脚跟。

经过一个月的艰苦斗争，到 9 月底，刘邓大军各部先后解放 23 座县城，歼灭敌正规军 6000 余人，地方团队 800 余人，在霍山、岳西、六安、舒城、潜山、太湖、庐江、罗田、商城、光山、罗山、经扶、潢川等县建立了 17 个民主县政权，初步打开了局面。

在实施战略展开的过程中，邓小平看到，部队虽然打了一些胜仗，建立了一些地方政权，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工作也取得了较明显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如部队情绪低落，对建立根据地的信心不足，打仗顾虑重重，在商城、光山地区的 3 次作战，打得都不够理想，没有达到全歼敌人的预期目的等等。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很多，从客观上看，是由于部队刚到大别山，还不太熟悉这里的生活习惯和山地、水田作战，部队减员较大，战斗力较弱。正如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所指出的：“我军南下，在淮河以北减员不大。一过淮河，生活习惯大变，开始吃不来大米饭，拉肚子，无鞋子穿，菜蔬、油盐吃得极少，蚊子多。山地走小路，炮辎笨重，又连月遇雨，体力均削弱。故 9 月份减员很大，病号普遍，占 1/3，多至一半，以疟疾最剧，感冒次之。加以平原部队怕山，怕水，伤员救护困难。两次歼敌良机（商城五八师及潢川南八五师）均未打，因部队情绪差，体力弱，亦有影响。”从主观上看，部队进入大别山之初，虽然对干部、战士们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指出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困难，强调发扬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作风。但是，由于部队一直处在连续的行军作战中，未能适当休整和进一步作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动员，所以，一些同志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只看到局部的、暂时的困难，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和艰苦性仍然认识不够，再加上群众还未发动，政权尚未建立，筹粮、担架都要自己搞，所以，部队中出现了纪律松弛，不愿艰苦奋斗，不愿积极打硬仗、苦仗的消极情绪，打起仗来顾虑重重，错过了一些歼敌的机会。

根据这种情况，邓小平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思想，及时克服部队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和纪律松弛现象。

9 月 27 日，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在光山县王大湾召开，会议历时 3 天。会上，高级干部学习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实行战略进攻的有关指示，听取了刘伯承、邓小平的重要报告。与以往开会不同的是，这次会议的气氛始终很紧张严肃。过去开会，邓小平总是面带微笑，热情地同大家握手、打招呼，或寒暄几句，然后才正式开会。这次却不同，他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同任何人握手、打招呼，便开始了他的发言。

他首先分析了部队进入大别山后的严峻形势以及艰巨任务，总结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接着，联系部队 9 月份在商城、光山地区的 3 次战斗的经验教训，严厉地指出：

《刘邓给军委、并陈粟、陈谢、徐滕薄电》，1947 年 10 月 6 日。

“至今，我们仍然有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够，只看到局部的困难，而看不到全国战局的变化，甚至不敢积极主动歼灭敌人，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丧失信心，思想上存在着右倾情绪。有些指挥员打起仗来，左顾右盼，顾虑重重，走路来象小脚女人一样迟缓，错过了歼敌的好机会！”

大家都知道，平日里，邓小平很严肃，不苟言笑，但很少扳着面孔训人，象今天这样如此严厉、毫不留情面的批评更是不多见。所以，仅从邓小平讲话的语气和表情上，大家已经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感。如果照此下去，大别山就守不住，根据地就巩固不了，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战略任务就成为一句空话。

邓小平用眼睛扫视了一下会场，更加严肃地说：“现在，有的领导不敢对战士们讲困难，你不讲，困难也客观存在着，我们不要怕讲困难，相反，应该勇敢地正视困难，要实事求是地向大家讲明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告诉同志们，只要我们紧紧依靠群众，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精神，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又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高级干部越要以身作则，鼓励战士们坚决勇敢地歼灭敌人。我们既反对在条件不可能的时候轻率地去作战，更要反对在条件可能时不敢勇敢地去作战。要教育干部、战士，对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样，才能想办法积极主动地克服困难。”

在讲到如何解决目前部队纪律松弛的问题时，邓小平要求所有高级指挥员都必须带头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部队纪律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问题，必须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去抓。他说：“毛主席在井冈山建军之初规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决不是什么简单的规定，而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体现，能否坚决执行，关系到我们在大别山能否站得住脚，一定要牢固地树立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坚决克服怕打硬仗、纪律松弛等右倾思想情绪。”

王大湾会议是部队进入大别山后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及时地解决了在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过程中出现的右倾情绪和纪律松弛现象，对于统一和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增强斗志，进一步歼灭敌人和巩固根据地提供了保证。

王大湾会议结束后，各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对右倾思想和纪律松弛现象展开了批判和斗争，有的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刻检讨自己，对广大干部战士触动很大，使政治思想工作更加深入细致地开展起来。

为了进一步贯彻王大湾会议精神，鼓舞全军指战员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勇气与信心，邓小平亲自到驻在王大湾附近的第一纵队，向连以上干部作了关于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报告。

这天，邓小平穿了身褪了色的灰布军装，腰束皮带，显得格外精神。与几天前的高级干部会议不同的是，今天，他很高兴，嘴角挂着微笑，一边鼓掌，一边笑着向大家致意。

会场设在王大湾附近的一个树木环抱的山坡前，晨曦洒在绿茵茵的草地上，干部们坐在南面山坡上，聚精会神地听邓小平作报告。邓小平讲话从来不拿讲稿，他思路清晰，语言生动，扣人心弦，指战员们都爱听他作报告。今天，他讲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克服困难，能不能在大别

山站住脚这个指战员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他讲道，我们进军大别山之前，毛主席曾对我们的前途作了3种估计，这说明毛主席早就充分估计到了我们到大别山之后可能遇到的困难。说实话，我们远离解放区，深入到敌人的后方，整天背着几十万敌军在山里转，弹药、粮食、装备得不到补充，战士们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伤病员无处安置，怎么能没有困难。有困难是事实，但有困难并不可怕，共产党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干革命就难免要同困难打交道，就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他接着说，有些同志对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意义认识不足，所以，只看到我们目前有很多困难，而没有看到全国其它战场的胜利。我们进军大别山后，把敌人大多吸引到这里来，我们的压力大了，而我们的兄弟部队在其它战场上就轻松了，就可以腾出手来打胜仗了。这就好比“打篮球”一样，蒋介石看到我们到大别山“投篮”来了，要“得分”了，他就把前锋、后卫、主力都调来钉着我们。这样，他的战线就拉长了，顾了南顾不了北。他不让我们在南面“投篮”，不惜用几十万大军缠着我们，可他北面的“篮板”就空出来了，我们的兄弟部队在北面就可以“投篮”得分了。他又说，我们在大别山困难很多，是在“啃骨头”，但其它战场的兄弟部队却开始“啃肉”了，我们背上的敌人越多，啃的“骨头”越硬，兄弟部队在各战场上消灭的敌人就越多，胜利也就越大。而各战场上的胜利反过来也会支援我们，减轻我们的压力。所以，眼下我们的困难是多一点，付出的代价是大了些，但这只是局部的、暂时的，为了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是值得的，是很光荣的。

在讲到如何克服目前存在的这些困难时，邓小平说，克服这些困难，还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首先，我们坚持大别山的斗争并不孤立，现在，陈谢兵团已在豫陕鄂地区胜利展开，陈粟大军也进入了豫皖苏地区，我们三路大军互相配合，机动作战，一定能够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建立解放区。

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大别山区有我们长期的革命影响，有许多地方干部，红军、新四军、八路军都曾在这里建立过根据地，群众对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只要我们努力争取，方针正确，就一定能够打破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解除群众的顾虑，争取群众的支持。

此外，我们有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有中原局、野战军司令部的直接指挥，我们一定能够克服眼前的困难，在大别山立足生根。

邓小平讲了两个多小时，他那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喻，深入浅出的分析，紧紧扣住了每一个指战员的心，使他们了解了全国的斗争形势和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了解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与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辩证关系，认识到部队进入大别山后的分散作战并不是逃跑，而是战略展开，从而振奋了所有指战员的精神，增强了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信心。

争取群众建立政权

摧毁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这是重建大别山组织地的重要任务。早在跃进大别山的途中，邓小平就开始考虑部队进入大别山后，怎样开展地方工作，如何尽早建立党组织和地方政权的问题。部队过淮河前，在息县的彭店，邓小平主持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专门研究了进入大别山后开展地方工作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中原局根据大别山的自然地理状况，将大别山地区划分为4个工作区，分别成立工作委员会，以便统一领导地方工作。这4个工作区是：

豫东南工作区：包括尖山、礼山（今大悟）、潢川、商城、经扶、罗山等县；

鄂东工作区：包括黄安、麻城、黄冈、黄陂、蕲春、罗田、浠水等县；

鄂皖工作区：包括立煌、广济、英山、黄梅、桐柏、太湖、潜山等县；

皖西工作区：包括桐城、芦江、舒城、霍山、六安、无为、寿县、霍邱等县。

进入大别山后，中原局立即把随军南下的第一批地方干部1858人，以工作组的形式分遣到各个工作区和县，在各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打击土顽和地方团队，建立政权。为了保证地方工作的开展，从各纵队抽调一个团，作为各工作区的基干武装，以掩护地方工作的开展。

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工作十分艰苦，刘邓大军要在敌人的战略纵深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建立地方政权，关键是发动群众。党中央曾明确电示刘邓：能否争取广大群众站在我们方面，这是能不能在大别山站住脚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所以，刘邓大军一踏上大别山，就把争取群众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作为地方工作的主要内容。

大别山区的人民群众虽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但由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先后4次撤出这一地区，群众不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和迫害，有些村庄，因为居民多是红军、解放军家属，几乎被斩尽杀绝。所以，有的群众说：“你们四进四出，没有一次不是搞得箩（罗）里（礼）精（经）光，最后还要到剥皮（泼陂河）才走，鬼才相信你们旱鸭子（北方人）不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群众虽然心里欢迎，但由于解放军刚到，群众对解放军还不了解，加上当地的反动政权还未摧垮，保甲、特务势力仍在暗中威胁和控制群众。因此，群众对解放军究竟能否站住脚还有疑虑，表面上还不敢过分接近解放军，更不敢为解放军带路、提供情报和粮食。好多地方，部队还未进村，老百姓早跑得精光，有的在山上一连躲好几天，直到部队离开才下山。在这种情况下，刘邓大军到大别山最初的一段日子里，常常要自己筹集粮食，自己抬担架，行军、打仗时，指战员们小得不背着沉重的粮食、弹药，抬着山炮翻山越岭，有的指挥员主动将自己骑的牲口用来运粮食、驮伤员。部队在疲劳的行军之后，还得自己推谷子，舂米，做饭，打草鞋，钉马掌。由于没有群众的支援，给养不能及时补充，有的部队一连20多天不见油盐，以清水煮马肉充饥。

为了尽快解除群众的顾虑，争取大别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邓小平指示各部队，要把争取群众的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认为，群众有顾虑，不敢接近我们，主要原因是“怕我再走和希望我们整好纪律”，所以，“能否发动（群众）决定我们能否打几个胜仗和整好纪律。”他一面指示部队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一面要求部队，要通过各种形式，向群众做宣传工作，要他们相信我们决不再走。与此同时，他要求全体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人民军队优良传统，以实际行动取得群众的信任。

进入大别山后，邓小平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争取群众的重要一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执行。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毫不含糊。在率领部队行军、走村过店时，他宁可在麦场上坐等到天亮，也决不让去打扰群众。有时候，在田间地头找一个草棚，点亮煤油灯，摊开地图，与刘伯承一起研究作战行动。

一天，邓小平率野战军司令部来到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的一个村子里。当他听说村里有个老红军家属，家里只有3升米，而部队征粮的同志却硬要他拿2升米时，十分生气，他焦急地对刘伯承说：“如果照此下去，老百姓不是更不敢接近我们了吗？”他们连夜商量，起草了一份《粮草通知》，内容是：部队征集粮草一定要给钱，未付钱的要打借条，同时要向老百姓说明白，革命胜利后，我们一定如数付清。

《粮草通知》立即下发到各个部队，邓小平反复强调，执行《粮草通知》，就是具体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不是件小事情，而是关系到党的政策和我军的声誉的大问题，一定要严格执行。

刚到大别山的一段日子里，由于部队连续行军打仗，非常疲劳，病号不断增多，既无处安置，又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战士们因不服水土，生活不习惯，加上老百姓对解放军不了解，拉着水牛都上了山，一些战士对此不能正确看待，发牢骚，讲怪话，发火骂人，拿群众的东西，破坏纪律的现象常常发生。正如邓小平给毛主席的报告中所讲的：“9月初20天最紊乱，减员很大，右倾思想严重，纪律坏。”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9月上旬，邓小平在经扶县小姜湾村专门主持召开了整顿纪律的干部大会。这天天气不好，下着毛毛细雨，干部们都坐在村旁的草地上。

刘伯承首先发言，他激动地大声说道：“部队刚到大别山，纪律就这么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在大别山是站不住脚的！”

邓小平的批评更尖锐，他严肃他说：“部队纪律不好，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而政治危机必然带来军事危机，后果不堪设想。要知道，群众并不是注定要跟我們走的。如果我们纪律不好，骚扰百姓，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跟别人走呢？现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对我们能否站住脚还有怀疑，不敢接近我们。我们要多打胜仗，坚决执行群众纪律，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以后，凡是出现群众纪律问题，要首先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亲自为所有到达大别山的部队规定了约法三

《刘邓致军委朱刘中后徐滕薄先念陈谢电》，1947年9月20日。

邓小平：《我进入大别山四个月一般情形》，1948年1月15日。

章：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财物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他还要求所有干部、战士互相监督，严格执行，并指示成立了执法小组，严厉惩处违反纪律者。

约法三章公布不久，便发生了一件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野战军警卫部队的一个副连长未经店主同意，拿了店里的粉条、花布、火柴等东西，正好被执法小组撞见了。这事立即汇报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听了汇报，略加思索，当即下令按约法三章办事，枪毙这个副连长。

公审大会开始了，直属部队坐在一边，前来观看的老百姓坐在另一边，会场寂静无声。由于这个副连长平时打仗勇敢，表现不错，许多人请求司令部饶恕他，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一些当地的群众也前来为他求情。那个店主闻声赶来，对主持大会的同志说：早知大军纪律这么严，说什么我也不跑上山。如果家里有人，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请刀下留情。”

负责督办此事的张际春副政委见状也动了恻隐之心，请示邓小平能否宽大处理。

邓小平听了严肃他说：“群众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但既规定了约法三章，就不能说话不算数，失信于民。如果对一个副连长姑息、迁就，不能执行纪律，那么今后，更多的人犯纪律怎么办？不下决心严整军纪，部队的纪律就会继续坏下去，群众就更不相信我们，而我们在大别山也就站不住脚！”

当天下午，这个副连长在群众公审大会上被枪决了。这件事在全军和群众中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枪毙了一个副连长，避免了10个、100个象副连长这样的干部和战士重犯错误，教育了更多的人从中汲取教训，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从此，全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再也没有发生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

邓小平在整饰军纪的同时，指示各部队，在群众还不完全了解我们之前，一切要靠自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以实际行动给群众留下良好的印象。部队行军打仗时，自己抬伤员，每到一地，不顾长途行军疲劳，自己推谷子，做饭，还帮群众扫地、挑水、修路、治病。遇到农忙时，主动帮群众下田割稻，运送到家。这些都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解放军逐步产生了好感，许多长期躲在山上的老百姓也陆陆续续下山回到家，一直悄无声息的小山村开始恢复它以往正常的生活。

争取群众的工作有了明显的成效，这就为下一步深入发动群众，分田分粮，建立地方政权创造了条件。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宣言指出，我军将士“必须提高觉悟性，人人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亲密团结群众，把新区迅速建设成为巩固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还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例》，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废除封建性

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加快步伐，建立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在接到中央指示的第3天，即10月12日，邓小平即以中原局名义，起草并签发了《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造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这个指示总结了进入大别山以来的工作，肯定了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指示》中指出：

“我军进入大别山以来差不多已有一个半月，不仅早已完成战略展开，而且已建立了17个县政权，在部分地区已开始了大规模的分浮财斗争，不久即可以实行分田。但从总的方面看来，右倾现象却非常严重，其重要的表现为：

一、我们的部队还没有把发动群众实行土改看成自己的头等任务，还舍不得抽干部分部队在当地党委的直接领导之下专门担任地方工作。部队每到一地只是搞粮吃，很少进行群众性的宣传、组织贫农、开仓济贫等工作，甚至还有人不敢宣传我党土改政策。

二、无论是部队与地方，往往都还是束手束脚，畏首畏尾，不敢大胆发动群众分浮财（地主的粮食、财物），不相信群众敢分地主财物。许多事实证明，群众的觉悟与要求远在我们干部之上，只要我们允许并坚决给群众撑腰做主，镇压坏分子，群众就无所顾虑，什么东西都敢要，敢于把地主的的东西抢光。

三、事实证明，利用保甲长的办法是错误的，但经指出后，迄今还有些地方没有改正。事实上地主阶级正在利用保甲长帮助他们催收粮款租谷，并麻痹我们，掩护特务工作。我们有些同志还存有留恋上层统战的错误观点。

四、某些部队还没有把消灭土顽当成严重政治任务，缺乏进攻精神，不想办法，偷安一隅，怕走路，不奔袭，不穷追，只赶跑塞责，而地主却正在利用这些乡保土顽武装来威胁与控制群众，摧残我工作人员。

五、过去这一时期，各部队对于筹款工作一般是忽视，或者只重城市而忽视乡村，结果弄得部队生活很苦，纪律不好维持。最近大家注意筹款了，但又产生了在大市镇筹款不讲政策与方法，有的还对小商人开刀，如不迅速纠正，那就更加危险。

六、在筹粮方面，有的还是用普遍摊派的方法，事实上，除少数地区外，光地主的粮食就够军队吃了。”

邓小平要求各地对已经出现的右倾表现和刚开始萌芽的“左”倾现象必须迅速纠正。同时对今后的工作作了全面的、具体的部署：在已有初步工作基础的地区，如经扶、光商、立煌、皖西等地，立即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地展开分浮财运动，并按土地法大纲开始分田；在游击区也应普遍进行发动群众、分浮财的斗争，并为平分土地作准备工作；部队必须把地主的浮财迅速转移到贫农手中；在组织上，建立鄂豫和皖西两个区党委和军区，下设地、县等党政军组织；宣布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县、区、村（行政村）三级爱国民主政府；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建立正当合理的田赋、税收制度；禁止对小商人不讲政策，乱捉人，乱没收，禁止向小商人筹款等等。

指示下发到各地后，在中原局的领导下，地方工作很快发展起来。主力部队在作战的间隙，积极组织力量进山剿匪，打击地方团队，摧毁

反动政权，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各个工作队则全力组织贫苦农民开仓济贫，召开诉苦大会，斗争恶霸地主和反动分子，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通过一个时期的工作，使广大群众真正认识到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爱护和保护老百姓的。于是，他们由疏远解放军到逐渐接近解放军，由不了解解放军到真正拥护和支持解放军。他们有的组织起来，帮助抬送伤员，送粮食，送情报，当向导；有的主动协助解放军肃清上匪，提供情报；还有的帮助解放军做军鞋，照顾伤病员，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地方干部。

看到大别山区的群众初步发动和组织起来了，邓小平感到十分欣慰。他在给毛主席的报告中写道：“看见了群众，全军情绪大变。”这充分反映了部队进入大别山后，经过相当一个时期的艰辛的努力和曲折斗争，终于争取到了群众的支持的喜悦心情。有了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今后，部队的作战就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了，只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我军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就能克服任何艰难险阻，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争取和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刘邓大军不断粉碎敌人的进攻，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到10月底，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万多人，地方保安团队2700多人，先后解放了几十座县城，控制了广大的城镇和乡村，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创造了条件。

在中原局领导下，各地很快打开了建立根据地的新局面，加快了政权建设的工作。到10月底，民主县政府已由9月底的17个增加到33个，在建立县政权的地方，还普遍建立了乡、区政府和村农会，发展了地方武装。

根据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以来开展地方工作的实际情况，邓小平认为原来划分的4个工作区已不能适应根据地发展的需要，经中原局批准决定取消现在的豫东南、鄂东、鄂皖、皖西4个工作委员会，建立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统一领导大别山区各县委、县政府的工作。

邓小平对建立区党委、行署和军区极为重视，亲自领导和参与筹建工作。在确定区党委、行署和军区领导人名单时，他主张一定要抽派能力最强，富有地方工作经验，能正确掌握党的方针政策的人去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经过反复研究和考核，最后确定了两个班子的领导人选。皖西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司令员分别由彭涛、罗士高、曾绍山担任；鄂豫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司令员分别由段君毅、刘子厚、王树声担任。

11月中旬，皖西、鄂豫两个区党委、行署、军区分别在安徽省岳西县和湖北省黄冈县成立。皖西区划分了3个地委：一地委辖太湖、宿松、望江、潜山、安庆、岳西等县；二地委辖桐城、芦江、无为、巢县、舒城等县；三地委辖六安、合肥、霍山、寿春等县。鄂豫区划分了5个地委：一地委辖立煌、商城、固始、霍丘等县；二地委辖潢川、光山、经扶、罗山、信（阳）东等县；三地委辖礼山、黄安、黄陂、孝感等县；四地委辖麻城、黄冈、罗田、浠水等县；五地委辖蕲春、广济、黄梅、英山等县。

皖西、鄂豫两个区党委、行署、军区和各县民主政权的成立，宣告大别山根据地已重新建立起来了。这块根据地北起淮柯，南到长江，东抵前淮南路，西到平汉铁路，拥有人口 1200 万，成为威胁敌人长江防线和南京、武汉的战略基地。

鄂东皖西行

10月初，敌人加紧了对大别山我军的围攻。蒋介石从鄂东调来整编第七、第四十师，从皖西调来整编第四十八、第四十六师各一部，加上原在大别山北部的整编第八十五、第五十八、第五十二师等部，妄图合击在经扶、光山地区活动的刘邓大军主力。由于敌人的主要兵力向北部集中，而大别山以南地区只留有少数正规军守备。根据这一情况，刘邓研究决定，以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各留一个旅在大别山北部的商城、罗山地区伪装主力迷惑敌人，并继续开展地方工作，主力7个旅则跳出敌人的合击圈，乘虚向鄂东一带

出击，一面摆脱敌人的包围，寻机歼灭敌人，一面乘机向长江北岸发展，扩大根据地，并设法解决部队的冬衣。

10月1日，刘邓率领野战军指挥部和7个主力旅从光山出发，向大别山南部的鄂东一带移动。

秋天的大别山，露寒霜重，秋高气爽，一眼望去，层峦迭嶂，峰回路转，越往前走，山越高越险，越往上爬，路越小越陡。许多地方牲口难以通过，开始要几个人前拉后推，才勉强把它推上山去，后来干脆把牲口丢下，步行上山。邓小平、刘伯承和战士们一样，每日踏着披满露水的荆棘、草丛，翻山越岭，指挥打仗。刘伯承年近花甲，眼睛又不好，爬山时，常拄一根棍子。邓小平比他年轻，他什么也不拿，两手拽住野藤一个劲地往上爬。有时候停下来，等刘伯承上来了，搀扶着他一起走。考虑到刘伯承年事已高，上山太困难，邓小平曾指示军政处长杨国宇设法搞一副担架，挑选几个壮小伙子轮流抬司令员上山，可刘伯承说什么也不肯坐，他说：“我年龄是大了，可哪天掉过队？我坐着担架指挥打仗象什么样子？”邓小平见劝不动，只好叮嘱警卫员多加小心，务必保护司令员的安全。

部队南进以来，连战连胜，捷报频传。10月1日，连续攻克经扶、黄安（今红安）、宋埠等重镇，消灭地方团队800多人。10月8日，第一纵队主力和第二纵队一部在歧亭、柳子港地区歼灭国民党整编第五十六师新十七旅旅部直属队和两个团的大部。10月10日，第一纵队一部攻克黄陂以东的李家集，歼敌一个营。与此同时，调赴商城的第三纵队主力兼程东进，急返皖西，在六安南的张家店一带歼灭国民党整编第八十八师第六十二旅全部，歼敌5000余人。张家店战斗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以来，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第一次取得歼灭敌人一个旅以上兵力的重大胜利。

这时，敌人的大部分主力已被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的两个旅箱制在大别山北部的罗山、固始、六安地区，而尾随刘邓主力南下的只有国民党整编第四十师和整编第五十二师第八十二旅。刘邓分析了形势，命令部队迅速作适当的分散，乘鄂东一带敌人兵力空虚之机，向长江北岸展开，开辟新的根据地。根据部署，第一纵队向蕲春、广济地区；第二纵队向黄梅、宿松地区，第六纵队向黄冈地区；第三纵队向潜山、桐城、庐江、望江地区进军。10月下旬，各纵队接连解放了舒城、庐江、桐城、潜山、广济、英山、望江等城，攻占了广济以南、长江以北重镇武穴，并在这些地区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迅速打开了大别山南部地区的

局面，控制了长江北岸 300 余里的广大地区。

刘邓大军矛头直指长江北岸，威震大江南北，使正在江西庐山坐镇指挥的蒋介石惊恐万分，他惟恐刘邓大军南渡长江，于是急令一直尾随刘邓军主力南下的国民党整编第四十师和第五十二师八十二旅，从黄安、麻城地区，经浠水向广济迂口，企图先抢占广济城，向解放军侧背发动进攻，逼迫解放军背水作战。

刘伯承、邓小平分析了敌情，敌四十师和八十二旅都是新编的队伍，战斗力不强，而且长途跟进已是精疲力竭，且是孤军深入，正好为全歼该敌创造了良机。于是决定，把四十师和八十二旅诱入广济附近的高山铺地区，予以歼灭。

高山铺地区是一个狭长的山谷，洪武脑山、马骑山、李家岩山和界岭诸山耸峙于峡谷的南北两侧，地势险要，便于设伏。刘邓抓住战机，命令分遣在长江北岸的 4 个纵队迅速集结，部署在高山铺地区周围：第一纵队从武穴抄近路回师高山铺，与中原独立旅分别占领峡谷南北制高点，形成箱制敌人的伏击圈；第六纵队从团风赶向十里铺，迂回敌人背后，俟敌人进入伏击圈后，从后面切断敌人后路；第二纵队主力在黄梅地区作保障；第三纵队西进，随时准备参战，扩大战果。另派一支部队，化装成游击队，前去吸引、诱骗敌人至高山铺地区。

10 月 26 日晨，敌人果然钻进了马骑山和界岭之间的口袋阵里，埋伏在两面山上的第一纵队和中原独立旅，象一把大钳似的紧紧卡住了敌人的咽喉，敌人察觉上了圈套，拼命向洪武脑山、马骑山反扑，妄图夺下一个阵地，挽回败局。

这时，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指挥部正在高山铺北面的胡家凉亭亲自指挥作战。胡家凉亭位置隐蔽，浓荫覆盖，从这里可俯瞰高山铺整个峡谷。

27 日，刘邓命令部队发起总攻，第六纵队五十九团一营一举攻占制高点小岗岭，直捣敌人师部。敌人连续组织反扑，都被解放军坚决击退，两个小时后，敌人溃不成军，全军覆没。高山铺战役，解放军共歼敌 1.2 万余人。这次战役的胜利，震动了国民党统治集团，使长江重镇南京、武汉国民党当局内部出现一片混乱，惊恐万状。迫使蒋介石召开重要军事会议，重新研究部署长江防线，以对付活跃在长江北岸的刘邓大军。对刘邓大军来说，这次战役极大地鼓舞了全军指战员的斗志，争取了更多的群众。用刘伯承的话来说，高山铺战役后，解放军在大别山取得了第二个回合的胜利。11 月的大别山，已进入深秋初冬的季节，然而，战士们仍穿着南征时被汗水浸透的那套单军衣。白天行军打仗还好凑合，可一到夜晚，露寒霜重，寒风袭人，战士们冻得瑟瑟发抖，难以成眠。连日来，邓小平看着战士们在潮湿寒冷的野外冻得背靠背，身挨身，蜷缩成一团的样子，心焦如焚，夜不能寐。严冬将至，气候逼人，解决全军的棉衣已成为迫不急待的问题。过去，部队在内线作战，有后方接济，有老区群众的支援，每逢这时，棉军衣早已发到战士们手中。可现在是在新区作战，远离后方，物资匮乏，而且大别山区群众的生活也很艰苦，要在较短的时间里解决 10 万大军的冬装，谈何容易？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大别山解放军的冬衣问题也十分关心，早在部队到达大别山不久，就致电刘邓，询问被服解决可能性如何？如无，准

备派十纵护送。因大别山远离老区，棉衣一时难以送到，毛泽东又致电刘邓，应作好就地筹措的准备。毛泽东在电报中说，你们全军冬衣准备，不要将重点放在由后方按时供应上面，而要放在自己筹办上面。你们如能努力收集棉花布匹，每人做一件薄棉衣或做一件棉背心，就能穿到12月、1月，那时后方冬服可能接济上来。9月23日，毛泽东又发来一电报，特别嘱咐刘邓：“必须下决心立即动手自制”，“万万不可依靠后方长途送冬衣。”__尽管党中央已指示晋冀鲁豫解放区设法筹措棉衣，但千里迢迢，关山阻隔，困难重重，要花费多大的力量，调动多少部队护送？邓小平前思后想，斟酌再三，下了决心：不再给党中央和老区人民增加负担，依靠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援，就地设法解决冬衣。筹措资金，采购棉花、棉布，自己动手，缝制棉衣的指示发到了各个纵队，邓小平专门指示：“全军动手缝棉衣，这件事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各部队的领导同志，一定要充分作好思想动员工作。”考虑到大别山区群众生活很艰苦，邓小平指示部队，不要给群众增加负担，而把筹措资金的重点放在当地城镇的商人和乡村的大中地主身上，有借有还，不失信于民。在邓小平领导下，野战军指挥部经过反复研究，规定了筹借布匹的具体政策和办法：（一）抽出得力干部，附以精干武装（一连或一营），进入远距离战争空气不浓的地区，进袭富裕城镇之敌，向商会筹措。（二）收集各城镇之棉布，采取：（甲）用筹得之款买或抵缴捐款；（乙）半强制性的用黑货黄金买；（丙）打正式借条办清手续，保证不久归还。（三）在乡村集镇禁止利用保甲长，并有计划的由政府或随军工作队（或各筹款委员会）对大中地主筹款筹棉布。（四）大军驻地很难筹款筹布，必须分派一团或一营部队，由筹款委员会率领到无战区筹款。为筹借布款有秩序不混乱不影响我军声誉，必须由各纵队各工委抽出政治上强而可靠且有办法的干部，组织筹款委员会。（五）部队以团为单位，组织民运工作队，其任务是，领导连队民运工作组工作，随军调查保长及大中地主筹款筹布，调查乡村情况，组织贫民小组，宣传我党政策。（六）各部各工委，必须将解决冬衣及菜金视为严重的政治任务，特别注意防止乱没收，贪污，严格群众纪律，不住市镇，买卖公平。在筹措布匹、棉花的过程中，邓小平又多次强调，必须严格执行政策，坚决防止对商人不讲政策，不讲方法，乱捉人，乱没收，坚决禁止向小商人筹款。

高山铺战役后，部队驻在长江北岸，这一带经济发达，比较富庶，是筹集棉花、布匹的理想地区。特别是长江北岸的要点武穴，是这一带商业最繁华的集镇。所以，指挥部把筹措的重点放在武穴，希望在这儿多筹借些资金和多征购些棉花和布匹。在筹借过程中，由于前一段部队加强纪律教育，一些干部、战士怕犯错误，束手束脚，小心谨慎，结果，几天过去了，只筹集到10万资金和数量不多的布匹和棉花。第一纵队政委苏振华听了汇报很不满意，批评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太右倾了。

邓小平听了则风趣他说：“我看，对取自群众的事，右一点比‘左’好。只要母鸡在就能取到蛋，不要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嘛！”

布匹和棉花都搞来了，五颜六色，质料不一，棉花也多是带籽棉。战士们动脑筋，想办法，用树条、竹鞭和自制的弹弓来弹棉花，用稻草灰和锅底灰把布染成灰色，然后脱下单军衣，依样画葫芦，裁的裁，剪

的剪，自己动手，缝制棉衣。

邓小平和战士们一样，自己动手，亲自裁剪，一针一线缝制，他还和刘伯承一起经常到直属队去检查战士们做棉衣的情况。

这天，邓小平和刘伯承走进警卫排的院子，见一群人正围着一个战士取笑打闹，原来这个战士做的新棉衣，前襟吊起来老高，脖子后面却鼓起一个兜兜，那兜兜大得能放进去一个大搪瓷碗。邓小平见状，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时，刘伯承走上前去，从衣领兜兜中拿出那只大碗，然后叫那个战士把棉衣脱下，放在门板上，邓小平连忙上前帮他拉平了袖子。刘伯承拿着剪刀，比着碗口，裁好了领口，又让其他同志缝好，不大不小正合适。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示范与指导下，战士们互教互帮，边学边缝，半个月后，全军指战员终于都穿上了自己缝制的棉军衣。

当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把自己刚缝好的那件棉衣穿在身上时。他仔细端详着，欣赏着，然后笑呵呵地对刘伯承说：“你看，这穿在身上不是很好吗？我们的军队就是有这么一个最大的长处，只要我们自己动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后来，这件棉衣一直伴随着邓小平转战在大别山上，渡过了大别山最寒冷的冬天和最艰难困苦的岁月。几个月后，当邓小平率领部队转出大别山时，这件棉衣的棉絮已经脱落，衣面也刮破了好几处。负责后勤的同志实在看不下去，想瞒着他做一套新棉衣，可由于邓小平在个人生活上一向律己很严，从不允许搞特殊，而在此之前，后勤部门已碰过几次钉子，所以，谁也不敢开口。还是陈赓的胆子大，他来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看到政委穿的棉衣又破又单薄，便命令副官长一定要为政委做套新的。有陈赓做“靠山”，后勤部门欣喜万分，立即赶制了一套新棉衣送给邓小平。谁知，他不仅不收，反而搓着冻得冰凉的双手，严肃地批评身边的工作人员：

“你们怎么这样做呢？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大家都和我一样穿的不多吗？你们的棉衣就比我的还破嘛，为什么偏偏要给我做一身呢？再说，棉衣破了，可以补一补再穿嘛！”

当他看到同志们为难的样子，缓和了下口气，笑着说：“这样吧，棉衣既然已送来了，就别退了，给万全穿吧，他穿着也合适。”这样，邓小平仍然穿着那件又破又薄的棉衣，直到春天来临。

11月初，邓小平、刘伯承率野战军指挥部和直属队经张家 东行，到皖西视察工作。

皖西地区多是山地，这里是大别山腹地，山脉纵横，群峰叠嶂。与大别山北部不同的是，这一带山间平原较多，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东部的庐江、无为地区是全国有名的产米区，还是芜湖米市的主要来源地。从大别山北麓的穷乡僻壤，来到这茶树遍坡、猪羊成群的沃野之乡，战士们惊喜万分，高兴地合不拢嘴，真可谓是山外更有青山在，富甲江北渔米乡啊。

皖西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抗战期间是新四军第七师的根据地。此后，该区革命力量虽受到严重摧残，但党的活动与斗争从未间断。特别是中原解放军突围后，当地党组织与游击队在桂林栖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在敌人的残酷“清剿”与屠杀中，坚

持游击斗争达一年多，直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一个多月前，桂林栖、刘昌毅领导的皖西人民自卫军，在刚解放的霍光县城与刘邓大军第三纵队胜利会师。此后，他们两支部队亲密配合，并肩作战，攻城略地，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解放了皖西大部地区，使第三纵队得以在皖西顺利展开。邓小平、刘伯承率指挥部到皖西时，这里的地方政权已大部建立，群众已初步发动，一些地区已开始进行分浮财，分田地的斗争，第三纵队和皖西工委正在着手筹建皖西区党委、行署和军区。

看到皖西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邓小平很高兴。11月9日至12日，野战军司令部在第三纵队驻地——安徽省太湖县刘家贩胡家祠堂召开了有第三纵队旅以上、地方工委和支队以上领导参加的高干会议。会议由张际春副政委主持，邓小平、刘伯承分别作了重要报告。

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讲了5个问题：（一）目前形势问题；（二）两个中心任务（土改与打仗）；（三）武装建设问题；（四）作风问题；（五）鄂西北的教训。他重点讲了形势和任务以及坚持皖西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皖西的地理位置，东接津浦，西北与鄂豫根据地相连，南控长江，威慑南京，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号召在皖西地区坚持斗争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展壮大根据地和人民力量，并作好残酷斗争的准备。

在刘家贩，邓小平亲自听取了刘昌毅关于中原突围后转战鄂西北、皖西的汇报，了解了皖西工委、皖西支队坚持斗争的情况，帮助第三纵队完成了皖西区各级党、政、军领导机构的筹建工作。此外，他还亲自召开贫苦农民座谈会和群众大会，向农民宣传土地法大纲和党的各项政策，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经济状况，了解部队进入大别山后领导农民开展打土豪、分浮财、分田地的斗争的情况。在邓小平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皖西区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离开皖西，邓小平、刘伯承率指挥部向鄂东的黄安进发。沿途，他又进一步调查、了解了鄂东各县建立地方政权和开展群众工作的情况。当他得知这里的地方政权已经建立，解放军在这一带深入剿匪，惩办匪首恶霸，大胆为贫苦农民撑腰办事，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另外还建立了民兵队伍，壮大了地方武装时，非常高兴。后来，他在给毛主席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第六纵队第十六旅在英山县一面组织部队深入剿匪，一面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土改的经验，并向其他部队推广了这一做法。

指挥部和直属部队兼程西进，一路还算顺利，但是，在新洲的柳子港准备通过大沙河时，却遇到国民党整编第八十五师的阻击。敌人抢先占领了桥头碉堡，又在各个渡口部署了重兵，企图阻止解放军过河。

当时，刘伯承正患眼疾，疼痛难忍，指挥渡河的重任便落在了邓小平一人肩上。他站在刘伯承身边，一边听警卫团长夏云超报告敌情，一边思索着渡河的办法。

突然，他转过身，命令夏云超：“立即派警卫部队冲过桥去，封锁敌人的火力！”

随后，他又命令指挥部机关人员：“紧跟警卫部队后面，不准犹疑，不准掉队，立即冲过桥去！”

在邓小平指挥下，指挥部各机关顺利地通过了柳子港，过了大沙河。在清点人数时发现，除少数负伤掉队的以外，指挥部的人都安然无恙。

后来，夏云超迷惑不解地问邓小平：“为什么战斗部队在可渡地方经过紧张战斗才通过沙河，机关走了大桥，却几乎没有伤亡？”邓小平笑了笑，说：“部队经过激战，是强渡沙河的，如果我们再跟在他们身后渡河，那不仅都打湿衣服，恐怕代价要高得多。”原来，敌人占领了桥头碉堡，封锁了桥面，自以为万无一失，而把主要兵力放在各渡口、他们认为，解放军绝不敢轻易选择从大桥过河的方案。然而，邓小平正是利用了敌人的这一心理，给敌人来了个猝不及防，指挥部队脱离了险境。

11月下旬，在鄂东、皖西转战了近两个月的邓小平、刘伯承，率领野战军指挥部来到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几天后，与李先念、王宏坤率领的第二十纵队、第十纵队胜利会师。这时，蒋介石对大别山的重点“清剿”也拉开了帷幕，大别山的斗争进入了最艰难困苦的时期。

第五章 风雪大别山 勇挑重担

当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部队转战鄂东、皖西，威胁敌人的长江防线，取得大别山斗争的第二个回合的胜利的时候，陈谢集团、陈粟大军在豫陕鄂和豫皖苏地区也分别得到迅速发展。

陈谢集团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取得洛阳外围作战胜利后，蒋介石急令尾追刘邓大军的整编第三、第十五、第四十一师和青年军第二六师各一个旅回援，与原驻洛阳地区的4个旅组成第五兵团，由李铁军指挥；另以新编第一、第一三五、第二十六、第一六七旅和青年军第二六师一部组成陕东兵团，由谢辅三指挥，企图从东西两面夹击陈谢集团，阻止其继续发展。根据中央军委“西面空虚，攻取较易，洛阳附近，敌所必争，不应使用主力”的指示，陈谢主力于9月2日起，自洛阳等地向西进击，连克疏略镇、灵宝、卢氏、陕县等县城，造成对潼关、西安的威胁。

10月中旬，国民党在洛阳集中10个旅，在潼关集中8个旅，再次夹击陈谢集团。陈谢集团按照中央军委指示，除留一部分向陕南发展，一部在陇海路牵制敌人外，主力越陇海路南下，向伏牛山广大地区发展。经10多天作战，先后解放临汝、鲁山、宝丰、南召、叶县、方城等县，并在11月4日的郟县战斗中，歼灭国民党整编第十五师残部，俘获师长武庭麟。这时，由潼关东进的国民党军8个旅，已达卢氏、陕县以东地区，第五兵团7个旅已尾随陈谢主力进至鲁山、襄城一线。11月8日，陈谢集团在南召县的甫召店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暂时避免与尾追之敌决战，而以一部兵力采取“牵牛战术”调动疲惫敌人，主力则在豫西南广大地区展开，消灭地方保安团队，建立根据地。

会后，陈谢集团以两个旅展开于甫阳以西地区，两个旅展开于方城、舞阳、泌阳地区，三个旅展开于洛阳东南地区。同时加强了在豫陕边的活动。到11月底，陈谢集团共歼敌5.6万余人，解放了36座县城，解放人口900余万，在鲁山县成立了豫陕鄂行政主任公署和豫陕鄂军区，建立了8个专署和军分区以及39个民主县政权。在黄河、平汉铁路、汉水和潼关之间开辟建立了豫陕鄂解放区。

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于8月上旬接到中共中央关于挺进豫皖苏，配合刘邓经略中原的指示后，即组成外线作战兵团，积极准备参加中原作战。9月初，黄河北岸的华野第六、第十纵队、特种兵纵队及野直机关在寿张县渡过黄河，进入鲁西南地区，并会合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十一纵队，在巨野、菏泽地区发起沙土集战役，取得歼敌2万余人的胜利。

9月24日，陈粟大军为迅速完成配合刘邓、陈谢两军开辟中原解放区的任务，除留第十纵队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鲁西南继续牵制敌人外，其余主力分5路，出鲁西南向中原挺进。9月26日，南下各纵队在兰封、民权间和碭山以西越过陇海铁路，全部进入豫皖苏地区。此后，以纵队为单位，在豫皖苏军区武装的配合下，大力消灭地方保安团队和上杂武装，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发展人民武装，仅一个月，

各纵队就攻克 24 座县城，歼敌 1 万余人，在原有 3 个军分区和专署的基础上，又在沙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新开辟了 3 个军分区，扩大了豫皖苏解放区。

这样，刘邓大军在大别山，陈粟大军在豫皖苏，陈谢集团在豫陕鄂的“品”字形阵势就基本形成了。三军以“品”字形阵势展开于中原地区，这就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移到了长江北岸，中原地区也由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为将来解放军南下的前进基地。这对于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将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中原形势的紧迫，特别是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胜利展开，时刻威胁着国民党的长江防线，这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战略，把战场的重心由陕北和山东改置于中原，实行“坚守中原，经营华南”的方针，倾全力与解放军争夺大别山这一危及国民党政权巩固与否的战略要地。11 月 14 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国务会议”上忧心忡忡他说：“刘匪现已据有大别山区，如今冬以前不予歼灭，容其生根，则湘鄂皖赣心脏地区以及大江南北，备受威胁，实为心腹大患。”11 月下旬，他亲自宣布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主任，直接掌管豫、鄂、湘、赣、皖 5 省军政大权。同时，从山东、陇海线和豫西调来整编第二十八、第九、第十一、第二十、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师，加上原在大别山地区的整编第七、第十、第四十、第四十八、第五十二、第五十六、第五十八、第八十五、第八十八师，共 15 个整编，33 个旅的兵力，计划从 11 月底开始对大别山展开全面围攻。蒋介石相信，通过这次“总力战”，一定能肃清大别山解放军，消除他的“心腹大患”，确保他在中原战场的主动权和长江防线的安全。

大别山，敌人必争，解放军也必争。因为大别山根据地能否巩固，是中原解放区能否最后确立与巩固的关键。因此，中共中央指示挺进中原的三路大军，必须长期配合，密切协同作战。具体部署是：刘邓主力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陈粟、陈谢两军向平汉、陇海展开大规模破击战，寻机歼敌，调动围攻大别山的敌人，直至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为止。考虑到大别山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地方干部不足的困难，中共中央在此之前已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第十纵队以及中原局第二批地方干部兼程南进，驰援大别山。

第十二纵队的前身，是在豫鄂边坚持了 8 年抗战的新四军第五师。1946 年 6 月，该部随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从豫鄂边突围到豫陕边，建立了豫鄂陕根据地，坚持斗争达半年多，后奉中共中央命令北渡黄河转到山西晋城休整。1947 年 6 月，五师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赵基梅任纵队司令员，下辖三十三旅、三十四旅和中原独立旅（中原独立旅暂归刘邓指挥，十二纵队到达大别山后归还建制）。

8 月 5 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和第十二纵队司令员赵基梅率第十二纵队从晋城出发，经清丰、南乐，在寿张南部渡过黄河，在商丘以西越过陇海铁路，尔后，攻通许，占扶沟，在淮阳稍事休整，渡过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越过信（阳）潢（川）公路，于 11 月下旬进入大别山区，到达罗山县的苏家河地区。第十纵队是根据刘邓的命令，于 1947 年 9 月 1 日在安阳地区

新组建的部队，它由冀南军区独立第四旅、第五旅，3 个独立团及“六

“一四”部队（原高树勋将军起义部队改编）合编组成，辖第二十八旅、第二十九旅、第三十旅，共 1.9 万人，王宏坤任纵队司令员，徐子荣任政委（徐当时在华东解放区）。第十纵队经过短期整训，携带着大量的经费、物资、弹药，于 10 月 14 日出发，沿途冲破国民党军在陇海铁路、信潢公路的阻截，于 11 月底进入大别山区，在光山县何畷与刘邓大军主力会合。中原局副书记李雪峰带领从晋冀鲁豫解放区抽调的第二批地方干部约 2000 多人，随第十纵队也来到大别山，在黄安县七里坪与刘邓领导的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会合。第十二纵队和第十纵队以及大批地方干部的到来，增加了大别山的斗争力量。这几天，邓小平特别兴奋，专门抽出一天时间，听李雪峰详细介绍了全国土地会议的情况，召集几个区党委主要负责人总结了地方工作的开展情况。他建议，在敌人的围攻还没有开始之前，抓紧时间，召开一次中原局会议，传达和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讨论和研究大别山如何开展土改和整党的工作。同时，把刚到达大别山的 2000 名地方干部全部分遣到各县，尽快地熟悉大别山的情况，配合原有干部，进一步发动群众，巩固政权，扩大根据地。正当中原局准备召开会议和分遣干部的时候，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开始了。由于敌人来势凶猛，情况紧急，中原局只得放弃原定计划，集中讨论如何粉碎敌人围攻的问题。

当时，从全国战局来看，大别山解放军是处在外线作战，但就大别山这个地区来说，由于敌人重兵围攻，解放军又处在外线中的内线。在这种复杂的和严重的斗争局面中，如何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确实是个难题。

邓小平和刘伯承、李先念、李雪峰等主要领导人认真分析了大别山敌我情况，认为既要把敌人主力拖在大别山，以利陈粟、陈谢两军在外线大量歼敌，又要在内线积极作战，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由于敌人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且密集靠拢，向心合击，难以捕捉战机，而根据地刚刚建立，群众尚未充分发动，政权还不巩固，加上山区作战，回旋余地狭窄，粮食困难，不便于大兵团宽大机动，不宜于集中过多的部队在大别山打大仗。因此，决定采取内线与外线配合的方针，即抽一部分主力留在大别山，利用大别山的复杂地形，在内线进行小的战斗和游击战争，打击和牵制敌人；其余主力分三部分，分别向桐柏、江汉、淮西三个地区实施战略再展开，在外线开辟新的根据地，分散敌人兵力，并配合大别山内线和陈粟、陈谢在平汉线的作战。具体部署是：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第一纵队转至淮西地区；第十纵队向桐柏挺进，开辟桐柏解放区；第十二纵队向江汉地区展开，创建江汉解放区。事实证明，分兵桐柏、江汉、淮西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有利于内外线配合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而且对实现党中央的在江、淮、河、汉之间创建辽阔的中原解放区的战略任务具有重要作用。

桐柏、江汉、淮西均为中原战略要地，兵家必争的战场。桐柏区位于豫西南和鄂西北交界处，东隔平汉铁路与大别山相邻，西、北傍伏牛山与豫陕鄂解放区相呼应，南临汉水与江汉地区相接。江汉区位于鄂北地区，东临武汉，南凭长江，西依巴山，北接桐柏，是防守长江中游重镇武汉的屏障，又是西进四川的门户。淮西区指淮西北岸至沙河以南一带，是鄂豫、皖西、桐柏、豫皖苏和豫西解放区的结合部，又是大别山

的战略后方。中原三军占领了大别山、豫陕鄂、豫皖苏，再占领了桐柏、江汉、淮西，就可使中原各解放区连成一片，使平汉线东西地区衔接成面，形成江淮河汉之间的宽大机动的战场，为将来三军逐鹿中原，创建巩固的中原解放区奠定良好基础。

此外，桐柏、江汉、淮西三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是著名的粮仓。由于敌人主力都被吸引在大别山，这里兵力薄弱，防守不严。只要解放军乘虚攻入，定能辟为新解放区。这样，既能把战争进一步引向国统区，扩大解放区，又能利用该区的人力、物力、财力补充自己。

对于开辟桐柏、江汉新区，邓小平有着充分的信心与把握。他认为第十纵队刚成立，又经过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与动员，战斗力强，士气高，干部力量雄厚，此次进军桐柏，一定能旗开得胜，顺利完成开辟新区的任务。而第十二纵队的优越条件更多。过去，他们长期转战在豫鄂边界，情况熟悉，经验丰富，江汉地区又是新四军五师的老根据地。这次他们打回老家，重返江汉，指战员们信心十足，士气高昂，相信他们一定能克服任何困难，把根据地重新建立起来。

在研究部署完了开辟桐柏、江汉两区的具体问题后，邓小平决定亲自到两个纵队去作战前动员，鼓舞一下全体指战员开辟新区的斗志。

12月3日下午，邓小平和刘伯承来到第十纵队驻地光山县何畝，接见了连以上干部。他首先赞扬第十纵队动员工作做得好，顺利到达了大别山。接着，详细阐述了坚持大别山斗争与开辟新解放区的关系，部队集中作战歼灭敌人同分散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关系。强调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加紧军事训练，作好吃苦的思想准备，迎接新的艰巨的战斗任务。最后，他号召大家：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英勇杀敌，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创建根据地，立足桐柏，打好向江南进攻的基础。

几天后，邓小平和刘伯承又来到罗山县苏家河第十二纵队驻地，向营以上干部作战斗动员。他首先分析了1947年7月以来，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后的全国形势，指出中原三军挺进大别山、豫皖苏、豫陕鄂，在江淮河汉之间创建中原解放区对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意义。接着，向全体指战员下达了进军江汉，开创新的解放区，配合大别山内线作战的战斗任务。他说：

“同志们，你们的任务是进入江汉地区，建立江汉解放区。你们越过了汉铁路后，敌人很可能派兵尾追，乘你们立足未稳扭住你们，这就麻烦了。因此，你们必须设法摆脱敌人的追击，迅速完成战略展开任务，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在工作中，你们一定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是，这个地区曾是你们的老家，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克、服困难，完成这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我们的部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我们在打仗的同时，还要执行工作队的任务，开辟根据地，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在执行任务中，一定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政策，把根据地巩固下来。”

主力部队分遣行动，实行战略再展开，指挥部也必须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指挥内线斗争和外线作战。经过研究，刘邓决定将野战军指挥部分为前方指挥部和后方指挥部，前者留在大别山指挥反“围剿”斗争，后者和中原局机关随第一纵队转移到淮西地区，指挥全局。

在谁留大别山指挥，谁去淮西的问题上，自然又经过了几番长时间的争论，最后，还是采纳了邓小平的意见，即：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率前方指挥部留在大别山，刘伯承、李雪峰、张际春率后方指挥部和中原局到淮西。

邓小平十分清楚，主力部队分遣桐柏、江汉、淮西后，留在大别山的部队只有3个纵队，七八万人，而敌人的兵力却多达33个旅，30万人，在敌众我寡，兵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坚持大别山的斗争将会越来越艰苦，处境也会越来越危险和国难。正因为此，他才极力坚持让刘伯承到淮西，自己留在大别山。在邓小平与刘伯承共事的10年里，每当遇到情况紧急、处境危险，指挥部不得不分开行动时，邓小平总是以自己年轻为由，“固执己见”地坚持自己到最危险、最艰苦的地方。多年来，他的这种勇挑重担的高尚品德，已经成为他的一个鲜明的特点，为全军上下所共识和称颂。

又要分手了。邓小平亲自为刘伯承送行，他们边走边说，送了一程又一程。

“敌人如果知道我军有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必然会疯狂地扑向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这样，你的担子会更重，处境也会更危险。”戎马一生，具有丰富经验的刘伯承已经预料到，大别山将有一场激烈的恶战，他当即决定，把原准备带到淮西的警卫团留在大别山，并一再叮嘱李达参谋长，千万要注意保护邓政委的安全。

临行前，刘伯承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你在大别山千万要注意，我还是不放心哟！”

“放心吧，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邓小平充满信心地回答。

12月11日夜，刘伯承率领前方指挥部、中原局机关和第一纵队，从札山县（今大悟）东北的黄陂站出发北上，向淮西转移。邓小平则率领前方指挥部留在大别山。此刻，等待他的是大别山最寒冷的冬天和敌人33个旅的最疯狂、最残酷的“围剿”。

指挥反“围剿”

邓小平与刘伯承在黄波站分手后，即率领前方指挥部北上黄安，全力指挥“反围剿”斗争。

这时，围攻大别山的敌人步步逼近，已经占领了立煌、商城、太湖、罗田、广济、英山、上巴何等地方，并继续向根据地中心区压缩。

国民党军采取分进合击的部署：以整编第八十五、第二十八、第七、第九、第二十五、第四十六师等部，自孝感、武穴、太湖、霍光一线，成半月形阵势，由南向北稳步压缩推进；以整编第四十八、第五十八师进到商城地区；以整编第十、第十一、第二十师和整编第五十六、第五十二师各一个旅共 9 个旅兵力，在光山、罗山、信阳、花园一线堵击，企图在解放军向西、向北转移时合力围歼。此外，敌人还利用反动地主、恶霸、特务，恢复和加强乡保武装，保甲统治，发展谍报网，修建碉堡等，以配合其正规军进行“清剿”，彻底摧毁大别山根据地。

在敌人的进攻与合围中，刚建立的大别山根据地受到严重破坏。已经解放的县城又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到 12 月底，解放军控制的 30 多个县城只剩下 12 座，后来，连这 12 座也被迫放弃了。由于敌人的“清剿”，根据地彼此被分割开，刚建立的地方政权受到摧残，农民协会被迫解散，许多群众因担心敌人报复又重新躲到了山上。而地主反动势力却活动猖獗，伺机报复，公开逮捕，杀戮共产党的地方干部和解放军伤病员，威胁利诱群众，制造白色恐怖。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大别山的斗争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与考验。正如刘伯承、邓小平写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所说：“此次为我反攻后之最大考验，处境确有困难。”

围攻大别山的敌人有 33 个旅，而坚持大别山斗争的解放军只有 10 个旅，敌我兵力悬殊，且严冬已至，地瘠人贫的山区粮食更加紧缺，财政供应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粉碎敌人的围攻，采取什么战略战术和斗争方针，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呢？

邓小平对敌人围攻大别山的特点作了精辟、透彻的分析，他认为，敌人对大别山的疯狂围攻，是垂死挣扎的表现。大别山是敌人的战略要害地区，敌人越是接近死亡，越要拼命争夺。敌人已没有战略进攻，只有战役进攻了。它对大别山的围攻，形式上虽然同过去对中央苏区的围攻相似，实质上则完全相反。过去的围攻，是敌处在战略进攻，我处于战略防御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的围攻，是敌处于战略防御，我处于战略进攻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并不表示敌人的强大，而只是敌人垂死前的回光返照。同时，我们跃进大别山，正是要吸引大量的敌人向我进攻。把敌人吸引来的越多，我们背得越重，对其他兄弟战略区进行大规模的反攻和进攻就越有利。而兄弟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也正是对我们坚持大别山斗争最有力的支持。只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在全国各兄弟战略区的配合和广大群众的支援下，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围攻，把大别山根据地巩固起来。

在敌人的围攻开始之前，邓小平曾与刘伯承认真研究了关于粉碎敌人围攻的军事部署，向所有部队发出《敌我作战要领》，向全军指出，

《刘邓致军委陈粟陈谢徐滕薄电》，1947 年 12 月 8 日。

蒋介石此次进攻大别山是要“彻底破坏根据地，摧毁物资及党政组织。”根据敌人这次围剿的特点是，以一个强大的纵队寻找我主力，其余则分散“清剿”。因此，我军的作战要领是：（一）主力宽大机动，待敌疲困时，寻机歼敌一路。（二）以二纵主力在外线分散活动，坚决打敌弱点。（三）军区和分区一部适时转移至外线，积极活动，特别是断敌补给线；同时，留一部兵力在内线，以积极进攻的游击战术，疲困敌人，保护群众，实行空舍清野，反“清剿”和侦破敌情。（四）各部队各分区要深入动员，敌人是垂死挣扎，并不可怕，反对右倾，坚决打敌，在决战时，不怕伤亡，认清只有粉碎敌人的进攻，才有巩固的根据地。

当敌人开始大举围攻，邓小平指挥主力部队及时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后，邓小平再次指示各纵队首长，主力虽转至外线，使敌人的合围扑空，但“敌将多次反复的进攻清剿，以达其战略防御，使我难于立足，并阻我过江前进之目的。必须对此形势明确认识，才有备无患，不致慌乱。要使全体军民了解，敌人是垂死挣扎，而我们业已完成战略上的展开。敌之一切进攻、清剿，均将在我坚强的、有组织的斗争下归于幻灭。”

为了适应已经开始的反“围剿”斗争，邓小平指示主力部队作适当分遣。即二纵位于经扶、立煌之线以北地区，六纵位于大别山南地区，三纵位于皖西地区辗转机动。他认为，部队分遣行动的优越是：（一）容易争取一个旅以下的歼灭战；（二）容易集结两个纵队作战；（三）避免大兵团集结被迫作战的毛病；（四）便于进行地方工作，填满空白；（五）在肥区吃粮食；（六）容易解决财政困难；（七）把敌人引向外，中心区好深入工作。他明确指出：“这是积极坚持和深入大别山工作的方什。各兵团必须在指定地点灵活分散集结，实行打仗、土改、筹款三大任务。”

在指挥部队进行反“围剿”的作战中，邓小平不断地总结经验，根据大别山区的特点，为部队规定了关于大别山反清剿的斗争方针与策略。关于斗争方针是：

（一）以小部消耗大敌，以大部歼灭弱敌，发展外线，开展新区，吸敌西顾，配合内线反清剿斗争，抓紧空隙进行土改。

（二）以必要兵力坚持内线反清剿斗争任务，适时分遣集结，力争打小歼灭仗（一个班也好）。

（三）虚虚奔袭敌纵深薄弱地带，除可开辟新区工作外，迫使敌回头。凡所有部队，均应主动的机动与休整，避免被动的退却。不厌转移，加强开展情报通讯，确定掌握情况，争取出敌不意，抓空开展工作。

（四）发扬高度进攻精神，捕歼小敌、土顽，尤应以爆破、阻击、夜袭、火攻、捕捉、破残、破路等，才能杀伤匪方人马、物资、破坏交通，消耗疲敌。

根据部队在反“围剿”作战中一时难以寻找战机打援的情况，邓小平强调部队要主动分遣寻找敌人的弱点，采取多种形式拉敌、疲敌、打

刘伯承、邓小平：《敌我作战要领》，1947年12月7日。

《刘邓先念雪峰致各首长并报军委陈谢陈粟徐滕电》，1947年12月17日。

《刘邓先念雪峰致各首长并报军委陈谢陈粟徐滕电》，1947年12月17日。

《刘邓关于大别山反清剿斗争方针给所属部队的指示》，1947年12月26日。

击敌人弱点，决不与敌人胶着打消耗。据此，他明确规定了部队作战行动的策略，即：（一）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主要应在外线拉敌；（二）以小对大，以大对小，分派小部队游击，疲敌大部，远离敌主力；（三）不消耗战；（四）积极找敌弱点，在进退时都应取进攻姿态，组织有力的对敌伏击。

可以看出，邓小平关于反“围剿”斗争的军事原则和战略战术方针的论述，既运用和吸收了抗战时期游击战争的成功经验，又遵循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运动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同时，结合了大别山区的地理、地貌和这次敌人围攻的特点，这是将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与大别山实际斗争情况相结合的具体体现，表明了邓小平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历史的思想与特点。

在上述军事原则与作战方针、策略的指导下，邓小平在指挥部队突破敌人的第一次合围之后，命令部队时而集中歼敌，时而化整为零，以灵活多样的方式打击敌人。当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解放军合围时，部队即跳出包围圈，转到外线，以旅、团为单位，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与敌人周旋，拖疲、消耗敌人，并寻机歼灭分散、孤立之敌。当敌人发现解放军主力转到外线对其尾追跟踪时，部队则又灵活地甩开敌人，利用敌人在运动中分兵合击的时机，集中主力歼灭分散之敌。由于邓小平采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指挥部队灵活机动，巧妙周旋，使得敌人到处扑空，处处被动。而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各个纵队和军区武装则不断取得“反围剿”的胜利。

第六纵队接到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指示后，立即在部队中进行了紧急动员，使广大指战员充分认识到敌人围攻的兵力虽然强大，但他们是被迫进行垂死挣扎的敌人。解放军处在内线作战，穿插于数倍于己的敌人之间，困难虽大，但由于已熟悉了大别山的地形，习惯了大别山区的生活，学会了山地作战并有了一定的经验，所以，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围剿”，取得胜利。

12月初，敌人的“围剿”开始，第六纵队除留一部分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外，主力及时跳出敌人的合围圈，转移到鄂东的黄安、黄岐地区，调动和分散敌人，并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12月3日晚，第十八旅和第十六旅四十九团乘国民党整编第八十五师西移，宋埠空虚之机，以突然的动作一举攻克鄂东重镇宋埠，全歼麻城地方团队2000余人。这是大别山反“围剿”斗争取得的第一个胜仗。这一仗，不仅给黄安、麻城地区反动势力以毁灭性打击，也直接援助了这一地区的地方工作。

为了拖散敌人，破坏敌人随时实施的合围阴谋，12月中旬以后，第六纵队采取以旅为单位的活动方式，使敌人对其“吃不下”，围不着，处处扑空，疲于奔命。而第六纵队则适时分遣与集中，寻找战机，消灭分散孤立之敌和地方反动武装。12月24日，在英山、罗田坚持内线斗争的第十六旅，乘敌人主力远在浠水、罗田、麻城“清剿”之际，突然转到外线，包围广济城，歼灭广济守敌青年军第二三师第六团1800余人。当国民党第七师赶来增援时，十六旅即转移到龟峰山下木子店地区活动。1948年1月8日，第十六旅为摆脱敌人的合击，突然进攻驻守长轩

岭的黄陂县两个保警中队和黄陂县特工队，歼敌 200 余人，并在敌人主力到来之前，适时转到外线。

第三纵队一直活动在皖西地区。12 月 7 日，纵队主力从麻城白果地区出发，向北转移。国民党整编第七、第二十八、第四十八、第五十八、第四十六师前后夹击，紧追不舍。部队发扬艰苦奋斗、顽强作战的作风，先后多次打破敌人的合围。12 月 13 日，纵队进至新县正向商城以西转移时，与国民党整编第五十八师遭遇，第九旅连续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激战终日，掩护纵队主力安全转移。16 日和 17 日，纵队在商（城）潢（川）公路上的江家集和商（城）固公路上的石桥分别遇到敌人的追击和堵截，部队顶风冒雪，破冰徒涉泼皮河与灌河，终于摆脱了敌人。此后，强渡史河，跨过六（安）叶（家集）公路，于 24 日到达英山以北地区。从 12 月 7 日到 24 日，第三纵队拖着敌人 5 个师，在麻城、新县、黄安、商城、潢川、固始等地区周旋，在冰天雪地里连续行军作战 18 天，行程千余里，并多次冲破敌人的合围，胜利地完成了吸引多路强敌并将其拖疲拖困的艰巨任务。

第二纵队在完成了掩护第十纵队进军桐柏的任务后，即由光山地区向东进发，奔袭固始，歼敌一部，吸引已南下商城的国民党第四十八师、第五十八师回援。1948 年 1 月，第二纵队在司令员陈再道率领下北上，将国民党第十师、第十一师吸引至淮河以北地区，尔后突然掉头渡淮南下，收复光山县城，歼敌保安团一部。

在主力部队来往机动，与敌周旋的同时，鄂豫、皖西两军区部队和地方干部也以顽强英勇的精神，与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当敌人进行反复“清剿”，实行“自首政策”，分离群众与共产党的联系，到处搜刮资财，企图在军事、政治、经济上摧毁根据地时，鄂豫、皖西区党委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粉碎敌人围攻的指示，在邓小平和前方指挥部的领导下，带领地方武装和群众，积极开展破路，反抓丁，反抢粮，反掠夺的斗争。在敌人到来之前，转移粮食，隐蔽后方医院和伤员、物资，使敌人搜寻解放军伤病员和物资的计划到处落空。当时，主力部队转移后，隐蔽在蕲北曹家大山一带的伤员就有 500 余人，敌人丧心病狂，到处搜索，威胁利诱群众交出伤员，蕲北山区的群众为了掩护这数百名伤员，自动组织起来，轮流站岗，放哨，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捕，保护了伤员的安全。

为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鄂豫、皖西面军区部队采取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战术，积极投入艰苦的反“围剿”斗争。12 月初，皖西第一、第二军分区部队分路出击敌人在太湖、潜山等地的兵站，迫使已进入鄂东的国民党第二十五师分兵回援。12 月下旬，鄂豫军区部队奔袭黄冈以东之上巴河，稀水以北之关口、钱家寨，广济东北之濯港，黄梅以南之析春等地，共歼灭敌正规军和地方团队 1600 余人。此外，各县大队破坏敌人的碉堡、电线、公路，阻滞敌人的行动，积极配合了主力部队的行动。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共歼敌正规军和地方团队 1.3 万余人，收复了太湖、英山、金寨、广济、潜山、岳西、黄梅、礼山等 10 余座县城，取得了大别山内线斗争的初步胜利。

在一个多月的反“围剿”斗争中，邓小平率领着短小精悍的前方指挥部和刘怕承临行前留给他的警卫团，一直和数倍的敌人周旋在大别山

上。他和战士们一样风餐露宿，踏冰卧雪，和群众一起忍饥挨饿，共渡难关。他的这种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勇于和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的品格以及坚韧不拔、不屈不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鼓舞了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全体指战员，使他们树立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信心与勇气，从而经受了挺进大别山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渡过了创建根据地的最困难的时期。

然而，就是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邓小平首先考虑的还是全局。当时，中央军委为缓解大别山的严重局面，命令粟裕率4个纵队迅速南下，与陈谢集团会合，沿平汉路直迫武汉，以吸引和调动一部分敌人出大别山，减轻大别山的压力。邓小平知道后，立即复电表示，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任务，就是为吸引敌人重兵于自己周围，使兄弟部队能够展开反攻，大量歼敌。因此，自己再牺牲再艰苦也要坚持住，不能分散兄弟部队的力量。他向中央军委建议，陈粟、陈谢对大别山的支援不宜急躁，而要立足于长远考虑。他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3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①他还要求中央军委将刘邓所属的杨苏纵队留在淮北，参加陈粟军作战，以便大量歼敌。

邓小平的这种在自己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还能胸怀全局，勇挑重担的精神，给许多老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跟随邓小平坚持大别山反“围剿”斗争的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曾回忆道：

“在经扶城以北的行进途中，我到野战军前方指挥所，见到了邓小平政委和李先念副司令员。一见面，李副司令员就开玩笑他讲：锡联同志，背得动吗（指背着敌人行动）？邓政委接着说：就是要多背一些，釜底抽薪就不要怕烫手。调动敌人回援根本重地，这是个关系到全局的战略行动。我们多背些敌人，宁愿本身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也要拖住敌人几十个旅于自己的周围，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能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现在陈粟、陈谢的部队，为配合我们粉碎敌人的围攻，已开始向陇海、平汉路的敌人出击。我们准备告诉他们，要作长期打算，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一些，他们可以放手歼敌，对全局极为有利。”在邓小平指挥大别山军民进行内线斗争的同时，分遣到江汉、桐柏、淮西的第十二纵队、第十纵队、第一纵队以及进行外线作战的陈粟、陈谢两军也分别取得了胜利。

第十二纵队接受了开辟江汉新区的任务后，于12月6日，在湖北省黄安县组成江汉军区、区党委、行署，刘建勋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赵基梅任军区司令员（过平汉铁路后，赵基梅病故，张才干继任），郑绍文任行署主任。14日，赵基梅、刘建勋率江汉军区部队从礼山县陈家湾出发，在广水、花园间分三路西越平汉铁路，进入江汉地区。由于事先组成党政军领导机构，划分了展开地区，所以部队跨过平汉铁路后，即直奔指定地区，消灭国民党地方保安团队，摧毁保甲组织，解放了广大乡村城镇。12月20日，部队首先攻克京山，接着，围攻钟祥守敌，全歼湖北省保安第二总队1300余人。1948年1月8日，又攻克鄂北重镇随

① 陈锡联：《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第三纵队》，见《中共党史资料》第24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46—47页。

县，全歼湖北省保安第四总队，俘敌 1400 余人。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先后解放京山、天门、应山、随县 5 座县城，建立了 4 个军分区，12 个民主县政权，开辟了以大洪山为中心，纵横 700 余里，有 300 万人口的江汉解放区。12 月 5 日，第十纵队准备分南北两路在信阳以南、广水以北地段越过平汉铁路，向桐柏进发。国民党军发现第十纵队的意图后，急调整编第二十、第十师和第五十六师的一六三旅、第五十二师的九十八团，对第十纵队围追堵截。6 日晚，第十纵队的北路部队攻克信阳以南的柳林车站，越过平汉铁路。7 日，在谭家河地区与国民党整编第二十师遭遇，经过 3 天激战，9 日晚突破重围，进入桐柏地区。与此同时，南路部队在武胜关以南东筮店地区附近越过平汉铁路也到了桐柏。

12 月 13 日，第十纵队在湖北省应山县浆溪店举行会议，宣布正式成立桐柏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徐子荣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徐未到任，刘志坚代理），许子威任行署主任，王宏坤任军区司令员。同时，组成了各地、县级党政军领导机构，配备好了干部，划分了展开区域，各部随即分头奔向指定地区。12 月 15 日，桐柏军区第二十八旅冒雪奔袭桐柏县城，歼灭保安团 700 多人。17 日，三分区部队解放枣阳，19 日，二分区部队解放泌阳。20 日，军区部队解放唐河，21 日，三分区部队解放新野，一分区部队解放随县西北之唐县镇和枣阳的鹿头镇。1948 年 1 月 16 日，军区主力在三分区部队协助下，攻克宛西军事要地邓县，全歼守敌国民党 13 个保安团共 1 万余人，俘国民党邓县县长江海涛以下 8600 余人，使宛西反动地方武装和反动政权遭到毁灭性打击。经过一个多月作战，先后解放了桐柏、枣阳、泌阳、唐河、新野、邓县 6 座县城，解放了桐柏大部分城镇和乡村，建立了 4 个军分区和 22 个县级政权，形成了具有 100 万人口的桐柏解放区。

对于第十二纵队和第十纵队在外线作战的结果，邓小平感到十分满意。他认为，第十二纵队和第十纵队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打开局面，顺利地创建了江汉、桐柏两块解放区，并配合大别山的内线斗争，主要原因是吸收了大别山的经验，他在 1948 年 1 月 15 日给毛主席的报告中总结了这一经验，他写道：

“两纵过路后，因吸收了大别山经验，先配好了干部，配好了各分区各县武装，故展开极为迅速，情绪都很好。各占 5 座县城，仗也打得很好，两区都在普遍分浮财，个别地区已开始分田，估计可望少走弯路，工作开展，可能较鄂豫、皖西为快。”

开辟淮西的工作进展也很顺利。12 月中旬，当刘伯承、李雪峰率后方指挥部和中原局领导机关从大别山来到淮西时，豫皖苏军区部队已解放了淮西的临泉、沈丘、项城等县，并正在组织力量，积极扩大战果。刘伯承率部到淮西后，指挥第一纵队和豫皖苏军区部队又开辟了息县、上蔡、正阳等 10 余县工作，成立了豫皖苏指挥部（后改为豫皖苏第四军分区），填补了大别山与豫皖苏之间这块空白，使大别山的豫鄂、皖西两块解放区与豫皖苏解放区连成一片。12 月 24 日，第一纵队攻克汝南县城，俘获河南省保安副司令温汉卿以下 1800 余人。此后，一纵积极向西发展，配合陈粟、陈谢部队作战，并在平汉线与陈粟、陈谢两军胜利会师。

在邓小平指挥大别山内线斗争，刘伯承指挥外线部队向江汉、桐柏、

淮西作战战略展开时，陈粟、陈谢两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于12月13日发起平汉、陇海破击战。陈粟野战军破击平汉线郑州至许昌段和陇海线郑州至民权段，陈谢集团破击平汉线许昌至驻马店段。至22日，两军共破路420余公里，歼敌2万余人，攻克许昌、漯河、驻马店、兰封、民权、新中牟、洧川、长葛、西平、遂平等23座县城。

这时，蒋介石为了达到其彻底摧毁大别山根据地的目的，仍不肯从大别山调兵增援，并命令孙元良兵团由郑州南下，与原在豫西的第五兵团由南阳经驻马店实施南北对进，企图夹击平汉线上的解放军。12月25日至27日，陈谢集团主力在西平以南的祝王寨，金刚寺地区，全歼第五兵团团部和整编第三师，俘获第五兵团少将参谋长李英才。在破击平汉、陇海的战役中，陈粟、陈谢两军共歼敌4.5万余人，攻克县城及车站50余座，终于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抽调整编第十师、第十一师1个旅，第二十师、第八十五师、第五十六师、第五十二师各1个旅，第九师，共13个旅回援平汉线，减轻了大别山内线斗争的压力。

对于外线战略展开和陈粟、陈谢两军破击平汉、陇海对粉碎敌人大别山围攻的作用，邓小平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由于陈粟、陈谢两军破击战大胜，继因围攻确山，逼近信阳，又因我江汉、桐柏两区展开，连获胜利，才破坏了敌之进攻计划。

在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实施大举围攻的近两个月里，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内外线互相配合，共歼敌6.9万余人。不仅粉碎了敌人对大别山的“围剿”，巩固了大别山根据地，而且新开辟了江汉、桐柏、淮西解放区，发展和扩大了豫陕鄂和豫皖苏解放区。这个胜利标志着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已经由点的占领实现了对中原面的占领，已经在江、淮、河、汉广大地区站稳脚跟，胜利地实现党中央挺进中原，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的战略。

当大别山反“围剿”斗争和外线作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邓小平充满信心他说：

“现在看来，我们业已站住，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

“县委是全县党的领导核心”

1947年的冬天，大别山已经下了好几场雪，寒风呼啸，卷走了残留在树梢上的枯枝萎叶，大雪纷飞，覆盖了数百里巍峨的群峰。漫山遍野的马尾松，在朔风严寒的袭击下，依然挺拔，做立于绝壁险峰之上，在银装素裹中显得更加苍劲、碧绿、郁郁葱葱。

白雪皑皑、蜿蜒崎岖的山路上，邓小平穿着那件自己缝制的灰色棉军衣，和率先念、李达，还有鄂豫区党委书记段君毅等一行，疾步向东走去。他边走边与李先念他们交谈着什么，偶而，也停下脚步歇歇气，欣赏一下眼前这壮观的大自然的景色。

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围剿”斗争，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不断受挫，解放军将要取得大别山斗争的又一个回合的胜利。在这坚持大别山斗争最艰苦、最困难的岁月里，邓小平率领前方指挥部，日日夜夜翻山越岭，转战在崇山峻岭中。现在，他和战士们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咬紧牙关，终于挺过来了，就象远处那些昂首挺立在峭壁上的劲松一样，经受住了严寒的考验，在险境和困难面前，变得更加坚强，更加百折不挠。

在艰苦的反“围剿”斗争中，解放军在各级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有力配合下，又从敌人的手中夺回一部分县城和一些根据地。由于外线作战的胜利，敌人的一部分主力调出大别山，大别山的形势同渐缓和，地方工作重又蓬勃开展起来。经过这次反“围剿”斗争，邓小平确信，解放军在大别山已经站稳了脚跟。但是，从全局来看，大别山根据地还有相当一部分不十分巩固，不少地方仍处于敌我拉锯的游击状态，政权不稳，工作粗糙、不深入。邓小平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大别山根据地的这种情况，他说：“现我工作分布地区不下六百万人，但均不巩固，还是游击状态。几个月来都初步分了浮财（地主隐藏的东西仍属大部），已分田的约八九十万人，但都很粗糙，分假田的一定不少，全区象样的根：据地只经扶、岳西、礼山之大部，其他各地都有一块或几块较好的区域。但是插花形的急待连成一片，而敌人则有计划的分割我之联系，按地形条件，我如能控制经扶、商城、立煌、霍丘、岳西、英山、罗田、麻城、黄安9县全部，才算有了真正的根据地，此为我今后斗争的第一步目标。”

前一个时期，由于敌人围攻大别山，邓小平一直忙于指挥军事，无暇具体指导地方工作。现在，形势有所缓和，他准备抽出一段时间，亲自到鄂豫区的几个县去看看，检查一下这里的政权建设、土地改革和群众工作情况，以掌握和了解最准确可靠的材料。他认为，开辟根据地要靠军队，靠军事占领，而巩固根据地则必须靠地方政权和党的基层组织，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在各级政权中，县委的作用尤为重要，它是全县党的领导核心，是带领群众与敌人进行斗争、从事各项建设的战斗堡垒，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是联系党与群众的桥梁。县委的工作做好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就能通过他们顺利地、迅速地贯彻到群众中去，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就有了保证。而根据地巩固了，主力部队才可以无后顾之忧，放心地调

出去打大仗。

12月下旬，邓小平在鄂豫区党委书记段君毅的陪同下，已经检查了几个县的工作。现在，巧由商城往金寨县去。

金寨县位于大别山的腹心地区，山大林密，地域辽阔，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1929年5月6日，鄂豫皖地区党组织在这里领导农民举行了著名的“立夏节起义”（亦称商城起义）。几天后，各路起义队伍会师斑竹园，宣告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不久，第三十二师与鄂豫皖地区的其它几支红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所以，金寨县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之一。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五虎将之一卫立煌率部攻占了金寨县，他为了炫耀自己的功绩，以自己的名字立煌为县名，将金寨县改为立煌县。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于9月2日解放了立煌县城，并成立了中共立煌县委和县政府。县委开始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改县名，恢复金寨县原来的历史面目。当时的县长白涛曾亲自撰文，以通俗易懂的五言绝句，书写了《金寨县民主政府布告》向全县人民宣布，将立煌县改为金寨县。他写道：

查我金寨县，大别山中心，
革命根据地，中外有威名。
立煌本战犯，不应留臭名，
改名金寨县，历史面目真。

金寨县是鄂豫一地委的重点县，这时的县委书记是张延积，县长是王相卿，县委机关驻在南溪的余富山。

12月下旬的一天，邓小平、李先念、段君毅一行来到金寨县漆店区下楼房村，这里离余富山有40里路。邓小平一面派人去通知张延积等人来这儿汇报工作，一面和李先念、李达、段君毅到外面雪地上捡了一些松枝，准备开会时烤火用。

这时，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党中央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要求全党、全军进行深入学习，并在实践中严格遵照实施。刚好，这天晚上的新华社广播电台将全文广播这一报告。邓小平特意把金寨县委的负责人叫来一起听听，以了解党中央新的方针和政策，指导下一步的工作。

当张延积、王相卿等人赶到下楼房村时，天已黑了。邓小平正在专心致致地调整着收音机的频率，李先念、李达、段君毅等人围坐在一堆松枝旁，屋子很矮，窗子很小，屋里点燃了两支松油灯，但光线仍然很暗。

“来来，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先坐下烤烤火，听听新华社重要广播，听完之后再汇报工作。”段君毅见张延积等人进来，忙起身打招呼。

当时，中共中央已在太行山上设立了新华社广播电台，以便迅速向各解放区传递党中央的声音，了解全国斗争形势。但由于大别山远离老区，斗争条件艰苦，敌人不断地进攻、围剿、扫荡，所以，直到现在，很多干部还从未听到过新华社的广播。当段君毅招呼大家坐下听广播时，他们还真感到有些新奇呢。

不一会儿，新华社的广播开始了，那声音刚劲、浑厚、有力，字字句句凝聚着坚无不摧的力量，它越过千山万水，冲破风雪严寒，在大别山这间昏暗、矮小的草屋里回荡：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这激昂、豪迈、振奋人心的声音，象眼前这堆闪烁、跳跃的松明一样，温暖着房间里每一个人的心。

邓小平坐在火堆旁，两手不停地拨弄着松枝，眼睛却一直注视着那小小的收音机。火光映红了他的面庞，看得出来，他比南下出征时瘦多了。一连几个月在穷山恶水中打仗、生活，日日夜夜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而过度操劳，他两颊的颧骨更高了，眼窝深陷，那双深邃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略有些疲倦。

新华社的广播结束了，邓小平搓了搓手兴奋地对大家说：“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报告，大家都听清楚了吧，我们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我们已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奋斗，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革命的胜利就会很快到来！”

接着，邓小平让同志们汇报进大别山几个月来，在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方面的工作。

因为金寨县委的几个同志都是第一次见邓小平，所以说话十分拘谨。邓小平见状笑笑，随和他说：

“找你们来是随便聊聊，谈谈工作情况，不要拘谨，做了些什么工作，就谈什么嘛。”说着，他把头转向张延积：“干部和群众的情绪怎么样？”

“干部情绪很高，对坚持大别山斗争很有信心，除工作外，他们还帮助老乡搞生产，给红军家属打柴、挑水，群众很拥护我们，说我们象当年的红军。这里是老区，群众基础好，对创建解放区十分有利。”张延积谈起工作，便忘记了拘束，一口气说了一大堆。

邓小平听了十分满意，说：“那好嘛，你们要充分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坚持大别山斗争。党中央和毛主席命令我们千里跃进大别山，就是要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在外线更多地消灭敌人，取得战争的主动权。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我们每一个指战员和干部，都要认清形势，认清我们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伟大意义和光荣任务。”

从张延积等人的汇报中，邓小平知道，金寨全县已建立了11个区、乡政权，而且在打击土顽，发动群众，分浮财，分田等项工作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在，群众对解放军开始信任，并在一定程度上能主

动配合与支持我们的工作。如在这次敌人的全面“围剿”中，一天，金寨县委的几个同志被敌人包围，突围不成便隐藏到一个老乡家。当敌人搜查到这家人时，那个老乡死也不肯说出来，后来全村人还出面主动担保。敌人无可奈何，恼羞成怒，一气之下放火烧了这老乡家的房子。

邓小平听了高兴他说：“嗨！看来你们这里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嘛！你们已经开始在群众中扎下根子了。”他又说：“我们能不能在大别山站住脚，会不会被敌人赶出去，决定的一环便是团结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深入不深入。你们都是搞这方面工作的，你们的一举一动，都象一面镜子，群众就是透过你们来认识我们党、我们军队的。因此，你们要时时刻刻联系群众。”

当邓小平了解到金寨县的干部来自各个方面，组织还不够统一，工作还不太协调时，他严肃他说：“县委是全县党的领导核心，应当有魄力统一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搞好工作，坚决不允许有各自为政的现象。在当前斗争比较艰苦，形势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同志们务必注意这个问题，这是你们能否坚持大别山斗争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问题。”

在此后的岁月里，邓小平提出的“县委是全县党的领导核心”这句话，把金寨县来自各个方面的干部凝聚到了一起，真正发挥了县委在巩固、建设根据地中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

到金寨不久，邓小平亲自帮助一个老乡找到了他丢失多日的牲口。那是几天前发生在商城的一件事。那天，邓小平住在商城南乡黑河村一个老乡家。闲聊中，听老乡说，前一天，解放军在湾子里打上匪，把他的牛牵走了。邓小平详细询问了情况，原来，老乡的牛是让土匪抢走的，解放军来剿匪时，上匪扔下牛逃跑了，解放军则把牛当战利品牵走了。邓小平当即答应老乡，一定帮他调查、寻找。

离开商城，邓小平一行翻过九峰尖大山，进入金寨县，宿营时遇到了金寨县的一个工作组，一打听，恰巧就是他们前一天在黑河村剿匪，并且确实牵了一头牛。邓小平命令他们立即把牛送还老乡，并对他们说：

“你们怎么不动脑筋想想，土匪的牛是从哪里来的？老乡丢了牛，他能不急？这就是群众观点问题，一切行动都要以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新区工作，尤其应注意遵守群众纪律。”

后来，当邓小平得知工作组已把牛送还老乡并向他道歉时，满意他说：“这样就好，不要认为这是件小事。严守纪律，执行政策，关心群众，这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生根立足的大事。记住，这是个教训。”

在金寨的这段日子，邓小平一直住在下楼房村那所地主的大院里。地主早已逃跑了，留下了这幢空荡荡的宅子。山区的地主没有华北平原那些“搂半县”、“圈半县”的大地主神气威风，有个几十亩地，造几间稍好一点的房子就已很惹眼了。

房子前面有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房子正造在这小河的弯处。站在河边，向远处眺望，林海雪原，一片白茫茫的景象。山林在沉睡，四周寂静无声，只有眼前这条通往远方的小河，日夜不停地哗哗流水，仿佛在向人们说：春天就要来临了。

就在这小河边那幢房子里，邓小平渡过了来大别山的第一个除夕，也是最后一个除夕。

山里过年不比城市热闹，何况眼前正在打仗，一些群众携家带口躲

到了山上，使本来就没有几户人家的小山寨显得更加冷冷清清，连一些生活必需品都无处购买，更不要说置办年货了。上午，县委书记张延积领着一些人来给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等拜年，顺便带来些年货，如羊肉、鸡、花生什么的。张延积已从其他同志那里了解到，邓政委一向严于律己，从不收受老百姓的礼物，也决不允许身边的工作人员以任何借口收留群众的东西。但考虑到今天是除夕，首长总要改善一下生活吧，所以，硬着头皮送来了。

谁知，邓小平照例不肯收下，当他听说年货是群众慰问的，更加不高兴，严肃他说：

“接受群众的慰问品也要分个时间、地点嘛，这里是新区，群众生活很苦，我们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赶快把这些东西全部退还群众，让群众过个好年。”

年货是退回去了，可除夕还得过。邓小平坐在那堆烧得正旺的松柴旁，一边拿书本煨火，一边对站在一旁的卫士长说。

“看看还有些什么吃的，拿出来大家一起吃嘛。”

“只有几个麦饼，又冷又硬，还有一些枣子。”卫士长正在为首长们没有一顿象样的夜宵而犯愁呢。

邓小平一听立刻来了劲：“那好嘛，快拿来吃。麦饼烤烤，红枣当菜，蛮好的一顿大年夜饭嘛！”

他一边吃红枣，一边自己烤着又黑又硬的麦饼：

“嗯，蛮好吃，这比我当年穿越大沙漠那时的日子好过多喽！”邓小平一向不爱谈论自己，平日里由于工作繁忙，更难得与大家闲话聊天。这会儿听他这么说，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他。

邓小平是四川省广安县牌坊村人。16岁那年，漂洋过海，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他因从事革命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受到法国警方通缉，被迫由法转赴苏联，先后考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1926年5月，冯玉祥到苏联，要求中共派一批中共党员到西北军帮助工作，在选派出来的20多人中，有3个人负责打前站，邓小平是其中的一个，这年，他才23岁。

从莫斯科到内蒙，途经乌兰巴托和大沙漠，路途遥远，交通很不方便。邓小平一行乘坐一辆破旧的运军火的汽车，一连数日在朔风呼啸、尘埃蔽天的漫漫沙漠中艰难地爬行。凛冽的寒风卷起一阵阵尘沙，向他们扑面而来，他们一个个冻得蜷缩成一团，紧闭着双眼，只有到了宿营地，才能在帐篷里互相依偎在一起取取暖，吃点烤羊肉充饥。

事隔20多年，邓小平对当年穿越大沙漠的旅行仍记忆犹新。他说，眼下，坚持大别山的斗争和生活是很艰苦，但这比他在沙漠中忍饥挨冻的情景要好太多了。特别是经过前一段艰难曲折的斗争之后，大别山这漫长、寒冷的冬天即将过去，而春天就要来临了！

三到新县

1948年春节刚过，邓小平便与李先念、李达等一行由金寨翻山越岭，来到新县。

新县，即经扶县。位于大别山北麓，四周群山环抱，主峰黄毛尖，海拔1000多米，山间有谷地、盆地。该县森林资源丰富，主要有马尾松、黄山松、杉木、乌桕、油茶、栋类、毛竹、桂竹等。此外，盛产花生、茶叶、板栗、白果、猕猴桃等山货。

新县在鄂豫皖一带可谓久负盛名。过去，它是光山县的一部分，叫新集镇。1927年到1929年，共产党在鄂豫皖地区领导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商城起义、六霍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鄂豫皖三省交界的逃亡地主纷纷跑到新集，以此为据点，与根据地人民作对。1932年2月，红军攻克新集，此后，光山县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等领导机关相继设于此地，新集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和首府。1932年9月，国民党军刘峙部攻占新集，刘峙以自己的号“经扶”为县名，在新集设立了经扶县，它包括光山南部地区和黄安、麻城北部的一小部分地区。

抗战时期，新四军第五师在大别山建立了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因考虑到与国民党的统战关系，一直沿用“经扶”县名。这次刘邓大军解放了经扶县城后，首先提出更改县名的问题。

两个月前，刘伯承率领后方指挥部和中原局机关向淮西转移时，途经光山县南向店。在这里，经扶县委书记穰明德向刘伯承汇报了县委各方面的工作，并提出了更改县名的问题。穰明德当时提了两个方案，一是叫“伯承县”，一是叫“新县”。刘伯承听了表示同意更改县名，但他说：“不要以人名作地名，还是叫新县好。”这样，新县的县名就定下来了。

1947年12月30日，经扶县在陈店乡王湾召开了全县首次人民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了更改县名的决议，即将经扶县改为新县。

新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自大革命以来，共产党在新县的活动就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刘名榜领导的罗礼经光中心县委和游击队，长期在新县一带坚持斗争，在群众中的影响颇为广泛。这里群众基础好，党的影响大，人民对革命军队怀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刘邓大军解放新县后，在这一带开展工作一直很顺利，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邓小平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几次提到新县是大别山根据地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少数几个县之一。

对于新县的工作，邓小平一直很关心，并倾注了不少心血。在此之前，他曾两次到新县，亲自部署和指导各项工作。第一次到新县，邓小平帮助组建了新县县委和县政府，使新县的工作迅速全面地开展起来。那是新县刚解放不久的事情。当时，刘邓大军刚进入大别山，一切尚无基础，连吃饭都成问题。邓小平来到新县后，立即任命野战军民运部长穰明德为新县县委书记，任命刘名榜为新县县长，并派了一批得力干部，希望他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打开新县工作局面，并通过新县工作的开展，迅速沟通刘邓大军与当地群众的联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新县的干部果然不负邓小平的重托，他们一到新县，便立即深入群众，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打击上顽，保护群众利益，培养积极分子，很快巩固了政权，打开了斗争局面。使新县成为大别山根据地的中心区之一。

第二次到新县，邓小平帮助建立了鄂豫第二地委、专署和军分区，使新县和二地委的工作进一步深入发展。

1947年12月下旬，大别山的反“围剿”斗争即将取得胜利，邓小平部署完了前方的作战，便与李先念、李达、段君毅来到新县。他们一行沿着山间小路向西走去，行至泗店区一个村庄时，突然从四面八方杀出一股武装，一接触，原来是县委书记穰明德正带着部队在泗店区剿匪，他得到情报说东边来了一股“敌人”，便立即命令部队设下埋伏，投入战斗。

邓小平一见穰明德，便开玩笑地说：“穰明德，你这个小圈子可顽固了，竟然把我们当俘虏给捉来了。”

邓小平详细询问了新县县委和县政府开展工作的情况，他一边听汇报，一边不住地点头，并对某些具体工作作了指示。

这时，新县已划归鄂豫二地委领导，由于前一段敌情严重，鄂豫区党委和军区一直忙于搞坚壁清野，粉碎敌人的围攻和扫荡，所以，二地委、专署、军分区一直没有成立。邓小平这次到新县，除了听取县委工作汇报，了解一些基层工作情况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二地委建立健全领导班子，进一步发挥各级党组织在创建、巩固根据地过程中的领导作用。他亲自任命穰明德为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刘名榜为专署专员，熊作芳为军分区司令员，詹士山为副司令员，彭晓林为副专员，马一鸣为组织部长，王黎之为宣传部长。此外，任命王光力为新县县委书记，邱进敏为县长。这样，二地委、二专署、二军分区领导班子就算正式成立了，机关就设在新县。

这次是邓小平第三次到新县，当他看到在他离开新县的这段时间里，二地委领导班子成员已经全部配齐，工作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各项工作纳入正轨，分区部队发展了，队伍壮大到3个团，还搞了一部电台，加强了对外通讯联络。他十分高兴，与华北老解放区相比，尽管这里的工作条件很差，斗争环境很艰苦，群众觉悟也不如老区，各方面困难还很多。但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斗，反复拉锯，总算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艰难险阻，根据地正在一天天地发展和扩大，总算有了今天这样一个初步稳定的局面。不久，它就可以象老区那样，由创建阶段，进入巩固发展阶段，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更大的贡献。

邓小平十分清楚，解放军在大别山的斗争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敌人对根据地的“围剿”虽然遭到了失败，但他们并不甘心，还会卷土重来，特别是，将来解放军主力转出大别山后，敌人一定会肆机报复，再次与解放军争夺大别山。所以，坚持大别山的斗争还在继续，困难还会存在。这次，他到新县来，就是要全体干部了解全国斗争形势，进一步在思想上树立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信心，对即将到来的严重局面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为主力部队转出大别山作宽大机动创造条件。

在新县，邓小平召集鄂豫二地委全体干部会议，在会上，他作了关于全国形势和大别山形势的报告。

邓小平首先讲了反攻以后所取得的胜利，他说：

究竟我们反攻取得多大胜利？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指出，自反攻以来，歼灭了敌人 69 万，这数字一点也不夸大。加上 12 月歼灭敌人 11 万，总计 80 万，超过自卫战争第一年的战果。这里面有我们歼灭的 11 万。我们自进到大别山以后，9 月至 12 月，我们并未大打，也打掉了敌人 5 个旅，歼敌 5 万，比自卫战争第一年战果大。中央分配作战任务，第二年再消灭敌人 96 个旅，每月分配我们两个旅，我们算是完成了任务。陈粟、陈谢、东北的战果就更大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前进了一千里，创造了三大解放区，都已展开了工作，人口多了 4500 万，建立了各级政权及军区组织。大别山敌情最严重，而我们不仅战略展开了，而且战术也展开了，到处有我们的工作。我们已经在新解放区站住了脚，我们不会走，是已经明确了，这就是敌人也看得清楚。二陈（陈毅、陈康）的情况比我们更松些。我们最后展开的江汉、桐柏两个区，因接受了我们的经验，已顺利地展开了。

第一年我们在内线打，对我们很方便，但如果继续在解放区打，便上了蒋介石的当，这样我们便来了个跃进，打破了蒋介石把战争放在解放区内打，摧毁解放区，使我们不能持久的毒计，实现了我们的计划，剥夺了蒋介石 4500 万人口，这对蒋介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蒋原计划在河南征兵 11 万），如果再跃进 1000 里，便到了广东、福建，再一个 600 里便到了海边。

邓小平继而分析了全国的战局：

由于我们的跃进，使蒋介石征兵 100 万的计划只完成 50%，逃兵便有 30—70%，现在靠拉夫来凑数。这等于消灭了他 100 万，形势不能不起变化。这就是敌人彻底地输了，我们胜利了，而这一反攻胜利，正在发展。

在东北，迫使敌人缩在狭小的地区，我们增加了 700 万人口，军队增加了 6 倍，装备很好，在数量质量上都超过了敌人，敌人不但关外部队不能应付，还在从关内调（二十四军、五十四军也被消灭一部，五十四军还未来大别山，这次也被调到东北）。我们队伍都进了长春、沈阳城内。东北发言人已公开宣布，今年要进关。

晋察冀在收复石家庄以后，形势大大地变了，新的胜利消息就要传来。

在山东，敌人只有 3 个机动部队，我们负担很轻，已恢复敌人重点进攻以前的状态。

苏北是我们反攻出来之后才建立的新部队，现已能歼敌 8000 人，保持市镇 3/4，乡村 8/10，城 2 座，这一新起的部队，战斗力很强。

陕北我们在训练、休整，有 27 座城，延安以北到榆林已完全归我们。关中，人口、面积增加 1 倍，敌军占 8 座孤城。敌人只有 11 个旅，比过去重点进攻时弱得多（敌重点进攻时 34 个旅），现已转入反攻，消灭胡宗南是有把握的。

现在，战略上我们是继续胜利，而敌人后退一千里转入防御。过去敌人是面的防御，现在已转到线的防御，更发展到重点防御（东北）。晋察冀、冀东是线的防御，平汉以南只是点的防御，陕北完全是点的防御，晋冀鲁豫完全是点的防御，而且点也不多了，鲁西南也是点，豫皖

苏敌人只有五师、五十五师，兵很少，也是点。

邓小平在揭示敌人战略上的弱点时说：

蒋介石最怕“线线切断，点点包围”。我们打下石家庄、运城这两个战略据点，给敌人震动很大，使敌人看到点的防御也发生恐慌了。在东北已经不敢以一个师防御一个城，我们一个攻势，敌人以20来个师应付。敌人本可以放弃一些点，但破了产的地主，放不下架子，这对我们很有利。

敌人过去是黄河战略，想把我们赶到黄河以北，现在则是长江——汉水战略。蒋介石唯恐我们过江，他们内部估计，只要我们一过江，蒋介石便完了（所谓完了，不是不打，而是缩到一个角挣扎）。蒋介石现在的人力来源只有靠湖南，其他各省都没有完成计划。两广因游击战争开展，不能征兵；云南、贵州也征不了多少；四川已出兵450万，再搜刮也不多了。如果我们再下长江，打下湘鄂赣，则蒋介石一点办法也没有。钱可向美国要，人却不行。我们一过长江便胜利了。蒋想在最后无办法时，退到云、贵、川打，这叫作马歇尔计划。我们如过了汉水便到了四川，马歇尔计划就会破产，蒋介石就断了退路。蒋要把战争扭到长江、汉水以北打这个战略是积极防御——攻势防御。如说过去蒋还有进攻性，现在则丝毫没有，敌人对大别山的进攻，是战役性的。

了解反攻意义之大，就在使敌人改变了战略，这便是我们的胜利。

邓小平接着分析了大别山敌人兵力变化情况，说：

去年上半年，蒋介石向我山东、陕北重点进攻，共计100个旅（陕北我们只3万，打退了敌人30万兵力的进攻），这一次只有对我们大别山来一次进攻，而且只有33个旅，但二陈（陈毅、陈赓）一打，从大别山抽走了十几个旅，现在我们区只有敌人20个旅，比刚到的时候还少3个旅。

半年前100个旅，现在拼命不过凑了33个旅，而一击也垮了。过去是扭着干，我们如何打它却不散，现在不行了。

根据这种形势，邓小平最后得出两点结论：（一）基本的——敌人是防御的；（二）敌人是攻势防御，以进攻达到防御。他说，这叫作垂死挣扎。垂死是基本的，不看到这一点，便不了解反攻胜利，挣扎是另一方面，不看到这一点，会松懈、麻痹、丧失斗志！

小小的会场挤得满满的，几十个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干部被邓小平那深刻、精辟的分析紧紧地吸引住了。过去，他们只看到敌人33个旅对大别山的猖狂进攻，只看到敌众我寡、力量薄弱的不利条件，所以感到形势紧张，困难重重，听了邓小平的报告，他们的视野一下子由大别山扩展到了全国。他们了解到，敌人的进攻虽然气势汹汹，但那只是防御性的进攻，是临死前的狂吠；我们的面前虽然仍有不少困难，但等待我们的是胜利和希望。

窗外，寒风呼啸，屋内篝火熊熊。邓小平的报告激励着房间每一个人，使他们的注意力早已冲越这昏暗的小屋和寒冷多雪的大别山，转到了中原和全国。

纠正“左”倾错误 领导土改运动健康发展

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部队挺进大别山的时候，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废除封建性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建议全国各解放区民主政府实施这一纲领，展开土地改革，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当时，刘邓大军刚刚来到大别山，正在着手开辟根据地。在接到中共中央关于贯彻土地法大纲指示的当天，邓小平即以中原局名义，起草了《中原局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造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经中央批准并于10月12日发到所有部队和地方党委。邓小平在指示中指出，要坚决反对右倾现象，把土改工作作为创建根据地的有力武器，在有初步工作基础的地区，立即放手发动群众，分浮财，分田地。关于土改的组织形式和方法，邓小平建议，要组织贫农小组，成立贫农团与农会，召开贫农会员大会或农会代表大会，讨论与通过中央新颁布的土地法大纲，并立即开始分田。

为了保证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邓小平主张从主力部队抽出一部分武装，作为地方武装的基础，其任务是：消灭地主武装，歼灭小的正规蒋军，掩护土改。他还建议从每个纵队抽1000到2000名干部和老解放区的翻身农民战士，训练5至7天，组成若干工作队，直接参加与领导土改，以解决地方干部严重不足的困难。

当土改运动全面开展起来以后，邓小平及时总结了英山、经扶等县的经验，认为一面剿匪，一面土改的方法成绩颇好，值得推广。英山、经扶等县的经验是：树立贫雇骨干，组织贫农团，将所有地主的财产及富农多余的土地、财物全部交给贫雇农（下中农也得到一部分），每人分得5斗到3石粮食，半匹到两匹布和其他衣物。这样的结果是，贫雇积极性大大提高，仅一个半月内即完成了百万人分田。在上改中，以老部队两个连为骨干，扩大了两百多地方武装，一面剿匪，一面掩护土改，使方圆百里地区的上匪不敢活动。根据英山、经扶的经验，邓小平认为，只要满足贫雇要求，树立贫雇骨干，则群众可迅速进入与蒋匪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根据地的雏形能较快地建立起来，中农也在贫雇优势下要求加入农会。1947年秋天，刘邓大军经过两个回合的军事斗争，已控制了大别山以南和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并在大部分县建立了民主政权。群众看到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渐渐消除了疑虑，并开始接近解放军，积极支持解放军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土改工作很快开展起来，有的地区甚至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如光山县白雀园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到会人员竟达6000之多，黄冈县经过发动群众，成立了144个贫农团，拥有会员和基本群众23.5万人，经过几个月斗争，大别山区的大部分地区都分了浮财，小部分地区分了土地。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一场消灭几千年封建剥削制度的历史性大变革，是千百万人民参加的最广泛的群众运动。土改运动是一项十分复杂，政策性很强的工作，由于新区处在战争的环境，敌我拉锯激烈，群众未充

分发动，土改工作又毫无基础，所以，当土改运动全面展开时，不免会出现一些偏差或阻力。特别是，当时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要求尽快实现土改，争取群众，以支持战争。这就更容易助长一些激烈的方式和急躁情绪，使“左”的倾向很快滋生起来。

在大别山，中原局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造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发到各地后，不少地方的干部为了急于发动群众，扩大上改区域，完成上改任务，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打到哪里，分到哪里”和“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走一处点一处”等过激口号。这些做法由于方法简单，工作粗糙，使土改受到一些损失。有的地方片面提出“贫雇路线”，“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不许中农加入农会，把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分中农土地财产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地方下去组织群众打倒地主，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而是搞和平分田，形式分田，插牌子，一分了事，只求形式上的快。实际上，地主并未打倒，群众并未真正发动，而分的田都是假的。有的人说，“假的也好，分比不分好。”拿新县来说，全县有80%的地区进行了土改，贫雇农占有的土地提高到67.8%。从数字看，土地已从地富手里转移到贫雇农手里，实际上，那些分到地的老实巴交的贫苦农民由于担心解放军站不稳，怕国民党民团回来报复，因此，表面接受了土地，暗地却向地主赔礼道歉，有的白天分田，夜晚又偷偷地把地送还地主。此外，在土改中破坏工商业，没收小商人财产，乱抓人、乱杀人的现象也较普遍，搞得市场紊乱，工商业凋敝，影响了群众的生活。

土改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能尽快在大别山站住脚跟，通过土改，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支持。可这样做的结果却与最初的想法恰恰相反。越是土改，群众越少。正如邓小平后来描述的那样，把大地主赶跑了，中小地主、富农也“逼上了梁山”，拿起梭镖和我们干，最后普通群众怕地富回来报复，也跑了。邓小平说，这叫作自食其果。

邓小平在指挥反“围剿”时，对大别山区土地改革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已有所察觉。当前方局势稍有缓和时，他便立即来到鄂豫区，顶风冒雪，翻山越岭，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深入新县、商城、金寨、麻城等县，调查、了解土地改革运动中发生的问题。在调查中，邓小平发现，土改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在分浮财中，贫农几乎没有分到什么东西，而果实却落到流氓、地痞、地主狗腿手中。还有，少数干部存在着思想作风不纯的问题。

邓小平认为，土改工作中所以出现“左”的倾向，除了斗争环境险恶、群众还不觉悟等客观原因外，主要是干部问题。首先，一些干部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左”的情绪，认为“左”比右好，快比慢好，所以工作中，大噱大轰，一刀切，形式主义，只求快，不讲实际效果。这种“左”的思想情绪在上改工作中占主导地位，它是促成急性土改，造成上述各种偏差和错误的主要根源。其次，一些干部机械搬用华北老区的土改经验，用老解放区那一套发动群众、划阶级成份、分田地的办法来领导大别山新区的土改运动，而忽视了大别山区的实际情况和斗争特点，犯了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其三，干部本身的素质较差。在调查中，邓小平了解到，有些地方干部不是为了广大的贫苦群众谋利益，而是假公济私，贪污、浪费斗争果实，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在给毛主席

的报告中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一情况：

“地方干部大部质量不强或能力太弱，能够坚决执行党的路线（特别是走贫农路线）的固不缺人，但做坏事的确实不少。我们最近到立煌检查工作，该县进行土地革命，敌情并不严重，但工作坏在分浮财中贫雇农几乎没有分到什么东西。实行所谓积极分子分果实，使果实落在流氓、地痞、地主狗腿手中，最好的东西部被本地干部吞了。许多斗争果实存在区村，每天开大锅吃饭，部队干部经常还要吃好的，穿好的，逐渐浪费了。另一方面，实际还要向贫农要粮、要鞋、派差事、派慰问品，提拔坏人当干部，田还没有分（少数分了是假的），强迫命令的方式。”

对于土改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邓小平认为一方面要解决干部的问题，把干部思想作风不纯的表现通报全区，引起“各区严重注意，先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继之以党纪，采取严肃立场，坚决按照中央整党方针，克服这个严重现象，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工作无法开展。”另一方面，从大别山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据中央的方针，制定出更加符合大别山斗争特点的具体政策和策略，保证中央的土地政策真正得以贯彻。

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的政策，是邓小平从实际出发的思想的一个生动体现。邓小平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历来坚定不移，不折不扣，这一点曾多次得到毛泽东的称赞。然而，他贯彻中央的政策时，不是照抄照搬，生搬硬套，而是善于将中央的方针政策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注意了解和发现在执行中央政策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给予解决，并提出进一步完善政策的建设性的意见。邓小平在回答毛泽东所询问的一系列关于新区土改问题以及在阐述他本人关于新区土改的意见时，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

当邓小平不辞辛苦，深入大别山各县调查、了解土改中出现的

各种问题，并开始注意纠正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正在着手纠正全国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左”倾错误。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夺取全国胜利问题，其中重要议题之一就是纠正“左”的倾向，使土地改革运动健康发展。当时，毛泽东根据他初步掌握的材料，认为贯彻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应当同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应当区分老区、半老区、新区3种不同类型的解放区，根据各解放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步骤。由于中央和毛泽东对新解放区的情况不甚了解，为此，毛泽东于1948年1月14日致电担负开辟中原新区任务的邓小平，从6个方面询问新区土改情况。

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根据他所调查了解的情况，于1月15日和1月22日连续向中央发出两个电报，详细介绍了大别山区各方面的情况，对毛泽东提出的6个问题分别作了明确回答。

邓小平首先介绍了大别山区的特点，他说，大别山区的特点是：“经过苏维埃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两个时期（苏维埃时期的“左”，抗日时期的右，均在各阶层发生根深影响），地主、富农有很丰富的政治警觉与很丰富的反革命经验，无论苏维埃时期和抗日时期对农民及革命分子

的压迫都很残酷，普遍采取了自首政策，充分利用叛徒，消灭我之游击战争和党的组织。基本群众则经过了多次失败的教训，不放轻易起来，但起来后则很有力量（指老苏区）。 ”

根据大别山区这一特点，邓小平认为在上改中应当区分两种地区，采取不同的政策。他说，大别山区有 1200 万人口，可分为两种地区，即巩固区和游击区。在巩固区可以进行上改，在游击区则暂时不能急于平分土地，而应深入宣传土地法大纲，组织秘密贫农团，打土豪，分浮财，积极发动群众。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土改中“一刀切”的弊病。

鉴于大别山前一时期土改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向毛泽东提出了在平分土地时应对地主、富农、中农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他说：

“富农[地主]的粮食、耕牛、农具、土地、埋藏底金必须拿出分配……但可坚持对中小地主的衣物、家具在分配时给地主自留一部分（农民在分配时多一扫而光）；对富农只拿出其耕牛、农具、土地的多余部分，其日用家具、银钱则暂时不动，或将来再动；对中小地主、富农中之反动分子则采取没收政策（对家属采取个别对待政策）。如此可对反动营垒或多或少起些分化作用，于农民仍属有利。 ”

关于中农政策，邓小平认为采取中农不动政策为好。他说：“我觉得在新区一般采取中农自愿或中农不动政策为好，切忌强制打乱平分，使中农不满。 ”

他还将中央苏区的情形与大别山的具体情况作了对比，阐明了在大别山为什么不能对中农实行打乱平分的原因。他指出：“根据我在江西的经验——那里事实上是打乱平分的，但那是在大块苏区贫雇领导业已树立而且有力的条件下，中农觉得打乱平分比保持特殊更为有利条件下做到的，而在新区一时尚难具备这种条件，故应郑重。 ”

大别山区的中农与其它地区的中农不同，这里的中农多为佃户和半佃户。这些人缺乏土地，多余耕牛、农具。所以，如平分土地，而耕牛、农具不动亦不合理。因此，邓小平认为，“可采取按其本人自愿，或将土地、耕牛、农具打乱平分或照旧不动的政策，同时在负担政策上加以合理调剂。总之，对中农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按每家具体要求加以解决，不可用大会通过一律对付的强制办法。事实上初次所分配的土地问题必多，将来还要经过一两次复查，即是需要彻底平时再做，比现在引起中农不满为好。 ”

邓小平的两份电报，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解放区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特别是邓小平关于在新区土改中区分两种不同区域的建议对中央启发很大。根据邓小平提供的材料和意见，中央开始研究制定新区土改的具体政策。

在收到邓小平 1 月 22 日那封电报的当天，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给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文，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新区土改的意见。

毛泽东的电文主要内容有 3 点：（一）土改不能性急，大体用 3 年时间完成。（二）新区土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一切封建阶级的土地。（三）应区分两种区域，采取不同策略。在巩固区，可进行土改；在游击区，只做宣传工作，为土改做准备。

从这里看出，毛泽东吸收了邓小平关于新区划分两种不同地区的意

见。

这份电报作为中央指示转发各地之前，为慎重起见，毛泽东于2月6日，将他给粟裕的电报又转发邓小平，并就新区上改的斗争策略和组织形式等问题进一步征求邓小平的意见。

2月8日，邓小平复电毛泽东，表示同意他给粟裕的电报内容，并再次强调土改中要区分两种区域。他还对新区土改的斗争策略和组织形式等问题提出了6条具体意见：

“根据大别山情况我具体的意见是：

（一）在新区除了分为两个阶段外，还应分两种地区：即可以巩固的区域和游击区域。6日所指示两个阶段的策略，完全适合大别山的情况，只是在可以巩固的区域时间及过程应该缩短，在这种区域基本上仍可采取经扶、英山的经验。

（二）中农不打乱平分，绝对采取自愿原则。（三）现在的贫农团一经保证了贫雇在农村的领导骨干作用即应迅速扩大为农协会，吸收中农入会和个别中农积极分子加入领导机关。在尚未开展工作时，此类新区亦可不先组织贫农团而先组织农民协会，但必须保证贫农的领导。

（四）暂时不动富农底财。

（五）使地主不顽抗，特别是要地主能够生活，不要一扫而光。（六）工商政策仍应再次明确规定。苏维埃时期所规定的城市政策的具体办法，即保留地主的商业部分，地主住家又开商店者，没收布告贴在后门等，在今天完全适用。如大别山到处有工厂，现已停业，影响民生甚苦。现拟采取争取业主（即地主）复业，否则转由政府代管或交给工人合股经营的办法。”

毛泽东在收到邓小平的复电后，表示十分赞许，立即转发各地，并加了一段批语：“（一）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二）分阶段、分地区极为必要。在第一阶段将打击面缩小至只打击大、中地主及国民党反动分子时，并不是说富农、小地主中的保甲长、恶霸、反动分子为农民所要求打击者，也不要打击，我们只要注意对富农、小地主的多数，暂时不去惊动，就无危险了。（三）确定先组织贫农团，树立贫雇农威信，几个月后，再组织农民协会，团结全体农民，并严防地富及坏人混入。”

在征询了各方面的意见后，2月15日，毛泽东将他给粟裕的电报修改后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为题，下发各区，作为指导新区土改的文件。根据这一文件精神，邓小平授意中原局，于3月25日发出《中原局关于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对部队进入大别山以来，在土改工作中出现的“左”倾急性病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总结，对贯彻土地法，实行土改的各项政策、策略、方法步骤和组织形式等具体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各地按《新区土地改革要点》，“坚决克服目前普遍存在着而已为害不小的急性病”，分阶段、分地区、有步骤地进行上改。

在新县，邓小平亲自召集鄂豫区党委开会，认真总结前一段土改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纠正“左”倾错误的办法和措施。他在会上说：“要了解和他分析大别山的形势和特点，从大别山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动群众，进行土改。他还向大家指出：

“在新区树立两个观念非常必须：（一）根据地之确立与土改之完成要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半载所能达到。（二）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分地区的逐步深入，开始应缩小打击面，实与农民有利，否则必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

为了迅速纠正各地上改工作中存在的“左”倾偏向，邓小平和鄂豫区党委共同研究，规定了4条具体政策：

（一）任何时候不要忽视团结90%以上的人，中立那些可以中立或暂时中立的人，

（二）严禁乱杀乱斗；

（三）保护工商业政策；

（四）分别可以巩固区与游击区的不同策略步骤，在腹心区集中力量打成一片，而后背靠背地向外发展。在游击区采取武工队的组织形式，适当的集结武装，主动的打击敌人，特别是消灭土顽。

邓小平还指示鄂豫区党委，立即张贴布告，公开宣布停止过火的做法，安定民心。要让群众知道，我们要保护群众利益，保护厂主、店主照常营业，对被侵犯的中农，赔礼道歉，退回错分的土地财物，对没有反攻倒算的地主保障其安全，使之安心生产。

经过一些强制性的措施之后，大别山逐渐停止了乱打人，乱杀人，乱没收的过火做法，不少地方在斗争策略上缩小了打击面，采取秘密分果实，秘密组织贫农团等办法，减少了农民的顾虑，农民们纷纷回到村里，说你们早这样做就好了。

土改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很快得到纠正，但是，在于部们中间却一度刮起了一阵“整人”风，有的地方抓住某个领导的一段讲话当把柄，揪住不放，有的地方提出“要层层追究责任”，还有的干部互相指责，互相埋怨，搞得人人自危，工作十分被动。个别干部因怕挨整，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邓小平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明确地向干部们宣布：土改工作进行得不顺利，出现“左”的偏向，责任在中原局，不在下面，不要互相指责，追究责任。他希望中、基层领导和干部，要消除隔阂，解除顾虑，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放手大胆地工作。邓小平的一席话，不仅迅速扭转了地方干部思想极为混乱的局面，稳定了大别山数千名干部的思想情绪，而且使他们放下了包袱，消除了顾虑，轻松愉快地又投入了新的工作。

领袖人物的伟大，不在于他一贯正确，从不失败，而在于他比别人更善于从失败中学习，激励自己，不断前进。对于土改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邓小平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敢于正视缺点，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代表中原局，主动承担了责任。1948年3月8日，邓小平向毛泽东作了《关于进入大别山后的几个策略问题》的报告，从主观上深刻地检查了大别山区“左”倾急性病的各种表现及其危害性。他在报告中写道：

“从几个月斗争特别是敌情严重后，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左倾冒险急性病的害处。最近淮西区敌人扫荡中，有些地主在分了他的浮财之后仍不愿得罪我们，不敢向敌人告密。这些事实证明我们在策略上完全可能中立一批弱小地主和富农，如果我们到大别山后不犯急性病，即使那里经过土地革命，也可能中立他们的。我们的急性病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不分阶段不分地区对大、中、小地主及富农一齐下手，致树敌太多，增加了许多障碍，反于人民不利。

（二）我们所提的贫雇路线其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而正确的应该是中央所提的：以贫雇为骨干，巩固的联合中农的路线。在实际斗争中相当普遍的采取了拒绝中农的态度，甚至打击到富裕中农，其结果使贫雇更加孤立，易受摧残，甚至影响到贫雇不敢起来。在阶级划分上也犯了与老区同样的错误。

（三）在工商政策上可以说是很紊乱的。在 10 月 12 日中原局指示中，虽曾提出反对开始萌芽的对工商政策的“左”的倾向，但一直未引起注意。大别山我控制区工商之凋零（未作具体调查），估计主要是我们没有明确的工商政策，税收过重，纪律不好等原因所造成。敌人摧残确系原因，但非主要的。

（四）在工作布置上，对必然到来的严重局面缺乏预见，不是估计哪些是可以巩固区，哪些是游击区而有重点的分布力量，规定不同的策略步骤，尤其是未能乘敌之隙打开局面，而是平均的分布力量，普遍的安置县区架子。

（五）武装力量分得过散，在游击区一班一排的力量既不能保护工作人员的安全，又无力打土顽，陷于被动，到处吃亏，失去游击的本能。

（六）一般干部缺乏策略思想，大家是硬着头皮干。商城县委曾注意及此，利用伪属及社会关系打通商会、土顽队长关系，可以获得经常确实的情报，证明敌人营垒中有许多空子可钻，但被我们普遍忽视了。”

毛泽东看了邓小平的这份报告，对邓小平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大加赞赏，他欣然提笔，在报告上作了这样一段批示：

“小平同志的这种负责的自我检讨是很好的，有了这样的自我检讨，就有使广大干部逐步学会党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的可能；而没有全盘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足，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着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当忙的事务工作，而忽略了策降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我们要求各地负责同志每两月做一次综合性的工作报告，就是要求将这种策略与政策的规定，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做出的自我检讨（这些就是各地负责同志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中央报告。”

毛泽东要求各中央局领导以邓小平为榜样，正确评价成绩和缺点，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全党教育很大。正是有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一批领导同志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土改中“左”的偏向才得以迅速纠正，党的政策才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

主力出山

早在指挥部队进行反“围剿”的作战中，邓小平就看到，大别山高路陡，南北运动方便，东西运动困难，一出皖西山地，沼泽很多，不便大兵团宽大机动。事实上，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以后，一直是在进行游击战或游击性的运动。用刘邓的话说，“其方式是一散一集”，“主要是运用分遣与集结的机动歼敌人”。刘邓认为，要在中原广大地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最后夺取中原，把中原变为将来解放军渡江南下的战略基地，就必须在控制大别山之后，及时地把主力转出大别山，与陈粟、陈谢两支大军会合，机动歼敌，打中等以上的仗，破坏敌人的中原防御体系。

1948年2月7日，中央军委鉴于中原形势的发展，致电刘邓，询问指挥所现在何处，如果尚在大别山，似宜移至淮河、陇海、沙河、伏牛山之间，与陈（士渠）唐（亮）兵团、陈谢兵团会合，打中等以及大的歼灭战，中央军委指出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一）粟裕准备机动，刘邓亦可派两部参加机动作战；（二）将敌人主力吸引至淮河、汉水以北，利于大别山、江汉等地放手发展；（三）北面缺乏指挥中心；（四）北面有巩固后方可为依托；（五）必须打歼灭战才能解决问题。

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后，邓小平反复分析了大别山的形势和中原的战局。目前，敌人虽然仍在集中兵力争夺大别山，大别山的斗争也还处在比较困难的严重局面中，但经过几个月的斗争，特别是在粉碎了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之后，根据地已经确立，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权得到发展和巩固，已经基本具备了独立坚持大别山斗争的能力和条件。加上前一时期贯彻了中央的新区土改精神，纠正了土改工作中的过急、过“左”的作法，团结了广大群众，这些都有利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即使没有主力部队，敌人也不能把我们打出去了。此外，主力部队长期在大别山转战，消耗很大，且一时难以捕捉战机，不如适时转出大别山，休整之后参加机动作战。这样，既有利于中原战局的进一步发展，又能从大别山拖走一部分敌人，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从而有利于大别山的坚持。邓小平估计，“主力抽走，可能引起一些波动”，大别山会出现“一两个月的严重扫荡”，但“休整、胜利及粟的机动，必可改变形势，利于发展”。所以，他表示完全赞同中央军委的建议，适时将主力部队转出大别山。

2月9日，邓小平向中央回电，报告了指挥所的位置，表示同意中央的部署。他在电文中说：

“（一）我及先念率指挥所在大别山，伯承因身体不好，暂率野后在淮河以北，并指挥各纵。（二）我野后部队在大别山内，一时很难打到好仗，辗转消耗亦不合算，集中作宽大机。并利于粟的机动，实属必要。”

至于出山的时间，邓小平因考虑到整个中原战局的情况，主张“主力兵团不宜抽得过早”。当时，在进军中原的三路大军中，刘邓大军反攻作战时间最长，又一直处于国民党重重包围之中，长期在大别山区转

战，所以吃苦最多，消耗最大。特别是大别山远离老区，部队消耗严重却得不到后方接济，难以救护和安置伤员，这些都给部队的作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正如刘邓所说的：“我军在战略上前进一步，但在部队补给上则后退一步。原来所带的重火器，因敌情与山地关系，成了累赘，多半卸下，也很少有训练整顿的机会。仅靠原来携带的弹药维持作战，且不易作歼灭战，连手榴弹都无法在新区制造。”鉴于这种情况，大别山的主力部队亟待休整与补充。如果这时将主力及时转出大别山，到环境稳定，条件较好的淮西一带休整，对部队的发展将是十分有利的选择。但邓小平认为，陈粟野战军和陈谢兵团经过几个月连续作战，消耗也很大，也需要充分休整和补充。而且，这时陈粟野战军的9个旅正拟转到黄河以北休整，准备整训后向江南发展。陈谢兵团和华野的第三、第八纵队正在平汉线两线休整，准备向豫西作新的机动。如果主力这时出山北进，势必将部署在大别山周围的敌人吸引到北面。这样一来，虽减轻了大别山部队自身的压力，却不利于华野和陈谢兵团的休整，更不利于整个中原战局的发展。从全局考虑，邓小平决定推迟出山的时间。2月9日，他在给中央军委的复电中明确表示：“主力兵团不宜抽得过早，应对粟的机动以配合，故须留在大别山再打一个月圈子。我们指挥所则拟相机移驻，与野后会合布署作战。”

邓小平的意见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后，他一面继续指挥部队作战，一面着手部署主力部队转出大别山后的各项工作。

2月中旬，邓小平将中央军委关于主力要转出大别山的决定告知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要他们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以对付即将到来的严重局面。

2月22日，邓小平亲自起草了《中原局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对主力转出大别山后如何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作了具体部署。指出，为了大量歼敌，野战军主力在培养和扶植了地方游击战争之后，不能长期分散，必须适时集中，出入于大别山外围与内部机动。所以，要求各军区部队与地方人民武装，今后要独立自主地坚持大别山战略阵地，开展更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打击和歼灭分散之敌，以保护群众，保护土改，配合主力部队运动战，大量歼敌。邓小平要求必须“提高全体军民的胜利信心与顽强斗志”，“批评和反对那些软弱无能，依赖主力，不积极歼击敌人，消极等待敌人退走的右倾思想及和平建设根据地的思想”，健全各级游击集团的组织，改进游击战术，使游击战争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根据主力部队在大别山作战及反“围剿”的经验，邓小平要求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在开展游击战争中，必须依据大别山区的特点，遵循以下6条游击战术：

（一）好击必击，不好击就游。而击，必采取进攻的伏击、袭击、急袭，并无防御。游，必采取以弯为直的行动，不可老走一路，不可老驻一地。

（二）以分耗集，以集灾分，声东击西，攻敌不备。

（三）察明敌情，研究规律，捕灭弱敌，防逃断援。在数敌合击之前，靠近一敌，适时转到外线，奔袭弱敌，如敌来近，则伏击之。

（四）在土改中，大胆依靠贫农，收缴地主枪支，武装他们，带领和教育他们游击，肃清地方蒋匪，保卫土地，保卫粮食。（五）保护群众，依靠群众，强化自己侦察，清除谍报网、便农特务，识破伪装，号召群众，破坏公路网和碉堡网。

（六）断绝敌人补给线，夺辎重，捉俘虏。

主力转出大别山之前，2月，敌人在大别山的20个旅又开始对解放军实行盯梢、合围与分区“清剿”，第二、第三、第六纵队与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密切配合，采取适时分散与集中，内外线相配合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对潢川、固始和商城一带的重点合围与“清剿”。在协同主力部队作战的过程中，军区地方武装灵活运动游击战术，注重在实践中提高独立作战的能力，使部队经受了锻炼和发展，为以后独立领导与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当主力转出大别山后的各项工作基本部署就绪以后，邓小平命令各纵队，按第二、第六、第三纵队的顺序逐渐向大别山北部移动，相机转出大别山。

2月24日，邓小平、李先念等率领前方指挥部北渡淮河，在安徽临泉县韦寨与刘伯承率领的后方指挥部及中原局会合。

2月28日，靠近淮河的第三纵队穿过敌人的封锁、包围，转至淮河以北，与第一纵队会合，进入休整。

3月初，位于皖西的第三纵队和位于鄂东的第六纵队亦开始向大别山北部移动。3月下旬，部队在潢、固、商地区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后，遂向北推进，胜利渡淮，于月底到达淮河北岸。

至此，刘邓大军主力全部转出了大别山。

部队从大别山来到淮西，这在一些指战员的思想引起了一阵波动。有人认为这是在大别山站不住了，是前进了一千里，后退五百里。还有人认为，过去部队在内线作战时，十战十捷，仅鲁西南战役就歼敌9.5个旅，可一到大别山，前后才歼敌4个旅，所以，反攻以后胜利不如原来大了。这些错误认识严重地影响着部队的斗志，不解决这个问题，刘邓大军就不能继续完成党中央交给的战略任务。

1948年3月6日，邓小平在临泉县韦寨向野战军直属队干部作《关于反攻形势和整党问题的报告》，针对部队中普遍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特别是如何正确看待主力转出大别山，提出了他的看法。他指出，有些同志认为部队转到淮西，是“前进一千里，后退五百里”，“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甚正确的，是从形式看问题，不是从本质看问题。我的说法是：‘前进了一千里，又前进了五百里’。因为大别山仍然在坚持，并没有放弃，而且今后还更要坚持”。邓小平认为，主力部队转出大别山，不是在大别山站不住，而是“说明大别山的斗争已经前进了一步，前进到当地的人民和部队已经能够坚持大别山，前进到主力已经可以逐步抽出集结机动作战”，而这在前一个时期是不可能的。

针对有些同志对反攻的形势抱着怀疑，邓小平严肃地指出，有这些错误想法的同志，是由于他们缺乏一种从全局出发辩证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只“凭自己的直觉，从一个角落，一个局部来看问题的结果”。他们看问题，“只看到我们这一块，以为消灭了敌人9个半旅以后就不行了，说以前我们找敌人，现在敌人找我们。实际上，我看我们还是行的，起码我们完成了毛主席给我们的战略任务，在大别山建立了继续向

前跃进的战略基地。在大别山和中原地区背住了蒋军南线全部兵力 160 多个旅中大约 90 多个旅左右的兵力，减轻了其他地区的负担，使其他部队得到休整提高的机会。象陕甘宁的部队休整了两个多月，一出来就象老虎一样，一口吃掉敌人 5 个旅，接着华野、陈赓兵团都继续得到胜利，调动了敌人，我们这里的情况也会不同的。这就是说，战略是全国性的，打仗从来有进攻方向、牵制方向，一头担轻一头担重的。第一年的山东和陕北，是担着重的一头，蒋军不惜一切的扭着山东和陕北干，他们背住了。反攻以后，山东轻了，收复 80% 以上的土地。目前整个阶段，是我们走在前头插进了敌人心脏，威胁着南京、武汉，蒋军也必然拼命的扭着我们，我们担着重的一头，也要吃些苦，多走些路，把敌人背住，让华野、陈赓兵团和陕北的部队休整以后，自然会来分担我们的担子。因此，当我们担重的一头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整体，整个胜利是有我们一份的。”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浅出地阐述、分析革命战争的一些复杂问题，这是邓小平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鲜明特色。邓小平的上述讲话精辟地分析了大别山的艰苦斗争对全国战场的胜利所起的重要战略作用，深刻揭示了全局与局部、形式与本质、损失与胜利，后退与前进的辩证关系，对全体指战员的鼓舞很大。许多干部、战士认为，邓小平的话充满哲理，深入浅出，使他们心胸豁然开朗，真正懂得了坚持大别山斗争的重要意义，看到了全国革命的大好形势和光明前途，增加了他们战胜敌人，坚持中原斗争的胜利信心。

第六章 创建中原解放区 从淮西到豫西

1948年春天，接连下了几天雨，中原大地上的所有树木、庄稼、花草都沐浴在这场霏霏细雨中，一片清新、芳香、郁郁葱葱的景象。

潇潇春雨中，邓小平和刘伯承正率领野战军指挥部和中原局机关从淮西向豫西方向转移。

从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经过半年多的作战，全国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战场大量歼灭敌人，取得了反攻作战的胜利。南下中原的刘邓、陈粟、陈谢三军经过艰苦作战，已击破了国民党在中原战场的全面防御体系，迫使敌人转入战略要点的分区防御。几个月来，三支大军在大别山、豫陕鄂、豫皖苏以“品”字形阵势互相配合，协同作战，解放了中原25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了鄂豫、皖西、豫陕鄂、豫皖苏、江汉、桐柏6块解放区，在江、淮、河、汉广大地区站稳了脚跟。

根据全国和中原战局的发展，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1948年南线应以中原战场为中心，中原地区的斗争任务是：继续大量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中原防御体系，发展和巩固中原各解放区，使之早日连成一片，成为解放军继续前进的战略基地。在军事部署方面，中央军委指示，挺进中原的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应逐步集中，在淮河、汉水、陇海路和津浦路之间机动作战，打中等规模或大的歼灭战。

三大主力即将会师，中原的战局和创建中原解放区的斗争都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担负这一重任的中原局，其任务也更加艰巨。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的挑战 and 任务，中原局迫切需要寻找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作为联系各战略区的中枢，以协调指挥各野战军的作战，统一领导中原各解放区的建设和各项工作。

过去，由于大别山形势动荡，敌情不断变化，中原局一直随刘邓野战军主力行动，没有稳定的后方，与各方面的联系常常中断，不便统一领导与指挥。刘伯承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方指挥部和中原局机关转到淮西后，鉴于淮西一带比较富庶，曾打算以淮西作为中原的后方。但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发现敌人对淮西的争夺很激烈，根据地动荡不安，一直处在游击的环境中，这对中原局开展工作，指导各解放区的建设很不利。此外，淮西一带河流纵横，地域狭窄，不便大兵团机动作战。因此，邓小平和刘伯承都主张把中原局领导机关设在豫西。

豫西位于河南的西部，北依黄河，东界平汉，西邻潼关，南至汉水、丹江，境内多山，有伏牛山、嵩山、桐柏山、崤山、熊耳山，还有伊、洛、汝、沙、白、唐诸河流。豫西不象大别山外围的淮西那样富庶，但地域辽阔，水寨较少，山地与平原相间，是个可战可守，能进能退的好战场。如果中原各野战军以豫西为后方，就可以背靠伏牛山和武当山，依托江汉作前进基地，从容向西南发展，威胁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和大巴山防线。从军事上看，豫西是国民党白崇禧、顾祝同、胡宗南三大军事集团的结合部，中原各野战军以豫西为后方，就可利用敌人中原防御体系的这一弱点，抓住其要害，打破其联系，使自身得到长足发展。同时，

又可以起四面策应的作用，除了向南之外，西可以策应西北野战军向西安、潼关方向的作战，威胁关中；东可以策应华野粟裕兵团南渡黄河在豫皖苏一带发展；北可以与华北各解放区相呼应。

豫西位居黄河南岸，隔河与华北解放区遥遥相望，陈谢兵团解放豫西、控制黄河交通后，豫西就成为连接华北老区与中原新区的纽带，尤其是在国民党严密封锁平汉铁路时，豫西与太岳解放区的这条交通要道就更为重要。因此，以豫西为后方，“即可前出，又可后送”，便于加强中原新区与华北老区之间的联系，又有利于指挥整个中原作战。

1948年2月8日，刘伯承在《关于中原指挥机关的转移及淮西区划为中原局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了把中原局迁到豫西的建议，他说：

“我们感到最近两个月来，因领导和指挥上困难很多，大别山斗争紧张，……为了全面领导指挥的便利，是否可以考虑把中原领导机关转移到豫西和桐柏间。那里虽甚贫瘠，但似不象大别山动荡。安置后方及与后方联系，都可能要便利些。”

几天后，2月12日，邓小平在大别山以刘邓名义给中央军委和粟裕发了一个电报：

“根据总的任务，我们三军应确定向西，战役组织应以陈谢、陈唐两部先向西进，吸引敌十师、十一师向西，以便大别山的部队集结，迅速补充新兵，尾十师、十一师之后，并吸引大别山之敌向西进。”

在邓小平提出了三军向西的战略总任务之后，3月7日到14日，先行进入豫西的华野陈（士榘）唐（亮）兵团（辖第三、第八、第十纵队）与原在豫西的陈谢兵团乘敌人主力西调，洛阳空虚之际，发起洛阳战役，歼守敌第二六师，活捉师长邱行湘。17日，因敌胡、孙元良两兵团来援，陈唐、陈谢兵团主动撤出洛阳。4月5日，陈谢兵团再次攻克洛阳，第二次解放该城。4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提出了管理好新解放城市的各项具体政策。

洛阳地扼秦、晋、豫三省要冲，是陇海线中段军事重镇，是联系国民党中原战场与西北战场的重要环节。洛阳为解放军所控制，这就斩断了敌人中原与西北战场的联系，为解放军掌握中原战场的主动权，彻底消灭中原国民党军主力创造了条件。

自从陈谢兵团挺进豫西后，洛阳一直是豫陕鄂解放区的心腹之患。它处在陇海线上，又是国民党的军事重镇，常使豫陕鄂解放区有腹背受敌之危。洛阳的解放，解除了豫陕鄂解放区的后顾之忧。而中原局机关迁到豫西，也会更加安全和可靠。

洛阳战役期间，刘邓率主力在淮西地区完成了休整、补充，于4月初，由临泉地区出发，向豫西方向移动。

开始，敌人没有察觉刘邓大军西行的意图，所以，一路上，未见敌情，部队行军还算顺利。

4月8日，行至上蔡县洪河以东地区时，突然遇到一场罕见的暴风骤雨的袭击。战士们没有雨具，雨点打在脸上象雹子打的一样痛，雨水顺着头发、脸庞直往脖子里淌，顿时，浑身上下湿个透。许多战士经不住

这暴风雨的袭击，被风刮得东倒西歪、摇摇晃晃，举步维艰。还有些人冻得直发抖。几个纵队首长见部队行军实在困难，向刘邓请示，是否等雨停了再行动。刘邓商量之后，正待发布停止前进的命令，突然收到敌人已发觉大军西行意图的电报，国民党国防部汉口指挥所白崇禧已下令驻阜阳的国民党军立即尾随刘邓大军西进，驻信阳地区的张轸兵团由南向北侧击，令胡 兵团的整编第十八军不去洛阳，回师漯河、西平地区堵击，企图阻止刘邓大军越过平汉铁路，进入豫西，与陈谢、陈唐兵团会师。

“情况紧急，部队不能休息了，只有迅速渡过洪河，赶在敌人之前越过平汉路，才能脱离险境。”

“是啊，如果今夜不能渡过洪河，天亮之后，敌人的飞机一定会赶来轰炸，到那时，处境就更危险了。”刘伯承接着邓小平的话说道。接着，他命令部队，继续前进，连夜渡过洪河。

这时，天已经黑了，伸手不见五指。风越刮越狂，雨越下越大，洪河河水上涨，桥早被冲垮了。战士们跳进齐腰深的河水，手挽着手，臂挽着臂，一步一步地艰难地涉过洪河，冒着暴风雨继续西行。

经过这场暴风雨的袭击，不少战士病倒了，有的再也没有爬起来。雨停了，邓小平命令各纵队迅速安置冻病的伤号，休息之后，继续前进。

指挥部刚要进村，敌机便赶来了，满是水洼的道路上炸开了一个个的泥坑。幸好指挥部撤得及时，没有遭受大的损失，只炸死了几头牲口，炸坏了几车物资。

“好险哟，差点给封在村子里。”邓小平一边拍打着满是泥浆的军装，一边笑着对刘伯承说。

4月10日，部队来到平汉铁路。这时，平汉线自陈谢、陈粟两军破击后一直未通车，往返于郑州、许昌、驻马店的大车络绎不绝，熙熙攘攘。部队在遂平县越过于汉铁路，进入豫陕鄂解放区。这时的豫陕鄂解放区，经过半年来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全区建立了40多个民主县政权，成立了豫陕鄂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机构——前委、后委、行署、军区，地方武装不断发展，土地改革、剿匪反霸，发动群众等工作不断取得成绩，解放区政权巩固，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全区正在由创立阶段进入巩固发展时期。

邓小平一边走，一边观察欣赏着豫西的山山水水，田园风光。豫西的地理民情与其它地方完全不同。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豫西的土匪很多，而且活动猖獗。为了安全，这星村村都筑有寨墙，寨

寨都有堞壕，炮楼，宛如古代的城堡。见了这般情景，邓小平不由地想起了抗末期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的那段日子。

1944年4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么，侵占豫中、豫西36座县城。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派兵相机进入河南，收复失地，开辟抗日根据地。

当时，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理书记，主持八路军前方总 部的工作。接到指示，他立即了解了豫西的军事政治状况和地理民情，并着手组建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他对支队领导人皮定均、徐子荣说：

“建立豫西抗日根据地，南可与新四军五师的豫鄂边联结，东与豫皖苏配合作战，北和太行、大岳沟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你们要象一把钢刀插入敌人心脏，牵制敌人西进南下。你们到豫西后，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我相信，只要你们加强团结，发挥集体智慧，任何困难都是可以战胜的。”

一个月后，邓小平又把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林祥找了来，亲自听取了关于支队组建和渡河准备的汇报。他端起煤油灯，

走到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前，仔细研究了渡河方案，确定了渡河地点，然后对郭林祥说：

“豫西民性强悍，不打一点该打必打的仗，群众是瞧不起的。只要你们坚定地执行党的政策，又打一点胜仗，群众就会信任你们，就一定能扩大武装，建立政权，开辟根据地。”

在北方局和邓小平的亲自部署下，皮徐支队迅速渡过黄河，以登封、滎池等地为中心，开辟了豫西抗日根据地。不久，中共中央又先后派了几支武装到豫西，根据地很快扩展到整个豫西沦陷区，东到平汉路、南到伏牛山，北至黄河，西达灵（宝）陕（县），活动范围达近30个县，人口800余万。现在，部队经过的舞阳、叶县等地，就是当年豫西抗日根据地第三军分区的辖区。

到豫西后近一个刀的时间里，野战军指挥部一直驻在叶县以东的郭店镇。这期间，刘邓召集陈赓、谢富治、陈士榘、唐亮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三军会师后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当刘伯承赞扬陈谢兵团挺进豫西后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与刘邓、陈粟大军共同实现了把战争引向国统区的战略意图时，陈赓不好意思地说：

“我们能顺利挺进豫西作战，主要是由于敌人主力被引向陕北、大别山、沂蒙山三大主战场，我们乘虚而入。我们只是刘邓大军的一部分，过去，因作战形势需要，我们在一个地区单独活动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正式归还建制了，归刘邓首长直接指挥。前一段，通讯社、报纸为了宣传，称我们陈谢大军，我陈虚何许人也，怎敢与刘邓、陈粟并列？”

一席话，说得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哈哈大笑。

在叶县，刘伯承主要部署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而邓小平则全面了解中原各方面的工作情况，并着手筹划加强中原局领导，组建中原军区的工作。

登嵩岳一览中原

中原局迁到豫西后，邓小平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强中原局的领导力量，组建中原军区。

邓小平认为，中原解放区地域辽阔，辖区甚大。过去由于我军刚进入中原，各战略区基本处在军事开辟和独立作战的局面中，所以，与中原局的联系甚少。现在，解放军在中原已站稳脚跟，中原解放区已初具规模。今后，要把中原解放区建设成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南下的前进基地，就必须加强中原局对各战略区的统一领导，加强中原解放区的各项建设和工作。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首先加强中原局自身的领导力量。此外，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原的主力部队达30万，加上各军区武装共约50万，不仅作战方面需统一指挥，部队的军需、供给等问题也必须统筹安排，这些都需要有一个能协调各野战军作战和行动的指挥机关。

鉴于上述原因，1948年4月20日，邓小平与刘伯承联名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强调“中原局辖区甚大，领导力量极嫌薄弱”，建议中央调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华东局副书记邓子恢来中原局担任领导职务，同时组建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

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统一和加强对各大区的领导，正在着手进行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统一组成华北解放区的工作，考虑到中原局势正在发展中，中原解放区也正处在巩固发展的关键时期，各项建设和工作，如上改、财粮、生产等都须派最得力的同志前往主持，所以，中央很快批准了刘邓的建议。

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宋任穷、粟裕、李雪峰、陈赓、张际春、谢富治、刘子文12人为委员。建立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李先念为第二副司令员，邓子恢为副政委，张际春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曾希圣为副参谋长。

对于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所辖各战略区的区划和部队的建制，邓小平和刘伯承研究后，也作了适当的调整。

在刘邓率中原局来豫西之前，中共中央考虑到豫陕鄂区战略地位重要，曾决定在此成立豫陕鄂分局，以加强对该区的领导，并派了宋任穷、张玺等同志来豫西工作。中原局机关迁豫西后，邓小平认为，有中原局在此，无需再成立豫陕鄂分局。考虑到豫陕鄂区辖区较大，而豫西和陕南两个区实际上一直处在独立工作、各自为政的局面中，邓小平主张将豫陕鄂解放区划分为豫西和陕南两个解放区，以便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另外，在豫皖苏成立分局，由宋任穷任分局书记。

在豫陕鄂解放区党政军领导人会议上，邓小平亲自宣布了这一决定，并开玩笑地对宋任穷说：

“这里不再需要你了，你就到豫皖苏去吧。”

经过调整，中原局下辖的解放区便由6个增加到7个，这就是鄂豫、皖西、桐柏、江汉、豫皖苏、豫西、陕南。

在军队方面，原晋冀鲁豫野战军改为中原野战军，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九、第十一、第七个纵队，原第十、第十二、第三十八军分别改为桐柏、江汉、陕南军区。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暂归中原野战军指挥。

对于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主要领导人的工作，刘邓商量之后也作了一个大致的分工，即：刘伯承和陈毅主要抓军事和作战，邓子恢主要抓军区和地方工作，邓小平则以极大的精力抓党政工作。

这时，陈毅正在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而邓子恢远在华东，接到中央调令后，他们正在各自作来豫西的准备工作。

进入豫西后，未及洗去征尘，邓小平便首先到豫陕鄂前后委机关驻地鲁山县城驻了半个月，以便通过各种途径，尽快了解中原各方面的情况。

从气势磅礴的大别山，来到青秀透 的伏牛山和嵩山，如同走出一条长长的峡谷，进入一个辽阔的世界。伏牛山群峰巍巍，绵延八百里，嵩山耸立于丘陵之上，如异峰突起。由于两山背靠黄河，面向桐柏、大别、武当，故登嵩岳，大有一览中原之感。邓小平曾颇为感慨地说：

“我们到了豫陕鄂区，算是对中原全貌开始了全面的了解。”他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整个中原有 4500 万人口，现为我控制者约两千万，计有豫陕鄂 700 万（有政权有工作者 500 万），豫皖苏 900 万（能收税的），但 仍是敌来我往的拉锯局面，江汉 300 万，桐柏 200 万。其余一半人 口的区域，极大部分有我部队和政权活动。大别山区斗争仍极艰 苦，但是我们确实已站住了脚，敌人把我们打不出来了。而 4 个野 战纵队抽出后，减轻了人民负担，拖出了 3 个师（十师、二十师、五 十八师），加上最近策略的讲求，更便于大别山的坚持。”

对于中原各区的情况，邓小平作了一个大概的分析。他认为，中原各地区由于敌情、我情不同，大致可分为 3 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敌情严重，解放区处在游击状态的地区，如大别山的鄂豫、皖西，豫陕鄂的陕南。这 3 个区的工作主要是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地方团队，发展地方武装，巩固解放区政权。第二种是已有大片的控制区，解放区比较巩固的地区，如桐柏和江汉两区。这两区的工作且除配合野战军作战外，乘机大量歼灭敌人，扩大解放区。第三种基础较好，解放区已经稳定的地区，如豫皖苏、豫陕鄂的豫西区。邓小平认为，在中原各区中，豫皖苏和豫陕鄂两区最大，人口最多，工作基础最好，很快即可开始建设工作。只要这两个区的工作搞好了，整个中原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就有了基础和保证。所以，在来豫西后的两个月里，他主要是帮助豫皖苏、豫陕鄂两区作了工作布置。

4 月 25 日，邓小平在鲁山县城的天主教堂主持召开了豫陕鄂全区地委书记、专员联席会议。陈赓、谢富治、秦基伟、汪锋、孔从周、裴孟飞等前、后委领导人，还有刚到豫西的宋任穷、张玺参加了会议。在座的大部分是邓小平的老部下，现在又见到老首长，不禁欣喜万分。他们一致要求邓小平能给他们讲讲当前的形势问题。看到大家情绪高昂，邓小平也很高兴，他与大家一一握手，然后兴奋地说：

“这次我到豫陕鄂区来，看到情况很好，这是这里的党政军各同志

努力的结果，也是从去年7月起全国性反攻的结果。大家希望我谈一谈最近的形势，我想，就拿我们豫陕鄂区根据地的雏形已经具备这个事实，也大体上可以说明问题了。”

在和豫陕鄂区的同志们交谈时，邓小平发现，许多干部还不能全面地、辩证地看待反攻后的胜利形势，有些人看到刘邓大军从大别山转到豫陕鄂来了，怀疑是形势变坏了。邓小平认为，有这种错误认识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从全局出发辩证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他尖锐地指出：

“我们有些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

怎样正确看待反攻后的形势呢？邓小平认为首先要从全局出发看问题，要用算帐的方法来加以说明。他说，反攻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只要好好地算算帐，就会懂得的。”

“首先，从战略上我们由防御转为进攻，前进了一千里，占领了4500万人口的区域，经过奋斗已能控制的有2000万人口的地区，其他2500万人口的地区散布着我们的游击战争。在这里，敌人搞不到兵，搞不到粮食。这就是说，在敌人控制的3万万人口里面，去掉了将近六分之一。其次，看看消灭敌人的数目。据最近宣布的战果，全国战场自1946年7月到1948年2月，共歼敌将近210万人，3月份至少歼敌十几万人。这就是说，反攻以后9个月的战绩就已经达到第一年的数目，我们吃了苦头，但是换得了更大的胜利，对敌人的打击更沉重了。从中原三支野战军来看，在鄂豫皖，大别山几个纵队是有削弱，减员约15%，但江汉发展了100%，桐柏发展了50%，豫陕鄂这边发展了100%，豫皖苏也是发展的。所以，从总体上说，力量比过去大了。”

邓小平接着说，许多同志对大别山一定感到是个谜，原先我们占领了20多个县城，后来一个也没有了，野战军主力也从大别山转到淮北去了，这能不能说是胜利呢？我说，这也是胜利了。因为，我们在大别山已经建立了两个军区，普遍地完成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布置，胃下的军队散布在各个角落里，县、区武装政权都组织起来了。事实证明，我们就是游击姿态，也站住了脚。虽然，我军在大别山确实有损失，但正是有了大别山的艰苦奋斗，才有了全国战场的胜利局面。在讲到如何看待局部损失和全局胜利的关系时，邓小平指出：

“现在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所以，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评论战局的时候，第一讲到中原，对中原的成绩估计得最大。”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用了比较多的时间专门讲了中原解放区当前的工作问题。他说，我们要争取三五年内取得全国胜利，就要在当前的战争、土改、整党、工商业、杀人这5个问题上不犯错误。这5个问题都涉及政策和策略，在任何一个问题上犯错误，我们都会失败。目前，中原区这5项工作中的主要倾向是“左”，也有右的倾向，但不是主要的。说到“左”的问题，邓小平十分严肃地指出：

“这个‘左’由来已久，抗战八年，工商业政策就有‘左’，对中

央的有关指示，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未能认真研究执行，结果是打击了我们自己。现在如果不克服‘左’的偏向，就不能把土改搞好，也不能把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好。”对于中原区有些人常常以“左”的面目出现，而实际上是在危害革命工作的表现，邓小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有些人总认为“左”比右好，认为自己最革命。我们说要中立和麻痹地主，以免多树敌，他就说这是迁就地主，是不搞上改了；我们提出要保护地富工商业，禁止乱没收，他就说，不能让资本家剥削。这些口号“听起来是革命思想，一算帐就知道这不是革命思想，并可使革命遭受失败。我大军在中原，几十万人要吃饭，要穿衣，不注意工商业，根本不能维持。”“资本家做生意，当然要赚钱，而且要有剥削，但是一个商号倒闭了，或者我们把它没收了，要影响到比资本家剥削所得多得多的人民的生计。我们要看看自己的脚究竟站在哪里，怎样做才是更好地为群众。”

关于中原区的经济工作，邓小平提出了他的一些具体意见，他说：

“我们要组织自己的经济，供应战争的需要。我们的原则是艰苦奋斗，供给标准如果和华北一样，是完全超过现实可能的，应该依据新区的条件，有个适当的限度。我们的财政要有很明确的政策，很正当的办法，光靠印票子不行。有了统一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再加上华北的帮助，问题就可以解决。在新区，不管哪方面的工作，如果不知道利用私人工商业，就不可能解决供应问题。新区和华北不同，华北有大批的国营合作社，有将近10年积蓄的力量，6年以上的经验，新区则没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所以我们要善于利用原有的私人工商业，逐渐组织自己的经济，在群众运动中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包括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内，一律不准没收，不准停业，如群众分了的，要赶快组织恢复生产。同时，要和商人讲统一战线，争取他们支持我们发行的票子。我们给商人贷款，让商人入股。组织经济不是一天的事，要不断检查税收标准和工商政策，把着眼点放在战争供应和人民生活上面。我们反对投机垄断，也要允许商人赚点钱。没有一定的政策，现实问题就不能解决。”

这次会议之后，邓小平又召集豫皖苏、豫陕鄂两区主要负责人开会，专门研究今后的工作部署问题。他说，要把中原解放区建设好，就必须纠正有些同志认为土地改革可以解决一切的错误思想，而下决心把中原区当前的工作重点放在财政经济、生产、节约、财粮征收，军队供给等方面来。关于发展经济的措施，邓小平提出，一是靠提倡节约；二是靠发行中州票，但须采取稳健发行方针，力求少透支（绝不超过四分之一）；三是大量举办工、农、商业贷款，第一步主要是工业贷款。他强调，在新区，我们自己的经济毫无基础，开始必须利用私人工商业来稳定物价，巩固本币，同时逐步组织国营经济。完全照搬老区的作法是行不通的。

关于财粮供应问题，邓小平的估计比较乐观。从淮西来豫西的路上，他已留心注意到，今年中原区的麦子长势普遍好。所以，他指示各区，在民负可能的条件下，无妨多征一些。他估计，豫陕鄂区可征收100万到120万石，加上工商业税收，可使该区12万人全部自给，并可供野战军3万到5万；江汉、桐柏两区亦能自给，并有可能供给野战军一二万人的负担；豫皖苏产粮更多，如豫陕鄂标准计算，除养活本区7万人外，还可供野战军5万到8万人。他兴奋地说，如果今年麦征、税收、

银行等工作做得好，就可以争取财粮供应的主动地位，实现大部自给，同时，亦可大大减轻华北的负担。

在北张庄

5月下旬，中原局、中原军区移驻宝丰赵官营、北张庄等地。

宝丰位于伏牛山脚下，西部为山区，东部是平原，境内有汝河、石河、净肠河、颍河、泥河诸河流，是个山川、丘陵、河流与平原相间、风景秀美的地方。从洛阳到襄樊与深河的公路蜿蜒南伸，绕过伏牛山、外方山，从宝丰的中部穿行而过，使一向交通闭塞的宝丰一下子成为陇海、平汉两条铁路夹角地区的枢纽，向北可直达陇海线重镇洛阳，向东可直到平汉线商业集镇漯河，向南经南阳与鄂西北重镇襄樊相通，是当时太岳、太行、华北老区通向豫陕鄂和中原各新区的必经之地。

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移驻宝丰后，这个一向偏僻、闭塞、沉默、寂静的小县城顿时沸腾了，特别是距城西北10公里处那片不为世人知晓的小村庄，一夜间突然变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下子来了这么多机关、部队，使往日无人问津的田间小路显得熙熙攘攘，拥挤不堪。

经过堪察，中原局驻在洛（阳）叶（县）公路以东4公里的赵官营，这是个大村庄，中原局直属机关均设在该村，中原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雪峰常住此地，负责中原局机关的日常工作。中原军区司令部及其所属的作战处、机要处驻在赵官营西南的北张庄，军务处和情报处驻在北张庄以东200米的何庄，通讯处驻在北张庄以西几十米的皂角树村。军区政治部驻在北张庄以南1公里处的柳林村。后勤部驻在洛叶公路以西的商酒务。北张庄地处洛叶公路以东2公里处，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它南依土岭，北临小溪，环境幽静，可进可退，是个理想的军事指挥机关所在地。司令部设在该村东北角一所大地主的宅院里，地主早带着家眷逃跑了，只剩下一幢空荡荡的大院子。这家宅院占地7亩，四周寨墙高筑，共有32间房屋，大门处修筑有一座3层炮楼，登上炮楼，可观察望十几里以外的动静，一有敌情，家丁即通知主人从容防范，或上炮楼据险固守。

“嗨，还有炮楼守卫，这家主人好威风哟！”邓小平一进院子便指着那座炮楼笑呵呵地说。

这座宅院有3所过厅，包括东、西、南、北4个院子。刘伯承住在东院，邓小平住在西院。西院是这所宅院中最大的院子，有15间房子，邓小平住在北边那5间堂屋里。东、西两院之间隔有一条通道，顺着通道往北走，出后门，是一片浓荫覆盖的树林，北面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河水清清，炎热的夏天，邓小平、刘伯承和直属队的战士们常常在小河里洗澡，或在树林里乘凉、散步。

从北张庄到何庄之间有一块开阔的空地，是集会和放电影的地方，那时片子不多，经常放映的是解放洛阳时缴获的两部片子，一部是反映美军占领菲律宾的故事，战士们给它起了个名叫《美军的暴行》，另一部是反映大森林自然风光的纪录片。战士中的大多数都是第一次看电影，所以感到非常新鲜好奇，有的战士百看不厌，甚至天下着毛毛细雨，也坐在那里不肯离去。

到北张庄不久，6月14日，邓小平天天盼望的陈毅、邓子恢来到宝丰，他们两人是在濮阳会合后，经太岳解放区，渡过黄河，从洛阳乘吉普车来到北张庄的。邓小平和刘伯承闻讯，欣喜万分，连忙赶到皂角树

村外“十里相迎”。陈毅也是四川人，与刘邓是同乡，3个四川老乡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陈毅曾参加了去年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今年春天又在西柏坡住了一个时期。临来时，毛泽东专门找他谈话，要他来中原调节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的协同作战和中原解放区的党政军工作，并对中原战局的发展及如何争取战争的胜利作了重要指示。所以，陈毅这次来，带来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最新精神和对全体指战员的问候。邓小平认为，让指战员听一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中原战局的评价，对于鼓舞部队士气，取得下一步军事上的更大胜利很有必要。

6月17日下午，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北张庄北边那片树荫里召开会议，听陈毅传达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和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重要指示。会场上摆了几张桌子，上面放了一些搪瓷茶缸，邓小平、刘伯承、邓子恢、李雪峰、张际春、李达等坐在桌边的板凳上，豫西军区、豫西二、五军分区及野战军直属队团以上干部1000多人则分散坐在树荫里。

陈毅清了清嗓子，便开始了他的讲演。

他首先转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中原全体指战员的问候。他说：

“同志们很盼望得到中央的指示，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关心中原部队，因为你们无后方作战一年，战略上成就最大，吃的苦也不少。这次中央给我的任务，就是要我代表中央向中原全体同志致敬！”

他的讲话一开场便抓住了所有在座的指战员的心，把大家的注意一下子都集中到了他的报告上。他接着讲了如何看待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成就的问题。他说：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根据地打仗，即使我们打胜仗，细算起来，我们根据地人民在经济上损失还是不小的。你想想看，在你家里打，打来打去，还不是把你家的东西都打坏了。长期在内线打下去是不行的，老百姓受不了。我们的部队挺进到大别山和中原后，牵制了敌人90个旅，这对西北战场和山东战场的胜利有多大的关系啊。只要从全局看问题，大别山在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反过来说，如果这90个旅压到西北和山东两战场，形势又会怎样，你们是清楚的，那两个战场的仗就不好打了。所以，我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议，要讲记功的话，各地只能记一半，另一半要记在坚持大别山和中原斗争的指战员身上。”

陈毅端起茶缸，呷了一口水，又风趣地说：“毛主席同我谈起刘邓大军作战艰苦，他知道在大别山的部队3月不知肉味，怎么办呢？他说他又不能把华北的肉送到那里去。”

树林里发出一阵阵笑声，邓小平也笑了。

陈毅又向大家传达了党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其实，这次会议的内容和主要精神，邓小平在率领部队坚持大别山反“围剿”斗争时已从新华社的广播中听到了。陈毅除了讲一些会议的精神外，主要强调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他指出：

“可以这样讲，十二月会议是准备胜利，争取胜利的会议。……十二月会议总结了从1946年6月中原战争爆发，到1947年一年又半整个人民解放战争，提出了新的作战方针。特别是根据中原的经验，根据中

原各兵团已站住脚跟，整个形势稳定，来检讨全中国的形势，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毛主席亲自讲，‘我在大别山各兵团没有站住脚，我们不敢开这个会，我也不敢讲这个话，不敢写这篇文章，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蒋介石可以打倒。这篇文章要等一年半载再写。因为中原的部队站住了脚，胜利靠得住，现在我们要开会分析，估计，大胆地写文章，向全国人民号召，准备在几年内取得全国的胜利’。”

在听报告的人中，除了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大部分人没有见过陈毅，只晓得他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有雄辩的口才。现在听了他的讲演，感到果然名不虚传。陈毅讲了3个下午，他的讲演条理清晰，逻辑性强，语言生动，扣人心弦。特别是讲到得意的时候，更是妙趣横生。听他的报告，既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又是一种享受。

陈毅作报告的时候，邓小平一直坐在他的身旁。这几天天热他穿了一件无领汗衫，头剃得光光的，右手总夹着一支香烟。他听得很认真，从不插话，也不与人耳语。有时，他也会被陈毅那特有的幽默所感染，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与陈毅那热情奔放、粗犷爽朗的笑声相比，他显得更加深沉稳健，端庆练达。

7月中旬，陈毅和邓子恢从华东带来的2000多名干部由金明率领到达宝丰。与此同时，刘杰率领的晋察冀南下干部大队1200多名也长途跋涉来到豫西。邓小平十分高兴，与刘伯承、陈毅一同到宝丰周营欢迎他们。在欢迎大会上，邓小平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这些干部是建设中原解放区的宝贵财富和难得的人才，并高度评价“南下干部的到来，胜过10万大军。”

这时，中原解放区日益扩大，解放区的各项建设事业不断发展，这些都急需一大批有知识、有能力、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去领导和开展工作。华东和晋察冀南下干部的到来，暂时缓解了中原解放区干部紧缺的困难。但仅仅依靠从老区输送干部还不能满足中原新区建设的需要。而且，中央已经来电，今后将不再从华东、华北抽调干部到中原来，中原的干部问题应自己设法解决。

鉴于干部需求量的不断增加，邓小平指示中原局，尽快组织人力、财力，筹建各种类型的干部学校，招收中原各地优秀的知识青年入校，经过短期培训和学习，再到实践中去锻炼，以解决干部不足的困难。邓小平说，中原的干部要靠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现在，中原需100万干部，但目前差得远，必须利用抗战时期的经验，大量举办各种训练班，培养本地干部。

在邓小平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原大学、中原军政大学等新型干部学校和各种干部培训班相继成立，刘伯承、陈毅、邓子恢、李达等都常去学校给学生作报告。特别是陈毅，对办大学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常在讨论工作时提及中原大学的事。他曾对中原大学校址大白庄发表了一番议论：

“大者大学也，白者简陋也，连个大学的招牌都没有，这怎么能算个大学呢？我看这是个革命的大学。”

每当陈毅高谈阔论，发表高见时，刘伯承、邓子恢总爱跟他逗趣打乐，而邓小平则默不作声，笑而不语。

自从陈毅住进了北张庄之后，伏牛山脚下这所大院里便增添了不少

乐趣和欢笑。陈毅早年曾攻读文学，后弃文从武，是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著名的儒将。与刘伯承、邓小平相比，陈毅显得更为豪放、粗犷。他兴趣广泛，博学多识，胸怀坦荡，幽默诙谐，与他一起共事，人们都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邓小平十分喜欢陈毅的为人与豪爽，特别是陈毅喜欢作诗，下棋，这很对邓小平的胃口，闲暇之余，杀上几盘，倒也真解乏过瘾。每逢这时，刘伯承则躲在他的房间看书写字，于他的老行当。

继陈毅、邓子恢之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的夫人及孩子们也从华北来到了北张庄，一下子住进这么多人，使原来有些空旷的宅院有些拥挤。邓小平指示直属队的战士们，在院内盖了 3 间房屋，又在东边那个空院里盖了一个八角式的草顶凉亭，专供夏天首长们开会、乘凉、研究工作用。

炎热的夏天，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中原局、中原军区的三巨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坐在那个新盖的八角凉亭里研究工作。他们中一个魁梧高大，一个强壮肥胖，一个矮小精干。正是这 3 个人，在北张庄这个不起眼的小村里，运筹帷幄，指挥着驰骋在中原战场上的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几十万人马，左右着中原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特别是邓小平，他聪颖过人，谋深虑远，高瞻远瞩，对今后中原战局的发展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六六指示》与新区 土地政策的转变

在大别山的艰苦环境中，邓小平曾一面指挥部队进行反“围剿”斗争，一面下最大决心来纠正大别山及中原各区上改中出现的“左”的倾向。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急性土改暂时停止了，“左”的倾向得到了纠正，土改也开始按中央的指示，分阶段、分地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但是，对新区上改的认识过程并没有完结，对土改运动中产生的“左”的倾向的根源还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和彻底肃清，在新区，究竟怎样土改？采取什么政策和策略步骤更符合新区的客观实际，这些问题不断地在实践中提出来。

邓小平率领中原局来到豫西后，环境的安定使他有更充足的时间和条件来总结大军进入中原后 8 个月的各项工作和经验教训，重新全盘考虑新区上改的政策和工作步骤等问题。从 5 月初开始，他即集中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面调查和了解中原各区的上改情况，特别是详细了解中原的两个大区豫皖苏和豫陕鄂的土改情况，使他对中原新区各方面的情况掌握得更全面，更具体和更准确，从而对新区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通过各方面调查，邓小平了解到，中原全区有 4500 万人口，我们业已基本控制的区域大约有 2000 万人口，游击区约 1000 万人口，还有新新区（没有解放军部队）约 1500 万人口，在控制区和游击区的 3000 万人口中，实行了分田的不超过 400 万人口，其余的地方大都只分了浮财。

关于中原各区上改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及其纠正的过程，邓小平也作了详细的调查。他了解到，各区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大体上都延续了两个月左右。今年 1 月开始纠正。各区纠“左”的过程略有不同，但都颇费力。大别山因为干部较多，领导机关又设在该区，“左”得最厉害。特别是 12 月以后，敌情严重，加上大军云集，人民负担很重，故“左”的倾向暴露得也最突出。1 月以后，因环境不许可，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土改，但干部思想并未打通，中央新区土改要点公布后，有些地委、县委不敢传达下去，怕泼冷水，有些领导干部思想上有抵触情绪，直到 3、4 月间才大致获得纠正。皖西区转变较快，收效也较早。鄂豫区因地域太大，特别是区党委本身意见不统一，转变较慢。桐柏、江汉两区开辟得较晚，“左”的时间也较短，故纠正得尚属顺利。豫皖苏区党委对该区工作基础估计过高，总想一次解决问题，所以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直到前不久，才开始转变。豫陕鄂区的一些干部对中央新区土改要点的指示抵触较大，邓小平来豫西时，各县的工作实际上陷于徘徊停顿状态。邓小平在该区地委书记专员联席会议上作了报告之后，一些干部的思想才开始了转变。

听了各地的汇报，邓小平还了解到，各区纠正了“左”的倾向后，在群众中的反映非常良好，大别山停止了上改，停止了乱打人、乱没收后，逃亡的地主、富农纷纷回家；豫西、豫皖苏内地的地主武装也逐渐减少了，集市开始恢复，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报考我们的学校，社会秩序也趋向安定。陕南的群众说：“我们不是马上要分地，土地我们哪个不想，只是不敢分，只要你们不走，不再受国民党拉丁、派款的压迫，两

年内，我们就可以把地赎回来。”

在认真分析和总结了中原各新区的土改情况之后，邓小平开始意识到，在新区，不管是巩固区，还是游击区，马上动手分浮财，分土地都是不适宜的。新区党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动员群众支援革命战争上面。5月9日，他在写给毛泽东的工作报告中初步阐明了他的这种思想。他说，在中原新区，有些同志认为，土地改革可以解决一切，而对于当前的紧急问题，如生产、节约、财粮、征收、军队供应等等重视不够，结果反而陷入被动。经过研究，我们已经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步骤，即将当前的重点放在财经工作上面，而将土改工作推至今冬明春，创造典型，积累经验，训练干部，逐步进行。

几天以后，5月中旬，邓小平亲自召集中原局、豫西、陕南负责人开会，并邀请宋任穷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原局专门讨论了豫西、陕南的工作方针。邓小平和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在新区实行打土豪分浮财，过早实行分土地害处很大。今后豫西、陕南的工作方针应确定为：（一）建立反蒋胡的统一战线，包括一切反蒋胡的地方实力派，在政治上只打击首恶分子及大恶霸最反革命分子和乡保长中最反动的部分；（二）不分浮财，不打土豪，连大地主也不打；（三）实行征借粮食、款子的政策解决军需；（四）保护城市及一切工商业。上述工作方针表明，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和认识，邓小平对于在新区实行怎样的土地政策和策略已经考虑得更加成熟和完善，思想也更明确了。

这时，中共中央、毛泽东和了解新区情况的陈毅、粟裕、李先念、薄一波等也正在西柏坡商讨新区土改问题，他们的意见与邓小平的想法大致相同。根据他们商讨的结果和邓小平的建议，毛泽东终于下决心改变新区农村工作的政策，即变土改为双减，并立即将这一决定首先告诉邓小平。

5月24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改革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只有“在一两年甚至三年以后，在大块根据地上，国民党反动派已被消灭，环境已经安定，群众已经觉悟和组织起来，战争已经向遥远地方推进，那时就可以进入象华北那样的分浮财、分土地的土地改革阶段。”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指示，向全党明确了上述意见。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这两个指示，邓小平于6月6日起草签发了中原局《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即《六六指示》。

《六六指示》近2万字，它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地、全面地总结了党在中原新解放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过程，深刻分析和检讨了土改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根源和危害。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讲的，“《六六指示》对一年来的斗争有全面的基本的总结，写了12条错误和教训。”

这12条错误和教训是：

（一）我们制定的方针和计划，不是从新区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

从主观的愿望出发。不管敌情是否许可。不管群众和干部的准备程度，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苦性，把少数勇敢分子的行动误认为是大多数群众的行动，把大军进入后群众一时的热劲，误认为是多数农民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觉悟和要求，因而不是有步骤有分别地去领导群众，取得胜利，而是轻率地决定实行土地改革。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有害的。经验证明，在军事上还没有取得面的控制，国民党和地富武装力量还没有被肃清，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分配土地的要求和组织起来，本地的正派的区村干部还没有大批涌现出来，外来干部又尚未熟悉情况的时候，就马上实行土改，不仅是主观主义的，而且是冒险主义的。

（二）从领导机关到干部，一般地没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普遍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事实上，新区存在着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的力量，但由于我们打倒一切和一次解决问题的“左”倾思想，把一批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赶到了国民党方面去，并且拿起武装来同我们对立。其结果打击面大，树敌多，不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

（三）普遍实行了走马点火、分浮财的政策。事实上分得最多的只是一部分勇敢分子，大多数群众并未得到或得到很少。此外，社会财富的过早分散和大量浪费，使军队供给很快发生困难，很快地把负担全部加在农民身上，引起农民不满。

（四）违背了工商业政策，没收地富的工商业部分，假借没收官僚资本反动分子的帽子，去没收那些本来不应当没收的工厂和商店；对生产资料的严重破坏，过重的而且是极其混乱的税收办法，严重地破坏和停滞了社会经济，市场凋敝和工商停业的现象极其普遍。其结果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使大量依靠工商业、副业和市场生活的群众，丧失了固有的谋生的道路。

（五）杀人过多，非但不能镇压住反革命的活动，反而增强了敌人的团结和抵抗。经验证明，应以政治瓦解为主，辅之以军事打击。

（六）一般同志到新区后，苦于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急于建设一个后方，安置伤员和机关，也促成了急性病的发展。事实证明，敌情最严重，政策最“左”的地方，更是无法获得后方。

（七）在新政权还未建立起来的过渡时期，不懂得暂时地有领导地利用旧政府来维持秩序，解决军需，结果造成严重的社会混乱。

（八）忽视了宣传工作，如在大别山，不是加强宣传队、剧团、文化工作的组织和领导，而是把这些机构的干部分散去进行土改工作，以致失去或减少了他们的作用。在宣传内容上，只注意土改宣传，而忽视了党的各方面政策的宣传，“左”的口号、“左”的词句掩盖了或减弱了党的正确口号和主张的力量。

（九）对城乡的公共建筑物、工厂、作坊、学校、文化事业、教堂、庙宇，乃至地富的房屋、家具等，作了相当普遍的严重的破坏，至今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的破坏性是反动的罪恶的行为。

（十）外来干部作风很坏，没有大量地培养本地的正派的积极分子成为区村干部，反而提升了一批流氓坏人来当干部，这是我们脱离群众的重要原因。

（十一）进入新区之前缺乏充分的动员和准备，对新区的复杂情况既不知道，又不研究，而是凭老经验盲目乱干，使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十二) 在斗争紧张的地区，一部分干部的右倾情绪也在滋长，甚至怀疑向中原进军的正确性，对党内存在的严重的错误倾向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也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损失。

关于这 12 条错误和教训产生的原因，邓小平在后来的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把它归纳为 3 条，第一条是主观主义，表现形式是经验主义；第二条是没有全盘地考虑新区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搞“左”了；第三条是干部作风不好。他说，为什么“左”了呢？主要是不从客观情况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以为“枪杆子加土改”，半年内就可以解决中原问题，因此有时就不讲政策，不讲策略，不讲方法。实行平分的结果是，地主富农上山了，中农也上山了，地富拿起武装与我们对抗，我们认为地富是反动的，来了个大杀，结果愈杀愈多，愈杀愈坏，我们什么也不好搞了。假如我们搞得稳当一些，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这样地富中是有一部分会到我们这边的，我们也不致有如此大的困难。我们刚到时，一般中小地主并没有跑，由于我们的“左”，才造成这样的困难，有些地方搞得厉害，连人都没有了，这是不是群众落后呢？不是，这是十足的主观主义所造成的恶果。

在讲到“左”的倾向时，邓小平强调政策上犯了 3 个错误，一是农业社会主义，或叫农民社会主义，表现很大的破坏性，造成工商业停业，市场萧条；二是分浮财、开仓济贫，其结果是我们没有了军粮，很快加重了群众的负担；三是乱杀乱打人，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印象。总的来说，是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乱打乱杀 3 条。但邓小平又强调，土改是黄河主流，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说，黄河主流向东流，但产生了 3 个浪花，即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乱打乱杀，总的说即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如不纠正，即会决口，即要改道，即会犯路线错误。

邓小平在《六六指示》中指出：“为了不重复错误，有效地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更早地完成全部解放中原人民的任务，全区应即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财，停止乱没收，禁止一切破坏，禁止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等等现象。”根据前一个时期中原各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以及当前中原的斗争任务，邓小平为中原全区详细规定了 12 条新的农村工作政策，要求各地仿照执行，以调整各方面的工作。

这 12 条政策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 3 个方面，一是规定了控制区、游击区、崭新区的不同的工作方针和策略步骤：

“在控制区，凡是没有分土地的地方，即应停止分配土地的宣传，进行减租减息及合理负担的宣传，立即着手调查研究，创造典型，积累经验，以便在各区党委范围内，制定统一简明的减租减息及合理负担的法令和进行步骤，并据此训练干部，教育群众，准备秋后直到明春，形成一个广泛的双减群众运动。凡是分过土地的地方，则应区别真分还是假分，一大片地区分了的还是只在一些孤立据点分了的，问题多的还是问题少的，而规定出不同的处理办法。一般的原则是，真分的一般应该确定地权财权，不再变动；假分的应该说服群众自愿改为租佃关系，实行减租减息；一大片地区分了的，而又是环境许可群众要求的，则领导群众继续完成分地工作，同时正确地划分阶级和补救缺点；只在孤立据点分了的，则按情况根据大多数农民意见，不再变动，或说服群众改为减租减息。有问题的侧按问题性质，协同群众商量解决办法。”在解决

问题的时候，不应只根据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意见，而应根据农民群众大多数（包括中农）的意见，并且可以吸收在家地富参加讨论发表意见。

在游击区，应在以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对敌斗争为主的方针下，坚决进行反抓丁、反掠夺、反保甲特务统治的斗争，保护基本群众及各阶层的利益，并按照环境及群众要求，适当地实行双减政策，即一般地在地区同意下实行双减，或者比控制区减的少一些，或者先从地富自愿的减起，都是可以的。在负担政策上，则应确实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在分配整个负担数目的时候，不可使游击区比控制区还重，而在两面负担的地区，还应酌量减轻。到游击区抓一把的倾向必须克服严行制止。在游击区应该采取比较隐蔽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力求各阶层团结一致，反对国民党军及土蒋，集中力量打击少数的反动特务分子，切不可过于突出，使群众受到本可避免的摧残。凡是敌人控制力较大的地方，还应采取武工队的斗争形式，实行革命两面政策，以反对国民党正在普遍实行的所谓“总体战”。

在崭新区，我们进入之后，应该采取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和地方上最反动的分子，以便于我们消灭敌人，站稳脚跟。在策略步骤上切不可操之过急。……在政治上要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或联合其较好的部分，中立其动摇的部分，孤立和打击其最反动的部分。切不可打倒一切，帮助敌人团结，把自己孤立起来。在社会政策上，不打土豪，不分浮财，不作经济上的没收，只对个别业已判处死刑的最反革命的分子的本人财产实行政治的没收，并分给群众。而在执行双减政策时，也应经过宣传组织、政府颁布正式法令等步骤，不可毫无准备地贸然进行。在实行适应调剂种子口粮的政策时，不可采取开仓济贫的办法，亦不可强迫地富拿出粮食救济贫民，而应提倡低利或无利借贷的社会互助办法，或者采取由政府从没收或征收的公粮中抽出一部分举办生产贷粮或临时救济的办法。”

二是强调了经济工作，规定了一些具体措施：

“为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以便保障人民生计和支援战争，必须注意领导人民加紧生产，不误农时，不荒地，防止地富怠工和破坏；必须坚决执行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纠正相当普遍存在的轻视城市、放弃城市工作领导的错误倾向。过去城市乡村的工厂、作坊、商店和副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党和政府要用很大力量组织各种专门机构（吸收工商业主、技师和工人参加），研究办法，使之迅漆恢复生产。凡是没收错了的私人工商业的生产资料，如果是军队和政府机关保存的，应无条件地全部退还，如果已分给群众，则应说服群众归还，或由政府用其他东西从群众手中换回发还。凡是应该没收的生产资料，亦应或由政府、或租给私人、或组织群众恢复生产，不得搁置不用，妨碍生产。同时，为了尽快地恢复与发展工商业，政府银行应根据实际情况，举办工商贷款，而集中力量于首先恢复和发展那些对人民生计和军需有密切关系的部分。”

三是在对土蒋、土匪政策，发展地方武装，强化宣传教育，培养本地干部等方面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最后，邓小平十分客观地强调：

“中原的局面虽已初步打开，但在完全战胜敌人，保障几十万大军供给等等方面，困难还是很多的，亟需全区同志认真执行中央正确的政策策略和领导方法，及时纠正错误，增强工作效能，才能不断地克服困难，达成解放中原全区的任务。”

毛泽东看了邓小平起草的《六六指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所以欣赏这个文件，不仅在于它正确及时，而且明确具体。邓小平在起草这个指示时，既能站在全局的高度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和论证，又能从中原各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今后的工作方针和每一项政策、策略加以具体、详细的说明和解释，所以，不难看出，这是一篇具有很高理论水平，有着十分丰富的政策策略思想，又能指导中原各项具体工作的好文章。

讲究实际，注重实践，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大的长处和优点，而这一长处领导创建中原解放区的斗争中，在指导新区土地政策的转变中，以及他所起草的《六六指示》中都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中原解放区和全国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之所以会出现“左”的错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脱离了实际，缺乏具体指导。只有平分土地的方针和政策，而没有与各地区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所以在执行中往往不知所措，出现偏差。邓小平在总结中原新区土地改革工作的经验教训时，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起草《六六指示》时，根据近一年来新区工作的丰富实践经验，对中原解放区的控制区、游击区、崭新区的不同情况，对政权建设、农民组织形式，群众团体、发展生产、工商业政策、地方武装、宣传工作等等，都作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使各级领导干部在开展工作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因而这个指示下发后，立即得到广大基层干部的欢迎，而党的新区农村工作政策也迅速得到落实。

善于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加以系统的说明，并与当地的实际情况密切相结合，在实践中很好地贯彻和落实，这是邓小平与众不同的风格和特点，这也正是毛泽东欣赏邓小平和他起草的《六六指示》的原因所在。毛泽东对《六六指示》亲自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充分肯定中原区在战略进攻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的两段文字。毛泽东认为，中央的5月25日指示所规定的新区工作原则仍需具体化，而《六六指示》正好可以作为中央指示的补充和说明。6月28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信中指出：“中原局指示可以发给中原以外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

中共中央5月25日指示和中原局《六六指示》的发表，标志着党的新区农村工作政策转变认识过程的完结。这一转变过程表明，党中央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它不仅反映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同时也凝聚着一大批各大战略区负责同志的智慧和结晶。邓小平作为中原新解放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本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精神，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政治上的敏锐，在中原新区不断探索，反复实践，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并主动地向党中央提出一些带有战略性的建议和策略，使党中央和毛泽东能及时了解新区的情况，从而在实践中逐步制定出一整套符合新区客观情况，能正确指导新区上改和各项工作的政策和策略，而这与邓小平的实践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指挥三军逐鹿中原

1948年春，中原战场大军云集，战云密布，一场逐鹿中原的大战正在密云不雨中。

1、2月间，国民党为了加强其中原防御，将中原战场重新划

分为第四（菏泽）、第五（信阳）、第六（商丘）、第八（合肥）、第十三（南阳）、第十四（阜阳）、第十五（襄阳）、第二十一（宜昌）等8个绥靖区，组成邱清泉、胡、孙元良、张轸、裴昌会、张淦6个兵团，总兵力有37个整编师，连同非正规军共86个旅、66万余人。这些兵力分属徐州司令部司令官顾祝同、九江指挥部主任白崇禧、武汉行辕主任程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目的是重点摧毁大别山根据地，巩固长江防线，确保江南统治区的安全。

4月，刘邓大军主力从大别山转到平汉路西后，蒋介石对他在中原的兵力部署又作了调整：以十几个旅继续“清剿”大别山；以整编第四十六军、胡璉兵团的整编第十八军及整编第九师分别位于郑州、漯河、南阳地区，监视进入豫陕鄂地区的解放军主力；以张轸兵团的整编第十、第二十、第五十八和第八十五师等部“扫荡”桐柏、江汉地区；以整编第五十六师守备襄阳、樊城地区；邱清泉兵团的整编第五军等部在鲁西南地区监视正在濮阳一带休整的粟裕兵团。

解放军方面，洛阳战役后，刘邓大军主力、陈谢兵团、华野的陈唐兵团三支大军在豫西地区胜利会师，经过短时间的整训和补充，正在寻求新的战机，而华野粟裕兵团也正在积极完成休整，准备加入中原作战。

当时的中原战场，就象一盘布局严密的棋子，牵一发而动全局，一着走对，步步皆胜，一着走错，全盘皆输。

4月16日，中央军委分析了中原形势后致电刘邓：平汉路敌人比较集中，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即将结束休整准备机动，你们“新行动方向是豫西南、鄂西、豫西北及整个汉水流域，歼灭分散之敌，调动平汉线以东之敌向平汉以西，以利粟裕行动。”并指示，到豫西南及汉水流域去的兵力不亦太大，在补充了新兵、弹药、夏衣之后，即可“早日向西南，首先夺取宛西4县，然后出汉水。”

宛西4县指南阳以西的镇平、邓县、内乡、浙川，该区为豫陕鄂三省要冲，北通武关、南傍汉水，唐河、白河、潦河，赵河诸河流流贯其间，是河南省主要产粮区之一。这里封建势力、地主武装强大，全区有28个保安团，是蒋介石亲手扶植的“模范区”。由于宛西处在豫陕鄂和桐柏解放区之间，是解放军进一步向汉水流域发展的一大障碍，所以，刘邓决定，发起宛西战场，首先摧毁解放区中心的这一封建堡垒，巩固中原的后方，控制汉水中段，使豫陕鄂区与桐柏区连成一片。

在接到中央电报的当天，刘邓在叶县以东的郭店镇召集陈赓、孙富治、陈士榘、唐亮等将领开会，研究部署宛西战役。确定由陈赓统一指挥这次战役。具体部署是：以第二纵队、华野第十纵队及桐柏军区主力两个旅为南路军，于5月2日攻击、围歼邓县之敌；以第四纵队第十二旅及陕南地方武装为西支队，于5月2日拂晓突击包围浙川、荆紫关之敌，待主力到达歼灭之；以第四纵队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及第二十二旅、豫陕鄂军区为北路军，围歼西峡口、内乡、镇平、侯集镇之敌。邓

小平对负责指挥这次战役的陈赓说：

“这次战役，是我们三军会师、逐鹿中原的第一步棋，一定要出奇制胜，掌握中原战场的主动权。打下宛西4县，我们的后方就有了可靠的依托，今后，我们主力在中原机动作战，就无后顾之忧了。”

他思忖了片刻，又接着说：

“南阳地区是别挺芳的老巢，别挺芳在此实行‘宛西自治’，多年，对人民很有欺骗性。至今，那里的群众对他仍颇有好感。部队进入南阳后，在宣传和执行政策上一定要讲究策略，坚决执行新区政策和纪律，把工作重点放在打击极少数反动武装头子和地主恶霸身上，避免打击一大片，逐步争取群众。”

战役从5月2日开始，到17日结束。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和保安团队2.1万余人，解放了宛西城镇十余座。从此，中原解放军有了更深的后方，既可向西、西南机动；威胁国民党长江中游和大巴山防线，又便于向东作战，寻机大量歼灭敌人。

宛西战役后，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整完暂不向江南作战略行动，先加入中原作战，以集中力量歼灭中原之敌，粉碎中原敌人防御体系。同时指示刘邓，牵制临颖地区的国民党整编第十八军，使其不能东援，为粟裕兵团渡黄河南下创造良机。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刘邓决定以围城打援的办法组织宛东战役，以第一、第三、第六纵队组成东集团，由陈锡联指挥，佯攻确山，吸引第十八军南下增援，以利于粟兵团南下。以第二、第四纵队、华野第十纵队和桐柏军区部队主力、豫西第七军分区部队组成西集团，由陈赓指挥，协同东集团，在羊册以东地区对由南阳东援的张轸兵团实施夹击围歼。

5月25日，东集团佯攻确山，敌整编第十八军南下增援，张轸亦率3个整编师由南阳东援。当张轸兵团主力行至赊旗镇以南的埠口时，遇到第四纵队的阻击。刘邓遂令东集团主力离开确山，兼程西进，参加围歼张轸兵团的作战，同时令华野陈唐兵团和中野第九纵队阻击敌整编第十八军。

这时，西集团的指挥陈赓鉴于东集团尚未赶到，而敌人队形过于密集不易割裂，所以于29日命令第四纵队主力稍向北撤，纵敌东进，准备在东集团赶到后，夹击该敌。但这一意图很快被敌人察觉。狡猾的白崇禧让他的参谋长在电话中故意对张轸说：“确山形势危急，你们明天拂晓必须东进，以解确山之围。”张轸回答：“我们坚决东进。”然后，白崇禧的参谋长又用日语说：“确山敌人主力一部已向西前进，宛西敌主力全部东进，你们立即回南阳。”张轸也用日语说：“我们立即回南阳。”当时，陈赓的监听人员不懂日语，只将对话的前半部分报告陈赓，而用日语对话的情形却未向陈赓报告，致使陈赓作出敌人要继续东进的错误判断。

31日凌晨，当陈赓命令部队东进的时候，张轸兵团却突然掉头向南阳逃跑，西集团猝不及防，又未能按计划在南阳、赊旗镇之间切断张轸兵团与南阳的联系，结果造成张轸兵团向南阳逃跑时无人阻击的局面。

当时，中野司令部有人懂日语，发现敌人回逃南阳的企图后，立即报告刘邓，但陈赓指挥部已开始向东行动，电台撤收，无法联系。

6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亲自赶到陈赓的指挥部——南阳附近的彰新庄。刘伯承一进门便火冒三丈地说：

“怎么搞的嘛？部署的好好的，全乱套了！”

邓小平看着陈赓一语未发，但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他对没有组织好这次战役也十分生气。

当刘伯承了解到陈赓在发现张轶西逃后，已采取了应急措施，将敌人后卫部队分割包围在南阳以东的马刘营地区时，他的火气才平息了些。

6月2日，退回南阳的张转兵团全力回援，遭到第四纵队坚决阻击。3日，全歼被围于马刘营地区的五十八师师部及第一八旅，战役遂告结束。

宛东战役历时10天，歼敌1万余人，虽完成了掩护粟兵团渡河南下的任务，但未达到全歼张轶兵团的预定目的。事后，陈赓主动承担了责任。刘伯承在总结这次战役的教训时指出，西兵团迷于敌人表面现象，误认为张敌东进，也没有照顾到我东面有东兵团，于30日黄昏将其主力东进到羊册、郭集地区，欲由南北夹击防敌东逃，因而放松了极重要的西面兜击，使张轶得于31日拂晓向西逃走，此为未全歼张敌的重大失着。

宛东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于5月31日渡过黄河南下，进入鲁西南、豫东地区，参加中原作战。

中央军委分析了中原地区敌人兵力部署情况，确定中原地区夏季作战的重点是各方协助粟裕兵团歼灭第五军。中央军委估计，只要第五军被歼，便取得了集中最大力量歼灭第十八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

据此，刘邓令华野陈唐兵团归建，向豫东急进，以加强粟裕兵团在鲁西南歼第五军的力量。同时，为吸引张轶兵团及胡璉兵团向西、向南，以减轻粟裕兵团在鲁西南行动之顾虑，刘邓商议决定，发动老（河口）襄（樊）战役。邓小平对当时中原战场的这一形势作了一个精辟的概括，他说：

“华野主力在豫东展开打，中野主力在平汉线牵住南线敌人兵团，然后我们乘敌不备，出‘边车’袭取襄阳！”

6月5日，刘伯承在南阳彰新庄召开中原军区高干会议，初步提出了进行老襄战役的意见。此时，邓小平正在北张庄起草《六六指示》。当刘伯承通过电话告诉他会议已经统一了进行老襄战役的意见时，邓小平高兴地说：

“既然大家已经统一了思想，就请师长先进行一些部署，待您回到宝丰后，再详细研究具体部署。”

6月9日，刘伯承和李达回到宝丰北张庄中野司令部，邓小平也完成了《六六指示》并已上报中央，可以全力以赴指挥老襄战役。13日，刘邓下达了老襄战役基本命令。

14日，陈毅、邓子恢抵达北张庄，并一同参与战役指挥。这时，粟裕来电，鉴于邱清泉兵团队形密集，难以分割歼灭，而陈唐兵团已到达唯县、杞县之间，距开封仅一天路程，开封守敌又弱，故改变了原定在鲁西歼灭第五军的计划，决定先攻取开封，调动邱兵团来援，再于运动中歼灭援敌。

看了电报，刘陈邓从全局出发，决定暂停进行老襄战役，并急调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和华野第十纵队全力阻击敌第十八军及第二十八师等部，集中兵力保证开封作战的胜利。开封是中原战略要点，河南省省会。守敌为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部，第十三旅、河南省保安第一、第二旅等部，共约3万余人。陈赓兵团于6月17日发起总攻后，至22日，全歼守敌，击毙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攻占开封。

开封是解放军在全国攻克的第一个国民党的省会，蒋介石闻讯，惊慌万分，急令邱清泉兵团由兰封西进，区寿年兵团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企图重占开封，寻求决战。据此情况，粟裕决定放弃开封，以一部兵力牵制邱清泉兵团，以一部兵力割断邱、区联系，而主力则集中于杞县以东、以南地区围歼区寿年兵团。粟裕将此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和刘陈邓，并希望刘陈邓派兵阻击北上之敌。当时，刘伯承、陈毅正在襄城西北第四纵队驻地召开团以上干部会，研究夏季中野各部的作战任务。邓小平在北张庄接到粟裕电报后，速与刘陈电话联系，主张中野各纵全力阻击南线之敌，确保华野在睢杞地区歼灭区寿年兵团。

27日，邓小平以刘陈邓名义给粟裕发了电报：同意粟裕作战方案，中野以一部监视十八军，并主动攻击北追之吴绍周兵团，以吸引十八军回援。当晚，刘伯承、陈毅返回北张庄，与邓小平一起研究配合华野作战，牵制和阻击沿平汉路北援之敌的行动方案。29日，刘陈邓组成临时指挥所，亲赴前线指挥，组织中野各纵队，成功地阻击了张轸、胡璉、吴绍周3个兵团，有力地保证了粟裕兵团的作战。

这时，睢杞战场正打得难解难分。华野主力于6月27日晚发起总攻后，至29日晨，将区寿年兵团包围在龙王店及周围地区，战至7月2日，区兵团大部被歼，区寿年和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被俘。

开封、睢杞战役是敌我主力在中原进行的一次大会战，华野在20天作战中，共歼敌十万余人，给中原战场的敌人以沉重打击。在睢杞战役即将结束时，刘陈邓见中原战场的国民党军主力都被蒋介石调至豫东，而汉水中游的襄阳、樊城、谷城、老河口等地则势孤力薄。遂令一直监视襄樊之敌的第六纵队，于7月2日发起襄樊战役，夺取川陕鄂三省要冲襄阳、樊城。

襄阳城北依汉水，与樊城夹水相望，城南及西南是一片山区，有万山、真武山、琵琶山、凤凰山、铁帽山、扁山等，是襄阳城的天然屏障。因此，素有“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之说。

7月8日黄昏，刘陈邓率指挥部回到北张庄，全力指挥襄樊战役。

担任主攻襄樊任务的是中野第六纵队，在讨论攻占襄阳的方案时，邓小平对六纵司令员王近山说：

“打襄阳要纵观全局，通盘计划，象割肉一样，先割哪块，后割哪块，割肥的，割瘦的，心中要有数！”

刘伯承嘱咐王近山要多动脑筋。他说，在一定条件下，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拿下这一点，全盘就好解决了。选择何处下手，要靠自己动脑筋判断了。

王近山是个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他依据刘邓的指示，仔细观察了襄阳的敌情、地形，制定了“撒山打城，主攻西门”的作战方案。事实证明，这一方案是完全正确的。

固守襄阳的敌人企图依托坚固设防的南山，坚守襄阳，等待援军，但王近山指挥部于 10 日攻占了万山、琵琶山、真武山、铁帽山之后，一反历史上取襄阳必失夺南山的惯例，以一部兵力牵制南山之敌，主力则从东、西两面突然攻城，迫使南山之敌仓促撤至襄阳城内。15 日夜，解放军发起总攻，从东、西两面突入城内，16 日攻克襄城，活捉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

襄樊之役，歼敌 2 万余人，解放了老河口、谷城、南漳、宜城、襄阳、樊城等地。捷报传来，从不轻易表扬人，特别是不表扬高级干部的邓小平，兴奋地称赞道：

“王近山有两个难得，一是别人叫苦的硬仗，他能主动要求去打，这是勇；二是打硬仗有讲究，这是谋，二者兼得。”

襄樊战役是逐鹿中原全局中的一着好棋，无论从战场的选择，战机的捕捉，战役的部署与指挥上，都充分体现了刘伯承、邓小平综观全局，注重谋略，机动歼敌的军事思想。特别是攻襄阳，作战方法不循规蹈矩，不墨守成规，而是因时、因地、因敌而制胜，从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朱德总司令曾赞誉襄樊战役为“小型模范战役”。

后来，邓小平在总结部队分遣与集结的运动时指出：“我们常常也可以主力监视敌人，而一部出敌不意，寻求良好战机，如襄樊战役即其一例。”

襄樊战役的胜利，其意义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作用。襄樊是蒋介石惨淡经营了多年的军事重镇，自誉“铁打襄阳，固若金汤”。在襄樊战役中，襄阳城一夜间变成一片瓦砾，蒋介石派去坐阵指挥的“王牌将军”、国民党中央常委康泽兵败襄阳，做了解放军的俘虏，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强烈反响。逐鹿中原，鹿死谁手？国军能不能打败解放军？将来个人的归宿在哪里？这一连串的疑问象阴云一样笼罩着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蒋介石第一次发现，由于襄樊战役失利，在他的最高决策圈内，开始出现了一种潜在的危机和裂痕。

襄樊战役中，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被俘，在全国人民中也引起强烈震动。康泽是蒋介石的心腹之一，黄埔第三期学生。长期从事特务活动，是蒋介石的“十三太保”、“四大金刚”之一，先后任复兴社中央干事兼宣传处长，三青团组织处长，控制着蒋介石集团许多部门和地方的实权，是反共屠杀人民的大刽子手。康泽落入解放军之手，使全国各阶层人民，特别是青年拍手称快。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中共中央祝贺襄樊大捷的电文说：

“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对于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兴奋。”

邓小平在评价襄樊战役的作用时说：

“襄樊战役的胜利，其政治意义不亚于军事意义！”

经过宛西、宛东、开封、睢杞、襄樊几次作战，国民党在中原战场的分区防御体系也被粉碎，敌人虽然还能集中一些兵力与解放军作战；但只有郑州、开封、南阳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解放军已经完全掌握了中原战场的主动权。

在上述战役期间，中原各战略区得到巩固和发展，鄂豫、皖西两区广泛开展了游击战争，不断粉碎敌人的“清剿”，开始由山地转向平原

作战。陕南区以剿匪反霸为中心，坚决打击最反动的恶霸上匪头子，发动了群众，巩固了政权。桐柏、江汉两区因野战军主力一直在该区活动，除配合野成军主力作成外，乘机大量消灭了地方团队，扩大了解放区。豫皖苏、豫西两区比较巩固，入夏以后，以保麦、剿匪为中心，共剿灭地方团队4万余人，进一步巩固了解放区。

中原战局的胜利发展，预示着举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加强党的建设 增强组织纪律性

襄樊战役后，中原战场一片平静。中原局，中原军区利用这个时机，抓紧休整部队，并在全区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整党、整军运动。

其实，整党整军的任务早在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上就提出来了，由于中原解放区刚刚建立，各战略区一直处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中原局没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对各区的工作又缺乏统一的、直接的领导，所以，整党整军的工作仅在一些部队中初步开展，如1948年1、2月间，陈谢兵团在叶县地区开展了以诉苦、三查（查阶级、查斗志、查工作）、三整（整思想、整组织、整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3月，刘邓大军从大别山转到淮西地区后，也以此为内容，在部队中开展了整党整军活动。这些查整活动克服了部队中普遍存在着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现象，对于提高全体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增强对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两次查整工作的重点只局限在营以下部队和中下级官兵，并未触及团以上高级领导干部，而各解放区的地方党委也只是传达一下文件，了解一些主要精神，并没有具体贯彻执行。

中原局到豫西后，在叶县郭店召开了旅以上干部政治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开的时间很长，从5月4日开始，到5月31日才结束。其间，野战军司令部不断转移，从叶县到宝丰的杨岗、焦柚、柳林，政工会议也随着一边行军，一边开会。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总结坚持大别山斗争以来部队的政治工作经验，讨论部队的整党、建军等问题，会议认为，目前部队中仍普遍存在着纪律松懈、作风涣散等不良倾向，要求各级指挥员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全力克服和纠正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和现象，搞好部队整党工作。5月23日，邓小平于宝丰焦柚，在政工会议上作了关于政策问题的报告，强调正确执行政策对于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作用，要求每一个指挥员树立政策观念，纠正各种错误倾向，使党的各项政策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

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邓小平发现，不仅部队中存在着一些思想问题，作风问题，中原解放区的各地方党委中也普遍存在着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而且这些现象相当严重。他在《六六指示》中指出：

“由于反攻后处于比较紧张和分散的情况，各个区域的工作不能不带着较多的独立性。但因此而发展了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对党的政策和策略相当普遍地缺乏严肃的负责的态度，工作的松散、迟缓和效能之低，领导机关的放松领导和放任各种错误倾向的自由主义，都达到了相当惊人程度。”

当时，邓小平代表中原局提出了克服无纪律状态无政府状态，克服领导机关的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纠正错误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但由于中原解放区自5月以来一直处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接连发起宛西、宛东、开封、睢杞、襄樊等重大战役，各区都以组织故勤，支援前线为中心工作，所以，整党整军工作直到现在才提到议程上来。

7月28日至8月7日，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宝丰县城文庙召开团以

上军政干部会议。会上，陈毅传达了党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邓子恢报告了新区政策问题，指出全区要克服困难，进一步贯彻新区政策，搞好财经工作和支援前线的工作。刘伯承作了关于整党整军的报告，要求中原全区以一个月的时间深入开展整党整军运动。

邓小平参加了宝丰会议，但没有讲话。会后，他便动身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

当时，全国的战局发展很快，正处在战略决战和即将取得伟大胜利的前夜，各个战场不断取得胜利：中原、华东野战军粉碎了国民党中原防御体系，解放了中原战略要地洛阳、开封、襄阳等地；西北野战军于3月取得西北大捷之后，又于4月22日收复延安；东北野战军经过3个月冬季作战，歼敌15万，解放四平街，迫使敌人龟缩在沈阳、长春、锦州等几个城市。山东战场经过攻势作战，已把敌人围困在济南、青岛、临沂等地；华北野战军解放了除北平、天津、张家口以外的全部地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到9月，解放区面积扩大到235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1.68亿，拥有大中小城市586座，解放军总兵力发展到280万。此外，解放区的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空前高涨，这一切表明，国共两党各种力量的对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夺取全国胜利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战略决战即将展开，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共中央必须迅速改变过去根据地和解放区长期各自为战，各行其事的状况，把一切可能集中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过去，各根据地和解放区长时期处在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对敌斗争的需要曾经使中共中央允许各地方党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有很大的自治权，这种状况，虽使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困难局面，但同时也产生了某些地方主义、山头主义，无纪律和无政府现象，如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将自己管理的地区看成是一个独立国，不向中央请示、报告等等。

为了迅速克服党内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中共中央对各解放区的统一领导，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中共中央于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围绕“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这一中心，讨论了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纪律性的问题。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集中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以便达到全党、全军在方针、政策和行动上的完全统一。会议还提出了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的时间里，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

在西柏坡，邓小平时常惦念着中原局的工作。9月6日，他给中原局写了一封信：

“我们正在开会，这次会议解决问题颇多，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毛主席在几次会议及谈话中，提出全党当前任务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提高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四句话，但强调指出提高纪律性，即克服全党严重存在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为保障前两任务及革命胜利之中心环节。”

邓小平建议中原局立即着手写出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总结和检查，结

合正在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在全区深入开展一次以加强纪律性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教育。

10月上旬，邓小平从西柏坡回到宝丰北张庄。他发现，在他离开豫西的这段时间里，中原各区的面貌正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9月4日，中原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贯彻中共中央自1月以来有关加强纪律性的一系列指示，研究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各项措施。9月6日，又作出《关于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并建立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原局首先检讨了自身的问题，认为过去“没有把各级不作报告以及其他方面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提到原则的高度，没有把他看成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相反的采取自由主义的容忍态度，这是极其错误的。”在中原局的带动下，中原各区党委专门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有关指示，组织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反复讨论，深刻检查。在集中学习，人人对照检查的基础上，各地将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与整编党的队伍和贯彻中央新区政策相结合，将提高纪律性，建立请示报告制度与改进干部工作作风相联系，从思想上、作风上、工作方法上深刻检讨了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各种表现，正在收到良好的效果。

在这一个月里，中原野战军各部队开展了以检查团以上领导作风为重点的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各纵队集中团以上干部，在纵队党委领导下，按照纵队、旅、团的顺序，对党委领导、指挥作战、政治工作等方面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经验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满等现象展开了深刻的揭露和严肃的批评，从而改进了部队领导的作风。

这时，各区的整党工作还没有全面铺开，有的区写出了关于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书面意见，有的区正在组织学习讨论。豫西区离中原局最近，各项工作也开展得最快。在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结束的当天，豫西区党委便在鲁山县程村召开了全区各地、县委干部参加的扩大干部会议，集中整党与贯彻“夺月会议”精神。邓小平回到宝丰的时候，豫西区扩大干部会议已经开了近一个月，通过24天的检查总结工作，正在制定今后的工作方针与任务。邓小平决定到鲁山去看看，一是通过豫西区扩大干部会议，了解一下近两个月来中原各地的整党情况，二是尽快地把中央“九月会议”的精神传达下去。

鲁山位于宝丰的西南，相距20多公里，这是一个山川如画、风光秀丽、物产富饶的山区小县城。由于交通方便，邓小平常常到鲁山检查工作，有时骑马来，有时乘汽车来。驻在鲁山县城的豫西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负责人也因该区“近水楼台”，能常常得到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的指导与关照而感到自豪与骄傲。

邓小平最后一次到鲁山是7月中旬，那时，豫西军区正在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重点解决清剿土匪和整顿部队的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根据豫西近一个时期有些同志思想上麻痹放松、丧失警惕，而上匪活动猖狂，不断破坏、袭击解放区政权的情况，他着重讲了如何提高警惕，整顿部队，发展武装，加强对敌斗争的问题。他说，豫西是中原的初步根据地，武装发展很大，这一胜利是各战场配合

的结果，但在发展中存在着很多缺点，如近两个月来，政治上失掉警惕，使敌结合上蒋向我们袭击，遭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如果思想上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的工作就不能前进，如果继续麻木不仁，就会吃大亏。

这次会议以后，豫西区党委和军区狠抓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全面整顿队伍，大力清剿上匪，坚决镇压极少数最反动分子，打击了上匪的嚣张气焰，使之隐匿山区，再也不敢公开活动。10月15日，在鲁山以东十多里处的程村，邓小平受到正在参加豫西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的各级领导干部及农民代表近500人的热烈欢迎。过去邓小平虽常到鲁山来，也多次在豫西区党委召开的会议上讲话，但那些会议都只开到地委级，象这次开到县委、区委级的扩大干部会议还是第一次，所以，来开会的许多基层干部都是第一次见邓小平，因此显得特别激动。

会场设在程村边的柏树坟，这里松柏参天，浓荫覆盖，宽敞幽静，是个天然的会场。

邓小平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走向那只有张桌子，上面摆了茶壶、茶碗的简陋的主席台。他用眼睛扫视了一下会场，然后开始了他的讲话：

“同志们，我传达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精神，这个传达报告共讲九个问题……”

邓小平首先讲了“七大”以来党的成就，讲了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以及“九月会议”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内局势的发展提出的战略任务，然后着重讲了提高纪律性的问题。他说：“要保证我们战略任务的完成，中心环节是提高纪律。过去无政府无纪律的状态已到了不可忍耐的程度。一年来我们基本上克服了或正在克服着。拿中原来说，即要作为一个中心，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均要掌握，八九个月内要解决此环节。全党意志、思想、行动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要消灭党内怪头怪脑的违反纪律的现象。无纪律表现在许多方面：自订方针、自提口号、自作主张，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两套作法，向上报一套，向下讲一套，公开一套，秘密一套，并包括山头主义、地方主义。……提高纪律性，就是要克服山头主义及地方主义，违反即要按党章办事。”他接着讲了建立报告制度的问题：

“提高纪律性，一定要有报告制度，县以上（县委、县长、县武装负责人）均要作书面报告，或两月一次，或一月一次。口号是‘空口无凭，立字为证’，黑字写在白纸上，要用脑筋，不能乱写。文字要斟酌，县委、地委作报告，总要开县委会、地委会讨论，提倡用思想研究工作，可以避免工作中的盲目性。过去干了二三年工作，还不知道作了什么事，报告到上级就可以帮助发扬其好处，纠正其缺点，可以了解下面情况，这就是考一下的意思。”在讲到写书面报告的时候，邓小平举了他自己的一个例子。他说这次到西柏坡开会，毛泽东要他把进军中原一年来的工作和经验作一详细总结。他原想偷个懒，口头作个汇报就可以了，所以从中原出发的时候什么也没写。谁知毛泽东硬是不放过他，非要补写出书面报告。无奈，他只好花了几天时间，在会议开始前赶写了一份综合报告，这就是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的《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

意见》一文。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要学习毛主席的工作作风，欠了债，就要补，一年前的要补，即使是一百年前的也要补。

结合豫西区干部多，部队多，工作不协调统一的实际情况，邓小平讲了如何提高纪律性，统一全区干部思想的问题，他说：“中央这一次把提高纪律性作为解决一切战略任务的中心环节，不抓住这一个中心环节，其他一切无法保障。如豫西有的地委，你要双减，他要上改，区党委的指示下去可以改，胆子大，有‘勇气’。经中央批准的双减及合理负担政策，立了字还要改，真是无法无天！完全违背了共产党员的纪律。豫西有各地来的干部，有晋冀鲁豫的，晋察冀的，华东的，有先来的，中来的，后来的。军队有四纵队、九纵队、三十八军，各军下配有各旅，还有各部门的本位。如不提高纪律性，有什么办法统一？过去领导上打通思想，照顾山头是必要的，拿到今天统一全国胜利局面下即要犯错误，以此态度来保障此环节不可能。越是无纪律越要抓得紧，同时还要反对地方主义。这样多的地方与部分，如何捏弄来？只有一个路线、一个原则、一个思想才行，要有毛泽东思想。合乎此原则即对，不合乎者即不对，提出后不转变，是自觉的犯错误，规定做报告而不做，多次修改决议，都是自觉犯错误。……过去还带部分的盲（目）性，现在中央指出了就不能再犯。同时又要反对游击主义，即转游击为正规，军事上要提高战术，要有铁路、公路来保障战争，单靠骡子大车不行。其他方面亦要正规。一个步骤、一个决议、一个法令要贯彻到各方面。反对游击主义，要统一帽花、统一番号，过去番号名目好多，一纵、二纵，帽花自己可以设计，简直不像样。中央现在正搞这一套。人事问题上，不论地方或军队的干部不能随便委派，过去有私人委团级干部的。一定要按哪一级干部由哪级批准办事。另外要写决议、写文件，一个方针必须以文字为根据。”

邓小平的批评尖锐、深刻、一针见血、毫不留情面。他的讲话把豫西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引导到以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组织纪律性为主要内容的第三阶段，使这次整党更深入，更彻底。

通过这次整党整军，中原各级领导干部思想上一直存在的不同

程度的“左”的倾向和错误认识得到了彻底纠正，它不仅促进了中原局对全区的统一领导，保证了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而且增强了党和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调动全部人力、物力、财力，举行战略决战，全部解放中原，作了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充分准备。

总结中原新区经验

1948年8月24日，夏末初秋的西柏坡，风和日丽，秋高气爽，从田野里吹来的阵阵凉风中夹着丝丝浓郁的庄稼的清香。

邓小平坐在他临时宿舍里靠窗子的那张桌子眼前正奋笔疾书：

毛主席：

兹写出中原各区纠正左的转变过程及进入新区的若干经验，作为我向你的七月份报告。

邓小平是几天前从中原长途跋涉来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现在，会议正处在紧张的筹备阶段，但会议的主要精神和内容已透露给了前来开会的每一个人，以便大家互相切磋，交流意见，在会前统一思想 and 认识。

从硝烟弥漫的中原前线来到中共中央的大后方，邓小平感到无比的轻松、惬意。在西柏坡，他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还见到了徐向前、聂荣臻、滕代远、薄一波等老战友和各战略区的负责人。交谈中，大家无不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而高兴。特别是，战略决战已迫在眉睫，中央向全党提出了争取在大约5年（从1947年7月算起）的时间里，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胜利的战略任务，更使他们激动不已。几天来，邓小平一直处在极度兴奋的状态中。来到西柏坡后，毛泽东已找邓小平谈了几次话了。有时在毛泽东的办公室，有时在野外。毛泽东喜欢散步，闲暇之余，常沿着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到村外走走，邓小平有时也跟随左右，一起聊聊天。交谈中，毛泽东对中原战局的发展以及中原解放区的巩固和建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很认真地听邓小平汇报每一项工作，还不时地提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不止一次地赞扬邓小平：“中原的工作搞得很好，搞得很好哇。”他还在一些公开的场合高度评价中原部队的战略作用；“没有中原军的南下，东北、西北、华北的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对中原战略的伟大作用认识不足，是机会主义的观点。”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毛泽东对中原新区工作的赞扬和评价，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表扬中原工作本身，而是有着更深远的意义，毛泽东在考虑和谋划下一步的战略行动。当时，中共中央已下决心争取5年内彻底打垮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所以，毛泽东正在考虑，在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之后，解放军如何打过长江去，如何在广大的江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建设解放区。他认为，中原解放区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里，由国民党进攻华北解放区的战略后方变成了解放军的巩固的解放区，而且正在成为解放军继续南下的前进基地，这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事实。中原解放区在其成长、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有过不少艰难曲折，走了不少弯路，但也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今后二三年内夺取全国胜利，建设更多的象中原这样的解放区是无价之宝。所以，毛泽东专门把邓小平从中原叫到西柏坡来，除了要他参加政治局会议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详细汇报中原新区一年来的工作，认真总结其经验，以便研究和指导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毛泽东嘱咐邓小平，只作口头汇报、总结不行，要在开会之前写出书面报告来。这几天，邓小平的思绪越过千山万水，又回

到了那遥远的中原新区。他沉思良久，决定从两个方面来汇报中原新区的工作，一是中原区纠“左”的过程，二是提出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前者在他所起草的中原局《六六指示》中已作了详尽的叙述，这里只是一个概括的总结，而后者则是他写这一报告的主要内容和重点。根据中原一年新区工作的经验，邓小平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今后部队进入新区的七点意见。

一是关于出动前的准备问题。邓小平认为，部队出动前的准备工作，应包括思想、组织、政策、军事和经济各方面的准备。他举例说，刘邓大军主力南进时因缺乏准备，所以吃了很大的亏，而第十纵队因为出征晚，作了深入的动员，南进后部队情绪一直很好。因此，他认为，部队出征前，在思想上要向干部战士说清楚，划清革命不革命的界限，鼓舞士气和信心；在组织上，要有足够数目的干部随军行动，这些干部都须经过任务、政策和作风的训练；在军事上，要有适合山地战的组织和装备以及山地战术的训练；在经济上，要使部队进入新区后不致马上发生供给困难而破坏政策和纪律。此外，应在于部中进行关于新区政策的教育。二是关于展开问题。邓小平指出：“进入新区之后，首先的任务是打胜仗，占地盘。两者分不开，但是有矛盾。要占地盘，不能不分散一部兵力乃至削弱一部主力，减少野战力量。但不占地盘就没有后方，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发动群众，就无法供应军需，就不能使敌分散，也就不好打仗，故分遣适当兵力，展开占地盘是非常重要的。中原曾不顾削弱主力兵团抽出很大兵力展开，建设军区、分区和县于队，今天证明是成功的。”根据江汉、桐柏两区的经验，他又提出：“今后到新区，最好事先区分野战军和军区，每个军区为一单位，配齐军区、分区、县等三级党政军机构（包括部队），组成临时支队，一烙展开，收效必快。”

三是关于作战问题。邓小平认为，“在进入初期，特别要掌握住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我军主力不可轻率作战，因为如果受挫，极易陷于被动，小则大批减员，大则被迫离开。最好采取宽大机动，寻歼弱敌，既可因胜利而巩固信心，又可逐渐熟悉地形及其作战条件而使上下增加把握。一俟敌情地形熟悉，军区及地方工作铺开，伤兵有地方放，再进行一些较大规模的歼灭战，比较稳当。”邓小平还认为，部队到新区作战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分遣与集中的运用问题。他说：“我们区分野战与军区两套的办法，以野战军集中打大仗，以军区部队分遣占地盘，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和打小仗，这就解决了一个主要的分遣与集中的问题。”此外，野战军和军区部队也各有一个分遣与集结的问题。野战军以分遣来分散敌人，造成敌之弱点，而后适时集结歼其一部。军区部队则应以集中力量消灭敌之军事力量为原则。

邓小平在指挥部队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时候，正是运用了上述各项军事原则，正确地解决了部队的打仗与占地盘，分遣与集结的关系，才粉碎了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完成了战略展开任务，建立了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为创建中原解放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是关于部队进入新区后的供应问题。在这方面，中原部队体会最深，教训也最大。邓小平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深有体会地写道：

“这是在新区首先接触的最大最重要的政策问题。在毫无工作基础的情况下供应大军，无论内战或抗战时期均无此种经验。在中原曾采用

打上豪分浮财用粮食折菜金的办法，造成极大的浪费和混乱，证明不能再用，今后不打上豪，许多东西要拿钱买，例如没有布条打草鞋，没有废纸用作办公等等，开支势必浩大，如无妥善办法，不可避免地要形成混乱。

根据大别山和中原各区一年来的经验，邓小平提出了今后部队到新区解决供应问题的具体办法：（1）带一部分现洋，以半年为期，每月以每人两元计算，可解决菜金、黄烟及草鞋。（2）准备一种军用流通券，随军发行，随军兑换，其缺点是币价无法固定，小商人吃亏，好处可以应急，在闲难时不致过于混乱。（3）维持城市税收，照旧章程驻一天收一天税，同时适当地向商会筹款。（4）乡村派款。（5）粮食在不能实行合理负担以前采取征借办法，可以利用保甲征借。（6）缴获粮款全部归公。（7）随军的行政机构必须健全，可用战地行政委员会名称，全盘负责管理征借粮食，税收，筹款，接管城市，接收和处置缴获品，必要的没收，银行兑换诸事宜，军队的供给部门亦归其管辖。

五是关于社会政策。在以往的工作总结和向中央的报告中，邓小平曾多次阐述了他在这方面的意见，这里他又重申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新区必须经过一个军事时期然后才能进入巩固时期。在军事时期，我们的策略步骤，对群众主要是政治解放，对敌人是政治打击，必要的没收也只是政治的没收，斗争的对象集中于最反动的部分。此时期应发挥政权的作用，一切事情用政权出面比由军队直接出面要好。一俟军事局面打开，大体上进入巩固的阶段，工作重心即可放在合理负担及有步骤有准备地进行双减，建立税收制度，组织农协，建设党，广泛办训练班等工作方面。六是武装问题。每到新区，务必以最大力量建立地方武装，这是我军扩大与补充的可靠来源，也是巩固占领区的重要力量。中原政策搞“左”了，但还能建立或扩大地方武装12万人左右，如不搞“左”，数目必更大。但在建立时应不惜本钱抽调干部及若干部队以作骨干。

七是关于干部问题。邓小平根据中原区需用干部的标准，建议中央，如在江南开辟一万万人口的区域，所需合格干部当在三四万之间，请中央预为准备。同时，国统区大批学生回乡，也是干部的一个重要来源。

上述意见涉及军事、经济、政策、武装、干部等各个方面，内容丰富，详细具体，是开辟新区、建设新区所必须遵循的一套完整的经验。这些经验是邓小平在领导创建中原解放区的艰苦斗争和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纠正错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它凝聚着一年来邓小平的全部心血和精力，体现了他的所有智慧和结晶。正是有了这些经验，中原解放区才得以在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之后不断成长、发展和壮大起来，正是有了这些经验，几个月后，解放军打过长江后，才得以在广大的江南顺利地开辟了一块又一块新区，把中国革命推向胜利。所以，邓小平不仅是中原解放区的决策人，也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出谋划策的人。

邓小平用他的全部智慧和胆略创造了中原解放区，而中原解放区的丰富的历史实践也造就和磨练了邓小平，使他成为一个以注重实践，求真务实而著称于世的伟大的政治家。正是这个伟大的政治家，在其后几十年的岁月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着无法估量的影响和作用。

第七章 决战岁月 解放郑汴 挥师东进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先后在全国各个战场发起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在东北战场，东北野战军于9月12日举行辽沈战役，东北全境即将解放。在华北战场，解放军进行了察绥战役，歼敌2万余人，正向北平、天津附近集结。在西北战场，解放军重新夺回了主动权，已将胡宗南集团逼到关中一隅。在华东战场，解放军于9月16日同举行济南战役，全歼守敌10万余人。

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就下一步作战计划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举行淮海战役，攻歼淮阳、淮安和连云港地区之敌，为夺取徐州创造条件的建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全国战场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认为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除东北战场正在进行辽沈战役，华北战场准备进行平津战役外，同意粟裕的建议，决定南线举行淮海战役，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连续打几个大仗，歼灭长江以北国民党军队主力，并指示由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共同担负这一战略任务。

当时，国民党在中原战场的刘峙、白崇禧两大集团共75万人，被分别孤立徐州、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徐州“剿总”刘峙集团辖邱清泉（第二兵团）、黄百韬（第七兵团）、李弥（第十三兵团）、孙元良（第十六兵团）4个兵团，和第一、第三、第四3个绥靖区部队，分别位于津浦路徐州至蚌埠段及两侧地区，控制津浦南段和陇海路商丘、海州段交通，拱卫南京、上海，并准备在必要时放弃徐州，依托淮河进行反击。华中“剿总”白崇禧集团辖张途（第三兵团）、黄维（第十二兵团）、宋希濂（第十四兵团）3个兵团及第五、第十三、第十四3个绥靖区部队，防御平汉路南段及长江中游地区，控制武汉、信阳，屏障华南。

在解放军方面，参加淮海战役的兵力有，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约36万人，济南战役后，正集结在徐州、济南间津浦路两侧休整。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约15万人，正集结在豫西的禹县、襄城、叶县、鲁山等地区休整。此外有华东军区、中原军区和华北军北所属冀鲁豫军区的地方部队，总兵力约60万人。从双方总兵力来看，国民党军略占优势，但其内部矛盾重重，互相倾轧，士气低落。解放军虽稍处劣势，但经过整党整军，加强了组织性、纪律性，思想统一，情绪高昂。此外，中原解放区各项建设蓬勃发展，已经能够调动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保障决战的胜利，因此，淮海战役，稳操胜券。

9月25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给粟裕的复电称：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第一步作战应以歼灭即将自徐州调返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为目标，然后再歼两淮和海州、连云港之敌，歼其十几个旅，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以利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的作战。

10月11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规定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峰站、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第二阶段攻歼海州、新浦、连

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第三阶段准备在淮阴、淮安地区作战。中央军委估计，孙元良兵团将东进，指示中原野战军应即部署攻击郑州、徐州线，钳制孙元良兵团。

这时，邓小平刚从西柏坡回到宝丰，接到中央军委电报，立即与刘伯承、陈毅共商作战部署，决定在发起淮海战役前，首先攻取郑州，以吸引孙元良兵团回援，或吸引邱清泉兵团一部向西，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

关于郑州战役的具体部署，确定由陈赓和陈锡联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九纵队及豫西军区、豫皖苏军区武装，在华北野战军第十四纵队的配合下，于10月下旬发起作战，并责成陈赓和陈锡联制定详细作战方案。10月13日，一、三、四、九纵队的司令员杨勇、陈锡联、陈赓、秦基伟在禹县制定了郑州战役作战计划，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看了十分满意。

18日，刘陈邓下达郑州作战的基本命令。具体部署是：以第一、第三纵队为东兵团，在郑州城南至东北方向实施突击；以第四、第九纵队为西兵团，由郑州西南至正北方向实施突击；以豫皖苏军区第一、第五军分区的3个基于团兵力，位于开封以东、以西地区，破坏陇海铁路，牵制和阻击可能由开封西援之刘汝明部，并截击郑州可能东逃之敌；以豫西军区第四军分区基干团和九纵第七十七团组成北支队，直插平汉路黄河以南，阻击新乡南援之敌，并防郑州之敌北逃；华北野战军第十四纵队则在黄河北岸新乡至黄河铁桥之间发起攻势，协同作战。

10月19日夜，邓小平和陈毅乘吉普车开赴郑州前线，刘伯承、李达等则留宝丰指挥第二、第六纵队及桐柏、江汉、陕南军区部队，将黄维、张涂两兵团引向桐柏山和大洪山地区，防其北援。

时值暮秋，庄稼早已收割完毕，空旷的田野上吹着一阵阵凉风，中原野战军的4个纵队正踏着劲吹的秋风向各自预定目标前进。

郑州是中原最重要的交通要点和战略城市，由于它控制着平汉、陇海两大铁路枢纽，起着联系中原、华北、西北战场的作用，所以，它的得失，常常决定中原战局的成败。蒋介石对郑州十分重视，1946年7月，设立郑州绥靖公署，以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为主任，指挥鲁西南与河南的军事。1947年6月，郑州绥署改为国防部陆军总部郑州前进指挥所，孙震为主任，现在是第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兼主任。郑州守敌原为第十六兵团。当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的时候，孙元良奉蒋介石命令，于9月下旬率兵团东调徐州，增援济南。而郑州移防由安阳、新乡的第四十军第一六师、第二六八师等部接替。现在，郑州守敌计有：第一六师两个团、第二六八师全部、第三十九师一个团、四十军军部一部，以及汜水、荥阳、新郑、郑县等县保安团，分别驻守郑州至黄河铁桥间，郑州城年守备比较空虚。

10月21日晚，中原野战军各路攻城部队逐步完成了对郑州的四面包围。第四纵队进至城南外围，北支队进至郑州以北之双河桥、苏家屯、薛岗一线，第一纵队进至城东北侧，第三纵队进至城东南。22日拂晓，第九纵队进至城西北和西北的须水镇、兰寨、大李寨地区，豫皖苏第五军分区部队攻占了郑州至开封间的中牟县城。战役预定22日夜发起。

郑州守敌发觉解放军兵临城下，不敢固守，遂于22日晨6时弃城沿

公路北逃。负责从北面攻击郑州的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发现敌人逃跑意图，即请示邓小平。邓小平当机立断，果断调整部署，命令部队提前发起郑州战役，将预定的城市攻坚战转变为野外歼灭战。他指示秦基伟：一定要歼敌于运动之中，不能让他跑掉！

22日晨，北逃之敌先头部队在薛岗遇到北支队坚决阻击，从古荣镇、邙山来援之敌向双河桥、杜岗阵地攻，亦被打退。第二六八师、一六师主力沿铁路、公路两侧向薛岗、固城解放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其主力猬集于老鸦陈寨内。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下午3时，第九纵队主力发起总攻，全歼老鸦陈地区逃敌。这时，被北支队阻击在杜庄一带的敌人，发现主力被歼，即回头逃至邙山头，凭险顽抗，邙山位于黄河南岸，黄河铁桥从邙山脚下跨越黄河通向北岸，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第九纵队乘胜追击，将敌人合围于邙山头，战至23日晚，全歼邙山及黄河铁桥守敌。此时，华北野战军第十四纵队也歼灭了黄河北岸桥头守敌。至此，郑州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1.1万余人。

郑州解放的第二天，开封守敌仓皇弃城东逃，开封第二次解放。几天后，豫西南重镇南阳和豫东重镇商丘相继为解放军攻占，蒋介石用于南线的近百个师的兵力被迫全部集中于武汉和徐州为中心的两个地区，中原和华东广大地区基本全部解放。

10月23日，中共中央电贺郑州解放。25日，又电贺开封解放。中共中央在电文中称：中原三大名城，洛阳、郑州、开封均入人民解放军掌握，对于今后战局，极为有利。

郑州解放的消息传到禹县指挥部，邓小平欣喜万分。郑州是平汉、陇海两大铁路枢纽，它的解放，对于下一步支援淮海作战的繁重的支前工作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宝丰出发的那天晚上，中原军区司令部专门开会研究淮海战役的后勤供给问题。邓小平曾焦虑地说：

“大战迫近，部队却是瘦的，所以，现在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尽全力把弹药、粮食运到前线！”

能否保障运输线的畅通，把物资及时运送到前方，将直接影响到淮海战役的成败。刘、邓、陈商量决定，把中原军区参谋长李达留在军区司令部，专门负责支前工作，并在洛阳设立中原军区运输司令部，负责督办支前运输工作。当时，一部分支前物资已经可以由中原自给了，但弹药，尤其是炮弹，还要靠华北供应。由于郑州还在敌人手里，华北的大批物资不可能用火车经郑州直接运到前线，所以，洛阳的交通及水路运输还很重要。现在，郑州解放了，华北支前物资不须经洛阳转站，而可以直接运到郑州、开封、商丘，这对即将开展的淮海战役太重要了。

郑州解放的当天，即22日夜晚，邓小平和陈毅便乘车从禹县来到郑州，亲自部署下一步的工作。在原国民党郑州绥署，邓小平对豫西行署主任李一清和军区副司令员文建武等人说：

“大战即将开始，郑州的地位非常重要，一定要保障黄河铁桥的安全，保障铁路、公路交通运输，把各种物资及时运往前方。”按照邓小平的指示，豫西行署和军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成立了陇海平汉铁路郑州联合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铁路交通问题，另成立交通支队，保护黄河大铁桥和交通运输安全。

黄河铁桥位于郑州以北 60 里，约 6 里长，是全国第一座铁路长桥。郑州解放后，华北的物资可经黄河铁桥直接运到郑州、商丘，所以，它的地位不同凡响。豫西军区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派出得力干部和精锐部队守卫黄河铁桥，保证了它的安全。在后来的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一列列军用物资经黄河铁桥驰向淮海前线，有力地支援了战争的胜利。

按照原来部署，邓小平指挥部队攻占郑州后，即东进直取开封。现开封守敌弃城东逃，开封已经解放。邓小平决定部队在郑州休息两天后，即直出商丘，或直出徐蚌，牵制孙元良、刘汝明部，协同华野作战。

10 月 24 日 邓小平在郑州绥署礼堂主持召开参加郑州战役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他着重讲了关于部队东进前的形势和任务，他说：

我华野、中野现正集中力量进行徐州会战，以围歼国民党在长江以北之最大主力，这是一次最大的决战，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大决战，我们要全力争取这次决战的胜利。目前，在徐州方面，以刘峙为首，集结了邱清泉、李弥、黄百韬、孙元良 4 个兵团，以及刘汝明、李延年两个绥区的部队，我们要分批歼灭之，绝不能让敌人主力退踞江南。

我们很快要东进了，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同志们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我们要坚决彻底地把蒋介石的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否则敌人主力退守江南，将会给我们渡江作战带来极大的困难。对于这一点，每一个干部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估计到。当然，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指挥，有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援，有两年来解放战争的实际锻炼，是一定能够彻底消灭徐州地区敌人主力，取得战役胜利的。

10 月 26 日，邓小平、陈毅率领中原野战军 4 个纵队从郑州出发，沿陇海路东进，奔赴淮海前线。

当部队经过开封，进至商丘东南地区时，传来了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完全解放的消息。陈毅极为兴奋地说：

“这样看来，取得全国胜利的日子也快了！”

“是啊，我们也应该加快步伐，打一个加油仗！”邓小平情绪激昂，信心十足地应道。

指挥徐蚌作战

淮海战场位于江苏、安徽、山东、河南 4 省交界地区，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地域辽阔，村落稠密，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纵横交错，公路四通八达，有利于大兵团作战。徐州位居淮海战场的中心，它是南京的屏障，系关京沪和江南的安危。因此，徐州的得失，关系重大，失去徐州，就等于失去了整个长江以北的地区。

郑州、开封解放后，蒋介石派国民党陆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徐州，与刘峙重新调整了淮海地区的兵力部署：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由商丘转移到蒙城地区，保障津浦路徐蚌段西侧的安全；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在砀山、永城地区集结待机；刘汝明所辖的第四绥区部队由商丘移至临淮关；李弥的第十三兵团由碾庄圩、炮车段向灵璧、泗县地区转移，担任机动任务；黄百韬的第七兵团由新安镇移至运河以西集结；冯治安的第三绥区部队放弃临城、枣庄，退守韩庄、台儿庄段运河及其以南地区；周的第一绥区部队驻守淮阴、扬州线；李延年指挥新组织的第六兵团防守蚌埠；另调白崇禧集团的黄维兵团由确山地区开早阳、太和集结，参加徐蚌间作战。

这时，邓小平、陈毅率领中原野战军主力已东进至商丘东南地区，正向亳州、涡阳、永城地区集结。华东野战军经过紧张地筹划，也完成了发动淮海战役的一切准备工作。11月1日，中央军委根据粟裕的建议，同意整个战役由邓小平、陈毅统一指挥。

根据中央军委确定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任务是围歼黄百韬兵团，华东、中原野战军分别制定了第一阶段的作战部署：

华东野战军 8 个纵队担任围歼位于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的任务，另以 3 个纵队围歼邳县、官湖、炮车、运河车站地区之敌，控制运河以东地区，阻击李弥兵团东援，以 3 个纵队出临城、台儿庄、贾汪，自徐州以北、以东进逼徐州，切断陇海路，阻击徐州之敌东援。

中原野战军的任务是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首先歼灭位于商丘地区的第四绥靖区部队，钳制邱清泉兵团，然后直出徐蚌线，切断徐蚌线联系，从西、南面威胁徐州，并阻击可能由蚌埠北援之敌。另以刘伯承指挥的第二、第六纵队和陕南军区部队侧击和尾击由确山东进的黄维兵团，迟滞其前进。

1948年11月6日，华东、中原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至11日，华东野战军将黄百韬兵团主力合围在碾庄圩地区。为了配合华野作战，邓小平、陈毅指挥中野第一、第三、第四纵队和华野第三、两广纵队以及冀鲁豫军区部队举行沛（开封）徐段作战，以歼第四绥靖区部队，吸引邱清泉兵团西援。7日，中野向第四绥靖区敌人主力发起进攻，但该敌已先期向蚌埠方向撤退，中野一纵和华野三纵在张公店地区歼其第一八一师 5000 余人。8日，第四纵队沿陇海路东进，解放砀山，进逼徐州。中野主力、华野第三、两广纵队在控制了郑州至黄口段 300 公里铁路后，即转入徐蚌线作战。

攻取宿县，切断津浦路徐蚌间联系，是淮海战役中一着举足轻重的妙棋。当时，徐州以北已为华野占领，以西郑州、开封、商丘为中野解放，围歼黄百韬的战斗开始后，徐州以东也为华野所控制，唯有徐州以

南尚为敌人占领。蒋介石以重兵守徐州，他唯一的补给线和退路是津浦路，只要解放军攻克宿县，控制徐蚌段，就切断了敌人的补给线，阻绝了徐州之敌的退路。

郑州解放后，邓小平和陈毅曾两次向中央军委提出主力东进后的 3 个方案，其中都有一个方案是切断徐蚌线。

在豫西坐阵指挥的刘伯承分析了淮海战场的敌情后，也于 11 月 3 日向中央军委和正在淮海前线指挥作战的陈毅和邓小平提出了切断徐蚌线作战的建议。他说，敌人重兵守徐州，其补给线仅一律浦路，怕我截断，所以要孙元良兵团到宿县，要邱清泉、刘汝明两兵团南下。因此，陈邓主力力求首先截断徐、宿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的态势。这样，不仅孙兵团可能北援，便于我们在运动中给以歼击，邱兵团也可能被迫南顾，减轻东面华野的压力。

战局的发展正如刘、陈、邓所预料：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役打响后，徐州东线战场吃紧，蒋介石急忙采取救援措施，将孙元良兵团从宿县调徐州，命令邱清泉和李弥兵团增援黄百韬兵团，而且有放弃徐州的迹象。

11 月 9 日，中央军委电示陈毅、邓小平：

“徐州敌有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

11 月 10 日，中央军委又来电：

“你们务须不顾一切，集中 4 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兵团等部，切断徐蚌路，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盼至盼。”在永城中原野战军司令部，邓小平和陈毅连夜制定了徐蚌线作战方案。

11 月 10 日，刘伯承从豫西赶到亳县，与邓小平、陈毅会合，并一起研究了攻取宿县，截断徐蚌线的具体方案。

当天，刘、陈、邓下达徐蚌线作战命令：中野第四纵队，在华野第三纵队、两广纵队协同下，分别从宿县以北沿洋浦线北向徐州方向攻击前进，以钳制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东援黄百韬兵团；中野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之第八十团，攻夺宿县城；第九纵队和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及第三军分区部队占领固镇，向蚌埠方向推进，阻击可能北援的李延年兵团；第一纵队位于宿县西北地区待命。在向参战部队作战前动员时，邓小平指出：

“这次我们中原野战军 4 个纵队扑向津浦线，夺取宿县，控制徐州、蚌埠段，对直接配合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防止徐州敌人主力南逃，都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对由平汉线确山地区东进急援徐州之敌黄维兵团，由于我军占领了宿县城，控制了徐蚌段，也就有了围歼它的战场，而且可以腾出手来，胜利发展淮海战役。”

位于津浦线徐蚌间的宿县，是一座古城，环城有宽约 20 米，水深没顶的护城河，坚实高厚的城墙上及各桥头、街口、要隘都修筑有大批坚固的工事。十几辆装甲车在铁路上日夜不停地巡逻，保护着一列列北驰而去的军用列车，公路上，各个交通要口塞满了装载着各种物资的军用车辆。徐州东线战场吃紧以后，南部的这条补给线对徐州敌人就越来越重要。当时，守备宿县的敌人有：第二十五军第一四八师、交警第十六总队、第二总队之第三大队、陆军第六支队、装甲第七营，约 1.3 万人。

这些部队装备好，战斗力强，其中交警总队为军统系统部队，成员均受过良好训练，是守备宿县的主要力量。

11月12日，刘、陈、邓指挥中野主力和华野三纵、两广纵队分别转入徐蚌线作战。13日拂晓前，中野三纵、九纵一部完成了对宿县城敌人的四面包围。中野四纵、华野三纵及两广纵队按预定计划攻击徐州至宿县段敌人，在夹沟地区追歼由宿县北撤的孙元良兵团的第四十一军军部及第一二二师，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汽车、火炮、辎重和通讯器材等装备。14日，又在涂州以南三堡地区歼灭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第三十六师4000余人，逼近徐州。15日下午，围攻宿县城的部队向守敌发起总攻，16日晨攻克该城，歼敌1.2万余人。这时，中野第九纵队一部和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占领了蚌埠以北的任桥、固镇，并向南推进，以阻止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向北增援。

至此，徐蚌线作战取得了胜利，解放军控制了以宿县为中心，北至曹村、南至固镇的广大徐蚌地区，切断了徐蚌间敌人的联系，提前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为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准备了战场。

后来，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等人的电报中，对攻克宿县，切断徐蚌线，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

“你们消灭了刘峙系统18个整师（包括争取何、张3个师起义在年），并给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刘汝明4个兵团以相当打击，占领徐州以南、以东、以北、以西广大地区，隔断徐、蚌联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18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

当刘、陈、邓指挥中野主力切断徐蚌线的时候，徐州以东围歼黄百韬的战役打得正激烈。11月11日，华野各纵向被围于碾庄圩一带的黄百韬兵团展开猛烈攻击。碾庄圩地区位于运河以西，陇海线西侧，共有十几个村庄。每个村庄都筑有二三米高的土围子，周围修筑了以地堡群为基础，堑壕纵横交错的防御阵地。黄百韬将其兵团部设在碾庄圩，所属各军配置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20日，攻击部队占领碾庄圩，22日黄昏，全歼黄百韬兵团。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取得了胜利，共歼敌18个师，将刘峙集团分割为南北两大股，为全歼该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战役第一阶段，淮海战场局势发展很快，变化很大，原来设想的战役第二、第三阶段攻取的两淮、海州、连云港等地已为解放军占领，刘伯承指挥的尾击、侧击东援徐州的黄维兵团的第二、第六纵队、第一纵队一个旅以及豫西、陕南、豫皖苏军区各部也来到淮海战场，与陈毅、邓小平会合，中野主力攻占宿县，迅速切断了徐州敌人南退之路，形成了对徐州四面包围的战略态势。这一切都推动了战役规模的扩大，即由原华东野战军主力作战，中原野战军配合，发展为西大野战军共同作战，由原计划歼灭刘峙集团一部发展的全歼刘峙集团和白崇禧集团一部的规模宏大的战役。因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认为，淮海战役已发展为南线空前大战役，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所以，淮海前线急需一个能统一指挥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的机构，来统筹解决战役的指挥和后勤供应等工作。

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接近尾声的时候，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

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中野和华野，统筹指挥淮海前线作战事宜和后勤工作，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 5 人为前委委员，可能时，开 5 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 3 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确定先打黄维

总前委成立后，即由永城移至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集。这里更靠近前线，便于掌握战场敌情变化，临机处置一切。

这时，徐州东线围歼黄百韬的作战已接近结束：战役第二阶段先打谁？这是邓小平就任总前委书记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当时，淮海战场上敌人的态势是：蒋介石为解黄百韬兵团之围，曾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幸明指挥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由徐州沿陇海路东援，令孙元良兵团由宿县撤至徐州，确保徐州安全，令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由蚌埠地区北进，令黄维兵团由确山驰援徐州，蒋介石把他的所有兵力投向徐州地区集结，妄图在解黄百韬兵团之围后，在徐州地区与解放军决战。但结果适得其反，这些兵团非但不能解黄百韬兵团之围，反而被华野、中野分别阻击在3个地区：杜幸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被华野阻击在徐州及其周围地区，已陷四面楚歌之境；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被中野阻击在固镇以南与蚌埠地区；黄维兵团虽有心援徐，但在进至宿县西南的南坪集地区时，遭到中野主力顽强阻击，欲北进不能，欲东去又不成。经过第一阶段的作战，敌人已陷入被动和困境，而华野和中野则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把敌人分割包围在徐州、宿县西和蚌固地区，为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敌人的3个集团中，究竟先打哪一个最为有利？围绕着选

择第二阶段作战目标的问题，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总前委和中野、华野之间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研究、商榷，集中决策的过程。从11月上旬战役开始到11月20日围歼黄百韬之前，由于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局势尚未明朗，毛泽东、总前委和华野、中野的领导人都在苦苦寻求下一步作战的最佳方案。这期间，曾先后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一是先打位于徐州地区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二是先打位于蚌埠、固镇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三是先打被阻在宿县以西地区的黄维兵团。

早在11月14日，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一起分析了淮海战役的形势后，根据黄维兵团主力15日可到达阜阳、大和地区集结的情况，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了先打黄维兵团的方案。电文说：“如敌（指黄维）出永城和宿县，我以集中一、二、三、四、六、九、及华野三、六共8个纵队，歼击黄维为上策。因为黄维在远道疲惫，距离后方之运动中，只先来3个军7个师，其中强者只有3个，我军也能适时。”

这时，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徐州集团，他一直设想诱使邱清泉、李弥兵团东援以歼灭之。起初，他认为，黄百韬兵团在几天内可解决，因此，目前是继续歼灭邱兵团的良机，只要黄百韬、孙元良两兵团歼灭后，我军即可围困徐州，准备第二步歼灭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夺取胜利，拿下徐州。

当刘陈邓提出先打黄维的意见后，毛泽东仍在图谋割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11月18日，他在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谭震林的电报中说：

“北线何、张起义是第一个大胜利。今后数日内，歼灭黄兵团全部，将是第二个大胜利。如能精心组织战斗，再歼邱、李四五个师，打得邱、李不能动弹，则将是第三个大胜利。”

鉴于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正向北推进，黄维兵团已进至宿县以西，准备加入徐淮作战，毛泽东认为，在北线打邱、李的同时，南线可对李延年、刘汝明展开作战，并提出了他的具体意见：

“……以二六纵队组成突击集团打黄维后尾，只要能歼其二三个师，就可以停止其前进。这是最主要的一着。以九纵对付刘汝明，节节阻止他，不和他打硬仗。……以三纵、四纵再加叶飞一纵对付李延年。不要打得太早，先以小部接敌，逐步后退，诱敌进入大店集一带地区，达到全部歼灭该敌之目的。此战胜利即协同九纵歼灭刘汝明，打开南线局面。谭王 指挥之四、六、八、九、十及十三纵，于歼灭黄兵团余部后，迅速移至徐州、宿县间，作为南线的预备队，准备协同南线各纵歼灭黄维。”

11月19日10时，毛泽东给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中再次重申了南线先打李延年、续歼刘汝明的意见，电文称：

“现刘峙依靠黄维（10个师）、李延年（在五十四军未到前是4个师）北上救命，我们觉得南线集中中野三、四纵及叶飞一纵，歼灭李延年兵团于宿县以东地区，是极关重要的一着。李延年歼灭后，即可续歼刘汝明，或将其驱至蚌埠，则黄维更陷孤立。”

毛泽东的意图很明确，北线打邱、李、孙，南线打李、刘、黄，北线可抽出五六个纵队于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加入南线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

当时，华东野战军领导人粟裕等人也主张下一步作战目标先打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华野于18日致电中央军委，表示华野将集中全部兵力打北线的邱、李、孙，并且已经部署好，所以，目前，华野不能分兵协同中野打南线之敌，对付南线黄、刘、李的全责可委托刘陈邓。

接到中央军委和华野的电报后，邓小平一直处在忧心忡忡、苦苦思索中。他历来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但绝不盲从。正是这一点，铸造了他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特别是当他认为自己的意见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时，就更加坚持或反复陈述自己的理由，而不盲目随从。

眼下，中央军委和华野的意见都已明朗化，照此战法，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淮海战场上将出现北打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南战刘汝明、李延年、黄维的局面。根据邓小平掌握的中野和华野的实力及现状来看，他认为，两个野战军同时进行两个大的歼灭战，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从中原野战军的情况来看，只有6个纵队，单独对付黄维和李延年、刘汝明两路重兵，困难颇多，而且，以一、二、六3个纵队6万人防御黄维兵团的12万人，也无把握。从华东野战军方面来看，对黄百韬作战，使用了6个攻坚战斗力强的纵队，且历时12昼夜，未能结束战斗，如果在战后紧接着打战斗力更强的邱、李兵团，不经休整，困难更多。从敌人方面的情况看，北线邱、李、孙集团，猬集徐州地区，不易割裂，而南线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行动谨慎、北进迟缓，黄维兵团自恃装备精良，大胆冒进，孤军深入，正好为歼灭它提供了良机。而且，黄维兵团已占

领蒙城，离宿县仅 70 公里，如让其通过中野防线，就会失去歼灭黄维兵团的良机，对下一步的作战也会带来严重后患。所以，邓小平反复权衡利弊，思之再三，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华野主力应集结徐州以东地区，监视邱、李、孙三个兵团，休整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的 3 至 5 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中原野战军歼灭黄维兵团。

11 月 19 日 9 时，邓小平与刘伯承、陈毅取得了一致意见后，便毅然挥笔，亲拟电文，向中央军委、毛泽东和粟裕、陈士榘、张震等陈述先打黄维的理由：

“……综合我当前之敌有黄维 11 个师（五十四军未计入），我们的打法须从整个会战和三、五个月时间着眼，如华野能干 20 日夜以前解决黄百韬，战局即可过关。届时如果已将邱、李包围，自应继续歼击。如果邱、李缩回徐州，或仅包围一部，则我应歼灭已包围之部，主力位于徐州以南、以东休息，抽出四五个纵队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运动之敌，而后攻击徐州。如果于歼黄百韬后，以七、八两个纵队钳制邱、李，以六、七个纵队先打黄维、李延年，似为上策。

以我们现有 6 个纵队，单独对付两路大军困难颇多，如取正面防御，必须分散兵力，不能歼敌，且仍有一路透过增援徐州之危险。如采取机动作战，不受保障徐州作战之限制，则可逐个歼敌。但对粟陈张作战不无影响；如果实行钳制黄维，打李延年 5 个军，至少需 5 个纵队，但以 1 个至 2 个纵队防御黄维均无把握。依我军态势，如李延年沿津浦东侧急进，很不顺手，故我们仍拟只以九纵与李刘 5 个军周旋，集中 5 个纵队，先打黄维一两个军，再协同华野对付李延年。”

电报发出几个小时后，邓小平考虑良久，认为还没有完全表达总前委的意图，于是，他又坐下来，以刘陈邓名义，再次致电中央军委：

“（一）我们决心先打黄维的理由，已详 19 日 9 时电。（二）徐东作战据我们观察，歼黄百韬使用了华野 6 个较能攻坚的纵队，历时已 12 昼夜，尚未解决战斗。如再以其余部队（其中只有两三个较能攻坚的纵队，加以部队必相当疲惫，刀锋似已略形钝挫），以之歼击较黄为强的邱、李，诚非易事。我们认为，徐海作战必须从三、五个月着眼，整补俘虏兵，才能保证必胜。因此，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是李延年、黄维北进的情况下，最好力争迅速歼灭黄百韬，尔后即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三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之 5 个纵队或 3 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这个步骤最为稳当。如我们不这样，过低估计夺身困难，而在南线又无保障，两路大军北进的情况下，我们 6 个纵队，除四纵外均 6 个团，九纵只来 5 个团，平均每纵不到两万人，炮兵很弱，故只能用于一处，马上打邱李既无把握，且可能陷入被动。如何？请考虑。”

毛泽东收到总前委刘陈邓的电报后，于 19 日 17 时回电：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和刘陈邓大体上一致的，华野必须将对邱、李、孙之作战，只限制于歼敌四五个师的范围，以便抽出必要兵力对付李延年，只有歼灭了至少阻止了李延年，华野的侧翼才不受威胁，才能保证继续歼灭邱、李、孙。11 月 20 日，毛泽东再次电示华野：“中野主力决定黄维，对李延年兵团须由你们负完全责任。”

11月21日，毛泽东给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姬鹏飞）的电报中，又进一步阐明了华野下一步的作战任务：华野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李延年，请粟陈谭王从目前起，即将主要注意力及兵力部署的重点，放在歼灭李延年3个军的上面。对邱、李、孙的作战，如有顺利发展的条件，可以再打一晚两晚，否则应当机立断，适可而止，抽出必要兵力，筹划歼灭李延年。只要歼灭李延年，战局便可改观。

毛泽东的意图很明确，他已经改变了原来集中力量在北线打邱、李、孙和北线打邱、李、孙，南线打黄、李、刘，同时进行两个歼灭战的设想，而开始同意在战役第二阶段将主要力量集中在南线，歼灭黄维兵团或李延年兵团。

华野在接到毛泽东的几次电报后，于11月21日18时复电，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军委指示，以7个纵队监视徐州周围邱、李、孙兵团，其余兵力集中歼灭李延年兵团。但暂不能派队直接配合中野作战。

11月22日，淮海战场局势发生明显变化，华野主力在碾庄圩地区全歼黄百韬兵团，正在向北推进的李延年兵团闻讯龟缩在蚌埠以北花庄集，畏惧不前。而黄维兵团则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向中野防线发起全面攻击，23日通过北肥河，先头部队突过浍河。这天夜晚，邓小平、刘伯承、陈毅齐聚总前委指挥部，商量下一步的作战部署。邓小平一边抽烟，一边听刘伯承分析敌情：“目前，李延年迟迟不前，这正是歼灭黄维兵团的良好时机。战机稍纵即逝，我们决不能坐失良机啊！”

“对，必须当机立断！一面命令部队利用河流阻击隔断敌人，一面立即向中央军委发报，请求先打黄维。”陈毅首先表示了态。深夜10点，从南坪集方向不断传来隆隆炮声，邓小平坐在桌前，代表总前委，疾书电文，又一次向中央军委、毛泽东恳切陈词：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而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因此，我们意见，除王张十一纵外，请粟陈张以两个纵队对李、刘防御，最少以4个纵队加入歼黄维作战。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实行。”

24日晨5时，毛泽东复电：

“23日22时电悉。（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至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以中原野战军为主，华东野战军配合，歼灭黄维兵团的决策就完全定下来了。在选择以黄维为主要作战目标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观全局，既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又勇于从淮海战场的实际出发，提出不同意见，表现了一个指挥员虚怀若谷，胸有全局，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责任感，也体现了他们将革命原则性与战场瞬息万变的灵活性有机统一的指挥艺术。对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胜利，总前委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双堆集围歼战

1948年11月23日，邓小平与刘伯承、陈毅研究了下一步的作战部署后，即将总前委指挥部从临涣集移至小李家。因为前一天，国民党的飞机突然轰炸了临涣集。

小李家位于徐宿铁路、徐阜公路之间，东距宿县30公里，西距临涣集10多公里。这是一个只有40多户人家的极普通的小村庄，自从总前委移驻这里后，这个淮北平原上的小村庄便与淮海战役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了。

从远处看，小李家掩映在一片苍翠的柏树林中，而村里早已是一片枯枝萎叶、残秋寒冬的景色。全村的房屋都是清一色的草顶，黄泥巴墙，光看外表，难以分辨哪家富贵，哪家寒惨。总前委设在一个叫李光者的农民家里。他家是中农，有21间房屋。作战室就设在他家的堂屋里，从墙顶到墙根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军用地图，总前委的3个常委——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天天聚在作战室里，研究战况，部署，指挥前线作战。

总前委迁到小李家几天前，即11月18日，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就开始了。

贡维兵团隶属华中“剿总”司令官白崇禧指挥，是国民党的嫡系精锐部队之一，两个月前刚刚组建，全兵团由第十、第十四、第十八、第八十五军4个军组成，共11个师、一个快速纵队、约12万人。这是一支全部美械装备、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也是中原野战军进入中原后遇到的一块最硬、最难啃的骨头。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曾这样描绘黄维兵团的实力：

“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剧烈的一次战役；而双堆集作战，则是中野在自工战争以来规模最大而最剧烈的一次作战。这次作战，所遇到的敌人，是蒋军的第一等护锐部队黄维兵团，它的兵力之大，装备之较现代化，工事之强度，抵抗之坚决，在中野来说，也都是第一次遇到的。”

当时，中原野战军有6个纵队，也是12万人，但编制不全，兵员不充实，重炮很少，弹药奇缺。以装备低劣的中野对付全部美械装备的黄维兵团，实力如何？结果怎样？邓小平心里十分清楚。他在11月22日召开的各纵队首长会议上曾非常形象地比喻了中原打黄维的艰难处境，他说：

“消灭黄维兵团，对中原野战军来说，犹如‘瘦狗屙硬屎’”与黄维兵团的实力相比，中原野战军的力量是薄弱了些，但邓小平对围歼黄维兵团充满必胜的信心，他在向中央军委一再要求先打黄维的同时，就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和赌注，只要能消灭黄维兵团，保证整个战役的胜利，中野就是拼光了，也在所不惜。他在纵队首长会上严峻而激动地说：

“我们这次围歼黄维兵团是非常艰苦的，也是非常光荣的。要消灭敌人没有牺牲精神是不行的。划腰不惜一切代价在华野协助下，完成歼灭黄维兵团的任务。即使这一仗中野拼光了也值得，其它野战军照样渡江，中国革命照样胜利！”

在后来的作战中，邓小平在电话上反复指示各纵队首长，要坚决贯彻中央军委把敌人歼灭在淮河以北的指示，要发扬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顽

强精神，服从大局，不畏艰险，不惜最大牺牲，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争取打好中原作战的最后一个硬仗。

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是从11月18日蒙城、板桥集阻击战开始的。

11月上旬，黄维在确山地区接到蒋介石驰援徐州的命令后，即兼程东进，于11月18日黄昏逼近蒙城，当时，中野一纵已先期到达蒙城，在这里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阻击战，随后，第二纵队也赶来参加了战斗。由于敌人攻击面很宽，一、二纵队防御力量过于薄弱，黄维兵团于19日突过涡河。当天夜晚，一纵即移至淝河沿岸板桥集地区继续阻击敌人，一直坚持到21日。

刘陈邓原拟在淝河与涡河之间歼灭敌人，但因这一地区过于狭窄，不便大兵团作战，故改变计划，准备在浍河与淝河之间歼灭敌人。具体部署是：以第四、第九纵队，豫皖苏军区独立旅，位于南坪集地区，实行正面防御，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位于浍河南岸敌之西侧，第十一纵队位于敌之东侧，待敌人进入预定地区，从东西两侧实行向心突击，配合正面部队，歼灭敌人。

这时，黄百韬兵团已放弃碾庄圩，22日，全军覆没。蒋介石为督促黄维北上援徐，对其封锁消息，命他率兵团立即行动，直取宿县，打通徐蚌，北援碾庄。

黄维是黄埔一期生，对蒋介石一向忠心耿耿，唯命是从。他虽然明白，眼下战局瞬息万变，攻占宿县，打通徐蚌根本不可能，而此去宿县必凶多吉少，但又不放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只好硬着头皮命令部队，23日向南坪集进攻，打开通道，渡过浍河，向宿县前进。

浍河发源于河南省商丘地区，向东南经南坪集流向固镇。南坪集位于浍河南岸，从蒙城至宿县的公路经南坪集与浍河相交。浍河水深，不能徒涉，附近只有南坪集有座大石桥。黄维兵团机械化程度高，携带大量车辆、坦克、重炮等辎重，要渡过浍河向宿县进军，就必须通过南坪集大石桥，所以，南坪集是黄维兵团的必经之地。坚守南坪集阵地的是陈赓指挥的第四纵队的将士们。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从早晨9点直打到日落黄昏。敌人主力分3路进攻，使用了所有飞机、火焰喷射器、榴弹炮、坦克等重型武器，但在第四纵队的顽强阻击下，始终未能接近阵地。

23日夜，在小李家坐阵指挥的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突然决定放弃南坪集，诱敌深入，以第四、第九纵队在浍河北岸布置成囊形阵势，诱敌十八军主力进入浍河以北囊形阵势以内，利用浍河隔绝敌人，以便以四、九纵钳制十八军，以一、二、三、六、十一5个纵队由东西两侧出击敌人，先歼灭第十四军、十军、八十五军。解放军放弃南坪集后撤，黄维不知是诈，以为攻击得手，遂令十八军于24日经南坪集渡过浍河，其余部队陆续跟进。当十八军通过南坪集进入浍河以北四纵、九纵布置的囊形阵地后，黄维很快发觉中了圈套，又急令十八军缩回浍河南岸。这时，中野各纵主力趁敌人混乱之际展开猛烈攻击，将黄维兵团压缩在浍河与淝河之间，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纵横不到15里的狭小地区内，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

双堆集位于蒙城至宿县公路以东，南坪集东南，是一个有100多户人家的平原集镇，因这里有两个古老的土堆而得名。一个是平古堆，高

30.9米，一个是尖古堆，高30.8米，两堆相距约二三里，堆上建有庙宇。双堆集就在这两个古堆的中间，黄维兵团的兵团部就设在双堆集西南的小马庄。

蒋介石得知黄维兵团被围后，即令黄维向东攻击，突破包围，与李延年兵团会师。黄维遵命于27日组织4个师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向双堆集东南方向突围，但解放军已在东南部署了强大的火力，而第八十五军第一师师长廖运周又在来围中率部起义，突围失败。从29日起，黄维兵团主力全部收缩在双堆集、南坪集、邵围子、蕲县集、芦沟集几个村落里，构筑大量地堡群，依托环形阵地和高炮、坦克，坚守待援。

黄维兵团是蒋介石的王牌主力之一，一向号称“攻如猛虎，守如泰山，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此刻，12万人被解放军团团围在几个小小的村落间，攻击不成，守无屏障，急得如同一头咆哮的困兽。

邓小平在距双堆集仅十多公里的小李家兴奋地说：

“这回，我倒要看看黄维守着这两个尖土堆，怎么样攻如猛虎，动如脱兔？”

自从围歼黄维兵团的部署确定以后，作为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便主动承担了大量的、繁重的战役的具体组织和指挥工作。他对刘伯承、陈毅说：

“两位司令员同志，我比你们小几岁，身体也比你们好，具体工作让我多做些，夜间值班我也多值些。当然，大的决策指挥，还得靠两位司令员，靠我们三个‘臭皮匠’，只是具体工作由我多做些。”

在征得刘陈的同意后，他正式向作战科的同志们宣布，一般事情多找他请示报告，重大事情同时报刘、陈、邓。

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开始后，邓小平天天守在作战室，刘陈邓共同商定的各纵队的作战任务，多由他在电话上向各纵队首长传达和部署，他向值班员规定，凡前线的战报，必须随时向他汇报。掌握第一手材料，是他的特点之一，除了每日听取汇报，处理电文，他天天亲自找各纵队首长通电话，一方面督促、检查各纵执行作战计划、命令的情况，一方面了解前线的战斗进展状况。

这时，淮北平原已进入地冻天寒的隆冬季节。北风呼啸，大雪纷纷扬扬，淮海战场被裹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寒冷的夜晚，邓小平常常坐在作战室里，等待着前线的战报。有时等得实在焦心，便从口袋里摸出一副扑克牌，独自一人玩牌。

东进以来，邓小平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作为总前委书记，他要负责淮海战役全局的决策、谋划、部署等问题，协调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的作战；作为中原局书记，他要亲自督促布署中原解放区的支前、战勤和供应工作，以切实保障决战的顺利进行；作为中原野战军政委，他要具体领导中野的工作，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同时，做好全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保证部队和前方将士的旺盛的战斗力。在这些日子里，邓小平日理万机，操劳备至，脸上生出好长的胡茬子，本来就已很突出的颧骨现在又高出了许多，显得又黑又瘦。邓小平一向讲究仪表、军容，可眼下军务繁忙，他已顾不得许多了。不过，有一件事他却天天不忘，那就是洗冷水澡。寒冬腊月冲凉水澡，这对于北方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一位见过邓小平冲凉水澡的小李家的农民说：“天那么冷，我们捂在被窝

里门都不敢出，他敢冲凉水。警卫员从井里打来一桶桶水，站在凳子上给他冲，他就喜欢洗凉水。”

12月30日，战局发生了变化。蒋介石鉴于黄维兵团被围，徐州孤立难守，打通徐蚌线的计划已难以实现，命令杜聿明放弃徐州，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经永城、涡阳、蒙城南下，先解黄维兵团之围，再一同南撤；刘峙飞赴蚌埠，指挥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继续北援，以期接应。30日夜，杜聿明率30万人撤离徐州，沿徐州至永城公路西撤。

邓小平接到杜聿明撤离徐州的情报后，即与刘伯承、陈毅研究，对整个部署作了紧急调整：华野11个纵队分3路向永城、涡阳、亳县急进，阻击和拦击敌人；中野各纵加紧缩小对黄维兵团的包围圈，准备发起总攻击。

永城，在徐州西南90公里处。如果敌人到了永城，就可往西分散逃走，往东南兜击中原野战军侧背，后果不堪设想。当时，华野、中野主力都集中在徐州周围、蚌埠地区和双堆集附近，一时难以赶到，而永城地区只有豫皖苏第三军分区部队守备。紧急中，邓小平直接要通了三分区的电话。他首先询问了永城地区守备部队的情况，讲明了眼下徐州之敌正向永城撤退的意图，接着十分严肃地说：

“总前委已命令华野几个纵队日夜兼程赶往永城堵截敌人，在大部队到达之前，如果敌人先头部队赶到，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通过永城！即使打到一兵一卒也不准敌人通过！”

12月2日，从蚌埠地区赶往永城阻敌的华野第二纵队正好通过小李家村外，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兴奋异常，一同到村外检阅。邓小平对第二纵队首长说：

“情况紧急，敌人工星夜向永城前进，那边部队少，你们要跑步前进！”

他想了想又说：

“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飞机轰炸扫射，不管掉队多少，一切都不要顾及，一定要挡住敌人！”

当陈毅看见队伍中不少干部战士背了许多东西，立即命令：“把背包丢掉！轻装跑步前进！部队减员一半也要赶到敌人前面，在永城堵住敌人！”

12月4日拂晓，华野各纵采取三面突击，一面堵击的战法，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包围在徐州西南陈官庄、青龙集地区。

这时，黄维得知徐州之敌南援，李延年、刘汝明亦向北靠拢，又得意嚣张起来，连日来加紧准备，妄图突围。总前委命令部队一面继续压缩包围圈，一面准备调用预备队，发起总攻。

12月5日，邓小平代表总前委，向所有部队下达了对黄维兵团作战总攻击的命令。

12月6日16时30分，中野各纵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

围攻部队根据敌人的防御态势，组成3个集团：以一、三纵、华野十三纵为西集团，对马围子、北玉皇庙地区之十军十八师、十八军、八十五军各一部阵地进攻；以六纵及华野七纵为南集团，向双堆集及其以南之敌进攻；以四、九、十一纵队和华野特种兵纵队的炮兵主力为东集团，攻击双堆集以东之敌。

黄维兵团到底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他们利用这一地区村庄多为互不连接的独立家屋，且多沟渠的特点，组成坚固的防御体系，以大量的地堡群、掩蔽部及交通壕构成，且互相贯通。工事越到纵深越坚固，兵力亦愈到纵深愈雄厚。中野和华野的联合攻击遇到敌人的顽强抵抗，而且越往纵深发展，抵抗也越激烈。刘陈邓命令部队，避开敌人火力，采取稳步前进，占领一村，巩固一村战法，提高了歼敌效果，减少了伤亡。

12月12日，刘伯承、陈毅以中野、华野司令员名义，发出《促黄维立即投降书》，黄维拒绝投降。13日，刘、陈、邓调整部署，调华野三纵和鲁中南纵队南下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统一指挥华野第七、十三、三纵、鲁中南纵队、中野六纵5个纵队，置重点于南面，直攻双堆集。

这时，被围在双堆集地区的黄维兵团，经过十多天的抵抗，损失惨重，弹药不足、粮食断绝。蒋介石虽天天派飞机空投物资，但包围圈大小，大部分物资都落在解放军阵地上，许多官兵和伤员在饥寒交迫和失望中死去，黄维兵团已陷入绝境。

13日，中野、华野发起总攻。战至15日，全歼黄维兵团。黄维突围不成，被解放军生俘。

与此同时，由蚌埠北进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亦遭到华野的阻击，未能与黄维兵团靠拢。黄维兵团被歼后，李、刘两兵团撤至淮河以南。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胜利结束。

1949年1月6日至10日，华野主力向被围在陈官庄地区的杜聿明发动攻击，全歼杜聿明集团。至此，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在两个月的作战中，中野、华野共歼敌5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直接威胁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和武汉等城市，为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在艰苦的决战岁月里，邓小平以其战略家气魄和胆略，以中野全部拼光的决心和勇气，亲自策划和指挥了双堆集歼灭战，描绘了淮海战役中最为壮观，最惊心动魄的场面，创造了中原野战军历史上又一次光辉的战例。

后来，邓小平在关于《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的题词中写道：

“双堆集胜利仅仅是全国千百次重要胜利的一个。一如坚持大别山的意义一样，只能把它的宝贵经验提取出来，作为我们继续进步的基础，而不能把它变成障碍自己前进的政治包袱！”双堆集歼灭战结束后，邓小平于1949年1月3日亲自起草了《关于歼灭黄维兵团的初步总结》，以邓小平、张际春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在这个总结中，他以多半的篇幅用来总结对黄维作战的经验，其中包括组织进攻，战术、政治攻势、战前动员、战勤供应、战场纪律等各个方面。这些经验对于中原野战军下一步的渡江作战和解放全中国的战斗都是极其宝贵的。

准备渡江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黄维兵团即将全部被歼时，韦泽东于1948年12月12日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黄维兵团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5人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体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由刘伯承将意见带到中央。

12月17日，刘陈邓驱车前往萧县蔡凹村华野指挥部与粟裕会合，第二天，谭震林也从山东兵团指挥所赶来参加前委会议，这是总前委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也是唯一的一次。会后，刘陈前往西柏坡向中央汇报，谭震林回山东兵团，粟裕留在蔡凹村继续指挥陈官庄地区的围歼战，邓小平返回小李家。

1949年1月1日，邓小平率总前委指挥部在宿县乘缴获的刘汝明6号专用包车经徐州来到商丘。当时，商丘是淮海战役支前总兵站，车站的站台上、仓库里到处是各种各样的支前物资，商丘车站已经变成一座座的炮弹山、炸药山、粮食山、布匹心、服装山、军鞋山。看着眼前这堆积如山的支前物资，邓小平脸上绽开了笑容，正是由于后方的同志们想尽办法，保障了前线所需要的一切物资，才有了淮海战役的胜利啊！他找到商丘总兵站的同志和中野负责商丘支前工作的杨国宇，对他们说：

“搞得不坏嘛，应该给你记一功！”

总前委指挥部设在商丘以南十几公里处的张菜园。这时，刘伯承、陈毅去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工作尚未返回，粟裕、谭震林正在前线指挥围歼邱、李兵团的作战，邓小平一人坐阵总前委，既要指挥前方作战，处理各种电文、报告，又要总结淮海战役各项工作，部署中原野战军的休整、补充任务。1月3日，邓小平起草了《关于歼灭黄维兵团作战初步总结向中央军委的报告》。1月10日，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作战胜利结束，全歼杜聿明集团，邓小平于这一天向毛泽东作《关于淮海战役期间部队情况报告》。

继淮海战役之后，平津战役也取得了胜利，这使全国的形势又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解放军已经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和中原的广大地区，消灭了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奠定了进一步取得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毛泽东高瞻远瞩，于1948年12月30日所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庄严声明：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初步决定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应争取解放湘、鄂、苏、皖、浙、闽、陕、甘9省，指出，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之后，几个大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在准备渡江作战的工作上，邓小平又一次显示了他非凡的组织才能。渡江作战，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大进军，是规模空前的大兵团作战。准备工作紧张、繁重、艰巨，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作战。部队的休整、补充、整编计划要进行，全军的政治动员、思想教育、渡江前的军事训练要一一安排，中原局、中原解放区的各项工作要部署，渡江作战计划及

有关具体问题要研究，而刘伯承、陈毅又远在西柏坡未归，这一切都要邓小平这个总前委书记亲自过问，亲自安排。这段日子，总前委指挥部和中野指挥部，忙得不可开交，但在邓小平的运筹和指挥下，虽然紧张繁忙，却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1月29日，邓小平在商丘市城里圣公会礼拜堂主持召开了中原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刚从西柏坡返回华野的陈毅，还有邓子恢、李达、张际春以及各纵队首长、各区党委负责人、郑州、开封两市负责人，共100多人，这是中原解放区创建以来第一次盛会。

这次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学习了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总结了淮海战役和中原解放区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讨论了关于准备渡江作战的一些问题。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邓小平于2月9日向毛泽东写了《在华野中原高干会上传达中央政治局决议的经过情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经过听报告、阅读文件，分组讨论和汇报作结论后，一致拥护政治局决议和毛主席的指示。特别毛主席指示的，坚持人民革命立场，揭露各种类型的丧失阶级立场、迁就资产阶级、羡慕并俯就帝国主义等奴性倾向，以及因胜利到来而轻敌骄傲、对现在未来不懂得比较，无预见无分析等表现，对到会的同志均有极大启示，提高了大家的警惕性并均联系部队和地方工作的实际有了原则的检讨。我们认为经过此次会议必然在思想斗争上、政策掌握上、工作部署上获得改善和提高。”

这次会议还研究了关于部队的整编工作。

根据中央军委1949年1月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指示，2月5日，中原野战军转发了中央军委关于中原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命令，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组成第二野战军前委，邓小平为前委书记。原中野7个纵队扩编为第三、第四、第五3个兵团，分别由陈锡联、陈赓、杨勇任兵团司令员，由谢富治、陈赓、苏振华任政委。另新建野战军特种纵队，由李达兼任司令员和政委。全军共28万余人。

产部队整编前后，加紧了渡江进军的准备工作。1月初，邓小平签发了《两个月整训的军事政治工作大纲》，后来，他又亲自组织宣传部编写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人民军队要作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两个政治教材，发到全军。各部队结合战后评功、选模、授奖，进行了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在指战员中深入开展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和遵守政策、执行纪律的教育。通过对和平问题、美国出兵干涉问题、敢不敢渡江等问题的辩论，使全体指战员认清了国民党假“和平”的真面目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增强了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的信心和斗志。

2月8日，中央军委发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指出新解放区的一切工作干部，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解决，要求军队必须着重学习党的各项政策，学会管理城市，准备接收并管理城市。根据这一指示，邓小平要求全军普遍进行城市政策、新区政策的教育，并采纳中原解放区的经验，在部队中组织了一些城市接收机构，为进入江南新区，接管城市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刘伯承从华北回到商丘后，也参加了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他亲自

起草了《渡江作战之研究》、《敌前渡河战术指导》、《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等教材，指导部队进行游泳、划船、水上练兵等各种训练，消除了一些战士对长江的恐惧感。

关于渡江作战的具体方案，邓小平于2月8日在商丘主持召开了总前委会议，中原局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由邓小平作了关于国际国内形势报告，提出了渡江战役的要求。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集中第二、第三（原华东野战军）野战军在长江下游实施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华东、华南，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军事干涉的指示，会议讨论了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战勤准备等问题。会后，总前委向中央军委作了《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的报告，请中央军委考虑速示。

2月11日，中央军委批准了总前委的渡江部署，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淮海战役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责。”

2月28日，邓小平和陈毅同赴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后，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统一领导和主持华东局和总前委的工作。

邓小平回到中原后，于3月20日在蚌埠附近的孙家圩子，召开二野、三野高级干部会议，主持讨论渡江作战方案。31日，总前委和参加会议的同志乘火车到合肥，在合肥以东的瑶岗，继续渡江具体部署。当天下午，邓小平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亲自草拟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以总前委名义上报中央军委。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规定，以第二、第三两野战军组成东、中、西3个集团，于4月15日18时，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先歼灭沿江防御敌人，然后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南京、上海、杭州，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纲要》预定战役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行战役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根据部署，第二野战军为西集团，在棕阳镇至望江段实施渡江，第三野战军为中、东集团，在贵池至芜湖和扬中至江阴间实施渡江，另以从平津地区南下的第四野战军（原东北野战军）之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约20万人，在刘伯承指挥下，占领武汉以北及以车地区，钳制白崇禧集团，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作战。这时，第二野战军各兵团已分由早阳、沈丘、漯河地区进抵长江北岸，第三野战军也到达预定位置，作好了渡江作战的准备。

因国共代表还在北京谈判，截止时间为4月20日，中央军委确定4月25日以后渡江。邓小平根据侦察员报告并查阅了近40年水文资料，得知长江下游每年5月初江水上涨，从4月15日至5月初这段时间，长江水位稳定，风浪小，便决定将渡江时间提前到4月20日。

4月17日，邓小平向中央军委建议，4月20日渡江，22日总攻，并提出，渡江战线长达千里，各部队渡江时间不必强求一致，中集团20日渡江，东、西集团21日渡江。

4月18日，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方案，并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

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当夜，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了几个月的长江防线，浩浩荡荡渡过长江，先后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及苏、皖、浙、赣等省广大地区，彻底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邓小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这一天，他在建国题词中写道：

“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们用了自己的鲜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

新中国的诞生，凝聚着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的结晶，然而，这一天并不意味着革命和奋斗的完结，等待他们的是更加艰巨，更为严峻的新的历史使命。而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当年45岁的邓小平，在经历了27年风风雨雨的磨练之后，又象创建中原新解放区时那样，在古老，沉睡的中国大地上，开创了一个改革、开放、振兴、腾飞的新世界。

